

# 红旗

HONGQI

9-10

一九六一年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六一年第九十期★

## 目 录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 ..... 施东向 (1)

古巴人民抗美爱国斗争胜利的

伟大意义 ..... 于兆力 (11)

再谈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

“积木化”问题 ..... 侯镇冰 鄧 明 关士斌 陆纪培 (18)

查明地下水资源 支援农业生产 ..... 何长工 (42)

加速发展化学肥料和农药的生产 ..... 李超伯 (48)

充分利用肥源, 增积有机肥料 ..... 土 丰 (53)



# 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方法

施 东 向

整整二十年前，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澤东同志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学习》的报告。这篇报告是在我們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文献。

毛澤东同志在报告中說：

“我們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內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变的內部联系，作为我們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須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結論。这种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学的結論。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譁众取寵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实际統一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風。”

这种理論和实际統一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作風，是毛澤东同志在我們党内一貫提倡的作風。《改造我們的学习》这个报告对于把这种作風普及于全党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十年前，在我們党內的許多同志中，

曾經存在过一种坏的作風，这就是毛澤东同志所指出的主观主义的作風。这种作風表现在研究工作上，就是“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論’研究上。”这种作風表现在实际工作上，就是“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是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風。针对这种坏的作風，当时毛澤东同志反复指出，必須認真注意对周圍环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这样才能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結合起来，这样才是理論和实际統一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作風。

我們党的历史证明，当毛澤东同志所提倡的理論和实际統一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作風領導着全党的时候，我們党的事业就能够发展，革命就能够取得胜利。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制定和在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我們在任何一項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中，都应当采取从实际出发的态度、理論和



实际統一的态度。各人的才力虽然有大有小，但只要不沾染上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作风，只要勤勤恳恳地注意研究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就能够在研究工作或实际工作中得到积极的成果。反之，如果只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那就必然一事无成。这也是为无数的事实所证明的了。

\* \* \*

人們的思想必須符合于客观的实际，一切原則、原理必須在研究客观存在的事实之后才能得到，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則。关于这点，恩格斯曾經很明白地說：“原則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終了的結果；这些原則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并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則，而是相反地，原則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于事物的唯一唯物的观点”<sup>①</sup>。

恩格斯說这段話是为了批駁一个德国哲学家杜林的錯誤观点。照杜林說来，哲学包含着一些最高的基本原則，这些原則純粹是从主观思維中来的，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这些臆想的原則应当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而自然界和人类则应当适合于这些原則。

恩格斯的观点和杜林的观点針鋒相对，一个是唯物主义的，一个是唯心主义的。

历来有許多唯心主义哲学家，自以为“創造”了某种“偉大的体系”，其实他們不过是虛构出来了一些原則和公式，硬說这些原則和公式已經包罗尽世界上一切业已发生和还未发生的事情。而且照他們看来，既然他們的体系已經給一切問題准备下了現成的答案，所以别人和后人的任务就只是把这些原則和公式简单地安置到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上去罢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彻底摺棄这种唯心主义的創造体系的把戏。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根本上同这种唯心主义体系相反。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論是研究了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和社会历史，总结了人类历史的經驗，特别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經驗，并且綜合了各門具体科学的研究成果，然后得到的。他們的理論是从客观实际中来的，他們也不准許别人从他們的理論中寻求对一切具体的实际問題的現成答案，把他們的理論当成一个呆板的公式简单地套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研究的历史材料，当然只可能是在他們当时已經发生的历史事实；他們所掌握的自然科学的材料也不能不受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但是他們深入地研究了这些材料，抓住了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中最本质的規律性，因而得出了普遍性的原理。这些普遍原理能够成为我們

<sup>①</sup>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頁。





研究一切問題、进行一切工作的可靠的指南。这就是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我們提供了一种正确的原則，正确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在这些原理的指导下研究新的实际，研究前人所沒有解决过的新的問題，就不至于迷失方向，就有可能达到正确的結論。但是如果以为在解决具体問題和新的問題时，只要依靠普遍性的原理，用不着再花气力根据具体的材料进行具体的研究，那就是完全錯誤的了。

一切科学的概念和对事物的規律性的認識，都是从对具体事物的反复考察和研究中取得的。人們考察和研究某一类事物，深入認識了它的內在的本质，撇棄了它的某些外在的、偶然的現象，这样才能获得对这类事物的科学的概念，把握这类事物的規律。一个科学概念的确立，一个客观規律的发现，标志着人們对某一类事物的認識过程的一个阶段。以后，人們要研究屬於这类事物的任何現象，就可以而且必須利用这一科学概念和这种規律性的認識。例如，馬克思主义从社会发展历史的大量材料中得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概念，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样的規律。人們如果拋棄这些科学概念，背离这一規律，就不可能对于今天和今后的社会发展历史进行科学的研究，作出科学的說明。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看到，某一类事物的科学概念和規律性的認識，并沒

有，也不可能把这一类事物在現象上的复杂多样性包罗无遺。科学概念和規律性的認識，因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反映，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正因为如此，同現象比起来，它們是比較單純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說：“規律把握住平靜的东西——因此，規律、任何規律都是狹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sup>①</sup>并且說：“現象比規律丰富”<sup>②</sup>。举例說，任何社会的基本矛盾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在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中，显出的具体形态是十分复杂的。有时，这二者間基本上相互适应，有时則发生激烈的冲突，它們之間的相互适应和相互冲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具有种种不同的具体形态，它們以及它們之間的关系又受到社会上层建筑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等等。很明显，如果人們只是简单地套用社会发展的一般規律，而不去具体研究特定条件下、特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那么就不但不能获得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認識，而只会使自己的認識貧乏和简单化，并且在实际上使普遍性的原理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

所以，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不但一切普遍性的原理都是从客观实际中得来的，而且在用普遍性的原理做指导去解决具体問

① 《哲学筆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9頁。

② 同上书，第160頁。



題时，也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則。

由此也可看到，为什么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在建立他們的完整的科学理論体系的时候，再三要使人注意他們的体系在性质上同唯心主义的体系根本不同。他們的体系不是提供人們一整套答复一切具体問題的現成答案，而是提供了一个研究一切問題的科学的方法；不是要人們停止进行研究，而正是要人們开展真正科学的研究。恩格斯曾經十分尖銳地批評那些不是把他們的理論当作研究方法而是当成公式的人。他說：“一般說来，对于德国許多青年作家，‘唯物主义的’这个形容詞不过是一个套語，他們用这个套語去处理各种事物，再也不花什么气力去作进一步研究，也就是說，他們一把这个标签貼上去，就以为一切都解决了。然而，我們的历史观首先是个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一种用以按黑格尔学派方式构造体系的手段。全部历史都应该开始重新研究。”<sup>①</sup>

我們必須采取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要求的这种态度来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毛澤东同志所提倡的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設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原則，就是这种唯一正确的态度。

毛澤东同志說：“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对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永远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宁主义并

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断地开辟認識真理的道路。”<sup>②</sup>

毛澤东同志曾着重論述了人类的認識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結。他強調指出，一般真理并不是凭空出現的东西，不是人們所不能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同时又指出，人們在認識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还必须繼續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这是因为，客观事物是复杂多端、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比一般原理要丰富得多。一切事物有它們的共同規律和本质，但各类事物又有自己的特殊規律和本质；同类事物有它們的共同規律和本质，但同类事物中的每一个別事物又有它的特殊規律和本质。反映事物共同規律和本质的一般原理，沒有也不可能把已有的和尚未发生的各种事物的一切特殊規律和本质完全反映出来，从而沒有也不可能为人們提供出解决一切实际問題的具體方法。

这是一个极其明显的道理。例如，馬克思主义从資本主义社会各階級的相互关系、階級斗争实践出发，通过对資本主义社会特殊的階級关系的深入的分析，发现了各个階級社会中階級斗争的一般規律，得出了科学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國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版，第487頁。

②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4頁。



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掌握了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它去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就不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所迷惑，就可以认清各个阶级的本质和它们之间发生的必然关系。但是，各个阶级社会、各个国家具体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情况是不同的。拿中国来说，中国有一切国家都具有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共同规律，又有它的特殊规律。只有对中国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斗争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认识了它的特殊规律，认识了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联系，才能得出在中国处理阶级关系、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的具体政策和办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解决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的许多问题的武器，但它不能代替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分析，更不能指出处理中国阶级关系的具体办法。对于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方针政策，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发展的总的情况和一般规律。但中国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阶级关系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只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才能规定出当时当地正确处理阶级关系的具体办法，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指出人们的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时这样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

先认识了许许多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sup>①</sup>

\* \* \*

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报告中，深刻地阐明了这个道理。他说：“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

<sup>①</sup>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8页。



都必須先有情況的了解，然後才会有好的處理。”這也就是說，不論做理論、學術的研究工作，還是做實際工作，都必須嚴格地遵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主義原則。

一切從實際出發，重視調查研究，這就是要尊重事實，對事實採取客觀的、科學的態度；就是要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了解事物，找出事物內部所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

我們的調查研究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指導下進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指導我們透過事物的現象尋求事物的內部聯繫、事物的本質，根據事物發展中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過程，把握它的發展規律性，而獲得科學的預見。因為我們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所以我們對待客觀事物的態度和狹隘經驗論者根本不同。狹隘經驗論者只是匍匐在個別的、片斷的現象材料面前，在尊重事實的名義下把自己和別人的眼限制在極其狹窄的範圍內，因而只能得到某種同客觀事實不相符合的、片面的主張。

只要正確地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會發生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事實不相符合的問題。有人覺得，有時好像會發生這樣的情形：照理論上說來，應當是如此；而事實上却偏不是如此。這種說法是根本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理是最概括也是最全面性的理論，它不允許把它的任何一個原則理解為片面性的、僵化的“條令”；它充分估計到任何一個原則表

現在客觀事實上，同錯綜複雜的多方面條件相結合就會呈現無限的多样性。例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經濟基礎決定社會上層建築，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出發點。但是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原理不但不排斥，而且確認了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並且認為社會意識、上層建築這些方面在一定時候、一定條件下，甚至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是從社會生活的各種因素的多样的相互作用之中指出經濟因素歸根結底起着決定的作用。當我們具體考察社會生活的發展時，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就在於使我們如實地考察社會生活的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又不致於為這種多样性所迷惑，以致看不到社會發展的根本規律。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會要求我們否認這個或那個事實，而只是幫助我們科學地了解這些事實，並從客觀事實中得出應有的結論。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個別問題上的結論是可以改變的。由於條件的改變，形勢的發展，時代的變化，原來適合於客觀情況的個別的原則和結論要被新的原則和結論所代替。但是作為我們的研究工作的指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並沒有改變，只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運用於這一社會發展條件得到了這一個結論，而運用於另一社會發展條件得到了另一個結論。



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看成脱离实际的片面性的东西，就会导致否认和抹杀某些事实，同样也会导致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以及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修正主义者，都常常首先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提出他们所谓的某些事实材料来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以为，他们举出的这些事实材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所无法解释，只好回避的。其实，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回避任何事实，而是对于任何事实力求给以科学的说明。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和修正主义者，如果不是捏造事实，也只是把某些在发展过程中的片断的非本质的事实材料加以夸张，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罢了。老的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都是用这种伎俩装出一种很“客观”，很“注重实际”的模样，利用某些眼前事变，某种细小的政治变动，企图迷惑视听，推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而为资产阶级效劳。

我们进行调查研究，总是抱有一定目的的。事先抱着一定的目的，是否会妨碍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客观事实呢？

如果人们预先抱着一种主观臆想的、或者歪曲事实的成见，进行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替自己的这种成见找“证据”，这样的目的当然只会产生主观主义的态度，使人不能如实地、全面地考察客观事实。这种目的是同客观的、科学的态度相对立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调查研究不需要抱有任何

目的。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我们不是为调查而调查，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因为有了要解决的问题，才去调查研究。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发现其中的规律性，是为了使我们的行动有正确的向导，使我们能够在实践中有效地推动事物的发展。在革命中，我们的调查研究是为了促进革命事业；在建设过程中，我们的调查研究是为了促进建设事业。这样的目的本身就是从客观实际的发展中提出来的。抱着这样的目的去调查研究，不但不妨害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客观事实，而且是进行客观的、科学的研究的必要前提。

科学地认识客观事物是要花苦功的。要搜集大量的材料，看到事物的各方面的联系，既看到这一方面，又看到那一方面；要不为任何假象所欺蒙，一定要揭开假象，揭露事实的本来面目；要不为任何根据某些个别材料所已经达到的判断和结论所束缚，如果出现新的材料，新的实践，就要舍弃或修改那些不完全、不恰当的判断和结论，如此等等。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要达到符合于实际而有利于实践的结论，无非是因为一切不合乎实际的结论不能在实践中达到推动我们的工作、发展我们的事业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谈到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系，谈到了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的结合。实际精神使革命气





概得到充实的内容；只有科学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成效地改造世界。也正因为抱着改造世界的革命气概，才要丝毫不苟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所以，把高度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科学性结合在一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调查研究工作的特征。

在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很多人注意了调查研究、掌握材料的工作，因而在研究工作上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至今在一些同志的研究工作中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种不良的作风。当一个问题摆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事实如何，而只是书本上所说的某一个定义。他们的研究工作，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他们根据现成的定义来进行推论，所用的方法不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的方法，而只是演绎法。

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这样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sup>①</sup>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必须

认真执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

为什么从定义出发是一种不正确的方法呢？

任何科学的定义，同一切科学的抽象一样，都只能概括某一事物的主要内容，不可能把事物的全部内容包括进去。任何一个科学定义，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列宁在他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驳斥了考茨基对于帝国主义所作的错误定义，并且指出，考茨基的错误定义是他全面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那一套思想体系的基础。针对考茨基等人的机会主义观点，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的科学定义。但是列宁又指出，他所提出的每一个定义都不是绝对的。他说：“如果要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sup>②</sup> 但他立刻又说，这样简短的定义虽然概括了主要的内容，但还不能使人特别明显地看出它所说明的那个现象的各个极重要的特点。因此，他又给帝国主义下了包括帝国主义的五个主要特征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上，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54—855页。

②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8页。



业已确立，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已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資本主义国家已把全球領土瓜分完毕。”<sup>①</sup>可是即使这个定义，列宁也不认为是絕對完备的。他說：“如果我們不仅注意到帝国主义的純粹經濟上的主要現象（上述定义只包括了这些現象），而且注意到資本主义的現阶段在整个資本主义发展中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別的关系，那末我們就可以而且应当給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sup>②</sup>由此可見，我們固然必須排斥錯誤的、不能反映事物本质的定义，但是也不能死抱着某一个简单的科学定义，而以为一切尽在于此。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作家对各种概念提出定义的时候，都是以大量的事实材料为根据，都是結合着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而决不是要求人們仅仅記住一个简单的定义。但是从定义出发进行研究工作的人，却往往是使这个定义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死板的軀壳，因而在实际上是剝脫了这个定义所具有的科学意义。而且，我們既然在进行研究工作，就絕不能仅仅限于知道某一已有的定义的内容，使自己的認識停留在原有定义的限度內。我們进行研究工作是要进一步深入地認識事物，是要認識新出現的事物。已有的科学定义能够給我們以帮助，但我們也只能把已有的定义当做进一步向具体事物进行探索的方法和基础。

从定义出发，是“省力”的方法，然而是不可靠的方法。采取这种“省力”的方法的人，如果不是閉眼不看事实，一味进行概念的游戏，那也常常会因为无法把丰富的事实装进被他們的理解弄得狹隘的定义的框框里去而陷入混乱。

研究工作从实际出发是艰苦的事情，要付出辛勤的劳动。但舍此別无他法。

从实际出发，还不能說就一定会立刻得出科学的結論。有时，人們虽然搜集了丰富的实际材料，但还作不出完整的結論来。这或者是由于事实的发展还没有把所要处理的問題的本质的东西充分显露出来，或者是由于在研究工作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客观的事实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們的認識也总是从比較不完全的認識逐步发展到比較完全的認識。因此，我們就要不断地注意新出現的事实材料，并且在已有的認識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調查研究工作的水平。总之，只要真正搜集了反映实际的材料，加以分析研究，而且繼續不断地努力，总是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結論的。

毛澤东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学习》这个报告中告訴我們，研究一个問題，既要研究它的現狀，又要研究它的历史，要对它的周圍的环境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要像馬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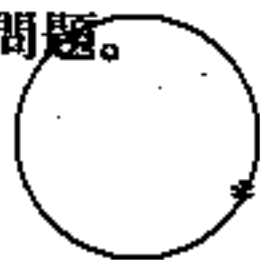
<sup>①②</sup>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9頁。



所說的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如果只是隨意地找一些个别的、片断的事实材料，就急忙得出結論、形成观点，那是靠不住的。如果只是用个别的事实材料，去适合从別人那里搬来的、沒有經過自己消化的、或者自己凭空設想出来的观点和結論，那也同科学的研究毫不相干。列宁曾这样說：“在社会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这是沒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辯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連儿戏也不如。”<sup>①</sup>

我們說要掌握事实的总和，并不是說，在研究一个問題的时候，不着边际地去搜罗过多的材料；更不是說，在說明問題时，要把一切在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的材料都罗列出来。为了研究一个問題，必須占有和問題的各个侧面有关的足够的大量材料，而且往往难免要接触到一些在經過研究以后看来是不必要的材料。不經過对大量的有关材料的研究，就无法形成正确的观点，也无法选择能够說明問題的典型材料。經過认真的科学研

究，就能对材料有所取舍，从而用必要的典型材料来論证所要說明的观点。这是材料和观点的辯证統一：材料形成观点，观点又統率材料。只有一大堆材料而沒有形成明确的观点，或者只有观点而沒有能够說明观点的必要材料，都不能正确地說明問題和解決問題。



毛澤东同志的《改造我們的学习》这个具有偉大意义的报告的根本精神，就是要我們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結合起来，要我們时刻注意克服理論和实际相脫离的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風。毛澤东同志在这篇报告和其他許多著作中，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我們党的历史經驗，強調地指出，要做到这点，必須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从馬克思列宁主义中寻找解决实际問題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必須进行周密的系統的調查研究，掌握丰富的、詳細的实际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研究。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为了做好我們的一切实际工作，为了加强我們的科学研究工作，我們一定要认真地实行这个方法。

<sup>①</sup> 《統計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頁。





# 古巴人民抗美爱国斗争

## 胜利的偉大意义

于兆力

古巴人民粉碎了美国利用雇佣軍对古巴的武装侵略。这个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全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武装侵略，突出地表现了肯尼迪政府推行侵略政策的本质。肯尼迪竞选总统以来伪装和平所积下的政治資本一下子輸掉了。

肯尼迪政府是在美帝国主义国际地位江河日下和国内經濟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上台的。为了摆脱美帝国主义的困窘处境，这个政府上台后，特别标榜什么“处理世界关系的新态度”。美国統治集团竭力鼓吹肯尼迪政府改变了美国政府原来所执行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说什么肯尼迪政府的政策是謀求和平的政策。其实，肯尼迪的所謂“处理世界关系的新态度”，就是要更狡猾地使用反革命的“两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一手抓橄欖枝，一手抓箭。

肯尼迪和他的亲密的助手們认为，只要能达到侵略的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采用。現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他上任以前主持編写的一个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报告中

曾經說过：“斗争有許多場所，許多方法；但是有它中心的目标，而方法一般也是互相配合的。根据形势的需要，軍事、政治、經濟和心理手段或者是交替采用，或者是兼施并用。”所謂“一手抓橄欖枝，一手抓箭”，也就是說，当他們认为和平有利的时候，就采用和平的手段，当他們认为战争有利的时候，就采用战争的手段。

肯尼迪政府发出了种种和平言論，同时又采取了空前的扩軍备战措施。肯尼迪直言不諱，美帝国主义需要爭取時間，“弥合導彈差距”，尽快地改变在軍事上所處的劣勢。他叫嚷：“国防开支必須以我們国家的安全的需要而不是以事先限定的預算为依据”，认为美国为了建立“新的導彈系統”，“应当准备不論这方面要化多少錢就付出多少錢”。美国壟断資产階級很欣赏肯尼迪这样把和平与备战“兼施并用”。他們认为，对于美帝国主义說来，“这是既现实又能获得实惠的唯一办法”。

肯尼迪的反革命的“两手”，特別明显地运用在爭夺中間地带“领导权”的斗争中。肯尼迪上台以后，动員了大批宣傳机构，宣揚美国“同情”民族独立运动，主張对中間地带的落后国家扩大經濟“援助”。与此同时，美



国又积极利用联合国和在美国控制下的其他国际组织，干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在美国所侵略的许多国家中积极扶植代理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它的舆论界，对于中间地带的“战争问题”感到极大的兴趣。他们特别强调局部战争，包括所谓“灌木林火式的战争”，“有限战争”和“次有限战争”，“游击战和反游击战”。他们认为，这是镇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夺取和控制这个广大地区所不可缺少的。

美帝国主义这次对古巴的武装侵略，就是肯尼迪政府这种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产物。

肯尼迪一上台，就诬蔑古巴为“外国和本国的暴政所统治”，“宣誓”要“消除”“这样的暴政”，并且提出组织所谓“争取进步的联盟”，企图纠集拉丁美洲国家一起来对付古巴革命。肯尼迪政府在对古巴采取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干涉手段和从古巴内部策动颠覆活动的同时，着重进行了对古巴入侵的军事准备活动。这个政府大大加紧了对麇集在迈阿密、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等地的反革命匪徒和雇佣兵的训练工作，并且指使古巴反革命流亡分子成立所谓“革命委员会”，准备在登陆古巴以后，成立反革命政权。

四月初，肯尼迪政府满心以为用武力“消除”革命的古巴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公布了题为《古巴》的白皮书，这是美国打算怎样消灭革命的古巴的反革命纲领。白皮书公然号召古巴反革命分子推翻古巴革命政权，并且表示美国将“全面和积极地支持”古巴反

革命分子准备建立的反革命政权。四月十一日，肯尼迪在电视谈话中露骨地叫嚷：“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的话”，古巴革命政权“可能成为一个比今天更大的危险”。接着，美国雇佣军就侵入了古巴。

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肯尼迪政府是这次武装侵略古巴的组织者、策划者和指挥者。肯尼迪极力掩盖自己好战的凶恶面目，给自己沾满血污的双手戴上白手套，说什么“古巴的基本问题不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之间的问题”，把美国这次侵略罪行说成是同美国不相干的。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遮掩天下人的耳目。但是，加勒比海的炮声比任何狡诈的语言都更有说服力。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美国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进攻古巴，再一次在全世界面前揭露了它的真面目，说明了肯尼迪政府只能比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坏些，而不是更好些。

世界各国广大人民同声谴责美帝国主义的这次侵略罪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了抗议美国侵略罪行的示威怒潮。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展开了空前广泛和激烈的反美示威运动，支援自己的古巴兄弟。亚非各国公众和社会舆论也强烈谴责美国武装侵略古巴。几内亚电台评论说：“人们曾经认为，肯尼迪政府会设法通过和平途径使古巴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而不至于发动极端卑鄙的进攻”，然而，“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已经公开侵略古巴”，肯尼迪政府在这次侵略古巴的行动中“起了极大的、不可告人的作用。”《柬埔寨电讯报》驳斥了肯尼迪关于这次事件



只是所謂“古巴人之間的問題”的謊言。這家報紙說：“暴亂者誠然都是古巴人，然而這些人的武裝和這些人的錢却是另一來源。是美元把暴亂者武裝起來的；是靠美元來招募僱傭兵和購買目前正在古巴製造死亡和破壞的飛機的。”

美國武裝侵略古巴的事實是這樣明顯，連美國的兩聯盟國的不少資產階級報刊也發表了“不同尋常”的評論，它們認為肯尼迪政府無法逃脫罪責，它們奚落美國“愚蠢”和“丟臉”。英國保守黨報紙《每日郵報》說：“無庸置疑，美國對這次行動的貢獻和承擔的義務是巨大的。反革命分子穿著美制軍服，配備著美制武器。替他們生產軍服的工廠，也就是替美軍生產軍服的工廠；他們的武器式樣新穎，有些武器甚至連美國兵士也不曾見過。幾個月來，在美國領土上招募、資助、武裝和訓練僱傭兵的情況，一直是公開的。”英國工黨刊物《新政治家》說，儘管美國極力為自己“洗刷責任”，“可是毫無疑問，國際輿論認為，肯尼迪政府赤裸裸地企圖以武力推翻一個鄰國政府在道義上和法律上是犯罪的。”法國《世界報》嘲笑肯尼迪“在幾小時之內，就使他進白宮時大有作為的開端所博得的同情的資本虧蝕了。”

美國僱傭兵的失敗，在美國統治階級內部引起了一片混亂。美國的許多官員和資產階級報刊都認為，肯尼迪政府這次犯了重大的錯誤。為了平息混亂，肯尼迪被迫承認，他對於這次事件要負擔全部責任。這樣，這個總統上任還不到一百天，就落在一種“比過去

任何新上任的總統都要孤立和困難得多的地位”了。

肯尼迪集團原來以為，在它的海空軍掩護下，由它所指揮的一幫僱傭軍侵入古巴，就可以打敗古巴人民；以為僱傭軍一登陸，古巴內部就會發生反革命暴亂，古巴革命政權就會垮台，或者至少可以造成反革命政權和革命政權對峙的局面，為美國繼續擴大武裝干涉造成有利條件。但是，美帝國主義的這種如意算盤是完全落空了。《紐約時報》說：“在估計什麼地方不對頭的時候，人們必須把所牽涉的三大因素——卡斯特羅政權、古巴流亡者和美國都考慮進去。在這三大因素之中現在當然應該看得很明顯的是，了解最差的是古巴國內的狀況”。這家報紙承認，美國對古巴革命政權受到“廣大民眾特別是農民”堅決擁護這一點，“一直是估計不足的”。

美帝國主義是否能從這次失敗中吸取教訓呢？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從來是過高估計自己力量、過低估計人民力量的，他們也從來不會吸取失敗的教訓，從而放棄反人民的政策。現在，肯尼迪政府仍然在進行緊張的活動，策劃對古巴進行新的侵略陰謀和軍事冒險。可是，革命的古巴人民是不可戰勝的。古巴人民在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中經受了鍛煉，不斷增強了自己的力量。他們的愛國正義鬥爭，有著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不管美帝國主義今後還會採取什麼侵略行動，它永遠也不可能阻止古巴革命的前進。



## 二

古巴人民这次能够迅速地取得胜利，就古巴本身来说，是古巴革命不断巩固和深入发展的结果。

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巴人民在以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为首的革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对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破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地镇压了国内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活动，同时，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改革。古巴实现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大庄园制度，征收了美国垄断资本霸占的全部土地，使广大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农场和农业合作社。古巴人民没收了美国垄断资本在古巴的全部企业、本国的私营大企业以及全部的私营银行，把它们变成为国有的企业，并且开始有计划地发展经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今年五一节指出，古巴人民的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页。他说，古巴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废除人对人的剥削”，这就是古巴革命政府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和思想”。

古巴革命的不断巩固和深入发展，使古巴人民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在抗击美帝国主义一系列的干涉、威胁和武装侵略的斗争中，古巴人民的反美爱国统一战线越来越坚强。为了保卫革命的果实，古巴人民广泛参加了民兵队伍。这支强大的民兵队伍，同久经考验的起义部队一起，成为抗击外国侵略者和镇压国内反革命叛乱的坚强力量。

古巴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完全有权利在自己的国土上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去进行他们想要做的一切事情，完全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所需要的社会制度，任何人也没有理由去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利。古巴人民推翻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使自己从美帝国主义和本国大庄园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他们在取得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之后把革命不断推向前进，这无非是要争取过他们所理想的生活。他们不会去威胁别人，他们也不容许别人强迫他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美帝国主义对于古巴人民的革命活动采取了十分敌视的态度，公然企图使用武装干涉的手段去“消除”古巴人民享有的合法权利，把古巴人民重新置于它的奴役之下。这当然是古巴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卡斯特罗总理说得好：“如果肯尼迪先生不喜欢社会主义，那又有什么办法！我们也不喜欢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如果他认为自己有权抗议距美国海岸九十哩的地方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那末我们也有同样的权利抗议距我国海岸九十哩的地方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当然，我们将不表示这种抗议，因为这个问题只有美国人民自己才有权利决定”。“肯尼迪企图教训古巴人民这里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是荒谬的。”

肯尼迪一再叫嚷古巴革命“影响美国的安全”，是什么“威胁整个西半球的大灾害”，这完全是无耻的诬蔑。肯尼迪企图用这种帝国主义的逻辑欺骗世界人民，要人们相信这



个世界上头号的帝国主义国家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而只不过是一个被别人威胁的受害者。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古巴进行侵略活动了。这只能是枉费心机。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只有六百多万人口和十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小国，会“影响”一个有一亿七八千万人口、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凶恶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安全，更不用说要去“威胁”什么整个西半球了。全世界公正人士都会同意卡斯特罗总理这样的话：“说古巴的社会主义危害美国安全是虚假的。古巴革命不威胁任何美国家庭的生活。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威胁它的数百万个家庭的生活的是玩弄原子战争的侵略成性的肯尼迪的侵略政府，这个政府执行侵犯各国人民权利的政策，这可能导致一场世界战争。”

早在去年十二月，美联社的一则电讯就承认，由于美国“对拉丁美洲进行剥削，并阻碍了它的发展”，广大的拉丁美洲人民“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活动怀有刻骨的仇恨”，“反美主义是激励士气的号角”。美国《民族》周刊在去年十一月说：“拉丁美洲对美国的恶感一直在逐步增长”，“每当我们对古巴发动‘惩罚性的打击’时，我们就失掉了拉丁美洲人民的支持”。这两段话，表明美国的资产阶级舆论也开始看出：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干涉古巴，难免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尽管如此，美帝国主义的本性却决定了它不会停止侵略，结果不能不又一次遭到惨败。

古巴革命的不断巩固和深入发展，不仅反映了古巴六百多万人民要求彻底解放的愿望，

也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的一种反映。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把古巴人民的革命看作是自己的事业，把古巴人民斗争的胜利看做是自己争取解放的希望，他们对古巴人民有着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感情。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人民现在还都受着美国的压迫和掠夺，他们都在为摆脱被奴役的地位而进行斗争。古巴人民第一次在拉丁美洲实现了真正的民族解放，把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统治打开了一个缺口。古巴人民站在拉丁美洲人民反美斗争的最前线，抗击和牵制着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古巴革命的胜利粉碎了那种认为离美国近就不能取得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宿命论观点，大大有利于拉丁美洲其他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增强了他们争取斗争胜利的信心。美国想要扼杀古巴革命，消除古巴革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是完全徒劳的。相反，这只能激起拉丁美洲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更大愤恨和反抗。美国这次武装侵略古巴，再一次激起了席卷整个拉丁美洲的反美示威怒潮，一些国家的人民还组织志愿队，准备为保卫古巴而战，就是最好的证明。

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巴人民这一次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和古巴革命的深入发展，也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和平的斗争的胜利。

古巴虽然离美国近在咫尺，但是，古巴人民敢于革命，敢于夺取胜利和巩固胜利，以大无畏的精神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





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他们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颠覆活动有高度的警惕，作了充分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认真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因此，他们能够在积极争取国际支援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敌人，树立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榜样。

古巴人民这次取得胜利这样快，说明古巴人民斗争力量的伟大，拉丁美洲人民团结力量的伟大，全世界人民支持古巴人民的力量伟大；同时，它也说明美帝国主义是如何外强中干。古巴人民这次抗击美国侵略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再一次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虽然张牙舞爪，貌似强大，本质上却都是纸老虎。革命的人民，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采取正确的方法，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就可以一步一步地夺取胜利和巩固胜利。古巴人民的革命斗争是这样，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都是这样。

### 三

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古巴的事件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维护世界和平，要经过严重的、复杂的、长期的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坚持执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各国人民广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群众性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和扩大保卫和平的运动，所有这些，都

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的声明指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共同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由于国际力量的对比越来越有利于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前景越来越光明，帝国主义要发动世界大战越来越困难了。

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古巴的血腥罪行，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严重警惕；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虽然越来越困难，战争的危險却并未过去。局部战争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它们已并将继续不断寻求它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在它们认为有利的地点发动局部性的侵略战争。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当帝国主义发动局部性的侵略战争的时候，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就应当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举行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来打败帝国主义侵略者，保卫自己国家的独立，维护世界的和平。英雄的古巴人民抗美爱国斗争的胜利，正是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对于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经验表明：当帝国主义把局部战争强加给某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时候，只有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一切维护和平的力量团结起来，不屈不挠地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扑灭帝国主义所燃起的局部战争的火焰，才能有效地捍卫世界和平。如果听任帝国主义发动局部战争并在这



种战争中得逞，结果就会削弱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力量，增强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便于它们发动世界大战。

因此，共产党人和一切保卫和平的战士，不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而且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战争，使它得到胜利，坚决反对和制止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所发动的每一次反革命的局部战争，使之失败。这就是全世界人民在保卫和平的共同斗争中的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

各国人民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记忆犹新。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德、日、意帝国主义就是首先在中国、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奥地利、捷克等国家发动局部战争和进行军事兼并，积聚和加强了它们的力量，一步一步地扩大了它们的侵略范围，因而得以顺利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先后在许多地方发动了侵略战争，或者指使他们的走狗挑起了反革命内战。由于世界斗争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已经不能像以前德、日、意帝国主义那样在局部战争中得逞了。在战后的一系列局部战争中，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遭到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坚决抗击，而且这些战争在多数场合都是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失败而告终。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的朝鲜战争，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四年的印度支那战争，一九五六年英、法、以色列对埃及

的战争和这次美国对古巴的武装侵略，是其中比较突出的几个例子。现在，还有一些地方的战争没有停止。事实表明，各国人民进行自卫的革命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所发动的反革命的局部战争，是对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巨大贡献，对于制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有着极重要的作用。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至死不会改变的逻辑。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是绝不会放弃战争政策的。古巴正面临着美国发动新的武装侵略的威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团结在以卡斯特罗总理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周围的古巴人民，决心保卫自己的神圣的祖国，保卫自己的正义的革命事业，准备再接再厉地对美国的侵略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卡斯特罗总理坚定地表示：“我们宁愿为保卫祖国而光荣牺牲，而不愿在帝国主义者奴役下生存”。拉丁美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关怀和注视着古巴人民的英勇斗争。古巴人民在拉丁美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下，依靠自己的紧密团结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定能够不断取得反对美国侵略的新的胜利，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更加辉煌的贡献。同样地，不管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如何疯狂地捣乱，不管世界人民前进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依靠世界人民的紧密团结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定能够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获得愈来愈大的胜利。



# 再談机床內部矛盾运动的規律和机床的「积木化」問題

**《紅旗》編輯部按：**本刊一九六〇年第二十四期轉載了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机床及自動化專業的同志們所寫的《從設計「积木式机床」試論机床內部矛盾运动的規律》一文。當時，本刊編輯部曾經去信要求這個專業的同志們寫一篇較長的文章，進一步闡述他們的論點，並且對車、鑽、鏜、刨、銑、磨各類机床的特點，分別加以詳細的分析。經過他們四個多月的努力，多次的討論和修改，寫成了這篇文章。現在發表出來，以供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同志們參考和討論。

這篇文章的論點，正如作者自己所說的，還是他們關於机床研究的初步結果，還需要做進一步的探討，還需要經過實踐的檢驗，而且文中有些問題、有些提法也不是不需要反復斟酌和商榷的，有關方面的同志也還有不同的意見。但是，我們認為，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机床及自動化專業的同志們在研究机床內部矛盾运动問題的時候，是遵循了從實際出發、具體地分析具體矛盾這個正確的研究方法的。我們相信，只要他們繼續遵循這個方法，深入地進行探索，並且同持有不同觀點的同志交換意見和商討，他們就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過程中，使認識逐步深化，而得出完善的結論。

我們全國有很多大學，每個大學都有若干專業，全國各地有很多科學研究機關，有很多生產單位，他們在教學、研究和生產的過程中，天天接觸和處理各種問題，或者說各種特殊矛盾。如果每一個專業，每一個科學研究機關，每一個生產單位，都能應用同樣的方法，抓住他們自己業務中的一個特殊性的矛盾，用一定的時間（哈爾濱工業大學研究机床內部矛盾运动的同志，從一九五八年十月開始，到這篇文章的寫成，共用了兩三年的時間），進行深入的、系統的、全面的 research，那就可以預期，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將獲得愈來愈多的成果，將出現更加繁榮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景象。我們期望看到愈來愈多的有內容、有分析、有見解的好文章。

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机床及自動化專業教師討論  
侯鎮冰 鄺明 關士續 陸紀培等執筆





《紅旗》杂志轉載了《从設計‘积木式机床’試論机床內部矛盾运动的規律》一文以后，《紅旗》編輯部写信給我們，希望我們再写一篇較长的文章，詳細地闡述前文中所提出的一些論点。我們自己也感到，前文中有很多問題言而未盡；半年来，哈爾濱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的师生在繼續考察、研究积木式机床和参加学术界討論的过程中，在認識上也有某些发展。所以对前文提出的一些論点，需要作进一步的闡明和补充。这篇文章要比較詳細地談談我們对机床內部矛盾运动規律的認識，說明一下我們对这一規律逐步認識的过程，說明一下我們运用这一規律，研究机床“积木化”問題的几点初步看法。我們之所以願意更詳細地說明這個問題，是为了和同志們共同探討，以便更正确地認識机床內部矛盾运动的規律，寻找一条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机床工业的道路。

## 一 从机床发展的历史看机床內部矛盾运动的規律

一切現代的金屬切削机床，都是由使刀具运动的系統(我們称做“刀具系統”)和使工件运动的系統(我們称做“工件系統”)所組成的矛盾統一體。刀具系統和工件系統間的相互連結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机床实现金屬切削加工的过程。刀具系統和工件系統的对立統一，构成了机床內部的基本矛盾。从机床最初产生的时候起，就已經包含了这个矛盾。这个矛盾存在于一切机床当中，决定着机床的共同本质。这一矛盾的不同表现，构成各种机床的不同特点。机床的全部发展历史，也就是这个矛盾发展的历史。那末，机床的刀具系統和工件系統的基本矛盾，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要研究一下机床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 机床的萌芽和形成

机床是用来进行切削加工的机器。切削

加工的目的，在于用切削的方法，去掉被加工零件毛坯(簡称为“工件”)上的一部分多余金屬，以达到工件加工要求的一定几何形状。为此，一方面，切削刀具要从被加工工件上切去金屬，另一方面，工件却因本身的分子內聚力而反抗切削，这样就构成了切削加工过程中切削刀具和被加工工件之間的矛盾。

当人类开始学会琢磨石器的时候，就有了最古老的切削加工方法。那时工件和刀具的相互作用，是靠人用手直接拿着工件和刀具(有时也用脚踏住工件)来实现的。出現得最早的和最常用的切削加工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钻孔，即由劳动者用脚踏住工件使之不动，再用手拿着某种磨尖了的刀具，在工件上往复旋轉，以钻出圓孔；另一种是車加工，即由劳动者一手拿着工件并使它不断地轉动，一手握着刀具对工件作直綫切削运动，把工件表面加工成为圓柱形状。在这



些最初的切削加工过程中，就已经包含了工件和刀具两者相互联结而又相互作用的对立统一关系，只是这个对立统一是通过劳动者的双手形成的。

生产的发展，被加工工件数量的增多，要求提高切削加工的生产率，同时，对工件加工表面几何形状的要求也更加严格，于是就出现了加工过程中刀具和工件之间的不平衡。例如，钻加工中刀具的旋转运动和车加工中工件的旋转运动，由于受到人手生理条件的限制，只能达到一定的速度和一定的准确程度，不能继续提高上去，而成为切削加工继续发展的障碍。与此同时，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生产经验，开始创造出一些最简单的机构，用来代替这一部分最困难的手工操作。远在旧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一种用弓弦拉动刀具旋转，代替人手直接握着刀具转动的最简单的机构——弓钻。<sup>①</sup>我国在商代前期（公元前16—14世纪）也已经应用这种弓钻在卜骨上钻眼，并且使用了青铜钻头。<sup>\*</sup>又例如，在车加工中，也开始把工件的两端支承在两个支架当中，同样地采用了弓弦机构，代替人手拉动工件作较高速度的旋转。<sup>②</sup>这些机构出现以后，使刀具和工件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一个暂时的平衡，切削加工就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在此后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切削加工的发展不大。到十八世纪末叶，在欧洲开始了从工场手工业向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机器发明。

这些机器零件的制造，对切削加工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了把这些铁制的零件加工得相当精确，仅仅以部分机构代替人手部分工作的切削方法，就显得力不胜任了。

以车加工为例，到十八世纪末叶，还只有用以代替原来人手直接转动工件的“机械旋盘”，而刀具的移动，还是由工人用双手握着刀具抵在工件上进行的。机械旋盘虽可以保证工件比较准确、均匀地旋转，但靠着人手移动刀具，还要承受很大的切削力作用，这就很难保证刀具直线移动的准确性。例如，当时用这种方法车制蒸汽机汽缸活塞，就很难保证活塞与汽缸体的严密配合。这样，刀具系统不能适应工件的加工要求，就成为切削加工继续发展的障碍。在一七九七年，英国机械师亨利·毛兹利发明了刀架。<sup>③\*\*</sup>这种刀架，可以代替人手夹住刀具，并使刀具沿着床身导轨作平行于工件的直线移动，刀具系统也被机械化了。这时，刀具系统和工件系统都形成了一套可以代替人手操作的机构。每个系统都包括三个部件，即骨架、安装在骨架上的工作器官（刀具、刀架、工件夹具）以及使工作器官运动的内传动零件。刀具系统和工件系统联结起来，就把刀具和

①②③……本文中用字码标明的注释均见全文的篇末，第40—41页。

• 这种铜钻和卜骨于1952年在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 在亨利·毛兹利之前，俄国机械师A·K·拿尔托夫于1712—1725年间曾发明了结构类似的刀架，但是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



工件間的相互作用，用機器的形式固定下來了。這就使切削加工在其發展中，完成了一個質的飛躍，形成了最初的、代替人手操作的切削加工機器，即金屬切削機床。

最初形成的機床，已經包含了由工件系統和刀具系統構成的基本矛盾。全部機床的發展，也正是這兩個系統間的矛盾的發展。

### 機床內兩個系統的完善化和各種類型機床的出現

從十八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約一百年間，是機床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里，機床發展的特點是：工件系統和刀具系統脫離了最初形成時的簡單形態，進一步完善化了；採用了蒸汽和電力等更為強大的動力；除已有的車床和鑽床等出現得較早的機床以外，又發展出了鏜床、刨床、銑床、磨床等各種機床，形成了現代機床的幾種基本類型。

我們先以車床發展和完善的過程為例，來看看機床內基本矛盾的運動情況。刀架的出現，形成了最初的车床。這時，刀具系統代替了人手，比以前準確得多地保證了刀具移動的直線性，而且也可以承受更大的切削力作用，進行更高強度的切削。這樣就使刀具系統和工件系統之間的矛盾運動又達到了暫時的平衡。但是從十九世紀初，開始了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迅速發展，在短短的幾十年里，紡織機、蒸汽機以及火車、輪船等開始大量製造。為了滿足對機器的大量需要，就必須

普遍用機器來製造機器，並且對製造機器的機器（金屬切削機床），在生產效率上和加工質量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對車床來說，刀架出現沒有多久，旋盤部分又顯得不能適應新的要求了。

刀具運動機械化以後，刀具系統已經可以保證刀具作比較準確的運動和承受更大的切削力作用；但工件系統依然由工人用手搖或腳踏做為動力，它的運動就顯得慢而無力，限制了刀具系統潛力的充分發揮，限制了整個機床的生產率的提高。至於在加工較大的鐵制工件時，則不僅加工速度太慢，而且以人力作為動力也確是過分吃力，甚至很難完成；利用風、水等自然動力，又受到自然條件的很大限制。這時，蒸汽機已經出現，並且開始在工業上大量應用，為機床採用更強大的動力提供了必要的條件，是在十九世紀最初二十年里，機床就開始採用蒸汽機做為動力來源。蒸汽機的採用，使工件的旋轉速度大大加快，切削強度（一次切去金屬的厚度和寬度）大大提高，因而又使刀具系統相對地顯得落后了。在新的強力切削情況下，原來支持刀架移動的、起導軌作用的木制床身承受不住強大的切削力作用，原來帶動刀架移動的絲杠也很容易被磨損。於是車床上又出現了可以承受更大切削力的鐵制導軌和減輕絲杠磨損的光杠、齒條結構。<sup>④</sup> 這樣刀具系統又向前發展了一步。刀具系統發展以後，工件系統又在某些方面顯得不適應。例如，原來支持工件旋轉的主



軸軸承很快就被磨損，原來用前後兩個頂針頂住工件使之旋轉的結構也不方便了，這些就被新出現的在磨損之後可以更換軸瓦的軸承，和能夠更方便、更有力地夾住工件的卡盤所代替了。這樣，工件系統也向前發展了一步。經過刀具系統和工件系統之間的矛盾的不斷產生和不斷解決，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車床已經基本具備了現代車床的結構形式。<sup>⑤</sup>

與車床同時發展和完善的還有鑽床。十九世紀最初二十年里，鑽床的刀具系統也採用了蒸汽機帶動刀具（鑽頭）旋轉，大大提高了切削強度。原來仍靠人力夾住工件的工件系統就不適應了。於是工件系統採用了虎鉗來夾住工件，鑽床也就基本上具備了現代鑽床的結構形式。<sup>⑥</sup>

隨着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的迅速發展，各種各樣機器的出現和大量製造，需要加工更多種類的、形狀更複雜的零件，在車床、鑽床不斷發展完善起來的同時，鏜、刨、銑、磨等各種類型的機床也就應運而生了。

十八世紀末，產生了用來加工蒸汽機汽缸內孔的鏜床。它的刀具系統，通過鏜杆帶動鏜刀繞被鏜圓孔的軸綫旋轉，工件系統使工件作進給移動；以後又發展到鏜刀一面旋轉、一面進給，工件系統只是把持住工件使之不動。<sup>⑦</sup> 當時，這種鏜床的結構還是十分簡陋的。與此同時，還常常在車床上加工較大直徑的圓孔（鑽床只能加工較小直徑的圓孔），即讓被鏜孔的工件由車床工件系統的主軸帶

動着旋轉，在車床刀架上裝上鏜刀，作進給移動。以後，由於工件越來越多樣化，被鏜孔的工件往往外形輪廓很不規則，工件的體積也越來越大，這時仍用車床的工件系統使它旋轉，就顯得十分不便，甚至根本不可能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就開始把工件放在原來刀架的位置上，而把鏜刀裝到原來使工件旋轉的主軸上。鏜刀比工件要輕小得多，旋轉起來就方便得多了。這樣，就在車床的基礎上演化出了鏜床。到十九世紀末，鏜床已經基本具備了現代鏜床的結構形式，但它與車床还是非常相似的。<sup>⑧\*</sup>

在十九世紀的最初二十年里，又出現了用以進行平面加工的刨床。和迴轉體表面或圓孔加工不同，平面加工是容易用手工方法進行的。過去一直由工人用手拿着刮刀、銼刀或凿子進行加工，或者像木匠刨木板那樣往復推動刀具進行切削。但在需要大量生產機器的條件下，這種手工加工方法受到人的體力限制，顯得十分笨重、緩慢，因而被一種使用新型機床的加工方法所代替。一八一七年，產生了最初的龍門刨床；到一八三一年，它的兩個系統都機械化了，並且採用了機械動力。這種刨床模仿着木匠刨木板的動作，由工作台夾住工件，作往復的切削運動，每往復一次，刨刀進給移動一個距離，再繼續切削。這樣就可以從工件上刨去一層金屬，加

\* 這種鏜床，到二十世紀初，又繼承了十八世紀末最初鏜床的刀具一面旋轉、一面進給的特點，發展成為現代鏜床。



工出一个平面。一八三一年到一八四〇年間，又出現了刨刀作往复切削运动、工件作进給运动的牛头刨床。<sup>⑧</sup>馬克思曾經形象地把这种刨床叫做“铁制的木匠”。

与刨床产生大致同时，一八一八年，出現了同样是进行平面加工的銑床，到一八五五年，发展成为基本上具有現代結構形式的万能銑床。<sup>⑨\*</sup>銑床以它的迅速旋轉的多刃刀具（銑刀），代替在刨床上作直綫往复运动的簡單刀具（刨刀）。在加工过程中，一方面銑刀自己旋轉，一方面工件作直綫进給运动，就可以效率較高地加工出平面。但由于多刃的銑刀形状复杂，制造比較困难，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推广。<sup>⑩</sup>直到二十世紀上半叶，由于更大批量的平面加工的需要，迫切要求提高加工效率，而那时在技术上也具备了大量制造銑刀的条件，才使銑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十九世紀末叶，随着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提出了制造更高精度的零件的要求。为着提高零件的耐用性能，常常在进行过一般切削加工以后，再对零件施以热处理，提高其表面硬度。热处理以后，零件往往产生微小的变形，需要对这种已經变硬了的表面，做高精度的修正。靠已有的机床，无法满足这些新的生产要求。一八六四年，出現了最初的加工經热处理后变硬的圓柱体工件的外圓磨床。它只是在原来車床的刀架溜板上，装上了一个可以带动新的刀具（砂輪）做高速度旋轉的“磨头”。所以这种最初的磨床，

倒不如叫做磨削車床更为确切。<sup>⑪</sup>到一八七四年才有了比較完备的外圓磨床正式产品供应市場。<sup>⑫</sup>继外圓磨床之后，又出現了加工較高精度圓孔的内圓磨床和加工較高精度平面的平面磨床。<sup>⑬</sup>从車、钻、鏜、刨、銑床，直到磨床的出現，現代机床的主要类型，就基本上发展齐全了。

車、钻、鏜、刨、銑、磨等各种类型的机床，無論它們本身的結構形式，或他們各自所能完成的加工范围，都是各不相同的。但在每一种机床当中，都包含着使工件运动的工作系統，和使刀具运动的刀具系統两个基本組成部分（在有的机床当中，工件或者刀具某一方是固定的，但它却要 and 另一方保持一定的相对运动关系，这在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运动形式）。只是靠着这两个系統的矛盾統一，即它們之間的相互联結和相互作用，机床才能完成某种切削加工过程。所以，工作系統和刀具系統的这一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金屬切削机床当中，車、钻、鏜、刨、銑、磨等等任何一种机床，都不例外。

例如：車床是通过工作系統带动着工件旋轉，刀具系統带动着車刀沿着工件的軸綫移动，这样就能加工出各种的迴轉体表面。钻床是通过刀具系統带动钻头旋轉并作軸向的进給，工作系統夹持住工件使之不动，这样就能加工較小直徑的圓孔。鏜床是通过刀具系

\* 我国早在1668年，就經用馬拉的銑床銑制了天文仪器的銅环。这些天文仪器，現仍在北京建國門古观象台保存。





統帶動鏟刀迴轉并沿軸向進給，工件系統夾持住工件不動，這樣就能加工較大直徑的圓孔。刨床則是通過刀具系統帶動刨刀作直線往復移動，工件系統帶着工件沿着和刨刀運動垂直的方向作直線進給運動，這樣就能加工平面（這裡說的是牛頭刨床的情況，龍門刨床兩個系統的运动正好是相反：工件作直線往復運動，而刨刀沿着和工件運動垂直的方向作直線進給）。銑床，如平面銑床，則以刀具系統帶動着銑刀旋轉，工件系統帶動着工件作直線移動，這樣就能在一定範圍內較刨床更高效率地進行平面加工。磨床是以刀具系統帶動它的刀具（砂輪）作高速的旋轉運動，這樣就能加工較高精度的圓柱表面（外圓磨床）、較高精度的平面（平面磨床）和較高精度的圓孔（內圓磨床）。可見，車、鑽、鏜、刨、銑、磨等各種機床，都是靠着它們的工件系統和刀具系統的对立統一，才得以完成切削加工過程的，而各種機床的工件系統和刀具系統的不同結構和它們之間不同的对立統一形式，就決定了每一種機床的特徵。

十九世紀末，已經具備了現代各種基本類型的機床，它們的工作機構也已經基本上發展完備了。但到這時為止，為機床工作提供動力來源的發動機（蒸汽機或電動機）和配力機（即把動力傳遞、分配到每一台機床上去的天軸、皮帶等傳動機構），還都是在機床之外獨立地存在着，而為很多台機床所共用的。所以，機床本身還是不包括發動機

和配力機的工作機。

### 現代化機床的形成和專用機床、 大型機床、自動化機床的發展

從二十世紀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是機床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十九世紀末，開始了某些機器（如汽車、農業機械等）的成批大量生產，這就要求盡量地提高機床的工作速度。同時，資本家為着從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餘價值，也盡量地加強工人的勞動強度。由於煉鋼技術的發展，大量的機器零件都改用了鑄鋼材料；為了加工鑄鋼零件，對機床提出了進行更高強度的切削加工的要求，這就是：既要加工更硬的材料，又要求提高切削的速度。進行這樣的加工，機床工件系統還是潛力有餘的，而刀具系統原來的刀具很快就被磨鈍，這就尖銳地出現了刀具不能適應高速度切削硬質工件的矛盾。因而刀具的改進，就成了當時切削加工研究的主攻方向。終於在一九〇〇年左右，發明了用新的合金鋼材料製成的“高速鋼”刀具。<sup>⑤</sup> 高速鋼刀具可以允許把機床的切削速度提高到四倍甚至四倍以上，但在這樣高的速度下，工件系統和刀具系統之間又出現了新的不平衡。例如車床的轉速從每分鐘一百轉提高到了每分鐘四、五百轉，刀具系統還是能適應的，而工件系統由於主軸軸承磨損太快，就不適應了。在這種情況下，又出現了一種可以在磨損以後進行調節，以保證比較準確地支撐主



### 軸的可調軸承。<sup>⑩</sup>

随着工件轉速的提高，切削力的加大，对发动机和配力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一台普通車床，一般只要零点三五瓩，最多一个瓩的动力就够了，而现在每台机床却要求三至四瓩以上的动力。<sup>⑪</sup>这时，天軸皮带的傳动方式，因为不适于傳遞太大的动力和过高的速度，就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了。二十世紀初，感应电动机已經可以大批地生产供应。于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就开始了大量地采用单独电机傳动以代替过去的天軸、皮带傳动。<sup>⑫</sup>同时配力机也起了变化，齒輪变速箱代替了过去的皮带塔輪傳动。发动机和配力机从很多台机床共用而变为分属于各台机床专用。

发动机和配力机的变化，可以为机床工作提供更大的动力和更高的速度，这就又反过来促进了机床工作机的进一步发展。例如，車床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后，为了适应高速度、高效率的生产需要，它的工作机部分中，工件系統原来的滑动軸承发展成了适应高速度、高負荷運轉的滚动軸承，<sup>⑬</sup> 刀具系統原来的平导轨，也被新的、磨損之后可以自动調节而經常保持精度的山形导轨所代替了。<sup>⑭</sup>

发动机和配力机专属于每一台机床以后，机床就包含了发动机、配力机和工作机三个基本組成部分。馬克思說：“一切发展了的机器，都由三个在本质上不同的部分——发动机，配力机，与工具机(即工作机)——

构成。”<sup>⑮</sup>这时，机床也就发展成为具有比較完备形态的现代化金屬切削机器——現代机床。

当发动机和配力机分属于每一台机床以后，由于各种工作机的要求不尽相同，各种机床的发动机和配力机也就逐渐产生了一些彼此不同的特点。比如有的机床要求动力大一些，有的則可以比較小一些；有的机床要求速度变化的幅度寬一些，有的就可以窄一些。但总的來說，这种机床的发动机、配力机和那种机床的发动机、配力机之間的区别并不大，所有机床的发动机和配力机都是用来为工作机提供动力和傳遞运动的，它們的作用基本上是相同的。构成一种机床区别于另一种机床的特征的，主要是各种机床的工作机的特点，它們的刀具系統和工件系統的不同結構，以及二者之間的对立統一关系的不同形式。

发动机、配力机分属于每一台机床以后，随着机床的发展，在某些机床中它們又进一步分化了。在一台机床的内部，又分成了专门為工件系統服务的发动机和配力机，以及专门為刀具系統服务的发动机和配力机。

机床在逐步发展成为現代机床的同时，还在专用机床、大型机床和自动化机床等方面有了重大的发展。

首先是专用机床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二十世紀初，在成批大量生产当中，經常不变地加工同一种形状的零件，这样就需要对机床两个系統的对立統一关系作一定的改变，



使它能够更好地适应这种工件加工的要求，以提高机床的生产率。在机床做了这种适合于某种特殊工件加工要求的改变之后，就形成了所谓“专用机床”。专用机床和通用机床的本质区别是：专用机床适应于加工某种特殊的工件，其两个系统的对立统一形式是很少变化的；而通用机床适应于加工几种不同的工件，其两个系统的对立统一形式是在一定范围内作较多变化的。专用机床出现之后，在成批大量生产当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专用机床需要专门设计和单个制造，所以生产周期较长，生产成本较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汽车制造业里出现了一种孔加工用的“组合机床”。<sup>②</sup>组合机床在使用上可以起专用机床的作用，它的设计和制造又比专用机床容易进行，因为它的一些部件是通用件，只要针对各种工件专门设计和制造主轴柜部分，就能够组合成各种孔加工机床。组合机床的创造是符合机床发展规律的。但由于当时人们对这种规律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组合机床还只是在比较窄的范围里（通常只是用来镗孔和钻孔）代替了一般的专用机床，而没有得到更为广泛的发展和应用。

与专用机床发展大致同时，各种大型动力设备（如发电机、汽轮机）、轧钢冶金设备（如轧钢机）和万吨海洋巨轮的建造，使加工大型工件的大型机床也迅速发展起来了。随着需要加工工件的加大，使工件运动的工件系统也越来越大，与工件系统相联结

的刀具系统也越来越大，整个机床也就愈益庞大起来。二十世纪初，已经建造了工作台直径六米、重达四百吨的立式车床；<sup>③</sup>到三十年代，已经出现了重达一千八百吨的巨型机床。<sup>④</sup>在工件加大、机床也跟着日益加大的过程中，出现过一些把两个系统分开、变换两个系统的对立统一形式而不分别加大两个系统的“以小干大”的尝试。但当时人们对此还没有自觉的认识，这种办法也只是偶然采用的一种权宜之计。

这一时期机床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各种半自动、自动机床在工业上比较广泛地应用。半自动、自动机床，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就已经产生了，<sup>⑤</sup>但当时它只能加工很小的工件，而且工件形状稍一变换，就要用很多时间进行重新调整，因此在生产中一直应用不多。到二十世纪初，由于大量生产机器的需要，很多小型零件标准化了，于是就可以大量地用自动机床生产，自动机床就有了比较大的发展。<sup>⑥</sup>机床自动化的发展也是机床基本矛盾的发展。以车床为例。普通车床在一个工件的加工过程中，工件系统的运动几乎不需作太大的变换，而刀具系统却要多次进刀、退刀、换刀等等。因此，需要把刀具系统的这一套过程首先自动化，这就形成了半自动车床。刀具系统自动化后，工件系统又显得不适应，因此，从半自动车床又发展到可以使工件系统自动送料、自动夹紧工件的全自动车床。自动化机床不同于普通机床的主要特点，在于它具有一个控制机构，





通过它，机床就可以按照人們預先編好的程序，在不同程度上自动地变化机床两个系統的相互关系，进行加工。

### 机床向高精度、特种加工和 更高程度自动化方向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开始了机床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机床向高精度、特种加工和更高程度自动化方向的飞跃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发展更加迅速。

首先是精密机床的迅速发展。从一九一七年出現座标镗床开始，<sup>②</sup>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各种精密机床虽然都已相继出現，但当时还只是用于制造精密的工具、卡具、量具，而沒有直接地用到机器零件的生产上，所以数量还是极其稀少的；就其精度來說，也还只是比一般机床高些，而远沒有达到現今的精密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各种尖端技术以及精密机器、精密仪表的迅速发展，要求大量制造各种极高精度的精密零件，精密机床才开始大量应用于工业生产，而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精密机床的数量迅速增长，例如，苏联在一九四五年才生产出十七台精密机床，而到一九五五年，年产量已将近六千台。<sup>③</sup>另一方面，机床精密度不断提高，例如战前精密的座标镗床，平均加工精度在百分之一毫米左右，而現今最精密的座标镗床，平均加工精度已达千分之几毫米了。<sup>④</sup>

最初制造的精密机床，主要是提高了机床工作机中某些主要部件的精度，这就是所謂“提高精度的机床”。进一步发展，又加上了一些特殊的机构，如座标镗床是在一般镗床上加上精确的座标测量机构，精密的螺絲車床則是在一般螺絲車床上，加上絲杠修正机构，这就形成具有某种特殊机构的所謂“高精度的机床”。但無論前一种或后一种，从它們的产生过程中可以看出，它們都是从普通机床发展而来的。

在精密机床大量发展的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航空、无綫电、原子能等各种新技术的发展，和耐热鋼、鈦合金等各种新材料在工业上的大量使用，就出現了加工这些新材料，为各項新技术服务的特种加工机床。这种机床的特点是：它具有专与某一种特殊加工要求相适应的两个系統矛盾的統一形式。各种特殊加工机床，虽各有不同特点，但它們都是从一般机床发展而来的。它們除了为适应这些特殊要求而具有某些特殊部件以外，其他部件与一般的机床仍然是相差不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机床发展的又一个方面，就是在单机自动化的基础上，机床自动生产綫以及自动化工厂的出现，机床向更高程度自动化方向的发展。特别是在汽車制造等成批大量生产的机器制造企业里，开始用自动化机床进行比較大的零件的加工。为了加工比較大的零件，往往有很多工序，需要由几台机床联合完成，于是机床自动綫



就发展起来了。例如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〇年間，苏联建成了几十条自动线，<sup>②</sup>一九五〇年又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生产汽车活塞的自动化工厂。但无论是单机自动化的自动机床或者自动生产线上的自动机床，目前它们的工件系统和刀具系统，都只能按着一定工件的加工要求，确定一定形式的相互关系，从而自动地完成加工过程。当工件变换了的时候，就需要相应地变换整个一套控制机构，按着新工件的加工要求，重新确定两个系统的相互关系，为此又要经过一个十分复杂的调整过程。所以，一般自动化机床只适合于加工批量较大的零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了一种“程序控制机床”（这里是指狭义的理解，广义地说，自动化机床都是程序控制机床）的研究。程序控制机床采用了光、电、磁等控制元件（这些控制元件能够根据加工要求和所编程序发出不同的信号）代替了普通自动机床的机械控制元件，并可应用计算技术编制程序，所以它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根据新的加工对象，改变机床两个系统的对立统一关系。程序控制机床可以用来进行批量较小甚至单个零件的生产。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经基本上成功。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机床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十分迅速的，当前还正在继续向高精度、特种加工和更高程度的自动化方向迅速发展着。

## 两 点 结 论

通过以上对机床发展历史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一切金属切削机床，都是由工件系统和刀具系统以一定形式相互联结起来的矛盾统一体。工件系统和刀具系统的对立统一，构成了机床内部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存在于一切机床当中，并贯穿于机床发展过程的始终。这一矛盾和矛盾的双方在各种机床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即每种机床的工件系统和刀具系统的特殊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特殊的对立统一形式，决定了各种机床的不同特点。只要使工件系统和刀具系统组成合于一定目的的矛盾统一关系，就可以成为一定的机床。只要改变两个系统和它们的矛盾统一关系，也就可以改变机床的特性，而组成各种类型的机床。

第二，一切发展了的金属切削机床，都包含着工作机、配力机和发动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工作机由工件系统和刀具系统组成，而工件系统和刀具系统又分别包含了工作器官、内传动零件和骨架等三种部件。工作机是机床的核心部分，它决定着机床的本质和一种机床区别于另一种机床的特征。各种不同的机床，彼此间不同主要是工作机部分。发动机和配力机，虽然在不同的机床上也有某些不同的特点，但它们基本上还是相同的。由于工作机决定机床的特性，因此我们只要主要地更换机床的工作机部分（更



換工作机的全部或者部分結構，或只改变工作机中两大系統間的矛盾統一关系)，就可以改变机床的特性，由一种机床变为另一种机床。由于各种机床之間有共同的部分，因此

我們可以把几种机床之間的部分通用化，做成通用积木块，在通用积木块的基础上，再加上部分的专用积木块，就可以組成各种类型的机床。

## 二 从研究“积木式机床”到逐步認識机床內部矛盾运动的規律

我們对机床內部矛盾运动規律的認識，是从研究“积木式机床”开始的。一九五八年，在党的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我国工人階級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發揮敢想敢干的精神，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明創造。在机械工业方面，也出現了“积木式机床”和“螞蟻啃骨头”机床等有重要意义的創造。这些发明創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了（虽然还不是完全自觉地）机床內部矛盾运动規律的結果。我們从总结工人同志們的創造，参加积木式机床的研究工作开始，到初步認識机床內部矛盾运动的規律，其間經過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 学习和总结工人創造“积木式机床”的經驗，研究加工大型工件的积木式机床

积木式机床是哈尔滨机联机械厂（以下简称机联厂）的工人同志們首創的。他們在“四无”（一无大厂房，二无大机床，三无大吊車，四无工程师）的条件下，发奋图强，刻苦钻研，巧妙地利用各种廢旧部件、鋼軌、角铁等，加上少量特殊制造的部件，在

九一个多月時間中，灵活地拼組过三十七种加工大型工件的机床（包括車、銑、鏜、钻、刨、磨等机床）。他們利用这些机床，加工出直徑四米的球磨机，高度四米二的洗滌机，五十吨水泥烘干机等大型机器設備，和重达二十多吨、长十二米、直徑二点五米的大豆烘干机圓筒等巨型零件。結果在一九五八年，使这个工厂的产值跃增了七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六倍，并且树立了小厂能制造大設備的紅旗。

机联厂工人当时讲过：“机床不外乎是由刀子（切削头）、身子（平台、鋼軌等）和轉子（齒輪傳动裝置）組成。”工人同志的看法是很朴素的，基本上是符合机床本质的。实际上“刀子”就是刀具系統，“轉子”就是配力机，“身子”則是工件系統以及把工件系統和刀具系統联系起来的部分。各种机床的大部分部件是互相通用的，只要把工件系統和刀具系統这两个矛盾方面的对立統一形式，根据具体工件的特点而加以变化，就可以构成不同的机床。这就是机联厂工人运用有限的几种部件而灵活地拼組出多种多样机床的奧妙所在。



我們专业的师生，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在党的领导下，深入工厂，拜工人为师，用工人、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式进行积木式机床的研究。两年多来，厂校密切合作，做了一系列的设计和试制工作。两年多的过程，也是我们对积木式机床的本质和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在认识上逐步深入的过程。

一九五八年年底，我们在机联厂工人创造的三十七种积木式机床的基础上，经过分析和定型，整理出十三种最常用的机床，包括铣床、镗床、大头车床、立式车床、单臂刨床等。这十三种机床只需九种不同的积木块（机床部件）就可组成。这套机床于一九五九年初制造成功，曾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全国机械工业土设备土办法展览会”上获得一等奖。它的设计和制造虽然还是比较因陋就简的，但是以这样少数种类的部件拼组出十三种不同用途的机床，不能不说是机床设计上的一个创造。它显示出积木式机床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然而，当时不少人对积木式机床抱着否定和怀疑的态度。在有些人看来，积木式机床永远只是一种土机床，创造这种机床只是权宜之计，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事实证明，积木式机床可以由土到洋，暂时的土只表明它是还不很完备的新生事物。从一九五九年三月到五月，我们结合机联厂要生产650轧钢机的任务，设计了一套大型积木式机床。这套机床包括用十三种积木块拼组成的六种不同的机床。第一套在一九五九年十月由机联厂试制成功，接着又由哈尔滨市儿

个地方国营工厂用分部件生产的办法小批生产了五套。使用过程证明，它们的精度和效率较之同样用途的“洋机床”并无逊色。此外，它们的工件系统和刀具系统都是分开的，两个系统的相互联系是通过平台实现的，因此可以加工比一般同样尺寸的机床所能加工的还大得多的工件（即能够“以小干大”）。大型积木式机床的设计和制造成功，用事实驳倒了对积木式机床的错误看法。由于部件通用程度大，两个系统可以分开，机床结构没有一般大型机床那样复杂，不专门制造机床的一般中小型机械厂也能制造这种大型积木式机床。但是直到这时候，我们对机床两个系统的矛盾统一规律还是没有很多认识的。当时我们对积木式机床的研究工作，仅限于大型零件加工这个特殊的机械加工领域内。当时我们给积木式机床下的定义是：“可拼可拆，以小干大”，意思就是说，在使用过程中机床可以根据加工对象而进行灵活的拼拆，较小的机床可以加工较大的工件。这种带有局限性的认识，特别是“可拼可拆”的概念，一直对我们以后几个阶段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通过农村用机床的设计和试制， 对积木式机床认识的进一步发展

一九五九年春天，在设计大型积木式机床的同时，我们专业的师生曾为设计农村用机床，在黑龙江省六个县进行了调查。调查后觉得积木式机床难于在农村推广。理由是，



积木式机床在使用中要拼拆，而农村机械厂缺乏机械化的起重运输设备，很难进行拼拆，并且由于技术水平较低，拼拆后的机床精度也不易保证。后来，我们和北京机床研究所等单位合作设计县和人民公社用的机床时，就采取简化机床结构的方法，设计出一套二十四种简式机床。这套简式机床，国庆十周年时曾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展出，以后各地按照这套图纸生产了相当数量，对发展我国的中小型机械制造厂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我们经过进一步的分析，认为简式机床并没有根本解决多快好省地生产农村用机床的问题。简式机床虽然结构简化了，但是二十四种机床之间部件没有通用化，一个省甚至一个大区的机床厂决不可能同时生产这么多品种的机床。事实上，这二十四种简式机床的试制任务，是动员了全国十多个专业机床制造厂的力量才完成的。所以用简式机床的方法，还不能做到在一个地区的范围内机床独立配套，更难以依靠地方工厂的力量来供应农村机械厂需要的全套机床。

一九五九年十月，中共哈尔滨市委从迅速生产机床、加强农机修配工作的角度出发，要求将积木式机床应用到农村去。我们专业师生再度下到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如果积木式机床在使用过程中能够不需要大拼大拆，只拼拆一小部分，那么没有起重运输设备，用人力也可以做到，而且由于机床大部分的部件不变动，拼拆后的机床精度也容易保证。根据这些想法，我们

和工人一起分析了几个设计方案，觉得只拼拆一部分机床部件是有可能的。到一九五九年底，就设计和制造出一套包括两个基型的小型积木式机床。根据这种设计，只要换上立铣头、钻头、车头、镗头或磨头等，机床的其他大部分部件都不变换，就可以相应地变换成立式铣床、钻床、车床、镗床和磨床等十一种机床。这套机床在一九六〇年又经过几次修改，并在学校和工厂进行了试制。

通过搞农村用小型积木式机床，我们对积木式机床的认识有了很多发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农村机床的加工对象大部分是中小型的零件，从这里我们看到，积木式机床既可以应用于大型零件的加工，也可以应用于中小型零件的加工。

第二，积木式机床的设计思想，既可以应用到专用机床中去，也可以应用到通用机床中去。农村用的机床，加工对象比较广泛，已经是属于通用性质的机床。以前不论是机联厂工人创造的积木式机床，还是我们和机联厂共同设计和制造的大型积木式机床，都是针对某种具体加工对象设计和制造的，还是专为某一个机械制造行业服务的。

第三，积木式机床不一定要在使用过程中大拼大拆，可以少拼拆一部分，而需拆换的部分（如立铣头、磨头）又正是区别各种机床特点的部分。这样就接近了以后关于工作机是机床的核心部分，它决定着机床的本质和一种机床区别于另一种机床的特征的认识。





第四，最初，积木式机床的设计，是偏重于从拆拼的角度来考虑解决机床的配套使用问题，而农村积木式机床的设计，已经较多地考虑了如何使部件通用化，用部件拼组的方法来解决机床多品种生产的问题。

### 初步认识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研究用机床积木化的办法，解决机床品种配套问题

在这四点认识的基础上，一九六〇年春天，我校党委要我们专业的师生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积木式机床，解决增加品种、使机床配套的问题。据此，我们发展了在研究农村小型积木式机床过程中得到的认识，从一九六〇年五月开始，设计包括十六种机床的一套中型通用性的积木式机床。到一九六〇年年底，完成了全部设计方案和其中最主要的四种的<sup>全部</sup>生产图纸，并有两种在我校机械工厂试制成功。这套机床的零件和部件的通用程度很大。例如，在工作性能相差很远的车床、铣床和镗床之间，通用的零件也占到全部基本零件数的百分之八十。这样，只要有两三个普通中型机械工厂，就有可能配套生产出这么多品种的机床。

在设计这一套中型积木式机床的同时，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对机床的发展规律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开始认识到工件系统和刀具系统的矛盾是一切机床的基本矛盾。我们在大型工件加工方面的实践和研究较多，机联厂工人创造的积

木式机床大多数也是用来加工大型零件的。在实践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现有的一些传统的大型机床，它们的刀具系统和工件系统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固定的（例如龙门刨床总是工件作直线运动），两者的相对位置只能在已定范围内伸缩，工件愈大，机床也愈大。另一种情况是像机联厂创造的大型积木式机床，或者像沈阳东北机器厂首创的“蚂蚁啃骨头”机床，它们的工件系统和刀具系统的关系非常灵活，机床可以很清楚地分为工件和刀具两个系统，如果工件很大，可以将工件系统和刀具系统的距离拉开一些；在工件过大、运动不方便时，可以将原来工件的运动改由刀具的运动来代替，这样，工件就可以不动，机床甚至可以爬到工件身上去加工。从对上述两种情况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发现，组成机床的核心是工件系统和刀具系统两者间的矛盾统一；积木式机床的工件和刀具两个系统是可以拆开的。这两个系统间矛盾统一的形式可以灵活变化，积木式机床每拼凑一次，实质上就是工件系统和刀具系统的矛盾统一形式变换一次。

机联厂工人创造的积木式机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机床的部件有很多是通用的。究竟机床的那些部件可以通用呢？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关于机器的精辟论述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马克思指出，一切发展了的机器，都是由工作机、配力机和发动机三个基本部分组成的，而工作机又是机器



的主导部分，工作机的发展引起了机器的变化。<sup>⑩</sup>我們根据馬克思的这一論述来分析机床，就看到，任何現代机床也都是由工作机、配力机和发动机三个部分組成的，而工作机的特点代表着每种机床的个性，成为一种机床区别于他一种机床的主要标志。这样，我們当时认为，既然各种机床的个性主要是由它們的工作机决定的，那末，工作机以外的其他部分，在各种机床之間就可以通用了。但是，像开始認識一切复杂的事物一样，我們这时的認識还是很不完全的。特别是在每一台机床当中怎样具体划分这三个組成部分，那些部件属于工作机，那些部件不属于工作机，当时我們在認識上还不是十分清楚的。而認識上的不清楚，就不能不使我們在以后的实践当中走了一些弯路。

还在一九五八年最初总结积木式机床的时候，我們就曾把工人同志們叫做“刀子、轉子、身子”的机床三个組成部分，定名为“执行件”（后来又叫“工作件”）、“傳动件”和“支承件”。现在看来，我們当时这种分法，实际上反而把工人同志們的本来基本上是正确的認識弄得模糊，甚至曲解了。首先，我們把“身子”叫做“支承件”（如导轨、立柱等），只是从形式上看到了它們起一定的支承作用，而沒有看到它們是工作机中两个系統の骨架，并不是工作机以外的什么独立的部分。其次，当时我們叫做“傳动件”的，除了机床的配力机以外，还包括了机床工作机中的某些內傳动零件（如螺絲車床从主軸到刀架的

挂輪架、絲杠、螺母等）。这样，余下的，我們当时认为是“工作件”的部分就不多了，只剩下了工作机中两个系統的工作器官。同时我們又认为，除了“工作件”以外的其他部分在各种机床之間都可通用。在这种認識的指导下，一九六〇年五月我們設計的那套中型积木式机床，就对各种机床的个性考虑得少了一些。結果由于照顾通用性过宽，个别部件就設計得比較笨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机床的性能。

經過这段弯路，使我們認識到，我們过去对机床三个部分的划分，由于沒有从机床的基本矛盾出发，也就沒有抓住机床的本质。于是，我們重新划分了机床中工作机、配力机和发动机三个組成部分。我們又进一步認識到，工作机虽然代表机床的个性，但是个性之中又包含共性，在各种机床的工作机中有很多部件是可以通用的。因为工件表面的形状一般不外乎是圓、直綫或它們的組合曲綫所构成，所以工件系統和刀具系統的运动形式也不外乎是旋轉运动、直綫运动或它們的各种組合运动形式。发动机和配力机在各种机床之間，虽然共性是主要的，但同时也有一定的个性，而不能一律通用。机床部件的通用化和各种机床不同性能之間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实际上就是共性和个性的矛盾。只要根据每个机床的具体情况，正确地处理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机床部件通用化和各种机床的不同使用性能都可以得到合理的兼顧。



根据对三大部分的新的認識，我們最近設計了一套輕、小、簡、廉的，适合我国中小型机械厂和农村人民公社机械修配厂使用的小型积木式机床，即用二十二种积木块，可以拼組出十种不同用途的机床（包括車、銑、钻、刨四个基型）。这套机床对于每种机床的共性和个性、机床部件通用化和各种机床不同使用性能之間的关系，都根据輕、小、簡、廉的要求作了比較合理的处理。

經過这一段过程，使我們进一步認識到：积木式机床的創造是机床内部矛盾运动規律的具体运用；积木式机床的原理可以适用于各种机床，通过机床积木化的办法，有可能解决机床的配套生产問題。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在机械制造工业的技术革命运动中，又出現了一个“多能切削头”的新創造。哈尔滨电影机械厂的工人同志們，根据工件的具体加工要求，在原有的机床上加上“多能切削头”，提高了工件的加工质量，并把生产率提高了一倍以上。目前推广“多能切削头”的运动正在哈尔滨市蓬勃地开展着。

“多能切削头”的創造，实质上是机床工作器官的一次革命。一般的通用机床并不是针对某一具体加工对象設計和制造的，所以它的两个系統的对立統一形式并不完全适应每种具体工件的加工要求；专用机床只适于加工某种特殊的工件，所以当工件变化的时候，它就无能为力了。而“多能切削头”的創造，正是按照具体工件的加工特点，发展变

化了机床的工作器官，使机床更适应于經常变化的工件的加工要求，大大提高了机床的使用性能。

“多能切削头”在生产上具有重大作用。

第一，在批量較大的生产条件下，使刀具系統的工作器官具有模具化的性质，实现多刀并进、一次完成几个工步或工序的加工，或者使工件系統的工作官器可以实现多个工件同时加工，这样就能保证加工质量，提高生产效率，并且也挖掘了机床的潜力。而在生产批量較小的情况下，它又可以采用多位刀架和多位工件夹具，节省加工的輔助時間。

第二，通过更換“多能切削头”就可以改变机床的使用范围，达到一机多用，也有助于解决我国机床品种不足的問題。

第三，由于“多能切削头”带有模具化的性质，它是按照一定工件的加工程序設計的，其本身已經反映了一部分加工的程序，所以，只要加上一个比較簡單的控制机构，就可以实现机床的自动化。并且只要更換“多能切削头”，就能使机床比較方便地适应于新的工件的加工要求，所以它較一般自动化机床更易于适应工件的变换，較少地受到生产批量的限制。

最初出現的“多能切削头”主要是发展了刀具系統的工作器官，目前它已經进一步应用到工件系統的工作器官上去了。并且，“多能切削头”經驗的运用已經超出了机械加工的范围，在其他加工行业里，也有了类似的





創造(所以我們覺得如果把“多能切削頭”改稱做“多能工作頭”,似乎更為恰當些)。

“多能切削頭”的出現和它在生產中所發揮出來的巨大作用,更進一步證明了機床的工作機部分是機床中最活躍的因素。只要對機床的工作機部分做適當的改進,整個機床的加工質量和生產效率就會有很大的提高。這也證明了兩個系統的对立統一是一是機床的基本矛盾,只要改變兩個系統的相互關係,就可以改變機床的特性。

積木式機床、“螞蟻啃骨頭”機床以及“多能切削頭”的創造,還說明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機床也如同其他機器一樣,本來是做人手的延長,為人服務的。但是在機床發展的过程中,如果人們的認識在一定階段停滯下來,不繼續深入地探討機床發展的規律,那末,人們的行動就有可能受到一定發展階段的機床的限制。反之,如果我們在生產實踐中不斷探討機床發展的規律,充分掌握機床本身發展的規律性,並且自覺地利用這些規律為我們服務,就有可能促進機床的不斷發展和不斷完善。

應該指出,在積木式機床創造之前,機床的生產部門和研究部門已經有過機床部件通用化的思想,但我們的機床積木化的思想,

是在我國工人發明創造積木式機床的基礎上進行研究,逐步形成的。據我們所知,早在本世紀三十年代,英國、德國、美國等國家都已進行了機床部件通用化的研究,並曾在生產中有所應用,但由於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限制,其發展是遲緩的。它們對機床部件通用化的研究,都是不改變現有機床的基本結構形式,只在同類型機床之間探求零件標準化、部件通用化的道路。近年來,在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在蘇聯,機床部件通用化的研究工作有了長足的發展。我們專業在這方面作比較深入的研究是從一九五八年開始的。我們首先研究了工人所創造的單個的積木式機床,進而和工人一起設計和製成了加工特定對象的成套積木式機床,再進而在逐步認識機床內部矛盾運動規律的基礎上,試圖將積木式原理運用到各種機床上去,用積木化的辦法解決機床的配套生產問題,形成了機床積木化的思想。

我們所說的機床積木化的含義,比部件通用化更為廣泛,它不僅包括用“積木塊”組成各種機床,還包括變換兩個系統的对立統一形式,“以小干大”,變換現有機床的工作器官——工作頭,擴大機床的使用範圍和提高機床生產率等等。

### 三 對運用機床內部矛盾運動規律的幾點看法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們從對機床內部矛盾運動規律的初步認識出發,曾提出了對今

後實踐的幾點初步看法,這裡再補充說明一下,希望能夠得到各方面同志的批評和指正。



### (1) 用通用积木块加上特殊积木块来組成各种机床，以解决机床配套問題

机床品种不足是当前我国机械工业中的一个重要問題。我們认为，运用机床积木化的办法，有助于解决机床生产的多品种配套問題。

我們最近設計农村用小型积木式机床时，对农村机械修配厂的情况进行了調查和分析，結論是：1. 当前我国农村要求的机床品种不是很多，最需要的是車、钻、刨三种机床；2. 机床主要是用来修配农机具，因此机床的开动率不是很高；3. 机床需要量很大，因此如果能够由地方机械厂自己动手制造，加上专业工厂供給一部分，那就可以更快地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的机修厂武装起来。我們根据这些結論所設計出的机床，它們的发动机和配力机是完全通用的，工作机通用程度也很大（工作机总共有十六个部件，其中通用的有十一个）。这样，一个县級的机械厂也可以生产全套机床。

对于通用机床的积木化，我們也进行过实践的嘗試，即一九六〇年五月开始的中型积木式机床的設計和試制。虽然由于那时对工作机的理解不够清楚，致使这套积木式机床不够理想，但却基本上证明了可以用机床积木化的办法，解决通用机床的配套生产問題。

目前生产中最常見的成批生产用的机

床，例如，C620型普通車床和X62W型万能銑床，是多年来在沒有考虑机床之間部件通用化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两者的部件几乎沒有通用的。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們认为可以先在工作性质相近的机床之間实行部件通用化，因为这些机床的工作机比較相似，共性較多，发动机和配力机的共性就更多。例如，龙门刨床、立式車床、龙门銑床之間就是如此。我們可以将全部常用机床分成几組，每組机床之間部件通用程度很大，可由一个厂来生产。如果从目前一个机床制造厂一般只能生产一种类型的机床（例如只生产車床），变成一个厂可以生产二至三种类型的机床，那末我国机床品种不足的問題就有可能更快地得到解决。

### (2) 关于精密机床問題

生产精密机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机床发展中的一个主要趋势。我国現在只有少数工厂能够生产精密机床，品种和数量还都远远满足不了国家的需要。我們认为，机床积木化的原理也可以应用于精密机床。精密机床上并不是所有的零件和部件都要求精密。曾經有这么两个例子：某一个工厂在最初制造精密机床时，对所有零件的精度都要求很高，后来制造了一个时期，发现很多零件并不需要这样精密，便将对它們的技术要求降低下来。又有一个磨床厂，原来生产一般磨床，后来要試制精密磨床，他們便利用了一些一般磨床的現成部件，修改了其中一些部件，



加上某些專門制造的精密部件，很快裝出了第一台精密磨床，以後又做了一定的修改，就制成了精密磨床的正式產品。當然，在精密機床上，除了精密的部件，其他的部件和零件對機床精度也會有一定影響，因此它們的精度也要比一般機床的部件和零件的精度高些，但是這已經不是生產精密機床的最主要的困難，因為只要把它們的精度適當提高一些就可以了。

生產精密機床最大的關鍵是精密部件的製造。但實際上並不是精密部件中的全部零件都要求很精密，因為精密機床之所以精密，主要在於工件和刀具的相對位置和相對運動的精確。我們認為，精密機床積木化從理論上說是可能的。精密件可以由專業工廠來集中製造，其他單位再配上一般部件，就有可能大大加快我國精密機床的生產速度。

### (3) 關於加工大型工件用的機床問題

大型零件加工是重型機器製造中的大問題。鋼鐵、電力、化學等工業的發展都要求提供大量重型機器設備，加工大型工件一般要用大型機床。我國由於工業基礎差，大型機床比普通機床更感缺少。大躍進中，各地職工面對着沒有大型機床的困難，創造出很多加工大型零件的方法，給我們指出了新的大件加工的發展方向。這些辦法都是符合機床內部矛盾運動規律的，是機床普遍規律在大件加工方面的具體應用。

大件加工有自己的特點。工件大而且重，但是需要加工的表面有時不一定大，所以就有“以小干大”的可能。重型機器設備的生產批量一般較小，而大件在每台大型機器中又只是少數的幾個（機座、機架、立柱等），所以如果用一般的結構固定的大型機床去加工，機床的利用率就不會很高；如果機床的結構形式靈活，可以變化，就可以適應多種的加工要求。我們認為，對於大件加工用的機床，用機床積木化的方法，除了可以加快機床的生產速度和多品種生產以外，還可以使機床的兩個系統在機床使用中靈活變化和“以小干大”。

最常見的大件加工方式有車外圓、鏜內孔、銑平面或刨平面等。這些加工方式，在我國都有應用上述規律取得顯著效果的豐富事例。

車外圓一般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工件長度短而直徑大，如水輪機轉子、座環，汽輪機的護環，球磨機的進料端蓋，減速器的大齒輪毛坯等，一般用立式車床來加工，工件裝在旋轉的大花盤上；工件直徑愈大，花盤就愈大，車床也愈大。現在世界上已有加工直徑二十五米的立式車床。製造這些大的車床，費工費料，而這樣大的工件又很少遇到。上海某廠工人曾經製造了一台加工五米直徑工件的立式車床，不用大花盤，工件不旋轉，刀具裝在一個橫臂上，橫臂繞着工件旋轉，這樣的立式車床比一般的立式車床就要簡單得多。第二種情況是，工件直徑較



小但长度很长，如汽輪机的軸、軋鋼机的軋輥等，一般要有很长的臥式車床才能加工。如果用和第一种情况同样的办法，使工件不轉，那末刀具就要在旋轉的同时，走一个长的直綫距离（等于工件的长度），这种結構的机床是比較难于制造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工件和刀具的运动方式仍和一般車床一样（工件旋轉，刀具作直綫运动），但是工件和刀具系統不用一个床身把它們固定联系起来，而是将它们做成可以分开的两个部分。例如，机联厂工人創造的加工二千五百瓩汽輪机大軸的积木式車床，就是把工件（大軸）放在四个托輥上，由电动机經齿輪帶动它旋轉（組成工件系統），裝夹刀具的刀架在工字鋼導軌上沿工件軸向作直綫移动（組成刀具系統）。这种两个系統的对立統一形式，在后来加工軋鋼机的大型积木式机床中，經過进一步的完善而被定型下来。

在特大型工件上鏜內孔和銑、刨平面时都可以使工件不动，所有运动都由刀具系統来担任。例如，机联厂和許多其他厂所創造的鏜杆机，机床本身只是一根鏜杆和两个軸承座，工件固定不动，鏜杆穿进工件要加工的孔內，一方面旋轉，一方面使鏜杆上的鏜刀作軸向移动，就可鏜出內孔。銑或刨平面，在一般情况下都要工件作直綫运动，对付大的工件，就需要龐大的工件系統；最好的办法是，使工件不动，使刀具除了本来的运动外再加上原来要工件作的直綫移动。例如，“螞蟻啃骨头”加工方法，使銑头連同电动机和变

速箱或者是整台普通的牛头刨床，爬到龐大的工件身上进行加工，利用工件本身来使刀具系統和工件系統联系起来。

所有这些事例都說明，两个系統的矛盾統一形式是可以根据需要而改变的。运用这些規律，我們就可以找到多快好省地加工大型工件的方法。

#### （4）研究矛盾的双方，进一步促进机床革命

認識机床內部矛盾运动規律，不但使我們能对积木式机床的創造这样重大的机床革命給予正确的評价，而且也可以看到机床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过去我們考虑切削加工过程，着重在刀具一方，对于切削加工过程的工件一方注意不够。如果同时考虑矛盾的双方，就会使切削加工出現新的局面。实际上，在生产中經常用热处理的方法，使工件变軟。近年来在加工一些特殊鋼材时，也常采用加热工件使之容易被切削的方法。

現在絕大多数机床都是用机械运动来切除工件上的多余金屬的。这种傳統的办法的缺点是：第一，机床要做得足够坚固，才受得住相当大的切削力（有时能达数百以至数千公斤）；其次，工件受力要变形，会影响加工的精度。如果能采用另外的方式来除掉毛坯上多余的金屬，那就会从根本上改变机床的面貌。事实上在当前的生产中已經开始应用这样的方法。这些方法虽然目前在工业上



还只用来加工小孔，但很有发展前途。这些加工方法仍然包含工件系统和刀具系统的矛盾统一，虽然矛盾的形式已经有所变化，但应用机床的普遍规律也可以研究这些问题。

像一切机器一样，自动化也是机床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它具有远大的前途。自动化机床和非自动化机床的主要区别有两点：第一，自动化机床有自动控制机构。普通机床用机械化的两个系统代替人手操作，而自动化机床，则用自动控制机构来控制两个系统对立统一形式的变换，进一步代替了人的一部分简单的脑力劳动。第二，自动化机床的工作机比较发展。例如，自动车床的工件系统比一般车床还多一个自动传送和夹紧工件的机构（在一般车床上，这些动作是由人手来进行的），刀具系统也比较复杂，有好几个刀架。目前自动化机床在整个机床中占的比例还很小，原因是它只适用于成批大量生产，而整个机械制造业有半数以上的产品是单件和小批生产的。研究单件小批生产自动化是目前机床自动化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了解决这个课题，也可以把积木化的原理应用到自动化机床上去。很多自动化机床上的自动机构可以做成通用的部件，根据需要增加到一般机床上去；由于部件通用，部分调整工作可以在机床以外先做好，以减少机床的调整时间。这样，就能使自动化机床适用于批量较小工件的加工。

目前机器制造业中的自动线为数更少，即使在现代化汽车制造厂中，也只是一小部

分工件是用自动线生产的。同样，机床积木化的原理应用到自动线上去，用通用部件来组成自动线，使机床部件和运输装置都尽量通用化，就有可能使自动线“一线多用”，在加工对象改变后仍可加以利用，使它适用于较小批量的生产。

### (5) 机床积木化对其他机器制造的意义

机床是机器的一种，因此机床的某些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用到其他机器上去的。一般机器（以及某些仪器）都可以分成几个基本组成部分。对于一台机器来说，这些基本组成部分中，有些是决定机器特性的主要部分，另外一些则是从属的和次要的部分。在不同品种的同类机器之间，除了决定它们各自特性的部分以外，其他部分基本上是相同的，而在决定机器特性的部分中，也有一定的共同之点。因此，我们就有可能将这些基本相同和有一定共同点的部分做成通用部件。这样，在机器的制造上，可以用较少种类的部件装配出多品种的机器，可以采用厂际协作、专业分工的办法，生产更多的机器；在机器的使用上，可以更为灵活和多能；在机器的修理上，可以用更换通用部件的办法，使修理更为简便。我校某些单位，正运用这些规律试图把积木化的思想应用到其他机器和仪器的设计和制造中去。

\* \* \*

以上谈到的，是我们专业的师生对机床





内部矛盾运动规律的初步认识和对机床进一步发展的不成熟的看法。这只不过是我们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当中，在我国工人伟大创造的启发之下，做了初步研究工作的一些粗浅体会。我国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已经获得了很大成绩，现在这个运动还在不断地发展着（最近“多能切削头”的出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必须紧跟上去，不断前进。我们在技术革命运动当中，首先是紧紧抓住新的苗头，拜工人为师，虚心向工人学习；然后把群众的创造集中起来，加以整理、提高，进行新的设计和试制；最后再进行理论上的研究，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寻找一般的规律，指导我们的实践。这样，从实践到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不断地循环反复，我们的认识就可以不断提高，工作就可以不断前进。

三年来的实践，还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研究技术科学也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唯物辩证法。过去我们习惯于把研究的对象分割开来加以研究，这虽有助于对每一部分的具体观察和深入分析，但长此下去，

就往往把各部分孤立起来，“见树不见林”，看不到事物的联系，把握不了事物的整体。我们结合研究工作，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了唯物辩证法，思想上就有了武装。一方面可以总观事物的全体，看到它的联系和全貌，另一方面又可以把事物一分为二，抓住它的内部矛盾。这就帮助我们有可能深入地洞察事物的本质，找到它的发展规律。

最后，在这篇文章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在学校里曾召开过几次讨论会和座谈会，也征求了校外很多同志的意见，同志们提出了宝贵意见，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例如，我们对机床两个系统中又包括着骨架、内传动零件和工作器官三种部件，对自动化机床的控制部分及其意义，对“多能切削头”的本质等等，都是通过这些讨论进一步认识到的。这就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只要坚决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一定可以把科学研究工作大大地推向前进。正是本着这种认识，我们把关于机床研究的初步结果提出来，抛砖引玉，和同志们共同研究，以便更正确地认识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寻找一条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机床工业的道路。

## 附 注：

① I) Friedrich Schwerd 著：《切削机床》(Spanende Werkzeugmaschinen)，柏林，Springer 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页；  
II) 贝尔纳著：《历史上的科学》，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4—45 页。

② I) 同①之 I，第 4 页；  
II) Л. А. Авзонштадт, С. А. Чихачев 著：《苏联机床制造业发展简史》(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костроения СССР)，莫斯科，机械制造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2 页。





- ③ I) 同①之I, 第6頁;  
 II) 奥村正二著:《工作机械发达史》, 东京, 科学主义工业社1941年版, 第33頁。
- ④ 同①之I, 第7頁。
- ⑤ 同①之I, 第9—10頁。
- ⑥ 同③之II, 第39—40頁。
- ⑦ 同③之II, 第28—32頁。
- ⑧ 德国赫尔曼·荷迈尔(Hermann Hommel)公司1900年机床样本, 赫·荷迈尔公司1900年版, 第816—819頁。
- ⑨ I) 同①之I, 第8頁;  
 II) 同③之II, 第38—40頁;  
 III) Charles R. Hine 著:《工程师用工作母机》(Machine Tools for Engineers), 纽约, McGRAW-HILL出版社1959年版, 第121—122頁。
- ⑩ I) 同①之I, 第8頁;  
 II) 同③之II, 第138頁;  
 III) 同③之II, 第52—54頁。
- ⑪ 同②之II, 第98—99頁。
- ⑫ 同③之II, 第80頁。
- ⑬ 同①之I, 第10頁。
- ⑭ G. Schlesinger 著:《1905年列日城世界博覽會。工作机械》(Die Weltausstellung in Lüttich 1905. Die Werkzeugmaschinen), 見《德国工程师协会学报》(VDIZ)1906年第10、11期, 第369—376頁, 第411—421頁。
- ⑮ I) H. Fischer 著:《机械制造中之新工作法》(Neuere Arbeitsverfahren im Maschinenbau), 見《德国工程师协会学报》1906年第11期, 第422—423頁;  
 II) 同①之I, 第163頁;  
 III) 同③之II, 第93—95頁。
- ⑯ 同①之I, 第165—170頁。
- ⑰ 同①之I, 第163頁。
- ⑱ I) Vojtěch Kulda 著:《机床的电气装置》(Elektrická Zařízení Obráběcích Strojů), 布拉格, 国家技术书籍出版社1958年版, 第17頁;  
 II) K. Müller 著:《工作机械的单独驱动》(Einzelantriebe von Werkzeugmaschine), 泰比錫, S. Hirzel 出版社1927年版。
- ⑲ L. C. Morrow 著:《机械加工生产的进步》(Progress in Machine-Shop Practice), 見《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学报》(Transactions ASME)1928年期。
- ⑳ 同①之I, 第174—175頁。
- ㉑ 《資本論》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第448—449頁。
- ㉒ 同②之II, 第288—296頁, 第304—305頁。
- ㉓ Riddell John 著:《60呎立式車床》(Sixty-foot Vertical Boring and Turning Mill), 見《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学报》1903年期, 第1288頁。
- ㉔ I) H. Vogler 著:《加工直徑 25.5 米的立式車床》(Karusselldrehbank für 25.5 m Drehdurchmesser), 見《德国工程师协会学报》1940年期, 第693—698頁;  
 II) 同②之I, 第308頁。
- ㉕ 同③之II, 第73—74頁。
- ㉖ G. Schlesinger 著:《德国机床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Werkzeugmaschine auf dem Weltmarkte), 見《德国工程师协会学报》1911年期, 第2038—2045頁, 2089—2097頁, 2130—2139頁。
- ㉗ 同②之II, 第313—315頁。
- ㉘ 同②之I, 第518—519頁。
- ㉙ Н. С. Ачеркан 著:《金屬切削机床設計的現狀和基本任务》(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Основные Задачи в Области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я Металлопорежущих Станков), 見《工艺装备設計的現代趨勢》(Современ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я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莫斯科, 机械制造出版社1957年版, 第56頁。
- ㉚ 同②之II, 第439頁。
- ㉛ 《資本論》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第448—455頁。





面貌，具有重大作用。我們必須在充分利用地面水的同時，大力勘探和开发利用地下水，實行地面水和地下水并舉，渠、井相結合的方針。

几年来，地质部門在上述方針的指导下，并同群众性的抗旱斗争相結合，进行普查勘探地下水的工作，已經取得了巨大成績。区域性水文地质普查，已經完成了二百七十多万平方公里，并在部分地区进行了詳細勘探，初步摸清了这些地区地下水的埋藏情况。这就为一百多个重点城市和大型工业企业的用水，和許多地区的农田灌溉、畜牧用水，提供了水源。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的抗旱斗争中，西北和华北各省、市、自治区的地质部門，派出了大批职工，同广大群众一起，在許多地区找到了地下水源，为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提供了可靠依据，有力地支援了农业抗旱。例如，河北省地质部門曾以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人力、物力，分赴重点农业区找水抗旱，并配合农田水利部門凿机井一千八百眼，解除了五十万亩农田的旱灾威胁。山西、河南等省地质部門也为人民公社凿了許多眼水井，支援这些公社抗御了严重旱灾。甘肃省戈壁滩上的火燒沟，解放前是“世世代代水愁”；解放后，經過普查勘探，利用地下水改变了干旱面貌，仅这个沟的一个生产大队，就靠凿自流水井，使耕地面积由四百亩扩大到二千多亩。正如毛澤东同志所說：“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資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sup>①</sup>

要根本改变我国北方的干旱面貌，必須充分利用地下水源。而現在已經探明的地下水，無論在水量上和地区分布上，都远不能滿足需要。我們必須鼓足更大干劲，迅速查明地下水的埋藏、分布情况，研究地下水的运动規律，为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提供可靠資料。

毛澤东同志教导我們：“不論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物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sup>②</sup> 开发利用地下水，也同做其他事情一样，必須首先知道它的規律，才能有效地利用它。

地下水的埋藏、分布和运动是有規律的。哪里有水、哪里沒有水，哪里水位高、哪里水位低，埋藏量有多少，水质\* 如何，在保持一定水位的条件下，出水量有多少，以及水井之間需要多大距离才能保持补給平衡，等等，都是有規律可尋的。地下水的規律是由地下水的补給来源，含水层的岩性和地质构造等許多因素决定的。地层中的孔隙和裂縫，是地下水汇集的場所和自由通道。地下水如同河水一样，也是經年不断流动的，

① 《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語。《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8頁。

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63—164頁。

\* 水质 即水的性质，包括物理性质和化学成分。水的溫度、顏色、气味等等，是水的物理性质；水中所含的鹽、碱等类矿物质，是水的化学成分。



坡度愈大，岩层透水性愈强，地下水的运动条件也愈好。只要补给范围广，含水层厚而孔隙大，地下水的储藏量就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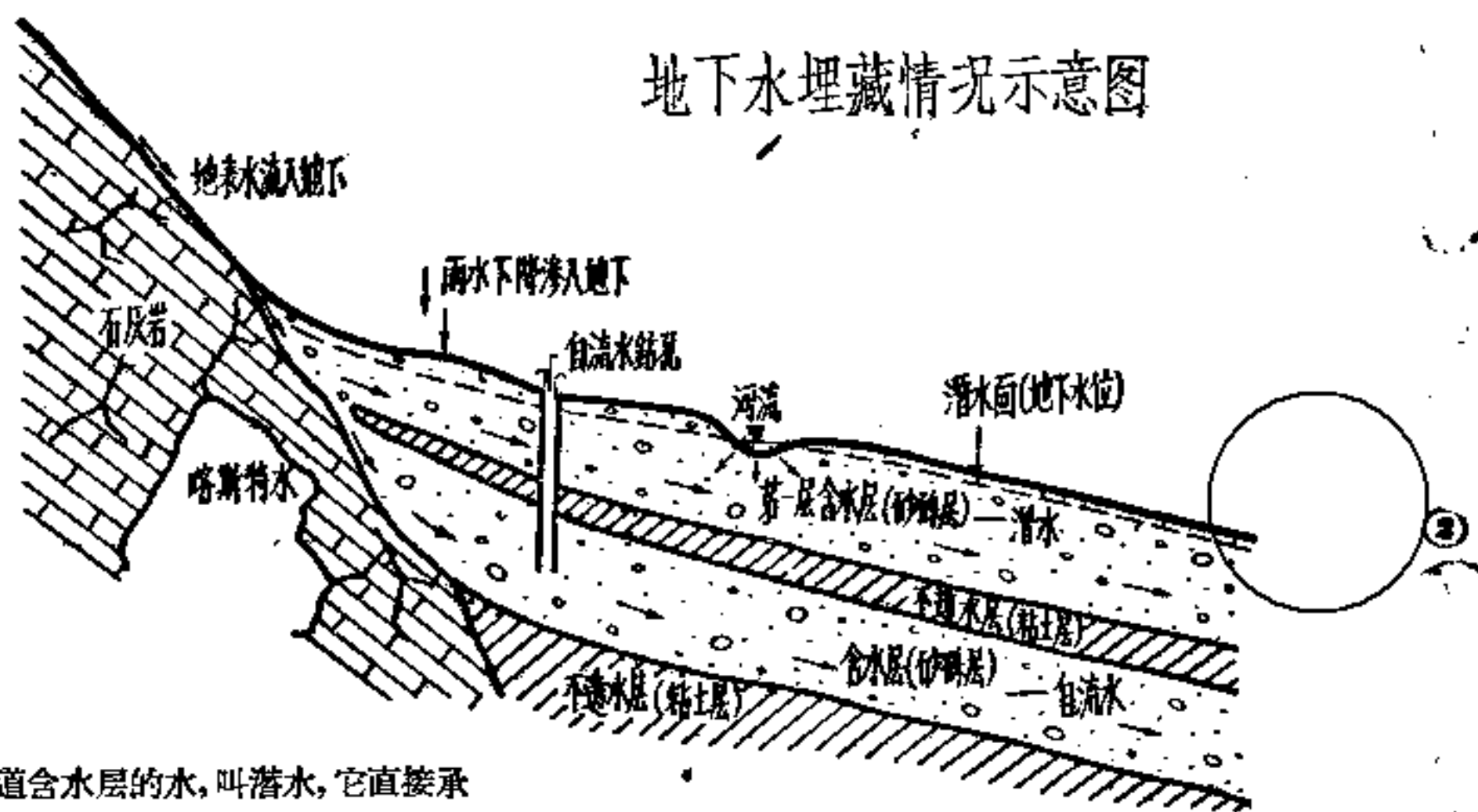
我国北方广大平原地区，以及无垠的沙漠、戈壁，大部分都有地下水分布。许多山前冲积的砂礫石地带和受到四面广大山区补给地下水的山间盆地，埋藏着水量大、水质好的潜水和自流水\*；在河流两侧和古河道流经的地方，也有较丰富的地下水。地下水中的自流水，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他们称赞自流水是：“不用机器不用牛，到处清水昼夜流；灌溉农田千万亩，天不下雨不再愁。”但是，自流水一般埋藏较深，也不是井井自流，有的还要用机械提水。而潜水一般埋藏较浅，提水方便。有些地区只凿自流井，使大量的潜水不能充分利用，这是不对

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自流水和潜水并重，自流和提水结合，综合调查，分别评价，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同时，地下水的利用，也要有个限度，在一般情况下，不能超过它的补给量，超过了这个限度，地下水位就会降低，就会影响地下水的开采和农作物的生长。

地下水的水质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水在地下汇集和运动的时候，总会或多或少地溶解许多矿物质。这些矿物质，有的对农作物有利，有的对农作物有害。对农作物危害最大的是盐、碱类矿物质。但是，这类矿物质对农作物的危害，要看当地的土壤、气候条件，以及农作物的耐盐、碱性能和水源情况而有所不同。根据华北不少地区试验，水中盐、碱类矿物质，对农作物的幼苗

• **潜水和自流水** 在地下，松散的砂礫石层透水性和含水性都较好，常常有水充填、流动，一般称为含水层；粘土层没有水储存和流通的孔隙，常常把水隔开，叫不透水层或者隔水层。在地层中，含水层和隔水层往往是相间成互层，即含水层下有隔水层，隔水层下又会有含水层。

储存在地面以下第一道含水层的水，叫潜水，它直接承受天上降水或河、湖、沼泽水渗漏补给，一般埋藏浅。汇集、流动在顶、底两道隔水层中间的含水层中的水，它由上游水源补给，承受着上游水和顶、底隔水层的双重压力，因而一遇孔隙就会向上流溢，有的还能喷出地面，这种水统称为自流水，也叫承压水。此外，在石灰岩或砂岩中常有洞穴或裂隙，水充填其间，俗称洞穴水，又叫喀斯特水（这种现象在南斯拉夫的喀斯特石灰岩地区特别多，所以得名）。这三类水的埋藏情况，如图所示。



危害較大，而在成苗以后，含量在千分之二左右，对农作物也沒有損害；超过了这个限度，只要土壤透水性能强，易于排水，农作物同样可以正常生长。只有在盐、碱含量过多，而土壤又不易排水的情况下，才会抑制农作物的生长，甚至引起土壤的盐碱化或者板結硬化。当然，由于排水系統不健全，渠道滲漏过多，或者灌溉定额过高，导致地下水位上升\*，土壤中的毛細管把地下水源源不断地吸到地面上来，經過蒸发，盐、碱类矿物质逐渐聚集在地表，也会造成土壤盐碱化。

对待地下水的規律，也同对待其他客观規律一样，只能認識它、利用它，不能違反它。毛澤东同志說：“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實踐中失敗。”<sup>①</sup>人們对地下水的規律認識得愈全面、愈深刻，利用起来也就愈有把握、愈有成效。当人們尚未充分認識和掌握地下水的規律时，便不能充分利用它，不能消除它的危害。

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的抗旱斗争中，广大群众显示了向地球要水、与天爭粮的偉大气魄，掀起了大找地下水、大用地下水的群众运动。絕大部分地区通过實踐摸到了地下水的“脾气”，做到了因地制宜，全面规划，合理布井，提高了成井率，抗御了严重的旱災，有不少地区还保证了早年丰收。但是，也有部分地区，沒有了解和研究地下水的分布和运动規律，就大量凿井，結

果不是井孔凿在无水地区，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費；就是井孔密度超过了补給可能，影响了出水量；或者該封閉的水层沒有封閉，使地下水因相互补給而引起水质变化，有的还引起了水量减少。因此，要想合理地开发利用地下水，必須首先正确認識和掌握地下水的規律。要想正确認識和掌握地下水的規律，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地下水的調查研究，也就是加强地下水的普查勘探工作。

地下水的普查勘探，是認識地下水运动規律的手段。起初，根据一些零星資料，初步推断地下水情，选择最有利、最需要的地方，通过勘探或者群众凿井取得更多資料，加以綜合整理和分析研究，补充、修正原有推断，然后再指导群众凿井，檢驗認識的正确性。正确的認識基于对大量資料的研究，而正确的資料又必須从勘探、凿井以及多次試驗和长期观测中逐步积累。在反复實踐中，发现地下水的分布和运动的規律。例如用抽水試驗方法，了解地下水的出水量；通过化学分析，掌握水质变化，等等。此外，要掌握地下水的規律，还需要进行长期观测，观察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人們的活动对地下水的影响。随着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往复循环，我們对地下水的認識就

• **地下水位** 地下潜水的上部有一个水面，这个水面叫作地下水位。地面上的水向地下滲漏过多，地下水位就会上升。

① 《實踐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3頁。





愈来愈能符合客观实际，也就愈来愈能正确地认识和掌握地下水的规律，从而也就可以通过有目的的活动，限制它不利的一面，利用它有利的一面，逐步夺得控制干旱的主动权。

怎样才能多快好省地查明地下水的埋藏、分布和运动规律，为农田灌溉提供丰富的水源呢？两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全面规划，贯彻群众路线，加强技术指导，开展技术革新运动。

为了迅速查明地下水资源，专业水文地质队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农作物的种植规划和地面水的分布、流量来选择地区，安排普查勘探工作。应当把主要力量放在当前急需用水灌溉而地面水又不足的主要粮、棉产区，为当前农田灌溉找到条件好、开采方便的地下水源，并查明地下水储量和开发利用条件，提出井位、井距、井孔构造以及技术措施和提水方式的建议；同时协助有关部门根据土壤和农作物的耐盐、碱性能，制定防治土壤盐碱化的措施。当然，专业水文地质队在部署力量和安排任务的时候，还应当统筹照顾，在满足当前需要的前提下，为长远建设准备水源。既要满足农田灌溉的需要，又要保证林、牧、副、渔以及工业企业和城市用水；既要查明地下水的水质、水量，还要查明地下水的补给关系和运动规律，预测地下水的水情变化。

地下水的普查勘探和开发利用，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涉及面很广，专业水文

地质队应当主动和有关部门密切协作。我们既要反对脱离当前农业生产实际需要的“为勘探而勘探”的错误作法，也要防止忽视勘探，不按照地下水的规律而盲目开发，或者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片面观点。

专业水文地质队伍在普查勘探地下水的时候，必须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实行“以探为主，探、采结合”的方针，认真调查和搜集群众中已经了解的地下水情和群众的打井资料。广大群众经过多年的实践，对当地地下水的水位、水量、土层划分以及咸、淡水的分界等等情况，掌握了不少资料。许多地区还流传着反映地下水规律的农谚歌谣，例如，在山区有“山扭头，有水流；山背宽，有泉井。”丘陵地带带有“岗窑窝，水流多；河源头，有水流。”平原地区有“茅草多，有水窝”等等。只要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抱着“满腔热情”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深入到群众中去，就可以得到大量的宝贵的资料。有了这些资料，加上必要的勘探工作，就可以对地下水的埋藏、分布和运动规律，做出接近于实际的推断，编制出比较精确的水文地质图，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指导广大群众进一步找水、凿井。这样，就可以使地下水的普查勘探工作，收到多快好省的效果。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的抗旱斗争中，我们曾经运用群众的找水经验和群众的打井资料，探明了许多地方的地下水，并编制了县的或者人民公社的水文地质图和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的规划图。这种图，通俗易懂，简明适用，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运用这个方法，大大加快了地下水的





普查勘探速度，提高了水文地质图的准确程度。河北、山西等省的許多公社，曾經根据水文地质图修正了开发利用地下水的规划，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井孔，而灌溉同样多的农田。

专业水文地质队普查勘探地下水的主要手段是打钻，群众开发利用地下水是打井，两者可以也必须结合起来。普查勘探钻孔，应该结合农田灌溉需要进行布置。在遇到水和取得足够的资料以后，普查勘探钻孔就应该移交农业部门加以利用，作为灌溉水井。群众打水井也应该了解并积累有关地层、水位、水质、水量等项资料，帮助水文地质队迅速查明地下水的情况。这就是说：专业水文地质队应该执行“以探为主，探、采结合”的方针，农田水利部门应该执行“以采为主，采、探结合”的方针。实行这样的方针，绝不排斥专业水文地质队伍根据抗旱的需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以适当的力量从事打井抗旱。但是，专业水文地质队在参加打井抗旱中，绝不应该单纯打井，而忽视水文地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在大面积勘探和开发地下水的工作中，怎样才能使勘探和开发的井孔，定的位置好，凿的速度快，打一眼成一井，井井水量大、水质好、出水久，这里面包括了一些重要的技术问题。如井距、凿井设备和凿井方法，防止或处理涌砂阻塞，止水、隔水以及井孔的维护保养等等。有的地方凿井速度低，成井少；有的地方部分井孔完成后，利用不久，就发生水量急剧减少的现象，或者引起

了土壤盐碱化，就是因为有些技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需要加强技术指导。要实行正确的技术指导，必须首先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从生产实践中来，再到生产实践中去。两年来，广大群众在抗旱凿井运动中，有许多创造和发明，如凿井钻具、锥具、不用钢材的滤水管，提捞涌砂、防止井孔破坏方法，等等。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加强调查研究，围绕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把那些好方法和好经验，加以搜集整理，取长补短，改进提高，定型配套，然后组织推广；同时普及水文地质知识，为县和人民公社培养技术人员。专业水文地质队，还应当选择适当地段，通过已有资料，对合理井距和主要含水层做出系统的推断和总结，作为广大群众打井的依据。有计划地建立长期观测站，选择适当水井，经常观测地下水的水位、水量以及水质的变化，研究地下水的变化规律，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当然，在进行勘探和开发利用地下水的工作中，还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各级领导应该经常深入实际，通过调查研究，抓住关键，提出课题，放手发动群众，贯彻领导、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针，有效地开展技术革新运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以迅速查明地下水资源，合理地开发利用，抗御旱灾，争取农业丰收。



# 加速发展化学肥料和农药的生产

· 李 超 伯 ·

支援农业是工业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化学工业在工业支援农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化学工业同农业关系密切，它不仅从农副产品中提取许多原料，而且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不少重要产品。

农副产品加工后的许多副产物，是化工原料的一项重要来源。化学工业利用这些副产物，可以生产许多有机原料和产品。例如，甘蔗制糖后剩下的甘蔗渣，可以利用来制取糠醛；棉花的棉短绒可以制造硝酸纤维或醋酸纤维；棉子壳可以制取糠醛、酒精和活性炭；粮食作物的副产品如稻壳、稻秆、麦秆、玉米芯、玉米秆等，通过水解的办法，可以制取糠醛、酒精；通过干馏的办法，可以制取丙酮、甲醇、醋酸、活性炭、杂酚等一系列化工产品。这些化工产品，是制造塑料、粘合剂、玻璃钢、合成纤维等的很好的原料。发展这些化工产品的生产，对于我国工业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从长远来看，这种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化工产品的生产，是有很大发展前途的。随着农业的迅速发展，化学工业将从农业方面取得越来越多的原料。

化学工业的主要行业和许多产品，同农业生产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农业生产需

要化学工业提供多种多样的产品。实现农业增产，需要化学工业供应化学肥料和农药。进行农业技术改造，逐步实现主要耕作、排灌和运输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需要化学工业提供橡胶制品，如拖拉机轮胎、汽车轮胎、力车胎、胶管、胶带以及橡胶配件等。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大力发展养猪业，要求化学工业提供防治牲畜疾病和促进牲畜发育成长的各种畜用药物，如畜用抗菌素等。化学肥料、农药、橡胶制品、畜用药物以及供给居民日用的医药产品，是化学工业支援农业的五类主要产品。其中同农业生产的关系最密切、为农业需要量最大的是化学肥料和农药。

我国耕地面积广大，需要肥料数量很大。在目前我国化学肥料的生产远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必须大量利用农家肥料，养猪积肥，种植绿肥等等。农家肥料是一种很好的肥料，它同化学肥料配合使用，能够大大提高肥效。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在我国农业上是以有机肥料（主要是农家肥料）为主，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化学肥料）并举。因此，化学工业部门应当生产更多的化学肥料，大力支援农业生产。

农作物需要的养分很多，重要的有碳、氧、氢、氮、磷、钾、硫、铁、钙、镁、硼等十多种元素。其中氮、磷、钾三种元素，



农作物所需要的量很大。迅速发展氮肥、磷肥、钾肥的生产，是化学工业支援农业的迫切任务。

氮肥是农业生产的一种最重要的肥料。它供给农作物最需要的氮素养分。农作物如果缺乏氮素，茎叶就长得细弱，而且还会变黄，影响光合作用的进行，抑制养分的制造，结果就会减少收成。追施氮肥，能够促使农作物茎叶生长和旺盛。我国农田利用率较高，南方亚热带和热带地区的水稻田，每年二熟至三熟，长江流域水稻田，每年种植两季作物，华北平原一般两年三熟，需要从土壤中吸收大量的氮素养分。我国绝大部分地区，轮种作物主要是禾谷类作物，它们需要更多的氮素养分。只有少数地区种植能够补充土壤以氮素养分的豆科绿肥。这样，就造成了大面积农田氮素比较缺乏的现象。只有追施氮肥，才能补充和提高土壤肥力，促进农作物生长。

在化学肥料中，氮肥是一种速效肥，它易于在水中溶解，能够及时被农作物吸收，用于追肥，效果显著。我国农民有使用氮肥的经验 and 习惯。氮肥种类很多，我国广泛应用的是硫酸铵。硫酸铵对于农作物增产的作用很大，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的材料，一斤硫酸铵，一般可以增产稻谷四斤至六斤，小麦三斤至五斤，籽棉一斤至二斤，玉米六斤至八斤。

磷肥也是在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它对促进农作物的生长和土壤的改进起着积极的作用。农作物从出苗、开花、结实，一直到种子成熟，都需要不断地吸收磷素。同氮肥比较，磷肥的肥效较慢，最适合于作基

肥使用。

磷肥的主要品种是过磷酸钙和钙镁磷肥。过磷酸钙适用于水田，旱地，微酸性、中性和微碱性土壤。它的适用范围很广。我国许多地区的土壤，需要补充一定数量的磷素，施用过磷酸钙，对改进土壤，增加土壤肥力，有显著的作用。钙镁磷肥也是一种很好的磷肥。根据各地近几年来的试验，钙镁磷肥不仅适用于酸性和中性的土壤，而且对于微碱性土壤，也有良好肥效，因此，钙镁磷肥在我国是有很大的适用范围的。但是在目前，有些地方的农民，不乐于施用钙镁磷肥，这是由于施肥方法不正确和有些钙镁磷肥质量不好的缘故。我们要使农民懂得，钙镁磷肥不是速效肥料，不应当作追肥使用，而应当作基肥使用。各地经验说明，把钙镁磷肥和有机肥料一起混肥，然后当作基肥使用，肥效是很显著的。同时，生产钙镁磷肥的工厂，必须努力提高钙镁磷肥的质量，降低成本。

钾肥对促进农作物生长的作用也是显著的。它供应农作物以钾素，帮助农作物制造淀粉和糖分，使农作物的茎秆坚挺，不易倒伏，并且可以增强农作物抵抗疾病的能力。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需要吸收大量钾素。土壤中钾的含量虽多，但是能被农作物吸收当作养料的钾素却是有限的，因此，也需施用钾肥，加以补充，以适应农作物生长的需要。冬小麦在返青至拔节时期，吸收钾的成分最多。

在施用化学肥料的时候，应当调查研究土壤、气候、农作物等各种不同的条件。土壤的性质有酸性、碱性、中性等等，土壤中有



的缺少农作物所需要的氮，或者磷、钾以及其他元素。我国的气候，从南方到北方，悬殊很大，就是在一个地区，也会因为地形等条件不同，气候也不一样。至于农作物的种类更是繁多，而且在它们生长的各个时期，对于养分的需要也是不同的。必须根据各种不同条件，合理施肥，才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农药同农业增产也是直接关联的。病虫害是农作物大敌，不仅需要使用农药除虫治病，而且要用农药预防病虫害的发生。我国农业近两年来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农作物发生病虫害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对农药的需要更加迫切。

根据农作物的不同需要，化学工业部门应当供应各种不同的农药。粗略地说，用于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有杀虫剂、杀菌剂；用于帮助农作物生长的，有植物刺激剂；用于仓库储存、保管的，有熏蒸剂、杀鼠剂、防腐剂等。此外，还有除草剂和棉花脱叶剂等等。

为了满足农作物对农药的需要，应当贯彻土洋并举的方针，在生产化学农药的同时，积极发展土农药的生产。化工部门应当协助县和人民公社，进行土农药的调查研究，总结生产土农药的经验，提高土农药的生产技术，生产更多的土农药，为农业生产服务。

化学肥料和农药不但对农作物的生长、农业的增产起着很大作用，而且对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起着积极的作用。由于化学肥料的肥效高，体积小，运输方便，更多地生产和使用化学肥料，可以节省积肥、运肥的劳动力，使农村人民公社腾出更多的力量来精耕细作、发展多种经营和扩大耕地

面积。从长远来看，应当逐步把农业生产从主要使用人力加工的肥料改变为主要使用机器制造的肥料，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当然，在那时，仍然要把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配合施用。使用农药也有同样的作用。农药比人力捕杀害虫更加有效，使用农药，可以大大节省劳动力；有些农药，如除草剂、棉花脱叶剂等，就是为了节约劳动力而使用的。

我们党在制定化学工业发展方针和规划时，始终把支援农业作为化学工业的重要任务。十多年来，化学肥料和农药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但是，从农业生产对化学工业提出的要求来看，目前化学工业为农业提供的化学肥料和农药，无论在数量上和品种上，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化学工业必须在支援农业方面作更大的努力，千方百计地增产化学肥料和农药，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迅速发展化学肥料和农药的生产，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例如，硫酸是制造化学肥料和农药的重要原料之一。硫酸工业的发展，一方面，要抓紧大型硫酸厂的建设，在当前特别是要抓紧一九六〇年新投入生产的几个大型硫酸厂的正常生产工作，使它们迅速达到和超过设计能力；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发挥现有小型接触法硫酸厂的作用。几年来，由于小型接触法硫酸厂的推广，许多地区的硫酸供应，在不同程度上做到了自给或部分自给。当前，各个小型接触法硫酸厂必须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并根据国家计划的安排，认真进行充实和提高工作，进一步发挥生产潜力。



要加速发展化学肥料和农药的生产，必須充分注意化学工业同其他工业部門之間，和化学工业内部各行业之間的相互依賴、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是几年来发展化学肥料和农药生产所取得的一条重要經驗。

工业是由各个工业部門組成的一个整体，化学工业是这个整体的一个組成部分。同时，化学工业又是由各个彼此相互結合的行业所組成的整体，化学肥料工业和农药工业是它的組成部分。任何一个工业部門都离不开其他的工业部門。任何一个化工行业都离不开其他的化工行业。发展化肥和农药的生产，需要其他工业部門和化工行业給予支持，特别是需要机械、冶金、煤炭等工业部門和酸碱、化学矿采掘等化工行业給予支持。各工业部門和化学工业的各行业对发展化肥和农药生产的支持，是通过工业部門之間、化工行业之間的协作来进行的。由于化学肥料和农药对农业增产的作用最为直接，因此，各工业部門和化工各行业除了根据本身的特点，加强同农业有关的各項业务，大力支援农业以外，还要尽可能地加强协作，从各方面帮助化学肥料和农药生产的发展。这既是各工业部門、化工各行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所必需，也是各工业部門、化工各行业对农业的支援的一项重要內容。

发展化学肥料和农药的生产，需要有关工业部門和化工行业提供設備和材料。

化学肥料和农药工业所需要的設備材料是多种多样的，它既需要冶金工业、机械工业等部門提供各种金屬材料和設備（如鋼、铁、銅和成套的机器設備等），又需要建筑工业、森林工业、輕工业等部門提供各种非金

屬材料和設備（如水泥、木材和陶瓷、玻璃容器等），还需要化学工业有关行业提供某些化工材料（如塑料、橡胶等）。例如，建設一个年产五万吨的合成氨厂（加工为硫酸銨，年产硫酸銨二十万吨），需要金屬材料大約三万六千吨，其中用于設備制造的約需一万七千吨，用于建筑安裝的約需一万九千吨。同时，合成氨的生产，是在高温、高压下进行的，对設備的要求比較严格。这就要求机械工业、冶金工业等部門給予密切的协作和有利的支持。又如，为了进一步提高鈣鎂磷肥的质量，当前急需解决的是粉碎能力的问题。有些鈣鎂磷肥厂，生产工艺前后不配套，高炉生产能力大，成品粉碎能力小，于是就产生部分成品未經很好粉碎的情况，而未經很好粉碎的鈣鎂磷肥，农作物是不易吸收的。为了更好地推广鈣鎂磷肥，粉碎能力不足的工厂，应当在机械工业部門的协作和支持下，增添必要的粉碎設備。

化学肥料和农药的原料，除了一部分取之于农业以外，它需要有关的工业部門和化工行业供給。

生产化学肥料和农药的原料，一部分来自矿石，例如磷、鉀、硫磺、煤、明矾、銅、汞等矿；一部分是无机和有机化工原料，例如硫酸、硝酸、燒碱、純碱、苯、萘、酒精等；此外，許多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廢液、廢气、廢渣、廢料，也是生产化学肥料和农药的原料。这些原料，有的是化学矿采掘业生产出来的，有的是其他工业部門的采掘业生产出来的；有的是化工部門的有关行业提供的产品，有的是有关工业部門綜合利用资源生产出来的产品。





大力发展化学矿采掘业和基本的无机、有机化工原料的各个行业，使原料工业得到优先发展，是发展化学肥料和农药生产的重要环节。以硫酸为例，生产一百吨硫酸铵，需要七十五吨硫酸，生产一百吨过磷酸钙，需要四十吨硫酸；如果硫酸生产不能迅速发展，硫酸铵、过磷酸钙等化学肥料的生产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目前，在化学工业内部，总的情况是原料工业落后于加工工业，化学矿采掘业和基本原料工业落后于化学肥料和农药工业。化学肥料和农药的生产对原料的需要，不仅包括一次生产过程和生产周期中所需要的原料，而且还要有合理的库存，这样，才能使生产正常地持续不断地进行。

资源的综合利用，可以取得许多化工原料和产品，其中有一些是化学肥料和农药的重要原料。还有一些化学肥料和农药的生产，按照我国工业生产的现状，主要通过或必须通过对某些资源进行综合利用，才能取得原料。这就不仅需要化工部门各行业的配合，还需要有关工业部门的协作。例如，苯是许多种农药的重要原料，它来自炼焦工业，是炼焦工业的副产品。我国现有的炼焦厂，还没有普遍回收苯。为了支援农业，多产农药，各个炼焦厂都应当根据各自的条件，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设备，使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更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回收苯这一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生产合成氨，除了目前主要利用空气中的氮，和经由水煤气取得的氢来制造（这就需要冶金工业或煤炭工业部门提供焦炭或

原煤），还可以利用石油部门供应廉价的石油废气和天然气制造，从长远来看，这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从原料方面支援化学肥料和农药生产，需要有关工业部门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当然，化学工业部门应当主动地从技术方面给有关工业部门以帮助。

要使生产化学肥料和农药的原料材料及时运到企业，产品及时运往农业生产战线，还必须依靠交通运输部门提供运输条件，轻工业、森林工业、商业等部门提供包装容器。在化学肥料和农药中，有许多产品有强烈的腐蚀性和毒性，必须有严密的包装容器才能储运，这就需要有关部门供应生产这种包装容器的材料和妥善安排生产。

根据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大力支援农业是各工业部门的首要任务，对于同农业关系最为直接的化学工业来说，尤其必须尽全力支援农业。但是，化学工业是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要使它在支援农业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努力加强这个环节，首先是加速化学肥料和农药的发展。三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持续跃进的胜利，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已经提前完成。这就使我们赢得了时间来加强对国民经济中薄弱环节的工作。只要我们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认真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够迅速发展化学肥料和农药的生产，使它更好地为农业服务，更好地促进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 充分利用肥源，增积有机肥料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土 丰

肥料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施肥是增加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一项基本措施。为争取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胜利，必须进一步做好肥料工作。

农作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需要从土壤中吸收氮、磷、钾、钙、镁、硫、铁和其他多种元素，其中最主要的是氮、磷、钾这几种元素。只有适时而充分地满足农作物对于这些营养元素的需要，才能使农作物正常地生长发育，提高其产量和品质。肥料（包括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含有农作物所需要的营养元素。有机肥料，主要是人畜粪尿、堆肥、绿肥、杂肥等，不但可以供给植物所需要的大量的氮、磷、钾和有机质，还能够提供农作物光合作用所需要的二氧化碳。

施用有机肥料，不仅可以供给农作物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还可以改良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熟化土壤，培养地力。我国农村的“地靠粪养，苗靠粪长”的谚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施肥对于改良土壤的作用。施用有机肥料，可以使土壤借着微生物的活动，增加有机胶体，使土粒胶结起来变成稳定的团粒结构，能提高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和透气性能，调节土壤温度。根据我们在河北省唐

县的观测，每亩施用猪粪肥四千斤，增加了土壤保水能力百分之三点八，减少水分蒸发百分之十四点三。在早晨，可以提高土壤温度二点二度，在中午温度高时，可以降低土壤温度一点九度。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的改善，又加强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的活动，使有机物分解、转化，产生许多刺激性物质，促进作物生长，并且使土壤中难以被作物吸收利用的磷、钾肥分转化为有效的肥分，发挥土壤潜在肥力。常年施用有机肥料，可以使土壤中的微生物大量增殖。根据我们观测，在常施有机肥的土壤中的微生物比生土中的微生物要多几千倍，微生物活动的作用（如呼吸作用、硝化作用、氨化作用和纤维分解作用）也增强几倍甚至几十倍，这就使物质转化加强，有利于使生土变为熟土，死土变为活土。极瘠薄的低产土壤，如砂土、盐土、冷浸田等，经过合理施肥和结合采取其他耕作及水利措施，也可以变成肥沃的土壤，为作物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条件。例如一般菜园土质好，单位面积产量高，耕作性能好，就是由于大量施用有机肥料（当然也有兼施无机肥料的）和精耕细作的结果。

合理施肥还可以调节作物生长发育的条



件。如增施氮肥除了供給作物合成蛋白质所需要的氮素以外，还能够使作物枝叶茂盛，增加叶绿素的含量，促进光合作用。在作物生长后期使用氮肥，还能使作物生长期延长。又如在同一土地上长期施用磷肥，能使有些谷类作物提早成熟。同时，根据我們的試驗，在作物幼苗期施用磷肥，生长盛期再追施氮肥，增产效果极大。作物在不同发育阶段需要不同种类和不同数量的养分，根据作物各个发育阶段的不同需要，进行合理施肥，并相应地采取灌水和耕作等措施，可以直接促进和控制作物的生长发育，达到增产的目的。劳动模范陈永康就是根据水稻生长发育的特点，采用施肥、灌水等措施控制水稻的生长发育，而获得大面积的稳定高产。

全国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肥料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肥料的数量不断增长，施肥面积逐年扩大，单位面积的施肥量不断增加，施肥方法不断改进，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根据許多典型材料推算，全国解放时（一九四九年），全国施肥面积只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平均每亩施肥量約一千斤；一九五二年，施肥面积扩大到占百分之六十，平均每亩施肥量增加到約一千五百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一九五七年），全国施肥面积扩大到占百分之八十，平均每亩施肥量約二千五百斤。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間，施肥面积和亩施肥量，又有了增长。国家在大力帮助农村增加有机肥料的同时，还加速发展化肥生产。化学肥料一九五九年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四十八点四

倍，一九六〇年又有很大的增长。

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复种指数的增加，对于肥料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也愈来愈高。为了满足这种需要，除了积极生产更多的化学肥料以外，主要地是依靠增加有机肥料。而要增加有机肥料，必須广泛地开辟肥源，做好积肥保肥工作，合理施肥，充分发挥肥料的作用。

我国土地辽阔，气候温和，肥料资源非常丰富。根据各个地区的調查資料，目前使用的农家肥料有十四类一百多种。只是人粪尿，就是一项巨大的肥源。我国农村人口有五亿多，平均每人每天排泄的粪尿以两斤計算（折合为成年人的排泄量），則全年能积攒的人粪尿就有一千八百多亿斤。这些粪尿如果能够好好地收集，掺入一定比例的水分、粪秆和土，經過漚制，可够四亿多亩土地施用。根据試驗，新鮮的人粪中一般含有氮素百分之一左右，磷酸百分之零点四左右，氧化鉀百分之零点三左右；新鮮的人尿中含有氮素百分之零点五左右，磷酸百分之零点一左右，氧化鉀百分之零点三左右。一个成年人全年排泄的粪尿，經過漚制，施在地里，可以增产粮食（以水稻、小麦、玉米平均計算）一百至一百五十斤。再以牲畜粪尿來說，新鮮猪粪中一般含有氮素百分之零点六左右，磷酸百分之零点四五左右，氧化鉀百分之零点五左右；新鮮的猪尿中一般含有氮素百分之零点三左右，磷酸百分之零点一三左右，氧化鉀百分之零点二左右。猪粪尿中还含有比較丰富的有机物。一头猪每年所排泄的粪尿



約四千斤，經過漚制，施在地里，可以增产粮食（以水稻、小麦、玉米平均計算）一百五十到二百斤。目前我国饲养的猪、牛、馬、騾、驢等家畜以及家禽，每年所提供的粪尿的数量相当大，在这些粪尿中如果以一比二或一比三的比例掺入藁秆和土混合堆漚，能制造出更多的厩肥。此外，还有各种綠肥、堆肥、泥肥、海肥、杂肥、矿肥等。从各方面挖掘和充分利用这些肥源，做好积肥保肥工作，防止肥分丢失，提高肥料的质量，并做到合理施肥，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农业增产对肥料的需要。那种认为肥源不足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根据各地已有的經驗，把季节性的突击性的积肥活动同經常性的积肥保肥工作結合起来，是挖掘和充分利用肥源、增加肥料的数量和提高肥料的质量的一个有效办法。

在积肥保肥工作中，一方面要根据肥源和劳动力的情况，抓住有利时机，集中一定的力量进行突击，另一方面要結合日常工作，进行經常性的收集和管理。不集中一定力量进行突击，就难以获得許多带有季节性的大宗的肥料，如河泥、湖草、山青、海肥等；沒有經常性的收集和管理，就不能及时集漚和漚制各种家肥、杂肥。許多优质肥料，如人畜粪尿以及城市垃圾、工业残渣，主要是依靠經常地收集和管理，只有这样，才不致使肥分揮发流失，并有利于改善环境卫生。

我国农民向来非常重視經常性的积肥和保肥工作，并且把积肥保肥工作与清洁卫生工作結合起来。农諺說：“要想多打粮，积肥

要經常”，“勤扫院子常积粪，家里清洁地里肥”，“扫帚响，粪堆长”。农村家庭一般都有厕所、猪圈等积肥設備。这些設備对于积肥有很大的作用。在許多地区，还采用避風、遮阴、盖土、糊泥等保肥措施，避免粪肥受風吹雨淋和阳光照射，造成肥分滲漏揮发。許多优质肥料，如人畜粪尿，如果分散各地，不加遮盖，任其受日晒雨淋，其中可溶性的肥分将会流失，有机物质也将因微生物好气分解而大大减少，特别是其中的氨态氮素也会随着温度的增高而加剧揮发。根据我們关于猪粪肥保肥的試驗，如果猪粪肥不加遮盖，自然堆放四十天，其中氮素肥分要损失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如果掺入适量泥土，氮素只损失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如果堆放时表面用泥封起，同样也堆放四十天，則其氮素只损失百分之五至六。大跃进以来，許多地方推行了“五有三勤”（五有即人有厕所、猪有圈、鸡有棚、家有灰仓、生产队有专职积肥員，三勤即勤垫圈、勤收集、勤管理）等积肥保肥措施，建造了許多厕所、灰仓、茅池、猪圈等，这些都对积肥保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有少数地方，沒有注意經常性的积肥工作，或者沒有做好保肥工作，肥分损失很多。有些地方将人粪晒干使用，厕所、粪堆不加遮盖，这样不利于保肥。根据我們观测，这样处理人粪尿，其中氮素和有机物一般要损失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有的甚至要损失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加强牲畜厩肥的积攒和管理，是积肥保肥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牲畜厩肥，尤其是猪厩肥，不仅数量大，质量高，而且适宜于



各种土壤和作物，对各种作物都有明显的增产效果。一般說，一头猪每年所排泄的粪尿，单是氮、磷、鉀的含量，就相当于一百多斤化学肥料的含量。在养猪积肥方面，特別要注意垫圈造肥。垫圈(垫土、垫草等)是把积肥、造肥和保肥結合起来的有效办法。垫圈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使猪粪尿中易于损失的肥分借着垫入的土和草中的大量胶体吸着而保存起来。根据我們的試驗，在猪粪尿中加土两三倍(以重量計算)就能保存大部分肥分。另一方面，垫圈可以調节水分、空气、养分、温度等，促进微生物的活动和繁殖；而微生物的活动和繁殖，又可以使垫入的土和草中无效的养分轉化为有效的养分，迟效的养分变为速效的养分，难以分解的物质逐步分解，对植物有害的物质逐步轉化为无害甚至有利的物质。所以，垫圈是获得大量优质肥料的重要措施。农民常說：“勤起勤垫，猪脚底下出好粪”，“有錢难买猪踩泥”。这也反映了垫圈积肥的好处。有些地方养猪不注意垫圈，或者建造猪舍时沒有很好地考虑到养猪和积肥相結合的要求，沒有建造粪坑、尿池，沒有保肥設備，这就大大地减弱了养猪积肥的效果。

扩大肥源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把增积肥料同合理利用土地、充分发挥土地潜力結合起来。种植綠肥，是增加有机肥料、提高土壤肥力的有效措施。农民說：“猪粪、紅花草，农家两件宝”，“麦地种綠肥，吃麦地又肥”。这說明农民对綠肥非常重視。

綠肥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是多方面的。綠

肥中含有农作物所必需的氮、磷、鉀等各种养分。根据我們几年来的調查試驗，我国許多地区的土壤缺乏氮素，而种植豆科綠肥，能够增加土壤中氮素养分。根据測定，种植豆科綠肥一年，一般每亩所能固定的氮素养分，相当于八十斤到一百斤硫酸銨的肥效。一亩綠肥，可供两三亩地用肥的需要，可以增产粮食一百五十斤至二百斤。如果全国扩种綠肥一亿亩，固定的氮素相当于四百万至五百万吨化学氮肥的含量，能滿足两三亿亩土地对氮肥的需要。如果在綠肥生长初期施入少量的磷肥和草木灰，可以大量增加綠肥产量，提高它固氮的效果。因此，种植綠肥能收到以田养田、以小肥养大肥的效果，能起到用无机肥增加有机肥、用磷鉀肥增加氮肥的作用。綠肥的根系能疏松土壤，改良土壤結構，增加土壤保水通气能力。种植綠肥，还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固定沙丘，减少風蝕、水蝕等危害。綠肥的莖叶，可以用来飼养牲畜，如紫云英(按干物的重量計算)含粗蛋白质百分之二十五，脂肪百分之五，是牲畜的好飼料。

种植綠肥用工少，而綠肥使用方便，肥效长久，是一种經濟而有效的肥料。种植綠肥对于运送厩肥不便的远地解决用肥問題，更有重要的意义。各地在种植綠肥方面已經积累了許多經驗，例如在輪作中合理安排綠肥的地位，实行綠肥和各种作物套种、間作，在果园、茶园扩种豆科綠肥，利用田边、地角、道旁、屋側等零星土地种植綠肥，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不仅不影响作物的种植



面积，而且能充分利用土地和太阳光能来提高土壤肥力，增加作物产量。因此，在已经有种植绿肥习惯的地区应当进一步种好绿肥，在有条件扩种绿肥的地区应当适当扩种，在还没有种植过绿肥的地区可以试种。为了解决种植绿肥所需的种子问题，根据各地经验，可以采取自繁、自选、自留、自用，并辅之适当调剂的办法，有的地方也可以建立种子繁殖区。

把积肥保肥工作与处理城镇工矿区食品加工、酿造、榨油、炼焦等工业的副产物和残渣结合起来，也是扩大肥源，增积肥料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这些工业的副产物和残渣种类繁多，有些含有农作物所需要的养分。例如，炼钢炼焦回收的大批氨水，就是很好的肥料；许多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副产物，可以用来饲养牲畜，增加厩肥；许多牲畜不能直接利用的残渣、废品，经过沤制处理，可以变成质量很高的肥料。

在充分利用肥源、做好积肥保肥工作、提高肥料质量的同时，还要十分注意合理施肥，充分发挥肥效的问题。

施肥，同采用其他农业增产措施一样，必须因地、因时、因作物制宜。肥料种类繁多，各地的肥源也不一样。不同土壤、不同作物以及同一作物在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需要施的肥料往往有所不同。同时，农业增产的各种因素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比如使用多量肥料，必须同时注意合理灌溉，以利肥料分解。随着耕作制度和栽培方法的改变，施肥的方法也要相应地改变。有了充足的肥料，如果使用不当或施用技术不得法，也不能收到增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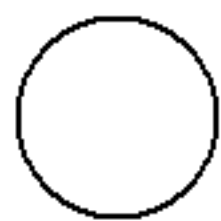
的应有效果。我国农民对于合理施肥、经济用肥有许多好的经验，需要进一步加以总结。根据各地的经验，应当注意把集中用肥和均衡用肥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水利、土壤条件较好的地区，多施肥可以使各种因素相互促进，发挥深耕、灌溉、密植等的最大效果。此外，还应注意将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配合使用，以收到更好的增产效果。有些无机肥料如磷矿粉、钙镁磷肥和有机肥料混合堆沤后，由于微生物的作用，产生有机酸类，能够促进溶解，提高肥效。把长效肥料和速效肥料配合使用，也是合理施肥、发挥肥效的办法之一。这既能保证作物生长周期对养分的需要，又能满足作物某一发育阶段对某种养分的特殊需要，收到调节作物生育环境、培肥土壤和催苗的效果。

做好肥料工作，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是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关键。农村人民公社进一步执行了以生产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进一步完善了“四固定”、“三包一奖”等制度，并实行了公养私养并举而以私养为主的养猪政策，对社员家庭积肥采取按质论价、付给现款或记工分加以收买的办法，这样便大大提高了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积肥造肥的积极性。许多生产队制订了积肥造肥计划，组织社员修圈积畜肥，或大种绿肥，或上山积土肥，或下海捞海肥。社员家庭积肥也大大增加。各地肥料资源的进一步发掘和利用，肥料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必将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争取今年农业生产丰收，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



# 红旗

HONGQI



11

一九六一年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 ★

## 目 录

### 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

一个法宝 ..... 李维汉 (1)

### 实验、抽象和假说在科学研究中的

作用..... 何祥霖 (12)

关于百家争鸣的一个问题..... 黎庶之 (23)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一个材料的调查..... 谢 商 (27)

南斯拉夫“企业自治”的真相 ..... 廖 原 (31)



# 統一战綫是中国人民爭取胜利的一个法宝

李維漢

**編者按：**李維漢同志計劃写几篇文章，系統地論述我国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經驗。本期发表的是这些文章中的第一篇，第二篇将在本刊下期刊出。

毛澤东同志經常強調，为了战胜異常强大的敌人，为了建設我們的国家，必須在無产階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結成广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在我国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民主統一战綫有着不同的內容，担負着不同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經驗证明：不論在民主革命时期，或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在我們党的政治路綫中，都必須正确地处理統一战綫問題。只有这样，我們的革命和建設才能胜利，才能发展。

中国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发生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是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轉变为新民主主义，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轉折点。“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这个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序幕。“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識分子（他們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战綫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識分子，沒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結合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首先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领导了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这个运动遭到了全副武装的反动統治的鎮压，暂时轉入了低潮。中国工人階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深刻地懂得：“他們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

<sup>①</sup> 《新民主主义論》。《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93頁。



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在它的一九二三年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以便由此展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并且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党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代表大会批判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革命，国民党不可能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因此拒绝革命统一战线，并且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代表大会也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倾向，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阶级只能站在帮助的地位，因此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就论述了救中国的根本方法是民众的大联合。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和以后的各个时期中，毛泽东同志都代表党的正确思想，同以上两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

国民党的前身是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它是一个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到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联盟。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大部分丧失了革命活力，陷于涣散状态。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继续斗争，但是屡次失败，濒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俄国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在中国发生的新的革命斗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在绝望里，……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sup>②</sup>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于一九二四年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且改组了国民党。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右派，自始就反对国共合作，破坏代表大会的决议。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以后，他们的反苏反共的活动更加猖狂起来，形成了所谓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共产党人经过同国民党左派合作，团结中间派，对右派展开尖锐的斗争，努力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变成实际。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通过这次合作，党发动和领导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在这期间，不仅工人运动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达到了以一九二五年“五卅”罢工为中心的全国高潮，而且在南方几省掀起了广大的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因此有了工农联盟作基础，成为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个基础之上，国民党发展成为民族民主革命联盟。在这个基础之上，创造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争取解放的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40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6页。



斗争。“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sup>①</sup>

但是，当时的革命阵营还是不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虽然获得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但由于我们的党那个时候还是幼年的党，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不懂得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在北伐战争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群众运动，所以，这个统一战线还缺乏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武装作为它的中心支柱。而当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群众运动也都塌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派即中间派，则随着工农运动的高涨，而愈来愈恐惧，愈来愈动摇。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右派，又还占据着重要的实力地位，许多政权机关和军队把持在他们的手里。在西山会议派遭到打击以后，他们找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新的代表，从一九二六年起，展开了各种新的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企图窃取革命的领导权，从内部来出卖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坚决依靠工农和武装工农，才有可能稳定中间派，巩固革命统一战线，以击退反动派的进攻。当然，敌人是很强大的，因为它不但包括地主买办阶级，而且包括支持地主买办阶级的国际帝国主义。但是，当时共产党如果采取了这样坚决的革命政策，是有可能避免至少是减轻后来的失败的。在这革命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根据对于当时社会各阶级所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地指出谁是革命的真正朋友，谁是革命的真正敌人，要求党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尤其要求党充分地估计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坚决地领导农民斗争，武装农民，在乡村中建立革命政权，以壮大和巩固革命的基础。可是，当时占据党的领导机关的陈独秀投降主义分子，拒绝了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他们在统一战线中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不但不敢坚决依靠工农运动，积极武装工农，反而抑止工农运动，特别是抑止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运动，来迁就地主资产阶级，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国民党右派。这样，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革命遭受了严重的失败。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期间，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革命统一战线中只剩下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以及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一些人，并且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和损失。但是，英勇的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

<sup>①</sup>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53页。



继续战斗了。”<sup>①</sup>共产党迅速地克服了陈独秀主义，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和湘、鄂、赣等地的秋收起义，并且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深入农村，紧紧地依靠农民，展开了农民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使工农联盟获得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武装支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成为我国民主革命中工农联盟的主要形式。同时，毛泽东同志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在农村中富农和地主也有不同，我们必须正确地、尽可能地联合或者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因此，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根据地规定和执行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经济，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的土地革命路线；规定和执行了奖励私人经济，同时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并力争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实现领导的经济政策。凡此都促进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发展，因而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给全国人民以希望，指出了走向胜利的方向，而成为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因素，并且为征集更广大的同盟军、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准备了重要条件。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蒋介石政府对外不抵抗、对内加紧“剿共”和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举行了侵占全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使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降为次要的矛盾，国内各阶级的关系发生了新的组合。工人、农民、学生的抗日运动迅速高涨起来；原来附和蒋介石反动派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的中间政治力量，也逐渐转向主张抗日。甚至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间也出现了某些抗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首先主张武装抗战，并且积极领导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和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国工农红军宣言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和武装群众的三个条件下，同国民党中愿意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共同抗日。但是，由于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党没有能够利用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的有利条件，去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他们都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都对整个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采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政策。而发展到最高峰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更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同反对地主买办阶级并列，否认中国革命中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甚至把那些同蒋介石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当作“最危险的敌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采取了一系列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

<sup>①</sup>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6页。



的政策，为时达四年之久，其结果，使革命力量遭到孤立，革命事业遭到很大的损失。在这个严重的历史关头，由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举行的党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挽救了党，保存了党和红军的骨干。这些骨干成为尔后我们党胜利地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核心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划时期的，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以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断地前进。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经过长征，胜利地到达了陕北。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进一步向华北进攻，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革命形势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重新走向高潮。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加紧进攻，造成了中日矛盾更加突出、更加尖锐，英美帝国主义同中国的矛盾，以及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都相对下降的形势。不但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力量更多地更为积极地转到抗日方面来，而且地主买办阶级的营垒和国民党内部也开始逐渐地分化为主张投降的亲日派和一定程度上倾向抗日的英美派。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迅速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号召和领导广大人民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进行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sup>①</sup>这就是组成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革命武装为中心支柱的，包括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人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接着说：“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sup>②</sup>为了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克服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在当时和以后的时期，系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为了迫使蒋介石国民党改变对外投降、对内进行反人民战争的反动政策，中共中央继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之后，在一九三六年五月进一步向国民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接着，同当时在西北进攻红军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达成停战协议；接着，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特别是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终于迫使蒋介石国民党停止了进行十年之久的反革命内战。在“七七”事变以后，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对日抗战的局面。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从工人阶级到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它包括了

<sup>①②</sup>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46、151—152页。





进步力量（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中间力量（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此外还有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和其他爱国分子），顽固力量（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针对这种阶级组合的情况，针对蒋介石国民党一面被迫抗日、一面又坚决反共的两面性，并且鉴于过去两个时期中“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种片面政策的错误，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自主，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全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斗争，克服了在抗日战争初期发生的类似陈独秀投降主义的第二次王明路线。这个错误路线抹杀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差别，反对划分左中右，主张一切经过蒋介石国民党的同意，而放弃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的方针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在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党和毛泽东同志紧紧地抓住了一个对全局有决定影响的主要环节，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尽一切可能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争取地主阶级以及和这个阶级有联系的人们共同抗日，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停止执行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的政策，而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为了发挥民族资本和私人经济的积极性，党采取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为了团结一切抗日民主人士共同奋斗，党采取了“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联合政府政策。就这样，党在根据地内发展和巩固了工农联盟，并把其他抗日阶级阶层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由于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巩固，就使敌伪军日益陷落在中国人民的分割和包围之中，不能达到占领全中国的目的；就使全国人民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有了榜样，看到了胜利的前途和人民共和国的远景，坚定了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信心；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强有力的支柱，有利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就有力量对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并且阴谋分裂、准备投降的蒋介石集团，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之不敢公开破裂投降，并且胜利地打退了他们为公开投降、全面内战作准备的历次反共高潮。总之，由于抓住了这个主要环节，党比较顺利地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从而把抗日战争引导到最后胜利。

由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了伟大的发展和成功，积累了完整的和丰富的经验。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果，革命武装的成果，革命根据地的成果，党的建设的成果，连同各方面丰富的经验在内，为以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极为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支持之下，采取了反革



命的两手：一手积极准备内战，一手进行和平欺骗。党和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方针：一方面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一方面准备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争取和平、民主，是当时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独裁、内战政策，同全国人民的愿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美蒋装出和平、民主姿态，只是为了欺骗人民，孤立共产党，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大规模的反革命内战。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这种反动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使自己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党和毛泽东同志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并且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这场复杂的曲折的斗争。经过这场斗争，终于使中国人民中的许多人，主要是中间阶层的分子，丢掉了对于美蒋反动派的幻想，而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则在全国人民中获得空前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一场重要斗争的胜利，在政治上为人民解放战争铺平了道路，从而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一年以后，我们党进一步提出并且实行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sup>①</sup>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纲领；提出并且实行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sup>②</sup>这样一个基本的经济纲领。依靠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和正确的战略指导，人民解放战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革命运动都迅速地进入了高潮，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和巩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对当时形势作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人民解放军已由防御转入进攻。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罪恶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彻底暴露。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的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已经破产。中国共产党不但在解放区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获得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战争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人民革命运动更加发展到这样的广泛和强大，终于把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也是最后的一个反革命统治，从四面八方，加以包围，加以瓦解，最后把它打倒，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基础之上，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达到了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在内的伟大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成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37页。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3页。



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随着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的转变，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但需要而且可能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因此，从三十年民主革命的战火中锻炼出来的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统一战线，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转变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统一战线。

在建国的头三年，即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胜利地进行了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镇压反革命分子、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其他民主改革的斗争，恢复了国民经济。这些斗争的胜利，大大地巩固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且为全面进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一九五三年，党中央正式宣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农业和其他个体经济是经过合作化的道路，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采取和平的方法，逐步地进行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而人民手里又掌握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国民经济的命脉，所以我们能够经过和平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很快，在一九五五年冬天和一九五六年春天，就相继出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接着就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使我国多种成分的经济结构变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工农联盟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都进到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这个时期内取得的伟大成果。但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却还远没有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也还需要一个逐步习惯的过程。不甘心于资本主义灭亡的资产阶级右派企图利用这种情况，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在一九五七年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我国人民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全民的整风运动，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和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取得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广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精神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此空前高涨，资产阶级的多数人也因此不同程度地转过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弯子，表示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个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个总路线的指导下，展开了农村



人民公社化和国民經济大跃进的局面，掀起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高潮。

在經济战綫上、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取得了偉大胜利的基础之上，在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之下，我国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工农联盟已經被提高到实现公社化和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基础上，民族资产阶級分子正在进入根本改造的阶段，即逐步改造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阶段。

一般說来，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是不断发展和不断巩固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是这样，在社会主义阶段仍然是这样。党在社会主义阶段，对资产阶級分子和资产阶級知識分子以及其他民主爱国分子，采取包下来，包到底，加以安排使用，又加以教育改造的根本政策；对于一切願意合作的民主党派，則采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因此，一切願意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半途而廢的人們，都必将經過长期合作和根本改造，在将来共同到达共产主义社会。可以預見，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将会繼續巩固和发展，直到阶級消灭，实现大同。

从上述的历史发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民民主統一战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一个法宝，一件武器，同样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胜利的一个法宝，一件武器。

远在一九三九年，毛澤东同志就从党的十八年的丰富的历史經驗中，总結出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問題或者三个主要法宝。他說：“統一战綫問題，武装斗爭問題，党的建設問題，是我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問題。”“統一战綫，武装斗爭，党的建設，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sup>①</sup>过了十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經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这时候，毛澤东同志为紀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写了《論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进一步总結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經驗，并且給中国人民指明了繼續前进的道路。他說：

“一个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軍隊。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級各革命派别的統一战綫。这三件是我們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們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們取得了基本的胜利。”<sup>②</sup>

“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論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換了中国的面目。到現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

① 《(共产党人)发刊詞》。《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97頁。

② 《論人民民主专政》。《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4頁。



基本的經驗，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國內，喚起民众。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农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綫，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农聯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二）在國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產階級和广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綫。”<sup>①</sup>

“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产党）領導的以工农聯盟为基础的民主專政。这个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这就是我們的公式，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sup>②</sup>

“就是这样，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資產階級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让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义，資產階級共和国让位給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階級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資產階級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国。”<sup>③</sup>

毛澤东同志在这里所指明的中国革命的經驗和道路，如果用一句話来概括，可以这样说：在工人階級（經過共产党）領導之下，以工农聯盟为基础，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进行武装斗争，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然后，經過和平的道路，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經成为世界无產階級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中国人民能够获得彻底解放的唯一的歷史道路。这个基本思想，像一根紅綫一样，貫串在毛澤东同志的著作中。我們学习毛澤东同志的著作，研究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的經驗，必須很好地体会和掌握这个基本思想。

有人提出問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阶段，人民民主統一戰綫还是不是一个法宝或者武器呢？毛澤东同志的回答是肯定的。

一九五〇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国委员会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上，毛澤东同志讲明了我們国家經過战争，經過新民主主义的改革，然后走到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之后，接着說：

“在这个远大目标上，在國外，我們必須堅固地團結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絲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國內，我們必須團結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須巩固我們这个已經建立的偉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統一戰綫。不論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統一戰綫的巩固工作

<sup>①②③</sup> 《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7、1485、1476頁。





有所貢獻者，我們就歡迎他，他就是正確的；凡對於這個革命統一戰線的鞏固工作有所損害者，我們就反對他，他就是錯誤的。”<sup>①</sup>

一九五六年，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詞中，毛澤東同志總結了我們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基礎經驗，又說：

“就國內的條件來說，我們勝利的獲得，是依靠了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並且廣泛地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進行偉大的建設工作，在我們的面前，擺着極為繁重的任務。雖然我們有一千多萬黨員，但是在全國人口中仍然只占極少數。在我們的各個國家機關和各項社會事業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黨外的人員來作。如果我們不善于依靠人民群眾，不善于同黨外的人員合作，那就無法把工作做好。在我們繼續加強全黨的團結的時候，我們還必須繼續加強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團結，繼續鞏固和擴大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必須認真地糾正在任何工作環節上的任何一種妨害黨同人民團結的不良現象。

在國際範圍內，我們勝利的獲得，是依靠了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sup>②</sup>

一句話，我們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的取得，仍然是依靠了一個國內的統一戰線和一個國際的統一戰線。

為什麼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仍然是一個法寶或武器呢？可以列舉許多理由，這裡只舉出最重要的三點：（一）工農聯盟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沒有鞏固的工農聯盟，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而隨着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工農聯盟也日益鞏固和提高。（二）我們需要經過統一戰線，調動一切可能調動的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對民族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根本改造，以達到消滅這一個最後的剝削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目的。這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過渡時期的一項偉大而又艱巨的歷史任務。同時，我們還面臨着帝國主義的威脅和國內封建買辦殘余勢力的搗亂，還要解放台灣，這也需要廣泛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共同奮鬥。（三）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對世界人民的聯系和影響越來越廣泛，對世界人民大團結事業所擔負的責任和應當作出的貢獻也越來越重大。只此三點，就可以充分說明，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社會主義階段仍然是一個法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一個法寶。

<sup>①</sup> 《在中国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8頁。

<sup>②</sup>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頁。





# 实验、抽象和假說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 何 祚 庠 ·

科学研究必須从实际出发。自然科学研究必須重視总结群众的劳动生产經驗。恩格斯說：“人的思維之最本质的和最密切的基础，却恰恰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非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sup>①</sup>。毛澤东同志說：“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sup>②</sup>人对自然进行斗争，主要方式是生产实践；因而从根本上說，自然科学理論是生产实践經驗的总结。

科学理論并不是由生产实践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从实践而得到的感性知識上升为理論的过程，是認識上一次的质的飞跃，“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sup>③</sup>。自然科学在实现認識上的质的飞跃时，需要利用实验这种特有的形式和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把生产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問題，或者在观察自然界的过程中，把某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現象（包括天然的和人工的），集中并控制起来，系統地、精細地进行实验研究，来揭发事物的內

在联系。在实验材料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便試行抽象和概括，力图造成科学的概念和理論的学說。科学的結論常不是一下就能到达和完成的，所以在科学发展的某一阶段，科学的抽象会以一种或多种假說的形式出現。为了进一步发展这些假說并檢驗这些假說，又設計出和进行新的实验。假如实验不断证明某一种假說是正确的，那末这种假說便将逐渐形成理論。假如实验推翻了这种假說，那末又要在新的实验材料基础上形成新的假說。如此不断反复进行。最后，由于实验材料不断地积累，精确度越来越高，条理越来越分明，加以人們不断进行抽象和概括，因而逐渐由假說过渡为科学的理論。

以上所述是自然科学理論形成的一个扼要的过程。当然，实际的認識活动的过程是很复杂的。但上述科学理論形成的过程，却是較有代表性的。几乎在所有重大的自然科学理論的形成过程中，都使用了实验、抽象和假說这三种研究方法。对于这三种科学研

① 《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2頁。

② ③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6、280頁。



究方法的作用估計不足，是不對的。現在試分別地闡述一下這三種方法在科學理論形成過程中的作用。

## 一、實驗

科學實驗在自然科學研究中起着重大作用。它是社會實踐的一種形式。毛澤東同志說：“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sup>①</sup>。古代科學實際上幾乎是完全沒有實驗研究的，因而古代的科學多半是一些原始觀察的記載和生產經驗的描述。少數的例外，如阿基米德浮力等於物體排水量定律的發現，也只是依靠在簡單的設備條件下進行的實驗。近代的“實驗的科學”，實際上只是當生產技術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時才發展起來。可以說，自然科學中的許多部門，只是在引進了近代實驗方法以後，才成為嚴密的科學。

科學實驗較之于對事物的直接觀察，和由生產過程所得的直接經驗，有若干優越的地方。首先，實驗將對原始的感性材料作進一步的加工，把事物的內在聯繫進一步揭發出來。在實驗室中，利用實驗方法，可以對各種自然條件進行精密的控制，擺脫許多偶然因素的干擾。可以把複雜的事物或生產過程，分析成若干單獨現象，可以簡化若干複雜的自然條件。可以準確而精細地研究事物中的某些部分，這部分和那部分的關係。可以把某些現象重複若干次，可以在不同條件下進行比較，等等。總之，通過實驗方法的研究，可

以使得事物中的因果關係更為清楚，條理脈絡更為分明，從而使科學研究得以在可靠而精確的實驗材料基礎上，作出科學的結論。其次，實驗研究能夠大大擴展人們的眼界。在實驗室中，人們常常可以利用各種儀表和儀器來代替感官的直接的觀察，進行精密的測量。特別是在現代化的實驗室中，常常利用一些自動化設備來探索在各種特殊條件下（如高溫、高壓、低溫、高速等）的物質運動規律，深入物質的構造。正是由於使用了這種實驗的方法，因而就發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現象、新規律，擴大了人們利用自然規律的範圍。

有些人認為實際的生產過程是很複雜的，在實驗研究中却常把複雜的條件加以簡化，這就要產生脫離實際的毛病。有些人還認為實驗方法的倡導是和十六、十七世紀唯物論哲學家分不開的，這些唯物論哲學家的世界觀帶有形而上學的局限性，而實驗方法却正好反映了他們所提倡的那種孤立的、片面的研究。

這樣的觀點是不全面的。人們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過程總是由局部到全面，由簡單到複雜。既要有對事物的分析，又要進行綜合的研究。如果不把局部的事物和簡單的事物分析研究清楚，對於整體的、複雜的事物也是弄不清楚的。當然，如果認為複雜事物就是簡單事物的機械的迭加，整體就是局部

<sup>①</sup> 《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6頁。



的簡單的集合，那將陷入形而上學。但是就人們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來說，分析的研究是必經的階段。沒有這種分析的研究，就不可能有在更高階段上的正確的綜合。馬克思說：“物理學者考察自然過程時，要在它表現在最精確的形態且最不受擾亂影響的地方去考察；如可能，還在各種條件保證過程正常進行的地方做實驗。”<sup>①</sup>

例如，生物體內的新陳代謝過程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生物化學過程，其中包含了多種多樣的複雜的有機化合物。要想一下弄清楚新陳代謝作用的全部生物化學作用是不可能的。生物化學家在研究這些問題時，一種辦法是設法把其中若干有機化合物提取出來，研究它們在純粹狀態下的各種化學性能。另一種辦法是在生物體中加入一些放射性碳、磷或氫。由於這些原子帶有放射性，人們得以用計數管或照相乳膠來“追蹤”這些帶有標記的原子，把它們所經歷的化學歷程從錯綜複雜的現象中分離出來，從而進行精細的研究。不难看出，人們通過這種實驗的辦法，便能逐步了解生物體內一些細微的變化過程，並能設法有效地加以控制。假如我們只是籠統地觀察生物體的新陳代謝過程，就只能停留在一般觀察的階段，而不能獲得有關這些過程的深入一步的知識。

又如，物理學工作者為了要研究固體的電學或光學的性质，常常希望能擺脫固體熱運動的干擾。因此，便將這些固體材料放在接近絕對零度的低溫下。這時，人們不但能

對這些材料的電的或光的性质作更深入的研究，而且還發現了新的性能。例如，有若干材料在低溫下具有特殊優良的導電性能，這種導電性能可能有重大的實用價值，而在從前卻為熱運動所遮蓋住了。由此可見，用實驗方法研究這種“純粹化”了的狀態的物質特性，常給科學帶來重大的利益。

但是，進行科學研究的目的是終究是為生產實踐服務。科學工作總是以直接的或間接的方式，甚至通過曲折的過程，應用於生產實踐。在實際應用科學成果於生產實踐時，如果不照顧到實際生產中的具體條件，就很難使實驗室的工作結果，直接應用到生產實踐中去。實際的生產條件和實驗室總是有不少區別的。在實驗室內，人們可以使用“化學純”甚至“光譜純”的化學材料，在現場就不能應用。那末，人們怎樣能保證實驗室的研究結果無誤地應用到生產實踐中去呢？這裡有以下兩種不同情況。

第一種情況。在有些學科中有一種“模擬理論”，專門研究實驗室中模型試驗的結果能夠在什麼條件下無誤地推廣到實際中去。另有一些學科憑借經驗的積累或理論的分析來提供這種判斷。例如，在宇宙飛行中，人們先用動物作飛行的試驗。由於所選擇的動物，如狗具有和人相接近的生理條件，因而在一定條件下，由動物試驗所獲得的超重和失重條件下的生理反應的知識，就能幫助我們來推

<sup>①</sup>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頁。



測人是否适宜于作宇宙飞行。此外，在有一些学科中，常采用扩大試驗或中間工厂的办法来逐步地扩展實驗室中研究所获得的成果。

第二种情况。在若干学科中，确实也还没有完滿的理論或經驗足以保证實驗室工作結果直接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例如，在农业科学研究中，實驗室的研究常常只对某一因素进行較深入的分析，而在实际生产中却总是多种因素同时起作用，互相影响。因而单纯地从事实驗室研究，就不免含有片面性和局限性。但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实驗研究，仍有重大作用。因为在實驗室条件下，各种物理因素較易控制，条件比較单纯。人們对于簡化了的事物进行研究，比起对于复杂事物来总是容易一点，也更容易发掘出它們的規律性。人們在掌握了簡化了的事物的規律性以后，并进一步把它和实际条件进行对比，就更能弄清楚較复杂的事物的規律性。在这种情况下，使實驗室中的工作和現場的生产实践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有时人們可以根据在簡化条件下对事物的研究，提出某种嘗試性的建議，試看能否付諸实行。人們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提出了某些新的經驗，这些新的經驗能否推广，或在什么范圍内什么条件下进行推广，有无普遍意义，不进行實驗研究往往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由于在實驗室活动中，工作的循环周期較短，工作量也較小，因此，在實驗室工作，能很快地起一种“过滤”作用，把一些不可行的建議加以否定，只留下有希望能

实行的那些合理化建議。特別重要的是，在實驗室工作中，有时从表面上看来和实际生产中发生的問題离开得很远很远，但实际上它却在更高的角度上，超出現有的生产技术水平，更广泛地結合着实际。这类問題的解决，常能开辟出新的天地，解决許多部門中的重大問題。对于實驗工作这方面的作用，我們必須加以重視。我們知道，原子能的发现，首先是在實驗室中发现原子核的裂变現象和相应的中子鏈式反应后，才提出制造原子彈和中子反应堆的原理。电子管，半导体三极管等，也都首先是在實驗室中試制成功，发现它的功用，然后才发展成为新的工业部門的。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不論是哪一种情况，實驗研究都起着重要作用。低估了實驗研究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对的。但是，任何實驗室工作总是生产过程的一种近似，一种縮影。即令在第一种情况中，那里有較好的模拟理論，可以保证无誤地放大到一般正常的实际条件中去，但在現場里仍有可能出現在實驗室內所意想不到的“例外”。至于在第二种情况下，局限性又要大一点。因此，科学工作者除了从事实驗研究以外，还必须向生产实践学习，向群众請教。只有把科学家的實驗室活动和广大群众生产实践中的各种各样的試驗活动結合起来，把室內試驗和現場活动結合起来，把单因子的實驗和多因子的現場观察結合起来，才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更完善的方法。这也是我国大跃进的經驗所



证明了的。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我們也必須一面从事实驗研究，一面向群众学习，向实际生产者学习，总结他們的經驗，偏廢任何一面都是不对的。

## 二、抽象

在科学研究中，把复杂的条件暂时地加以简化，暂时地撇开那些次要的因素，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是人类認識一切事物所必經的阶段。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人們不仅在实验室内简化实际条件，还常常运用思維的能力，在思維过程中，暂时地撇开較次要的因素，抽象地研究一些典型的“純粹的”形式。这通常称之为抽象法。馬克思說：“在經濟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那必須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sup>①</sup>。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抽象法是广泛运用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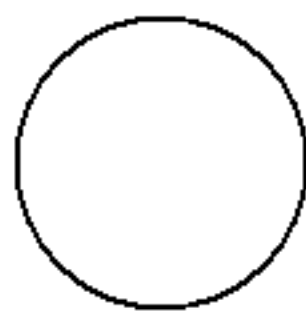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除了运用显微镜和化学試剂外，也运用这种抽象法。因为在实验室内有时有些次要因素还不能完全舍去，物质的形态还不够純粹，因此，人們只好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思維上来实现这种抽象。特别是科学上許多概念和理論，单用实验以及直观的形象是表現不出来的。因此，自然科学里，就常常对一些抽象的理想形态进行研究。例如，数学上研究沒有面积的点，沒有厚度和寬度的綫。力学上研究沒有大小的质点，絕對硬的“理想剛体”，十分柔軟的繩子，沒有摩擦力的滑輪等等。流体力学內研究沒有粘滯性的理想流体，不可压

縮的液体等。化学上研究理想的气体，理想的稀薄溶液。光学上研究絕對的黑体，单纯沿直綫进行的几何光学等等。

所有这些理想形态都是现实世界中所找不到的。在实验室内最多只能近似地接近这种理想情况，但在思維上却可以掌握它。这是抽象法能够补充实验研究的不足的地方。自然科学对于这种純粹形态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第一，在实际問題中，有許多情况和这种理想状态是十分接近的，因而在实践的目的不要求有太高的准确度的条件下，对这种純粹形态的研究結果就有直接的用途。例如，在研究炮弹飞行的彈道时，作为第一次近似，我們可以略去它的轉动性能，把炮弹作为一个质点，研究它的飞行軌道。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剛体，要在炮鏡上刻上来幅綫以保持彈头前进的方向。在炮弹飞行过程中，由于空气动力及重力的作用，也会有因彈性变性而引起空气阻力的变化，从而对飞行过程有影响。但这个影响很小，远远要比炮弹出管口速度的偶然变化为小。因此，在彈道学中，通常沒有必要考虑炮弹的彈性性能，把炮弹当作一个剛体就能够滿足需要了。除非我們要研究炮弹如何击穿鋼板，那末，鋼板和炮弹的彈性甚至它們的塑性性能，都成为不可忽略的了。

第二，在研究了理想的事物之后，把理想的事物和实际的事物进行对比，就更容易

<sup>①</sup>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頁。





对实际事物进行研究，了解它的规律。

第三，由于在抽象过程中舍去了大量具体材料，因而更能发挥逻辑的力量，从而超越现有条件，预见新事物的出现。

举固体理论的研究为例。在固体理论研究中，常常以没有“缺陷”的理想晶体作为研究对象。应用量子力学对于理想晶体进行计算的结果，发现理想晶体的强度竟比通常金属材料强度大出一千倍。假如我们对这个计算结果深思熟虑的话，便要认为，或者是量子力学理论不适用于晶体，或者是理想晶体这种抽象是没有意义的。然而物理学家们却提出了这种看法：既然理想晶体的强度应该比实际晶体的强度大一千倍，那末，常见的金属材料强度之所以减弱就是因为材料中有许多“缺陷”，假如我们能减少材料中的“缺陷”，那就能大大提高金属材料的强度，从而大大节约金属。实践证明，物理学家们的“预言”是正确的。不久以前，人们制造出若干极细的金属丝，称为“金鬚鬚”，它们有接近于理想晶体的强度。现在，“金鬚鬚”的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由此可见，用理想条件和实际情况加以对比，是能够得出重要结论的。

再以数学为例。数学的特点便是抽象，但是数学的抽象常能作出准确的预言。例如，苏联的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便是按事先算出的轨道而飞行的。它们的计算做得如此之准确，以致于能事先算出人造卫星在何时绕过月球的背面，将月球的“背景”拍摄下来

再传送到地球。数学家们或理论天文学家们利用天文学及力学上已经建立了的规律，把它排列为数学方程式，然后利用这些方程式进行纯数学的演算。在演算开始时，他们固然要用一些物理的思想作为指导，但在演算过程中，却要暂时地撇开事物的质，而只是抽象地考察事物的量的关系，凭借着对量的规律的研究，就能作出某些准确的预言，例如事先算出卫星的轨道。数学的逻辑推演有时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它有时超出现实条件下所能遇到的量的关系。例如，虚数首先是“理性本身自由创造和想像的产物”<sup>①</sup>，只是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后，才发现虚数在连续介质力学、电工计算、量子力学中有广泛的应用。

抽象所采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物理学和化学上，抽象有时以一种“思想上的实验”的形式出现。在热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中，这种“思想上的实验”有广泛的应用，由它们可得出很多重要的结论。这种“思想上的实验”并不是真正的实验，不能用来检验某一科学原理，但不能认为这就是唯心主义。“思想上的实验”是一种逻辑推理的方法，是在真实的实验的基础上作更深入一层的抽象分析。它不能等同于实验活动，但却以科学实验这种科学实践为基础。通过这种“实验”活动，可以揭露出不同现象间的逻辑的联系，在它的论证合乎正确逻辑的要求时，也能提供给人们以正确的知识。

<sup>①</sup>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





在热力学上常用一种理想的蒸汽机循环来做这种“思想上的实验”，它的倡始人便是卡尔诺。恩格斯在评价卡尔诺的工作时说：“他研究了蒸汽机，分析了它，发现了蒸汽机中的基本过程并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是被各种各样的辅助过程所掩盖住了；于是他撇开了对这主要过程无关重要的辅助条件而构造了一部理想的蒸汽机（或是煤气机），的确，这样一部机器就像几何学上的线或面一样是决不可能制造出来的，但是它却按照自己的方式作了像这些数学的抽象所作的同样的服务：它表现着纯粹的、独立的、真正的过程。”<sup>①</sup> 我们知道，从卡尔诺对于理想蒸汽机的分析中可得出蒸汽机热效率不可能大过某一数值的结论，这个结论已为一切蒸汽机、煤气机以及其他各种热机的经验所证实<sup>②</sup>。

抽象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是应用得较广泛的。有些人认为抽象活动是一种纯理论活动，是“从理论到理论”，是“脱离实践”。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抽象的思维过程确实以理论活动形式出现，但是科学的抽象却必须以实践为基础，抽出事物发展的主要因素，暂时撇开次要的因素。主要和次要之分必须按照实际情况来决定。在思维抽象活动过程中，常采用推理的方法。推理方法之所以正确，也是以大量实践为基础的。正因为进行推理的前提是由实践得出来的，推理方法的正确性也是由实践证明了的。因此，从形式上看来，科学抽象虽采用了纯理论的形式，

但却决不意味着脱离实践。相反，恰恰是以抽象的形式，更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列宁指出：“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而康德和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谈论正确的思维）——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sup>③</sup>

列宁在这里对于抽象的作用作了深刻的说明。他在这里强调指出，抽象必须是科学的抽象，科学的抽象才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相反，不科学的、不正确的抽象，就会引导人们走入歧途。如果不能正确地运用抽象法，如没有抓住主要的因素，或者虽抓住了主要的因素，却对这些主要因素作了不完全正确的概括，那就不能得到科学的抽象。因此，在应用抽象法的过程中，必须谨慎从事，随时听取实践的呼声，不断进行修正。例如，在土壩的设计当中，有些人为了数学上的简单起见，把土堆当作是服从弹性力学的弹性体。把土堆的力学性能当作是服从虎克定律的弹性体，看来是一个较差的近似，它不会完全符合于实际条

①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0页。

② 卡尔诺原始的工作中，在推导上有错误，但经过修正后，仍可导出热机的最大效率。详见王竹溪：《热力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版，第86页。

③ 《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1页。



件。这种抽象是不能够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的。应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计算的结果，就要增多土方，变成一个“胖壩”。当然，这里也得注意到：能设计出“胖壩”，总比不能设计、没有设计好一点。在工程技术实践中，有时会用一些明知不对的抽象来进行工作，这是因为在现有科学水平的限制下，暂时还不能做得更好一点，而由于实际需要的迫切，又不能等待理论完成后才动手。只要不把设计看死了，认识到进行设计的理论的基础有缺点，而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某些修正，那末，这类方法虽不很好，但总比没有要好一些。当然，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种较坏的抽象的水平上，应该进一步研究出切合实际的可行的计算方法。

自然科学研究中抽象法的正确运用问题所涉及的范围是较广泛的，它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这里只对这个问题的某几点作了一些粗浅的说明。总的说来，从形式上说，科学的抽象是离开实际更远一些，但它却根源于实际，在更高的阶段上反映了实际。从具体中来的科学的抽象又要回到具体中去，应用于具体的实践。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回到具体，往往是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我们必须小心地区分不正确的抽象和正确的抽象，并且充分估计到认识过程的曲折性，不可简单地对于正在抽象过程中的尚未最后形成的某些科学理论一笔否定，也不能简单地把科学的抽象运用于实际，或者因为不能这样简单地应用，就否定这种科学的抽象的意义。

### 三、假說

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抽象，常常由于实践水平和思维能力的限制，并不是一下就可以达到的。因此，在抽象过程中，在某一阶段，科学理论的发展又常常表现为假说的形式。在假说的阶段，认识已经具备了理论的雛型，但它还不够成熟。假说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恩格斯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件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就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那种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的新的说明方式了。更进一步的实验材料便会洗清这些假说，取消一些，修正另一些，直到最后建立起一个纯粹化的定律。如果我们等待建立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末这就等于说在此以前要停止思想的研究工作，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sup>①</sup>

恩格斯在上面这段话里，对于假说形成的背景，假说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以及假说最后如何根据实验材料而发展为定律的过程作了透彻的说明。假说是探索自然科学理论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阶段。一种理论，当它还在假说的阶段时，所根据的事实虽不够充分，所能解释的事物的现象也还有限，但却是进一步工作所必需的，不应当由于看到某

<sup>①</sup>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1页。



些假說所依据的事实还不充分，不系統，并且由于它还常和抽象的邏輯推理連結起来，就断定它是脱离实际的。

假說不仅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里經常出現，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里有时也要运用假說。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里，曾說明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由假說变成了由科学方法证明了的原理。他指出，由于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天才的假說，使得人們第一次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問題和社会問題，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使科学的社会学得以出現。他又指出，馬克思在提出这个偉大的科学假說之后，就着手实际地研究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来研究資本主义社会的材料，并根据大量材料把商品經济体系的活动規律和发展規律做了极詳尽的研究，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密联系的思想，揭示了資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規律。自从《資本論》問世以后，唯物主义历史观就不再是假說，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了。

使用假說的方法，并非让人们毫无根据地去玄想。科学假說的建立必須有一些事实材料作根据，或者它是某一已知原理的推广。成为科学的假說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它不能和已知为正确的事实或已由大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論相冲突。如果假說和事实不符或和正确的理論相冲突，那末这个假說就不能成立。

在人們所掌握的事实还不够充分，这些事实的可靠性还不够清楚，或对这些事实的細节以及它的准确程度还不够了解的条件下，根据这些有限的事实有时可以抽象出这种或那种假說，因而就表现为多种假說并存的局面。例如，关于天体演化过程就有好几种不同假說并存。在化学的催化理論上有好几种学說。原子核結構的理論目前就有五种模型之多。在遺傳学方面有两种学說，其一是米丘林的理論，另一种是孟德尔、摩尔根等人的古典遺傳学。在几种假說中也許只有一种假說是对的，但更多的情况却是相互补充。原子核結構理論虽然有五种之多，但有的理論只适用于解釋所謂“滿壳层”原子核附近的一些現象，有的理論只适用于解釋所謂“大变形”原子核。在科学理論研究过程中，有多种假說并存，对于科学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几种假說并存的局面，会通过不断的討論和爭論以及由于新的实验材料的出現而逐步得以澄清。結果或者是以某一种較正确的假說为基础而发展为系統的理論，或者是用“兼收并蓄、融会貫通”的办法形成一种統一的理論，有时是根本地推翻这些假說，另建新的假說。

假說有时以“出人意外”的形式出現，甚至看起来带有若干想像的成分。但是，只要它有一定的事实或理論作根据，不和已知为正确无誤的事实或已由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論相冲突，即使它带有若干假想或猜想的成分，它仍然不失为科学的假說。对于这类假說，我們不应輕易地加以排斥或否定。在科



學史上頗有一些由這種“驚人”的假說出發而最後得出正確的結果的例子。例如，在量子力學發展的初期，曾有德布洛衣提出電子具有波動性質的假說。這在當時看來是十分難以令人接受的“幻想”。而在現在，電子具有波動性已是公認為正確的事實了。然而，德布洛衣提出這個假說時，並不是由於他的幻想，而是由於他分析了電子運動的規律性，發現當時所知的電子運動的規律性和光的傳播有許多類似之點。至於光，在當時已經知道它具有波動和粒子的兩重性，因而他便把這兩重性也推廣到電子上而作為一種假說提了出來。

科學假說和科學想像是有區別的。科學想像也要有某種科學根據，但比起假說來，還要不成熟一些，也可以更自由一些。自然科學里科學想像成分較多的一個例子，是在火星上或金星上可能有類似人的高等動物的存在的推測。這一個推測是頗為吸引人的，但這只是一個推測，不能認為有足夠的根據。直到現在，科學的事實既不能證實它，却也不能推翻它。前兩年，蘇聯科學家分析了圍繞火星旋轉的衛星的運動，發現火星上的衛星運動規律，和地球上的人造衛星運動規律有若干相似點，並且這些特點還很難用別種理論來解釋。因此，他提出這樣的假想，火星上的衛星是由類似人的高等動物拋上去的。當然，這個假想看起來也是難以令人置信的，它的證據也不能認為很充分。它的正確與否，要由今后的宇宙飛行的實踐來進一步肯定它或推翻它。但這個假想和現有事實

及理論不相衝突，因此，它和胡思亂想仍是有區別的。在科學發展中，這種有一定科學根據但又不成熟的想像和猜想的存​​在，對於科學發展也是有益的。

當然，必須注意到科學的假說同科學的結論之間的區別。如果把某種假說甚至想像當成就是結論，以此作為生產實踐的指導，那就是有害的了。

假說不僅僅在探討重大理論問題時才出現，它在通常的實際工作中也運用得極廣泛，只是形式略有不同。這通常稱之為“工作中的假說”。例如，一部機器停止了工作，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有好幾種。因此，在實際工作中就常常提出一系列的可能的假說作為指導，再由各種實際試驗來證實或推翻它們。在作理論計算時，假說有時以引進若干假定的形式而出現，然後人們從這種假定的條件出發，試看計算結果是否和實驗結果符合，從而來證實或推翻這些假定。

不論在探討一個重大理論問題或從事解決某一實際問題時，假說這類形式使用得極為廣泛。科學研究的才能常常表現在是否善於提出這種或那種假說來推動科學工作的发展。

有些人把科學的假說和胡適在實用主義觀點指導下的“大膽的假說，小心的求證”混為一談。這種看法是不對的。胡適所提倡的“大膽的假說，小心的求證”治學方法，是以他的反動的實用主義真理觀為基礎的，他的方法論服務於他的真理觀。實用主義者胡適



根本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只是对于实用主义者及其所服务的反动阶级“有用”时，才是他所谓的“真理”。因此，胡适之流在作假设时，只采纳对他有利的“材料”，对他不利的事实就一笔加以抹杀，甚至任意地歪曲、篡改事实，以求符合他所要求的结论。他的假设虽然以大胆的形式出现，但却并不科学；他的证明虽然标榜是“小心”的，但由于他根本否认客观真理，便只能是主观的。

假设的形成是和人们的世界观联系着的。成功的假设一般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中的某些原理而获得的结果。如果缺乏科学的态度，并从错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就不免得到错误的假设。这类假设对于科学的发展往往不起推动作用，反而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入迷途。例如，天文学上有些主张宇宙有限的科学家，提出若干宇宙如何形成的“假设”，如宇宙膨胀论，其目的只是为了证明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这类假设，在哲学上固然是错误的，在科学上也缺乏根据。这类假设，我们是反对的。

\*     \*     \*

以上我们分别讨论了实验、抽象、假设三种科学研究方法。在使用这三种研究方法时，重要的是必须以实践为基础，以实践为指导。实验的安排总是为了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按照实际问题的要求来设计的。抽象法运用得正确与否，其前提是必须不断和实际情况相比较。假设也必须由新的实验事实

来检验、校正、丰富和发展。因此，在这三种科学方法的运用过程中，必须紧密地联系着实践。其次，是必须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全面地估计实验、抽象、假设在认识中的作用。假如只重视劳动生产经验的积累，而不重视实验研究，只重视掌握具体事物的具体知识，不重视进行抽象和概括，只重视收集各种实验材料，实验数据，而不重视理论的分析，不重视逐步地总结为科学的假设，那末，就将流于经验主义的错误，阻碍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假如把实验室活动看作是唯一的推动科学前进的实践形式，把抽象方法中对某些客观条件暂时地撇开和相对地割裂看作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把假设的形成和提出，看作可以是和实验无关的，那末，就会犯唯心论的错误。列宁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sup>①</sup> 在我们使用实验、抽象、假设这三种方法时，必须特别记住列宁这一个原则性的意见。

<sup>①</sup> 《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1—412页。





# 关于百家爭鳴的一个問題

黎庶之

为了学术的进步，应当开展百家爭鳴，鼓励在同一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的爭論，这点是大家都同意的。有人說，要参加某个問題的学术討論，必須掌握有关的充分知識，在人們的“本錢”不够的时候，就不会有有益的討論，所以百家爭鳴能否順利展开，有一个关键問題，就是人們的“本錢”够不够的問題。另外也有人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們觉得，如果这样提，就会妨碍百家爭鳴，就会使有些尚未成为专家的人自餒，不敢积极参加学术討論，也会使有些专家获得一个借口，拒絕考虑和接受別人的意見。这两方面的看法到底是哪一方面对呢？看来，恰当地理解這個問題，对于更好地开展百家爭鳴，促进科学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有成果的学术討論总是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进行的。人們在某一問題上具备了必要的理論知識和实际知識，才有可能对于解决這個問題作出自己的貢獻。

每一个学术問題的討論，都不是凭空出現的，总是因为有一些人对這個問題做了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才展开了討論。在我們所討論的問題中，有些并不是今天第一次出現，过去已經有不少人在這樣的問題上進

行过爭論，得到了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人們如果不先了解先前的研究成果，要提出对于当前的爭論有益的見解，是很不容易的。在学术討論中要提出真知灼見，就要認真接受前人所創造的知識积累，接受同时代人在知識积累中新增加的东西，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繼續努力。

学术討論所涉及的問題，常常是比較复杂的，要搜集大量的可靠的材料，从許多方面經過反复研究和探討才能够弄清楚。仅仅依靠一时的感想和偶然的“灵机”，是不可能得到科学的結論的。

有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能够在某一个問題上提出很好的意見，补充或糾正了某些专家的意見，这样的事实的确是常有的。但这并不能証明，沒有必要的知識准备也能发表真知灼見。这些普通的工人农民，在这一个問題上，有长期的經驗，有充分的实际知識，就这一点說来，他們是有學問的，而不是沒有學問的。他們的學問是从他們的生產實踐和生活實踐中得来的。有些专家，虽然有某一方面的學問，但是因為他們實踐經驗不够，他們的知識是不完全的，因而就能从有經驗的工人农民的意見中得到好处。所以





这里恰恰证明了，有价值的意見总是在必要的知識准备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当然，缺乏实际經驗的专家只要努力，也可以补足自己的缺陷，为此就要不辞辛勞地去进行調查研究，下功夫去学习实际知識，虛心地向普通工人农民学习。在学术史上，这种历尽艰辛跋山涉水去搜集实际材料、訪問群众的事例，并不是很少的。

所謂學問，无非是知識和經驗的积累。人們經過各种途徑所取得的有用的學問，都应当受到尊重。提倡百家爭鳴，当然不是輕視學問，而正是为了使人們从各种不同途徑取得的有用的學問都能提供出来，成为社会的公共財富。

目前我們的学术界，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和不断提高的，然而也确有研究不够，理論知識和实际知識准备不够的情况。我們的学术討論是有成績的，然而也确有泛泛而談，在概念上繞圈子，不注意掌握有关的理論知識和实际知識，盲目摸索的情况。由于知識不够，學問不够，因而提不出有科学价值的見解，这样的情况，如果存在着，就应当努力加以克服。支持和鼓励人們刻苦地学习知識和增加學問，对于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开展学术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是完全必要的。

这样的提法会不会妨碍百家爭鳴，使一些人不敢参加学术討論呢？提出这种顾虑是有某些事实做根据的，我們应当看一下这些事实。

的确，有这样的专家，他們拿學問的招

牌来吓唬人，不願意傾听在他看来學問不如他的人的話。他們不知道他們虽然有較多的學問，但是有些方面是他們的知識所不及的，而且在他們的专长中也未始沒有某些缺陷。而总的說來學問不如他的人，也可能在某一點上，學問超过了他們。

也有这样的人，他們虽然在某个問題上有了自己的独立的見解，但是由于他們的一般理論知識和实际知識准备較差，因而对于自己的見解沒有多大把握，也不能給以充分的科学的論証，所以他們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見。对于他們，应当給以鼓励，使他們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見，同时也应当使他們努力提高自己的必要的理論知識和实际知識，以便使他們的見解更加科学化和系統化。

一方面，使有學問的人更加謙遜一些，同时也使他們的學問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并且能够繼續增长起来；一方面，使學問較少的人能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見解，同时又积极努力提高自己，使自己在討論中和研究中一步一步地充实起来。这是在学术界的百家爭鳴中應該出現的气象。有了这种气象，我們的学术界就能不断地繁荣发展。

所以，正确地理解学术討論应当以充分的研究为基础，并不会起消极的作用，而只会起推动我們的学术討論和学术研究的作用。

学术研究和学术討論是互相促进的。在百家爭鳴中，通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开始是一些人在学习和研究中，提出了問題，发生了爭論；随后是由于爭論的展开，推动着更多的人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从各



个不同的角度和各个不同的方面，提出更多更好的見解，互相增益，互相补充，互相糾正。所以我們的学术討論是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学术討論又反过来起着促进学术研究的作用，使大家的知識水平和科学水平不断提高。

在学术討論中，要求有系統的研究和充分的知識，这并不排斥一得之見。“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这一得之見实质上并不是什么偶然的灵机，或者是什么脱离实际的冥想的結果，而是由于有了长期經驗，再加上“千慮”那样一种思想劳动，才出現了一种真切的見解。这一得之見，仍然是認真学习和研究的結果，仍然有一定的知識根基。靠偶然的灵机来做學問，总是不行的。一得之見同系統性的研究，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科学研究者往往在长期积累的知識的基础上得到了一得之見，又在这一得之見的基础上进行系統性的科学研究。这样起伏前进的思想发展的情况，在許多科学研究者的工作进程中都可以找到。隨着百家爭鳴的开展，这种一得之見和系統研究相互启发的情況將更多地出現。

在学术討論中要求充分研究和有充分的知識，也并不是說，只有某一行的专家才能参加某一行問題的討論。学有专攻，同时各門學問又有联系。一門學問的討論，往往不能不涉及到其他許多門學問，研究其他有关各門學問的人当然都能够提供意見，也需要提供意見。而研究有关各門學問的人，其所以能对一个共同有关的問題提供有益的意

見，还在于各自都有比較專門的研究。这种情形，在各科医生的会診中，人們常常可以看到。

知識是无穷尽的，人們任何时候也不能說自己所拥有的知識已經足够了。但这当然不是說，既然知識永远是不够的，所以永远不能发表意見。一方面，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总是不断地要求人們掌握新的知識，而使那些故步自封的人只能落到后面去。另一方面，在一定时候为研究某一个問題，人們至少必須掌握哪些知識，这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有了这些知識，人們在这个問題上就有了发言权；反之，不具备这些必須具备的知識，那就难免主观臆測、夸夸其談了。

既然在討論中有不同的意見，当然有些意見是不正确或不完备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們不要努力提出正确完备的意見，也并不意味着发表意見不需要充分准备和認真从事。因为認真并不等于一定正确，允許有錯誤也不等于可以輕率。沒有必要的足够的知識，就沒有发言权，这种說法的重点是在于推动人們更多地学习知識，而不是要人們不发表意見。知識不够，当然也可以发表意見，但是經過大家的討論，得到了正确的看法，最后还是証明，不以充分的科学知識为基础，妥当的結論是达不到的。在学术爭論中应当創造条件，促使正确的意見代替不正确的意見，使不完备的意見完备起来，而不能在已有的水平上停滯不前。学术討論本来也不只是要求人們把已有的知識表現一



下，重要的是要有所提高，有所发展。所以，应当鼓励人们积极努力，认真学习，刻苦研究，继续不断地去取得知识，始终把学术讨论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迈着踏实的步子勇敢地向前走。

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九月，在《反杜林论》新版的序文中，有几段同这个问题有关的话，对我们很有启发。恩格斯认为，研究和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有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他曾经在八年中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这种研究上。正在他进行这种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需要批判杜林的所谓自然哲学的情况，他勇敢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由于他当时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上还不成熟，所以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在他的著作中，举出了正确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去与他的论敌的谬误和歪曲的断言相对抗。因此，在他的著作发表以后的八年中，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人能指出我与当时所知事实不符的真正的错误，或者对于当时公认的理论的不正确的叙述”<sup>①</sup>。

列宁在一八九九年六月写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也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来理解这个问题。列宁在那封信中提到，当时的新康德主义激起了他的愤怒，他“忍不住”地在《再论实现论问题》的文章中，顺便地简要地批判了一下新康德主义。为了进一步进行系统的批判，他决定沉下心来对哲学从事更加深入的研究。他这样说：

“我说‘忍不住’，因为我很清楚地意识

到自己的哲学修养差，在我没有多多学习以前，我不打算就这些题目写文章。现在我正在这样做，我先从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研究起，然后准备转到康德。我已弄到了最主要的哲学名家的最主要的著作，但没有新康德主义的作品（我只订购了朗格的著作）。请告诉我，您和您的同志们是否有这类书，能否借给我用一下。”<sup>②</sup>

列宁的这种态度是严格的科学的态度。在他写《再论实现论问题》的时候，虽然他的理论修养已经使他能够判定那种“用新康德主义丰富马克思的理论”的倾向的谬误，但是他认为，为了认真地对付新康德主义，还必须努力占有更多的知识，进行更系统的研究。不但要系统地了解新康德主义本身，还要系统地了解它的源流。列宁这样努力研究的结果，在一九〇八年终于写出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那样一部光辉灿烂的著作。

列宁的做法告诉我们，争论一个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不能只满足于一般的知识，而要积极努力，依靠刻苦的学习和研究，取得更多的知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那种坚持不懈地去搜集、整理大量的现实材料和历史材料，总结群众的经验，接受有关各门科学的研究成果的认真严肃和生气勃勃的态度，是我们永远需要学习的。

①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② 《给亚·尼·波特列索夫》。《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页。



#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一个材料的调查

——光緒九年商人祝大椿是否在上海创办了“源昌机器五金厂”？

· 謝 商 ·

**编者按：**本文原载上海《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本文的作者在整理上海机器工业史料时，对一向被认为我国早期民族机器工业中创办最早、规模最大、资本最巨的“源昌机器五金厂”的材料，发生怀疑。通过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作者判定，这个“工厂”是商人祝大椿为了骗取清政府的官銜而虚构出来的。本文作者不仅校正了一个重要的史料，更重要的是他在学术研究中坚持了一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对于可疑的材料，不是轻轻放过，而是认真地进行分析，进行必要的调查，从而弄明了事实真相。《学术月刊》在刊登这篇史料调查报告时，加了编者按语，对作者在调查研究中的态度和方法，表示赞许。本刊在转载此文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删节。

许多近代经济发展史和近代工业史书籍都以“光緒九年商人祝大椿在上海设立源昌机器五金厂，资本十万元”一节，作为我国近代工业产生时期的一则重要史实。我们在调查整理上海民族资本的机器工业的发生和发展史料过程中，发现这个记载是事实完全不符的。

“源昌机器五金厂”，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早期民族资本的机器工业中规模最大、历史最早、资本最巨，在当时能制造各种机器的工厂，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于这个厂的记载，最早发现于光緒三十四年编制的《农工商部统计表》下函第五册，第四十页：

“源昌五金工厂”。营业，专做五金。出资人，祝大椿。资本十万元。”

解放以前，在许多经济著作和近代工业史、实业志之类书籍中都有所载录，例如：

“源昌机器五金工厂：资本100000元，业主祝

大椿。〔所在地〕上海。〔设立于〕光緒九年。”（日本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调查部《支那经济报告书》第31号附录，第5页）

“自五口通商以后，上海等处，即有外人所设之机器厂。国人自营之厂，则以光緒九年商人祝大椿在上海所设之源昌机器五金工厂，规模稍大。”（吴承洛编：《今世中国实业通志》下册。1929年2月商务印书馆版，第266页）

其他作同样引录的有龔駿编的《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杨大金编的《现代中国实业志》等。

解放以后出版的许多近代经济史和近代工业史书籍，也作了同样引录，例如：

“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商人祝大椿在上海创办源昌机器五金厂，资本十万两。造各种机器。商办。”（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第226页。《新政》第2期，1947年2月延安版，1953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版）

“一八八三年，上海商人祝大椿筹资十万元，

\* 在同书中别的地方，又称为源昌机器五金厂。



在上海設立源昌機器五金工廠。”(孟宪章著:《中國近代經濟史教程》,1951年9月中華書局版,第62頁)

“買辦商人祝大椿在1883年創立的源昌機器五金廠,有資本十萬元,規模較大,能製造某些機器。”(湖北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編:《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講義》,1958年12月高等教育出版社版,第237頁)

其他如吳杰編的《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汪敬虞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中,也有相同資料編入。

我們在研究“源昌機器五金廠”的史料的時候,從已有的各項記載或引錄中,首先發現兩個疑點:第一,關於“源昌機器五金廠”的業務問題,最早的記載(《農工商部統計表》)是“專做五金”。稍後的記載,則並不涉及它的營業範圍,只是後來某些近代史著作上始有“造各種機器”字樣,或轉相引伸為“能製造某些機器”之類。但是,“五金”和“機器”的範圍顯然不同。第二,關於源昌機器五金廠的資本問題,《農工商部統計表》所列的資本,系農工商部成立後登記的。祝大椿在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將“源昌機器五金廠”和他所創立的其它企業同時登記,其資本額應是一九〇七年時的實有資本,而並非一八八三年的創立資本。

儘管不少經濟史都有關於“源昌機器五金廠”的記載或引錄,但都是三言兩語,對於廠址、製造內容、創立經過、發展情況等,語焉不詳,而且存在着若干疑點。為了進一步弄清楚“源昌機器五金廠”的面貌,我們開始進行調查訪問。

在訪問之前,我們研究了“源昌機器五金廠”創設時的客觀經濟背景。一八八三年,

上海官僚資本企業江南製造局,在清政府和帝國主義相互勾結下,開始擴大軍火生產。外商船廠在這一時期逐步走上壟斷的道路,控制着整個上海的船舶修造業。為帝國主義侵略服務的“租界”公用事業,相繼建立。這時,其他的近代工業,如蠶絲工業尚處於萌芽時期,紡織、面粉等輕紡工業,則尚未開始建立。在這樣的情況下,從當時的銷售條件看,民族資本的機器工業的生產經營,較大的可能是依附外商進行船舶修理以及製造內河航運需要的小火輪等,製造其他機器的可能性是較少的,因而可以從訪問歷史較久的船廠找到線索。其次,按照“源昌機器五金廠”的資本有十萬元來說,則無論在一八八三年或一九〇七年,在上海民族資本的機器工業中應當是數一數二的,一般老年工人必然熟悉。因此,我們首先訪問了前英商瑞鎔船廠老工人七十六歲的孫祖恩同志、七十歲的李福生同志、八十一歲的錢仁道同志等,他們對於一九〇七年前後上海的機器工業,特別是船舶修造機器工廠,都非常熟悉。但是出乎意外,他們異口同聲地都說不知道“源昌機器五金廠”,也沒有聽見別人談起過這個廠,更沒有遇到過一個從“源昌機器五金廠”出身的老師傅或學徒。我們又訪問了一八七〇年創設、一九〇〇年左右發展起來的另一個機器船舶修理廠——建昌銅鐵工廠的六十三歲的廣東籍老工人文發同志,他在回憶中談到了不少一九〇七年前後存在的機器工廠如建昌、遠昌、合昌等廠的情形,但是對於“源昌機器五金廠”卻沒有絲毫印象。

後來,我們又訪問了在一九〇六年設立的萬昌機器廠私方八十三歲的趙孝林老先





生，他曾做过多年上海机器业同业公会的前身钢铁公所理事长，对同业非常熟悉。但是在他从一八九四年学业开始到一九〇六年自行设厂和以后若干年月中，没有听说过祝大椿曾设立“源昌机器五金厂”。其他机器厂的私方如八十岁的孙荣泉先生和陈芝生先生等，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工厂。从上海机器同业公会的史料中，也查不到有关“源昌机器五金厂”的记载。

这样，我们对“源昌机器五金厂”究竟是否存在过，开始发生了怀疑。

为了进一步深入调查，我们又找到了祝大椿所创办的第一个企业——专营煤铁五金的“源昌号”的老年职工七十岁的朱宝祥同志。据他回忆证实，自一九〇六年他进“源昌号”当学徒起（当时“源昌号”已开设二十年左右），资本家祝大椿并未另设“源昌机器五金厂”，也没有听说以前设立过。如果祝大椿另设有“源昌机器五金厂”，则该厂所用钢铁煤炭五金，必向自己设立的“源昌号”采购无疑。当时“源昌号”同其他机器厂颇多往来，就是从来没有同“源昌机器五金厂”有过交易。

根据上列访问结果，我们初步得出一个结论——祝大椿曾设立“源昌号”，而“源昌机器五金厂”是“子虚乌有”的。为了完全肯定这一结论，我们最后又访问了祝大椿的次子七十岁的祝伊孚老先生。据他介绍：他的父亲一八五五年生于无锡，一八七二年来上海，在旧铁行中习业。在一八八五年左右，才由他母亲多方拼凑了大约一千元资本，开设“源昌号”，经营煤铁五金，这是他父亲所设立的最早的企业，他的父亲就是以此起家

的。一九〇〇年前后，他父亲做了怡和洋行买办，又先后设立了碾米厂、面粉厂、丝厂、纱厂、电灯厂等企业，但是从来没有办过机器工厂。据他说，在一八八三年，他父亲一无资本，二无技术，根本不可能设立机器厂。

经过上列访问，从祝大椿的出身及其起家经过，证明祝大椿在一八八三年不可能有十万元资本，他所设立的早期的企业，只有经营煤铁五金的“源昌号”，没有“源昌机器五金厂”，从而推翻了被一般公认和普遍引用的这个虚假的历史资料。

除了访问以外，我们又从其他方面来佐证上列结论。首先我们查阅了当时的报刊。在一八八三年，上海已有《申报》、《捷报》等几种报刊出版，对于当时各项工业的动态，经常有所报道。例如在一八八二年到一八八四年间，《申报》和《捷报》多次记载过“发昌机器厂”等工厂制造小火轮的生产情况，内容生动翔实。发昌机器厂是一个从二百两资本发展起来的规模较小的民族资本的机器工厂，当时报刊尚且如此重视，岂有对同时期一八八三年设立的、拥有资本十万元的“源昌机器五金厂”，反而没有片言只字记载？此其一。再从同业对比来看。我们把“源昌机器五金厂”和同时期设立、资本相似、同样由买办创立的机器工业“求新机器制造厂”来作一个比较。“求新厂”在一九〇七年已是拥有厂地七十亩、厂房数十间、机床数十台、规模巨大的工厂，一开始就能制造三百吨轮船和引擎、榨油机、泵浦等机器，不数年，就发展成为闻名上海的最大的民族资本的机器工厂。岂有十万元巨额资本设立的“源昌机器五金厂”，厂址既无着落，又没有机器产品问世，在上海





默默无闻之理？此其二。再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一八八三年中法关系紧张，因为传闻法军要进攻上海，上海市場上曾經发生严重的混乱，胡光墉、金蕴青等富商相继破产，钱庄商舖倒閉的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拿出巨資来設厂，似乎也不大可能。此其三。

总之，从訪問經過，报刊記載，同业資料中，都有力地否定了“源昌机器五金厂”的存在。

然而，各种书籍所引为唯一根据的清《农工商部統計表》上所列祝大椿設立“源昌机器五金厂”一事，是如何发生的呢？經過我們調查，发现“源昌机器五金厂”完全是祝大椿別有企图的虛构。

原来，在一八九五年中日“馬关条約”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資本輸入的經濟侵略加深，引起朝野設厂自救的呼声，清政府也頒布一些奖励民間設厂的章程和規定，其間虽然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但是“推行实政”的政策，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也不得不繼續进行。一九〇三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門設置商部，奏定商律和公司注册章程，以及奖給商勛章程等，一九〇六年改为农工商部后，一九〇七年奏定“华商办理实业爵賞章程”，其中載有：

“第一条：凡商人無論独资、合资、附股营业，应得爵賞，即以个人資本之大小，所用工人之多寡为差。

第二条：此項爵賞，总以所办实业，能开辟利源，制造貨品，扩充国民生計者为合格，其仅以販运周轉，汇兌营利为业者，不在此列。

第三条：应得爵賞等差列左：……十、資本百万元者，拟請特賞四品卿銜，逾二百万元者并加二品頂戴。……”（《大清光緒新法令》，第16册，第10类，“实业”，第49頁）

祝大椿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了他的“申請”。有文件为证：

“祝大椿，道銜，上海商务总会議董，錫金商务分会总理。独资創辦源昌机器碾米厂、源昌机器繅絲厂、源昌机器五金厂，合资創辦华兴棧机器面粉公司、公益机器紡織公司、怡和源机器皮毛打包公司，共計所出資本在二百万元以上。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本部专折奏獎，奉旨特賞二品頂戴。”（光緒三十四年編：《农工商部統計表》，下兩第六册，第17頁）

祝大椿向农工商部登記他有关的企业和农工商部賞予二品頂戴，都发生在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据《光緒政要》記載，祝大椿的全部个人資本，剛好是二百〇一万元，剛够二品頂戴資格。这样，事情便极明显：第一，投資的數額是湊出来的；第二，祝大椿将他首先創立的“专做五金”的“源昌号”，改为“源昌机器五金厂”，張冠李戴，掩人耳目，弄虛作假，以便騙取清政府賞給官銜。因为按“章程”第二条，給賞只限实业，商业是不算數的。而且当时的“源昌号”确实經營五金鋼铁业务，間或拆过旧船，出售廢料机器，这样，“号”与“厂”是很容易蒙混过去的。

这一点，《商埠志》也是有力的佐证。《商埠志》是一九〇八年出版的，同祝大椿登記时相差只有一年，其記載比較可靠。《商埠志》在記錄祝大椿的所办企业中，沒有涉及“源昌机器五金厂”，只有“源昌号”为祝大椿所办的最早的企业。这更足以证明祝大椿在登記时故意混淆，使原来专营五金的“源昌号”成为“专做五金”的“源昌机器五金厂”。这样，祝大椿用冒名頂替的办法，向农工商部登記，終于騙得了二品頂戴的官銜，但却造成了一个无中生有的历史假象。



## 南斯拉夫“企业自治”的真相

廖原

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实行所谓“企业自治”有十年多了。他们在实际上取消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把原来属于国有的工矿、交通运输、贸易、农林、公用事业等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的企业交给各企业的所谓“劳动集体”（通过“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去“独立”地进行管理。各企业可以根据市场上的供求情况，任意确定产品的产量、品种和价格，自己采购原料并在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利润和工资的分配办法，自负盈亏。

铁托集团的这种经济政策，有它自己的“理论”基础，这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它的经济职能在过渡时期要消亡的修正主义理论。铁托集团诬蔑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是“官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是“国家资本主义”。他们宣称，国家的经济职能应当立即开始消亡，而代之以所谓“更高级的彻底的社会主义关系”和所谓“真正的经济民主”。据他们说，“企业自治”就是这种“更高级的彻底的社会主义关系”和“真正的经济民主”，是什么“有关国家经济职能消亡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铁托集团的这种经济政策，是由他们的总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这条路线就是使南斯拉夫的整个社会制度向资本主义蜕化的反动路线。

铁托集团一向把这一套修正主义的货色，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铁托在去年十一月发表的纪念南斯拉夫建国十五周年的文告中，说他们实行“企业自治”，“对总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南斯拉夫经济的实际情况，却无情地给了铁托集团的耳光。

事实上，铁托集团的所谓把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只是让企业的少数领导人来操纵企业的经营管理大权。至于广大的工人群众，不要说管理企业的权利，就连自己的工作权利也常常被无理剥夺。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伏克曼诺维奇曾供认：在南斯拉夫的企业中，不但存在着“官僚主义关系、裙带关系、贪污受贿”等等黑暗现象，而且很多工人只是因为批评了企业领导人，就被企业领导人“从企业中赶出去”（一九六〇年一月在南工会会议上的报告）。铁托本人在一九五九年六月的一次讲话中也不得不承认：在企业领导人看来，“把工厂企业交给工人管



理只是理論上形式上的东西”，“实际上在那里作主的是个人”。

在企业收入的分配上，也清楚地表明了所謂“經濟民主”的虛伪性。确定分配标准的工资条例，是由企业中的少数领导人制定的，工人无权过問。据南斯拉夫报纸报道，一九五九年各企业在制定新工资条例时，企业领导人都趁机给自己多增工资，他們工资增长的幅度大大超过了工人工资的增长幅度。有的地区，經理增加的工资几乎等于两个熟练工人的全部工资，有的部門只增加了少数领导人的工资，沒有增加工人的工资。企业的领导人除享有高额的工资外，还享有用企业公款到国外旅行、多分奖金、多拿补助工资等特权，因此，他們的实际收入大大超过了他們名义上所得的工资額，可以享受特別优裕的生活。

铁托集团的“企业自治”的实质，就是把追逐利潤作为企业經濟活动的最高准则，把所謂“經濟刺激”作为推动企业經濟活动的唯一动力，鼓励資本主义的經營方式，提倡强者打败弱者、大魚吃小魚式的資本主义的自由竞争。

在铁托集团的“企业自治”制度下，哪个企业能在市場上打败竞争对手，获得更多的利潤，就是經營得“成功”的企业。在南斯拉夫，企业之間勾心斗角，排挤傾軋，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企业之間的剧烈竞争，对生产造成了人为的損害。如“伊沃·洛拉·里巴尔”、“丘罗·甲科維奇”与“耶金斯特沃”三家机器制

造厂，一九五九年共同承包了为五家制糖厂制造设备的业务。这三家工厂都想从中捞到最大的利潤，在如何分配任务的問題上爭执了半年之久，結果推迟了制糖设备的生产，使五家糖厂不得不晚一年开工。企业之間由于害怕对手的竞争，互相保守自己的营业秘密，拒絕傳授技术。如南斯拉夫《战斗报》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日报道，日列尼亚宁“无产者”地毯工厂开工已有两年，由于沒有掌握織长毛絲絨的技术，一直不能織出合乎規格的长毛絲絨。这个厂請求留布里雅那的裝飾品織物工厂允許他們派工人去实习，或进行生产协作，但遭到了后者的拒絕，以至于不得不派人到外国工厂去实习。在原材料供应部門和加工部門之間的关系方面，由于供应部門不擇手段追求利潤，时常故意提高价格、供給次貨、拖延供应或拒絕供应，这样就使加工部門不能完成生产計劃，甚至被迫停工。南斯拉夫《消息报》一九六〇年七月十日报道：南斯拉夫的造船企业同它的数百家合作者进行合作“有着特別的困难”，因为后者对它供应原料和再加工材料时常发生“供应得晚、质量不合格、价格高”等情况，以至使“奥巴底亚”号輪船推迟了一年才下水。薩格勒布一家工厂約有价值一亿第納尔的产品“被冻结”，因为它的合作者沒有及时供应零件，直到該厂同意后者提出的“极高的价格”，这才把零件送来。今年一月十一日和二十四日的《战斗报》报道說：“維德姆·克尔什科工厂停止了标准卷筒紙的生产，因为沒有紙浆木材。”木材生产者虽然存有大



量的紙浆木材，但是为了等待更高的价格，“硬不出卖”，因而这家工厂“还不知道何时才能继续生产。”《消息报》說，供应原料和再加工材料的部門在南斯拉夫处于特权地位，那些依靠它們供应的加工部門无可奈何地表示：即使是它們拖延几个月供应，供应次貨，“我們也不得不沉默”。

剧烈的竞争，在交通運輸部門、商业部門和对外貿易部門内部以及各經濟部門之間也普遍展开着。同一条公路運輸綫上，往往几家汽車公司各設車站和票房，票价各有高低，各自招攬生意。海外運輸也有类似現象。如在一条通往美国的海運綫上就有两家輪船公司营业，其中一家用减少中途停船站、縮短航行時間等办法搶另一家的生意。在商业部門中，同一个地方的各家商店在出售同一种商品时，为了爭夺顧客，会有不同的价格。南斯拉夫的許多企业都自营进出口业务，它們也常在国外市場上互相搶生意。据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报道：“塞爾維亞汽車公司”曾以每部卡車八千美元的出口价格和一家外国公司簽訂了合同，而“南斯拉夫汽車公司”却以每部便宜五百美元的出口价格把生意夺去。为了获得高額利潤，商业部門不惜从外国进口那些本国工业部門也能供应的工业产品，并且想办法在市場上排挤本国产品，搶本国工业部門的生意。在工业部門和商业部門之間，甚至还演出了在报上登广告、在电台广播和散发傳单互相攻击的丑剧。如生产縫紉机的巴卡特工厂散发傳单說：“由于不正当的原因，本国

的工业品，甚至那些质量最好的，往往被攻击为质量不好的，而把坏的进口商品硬塞給公民們”；“我們的大部分商业网不仅丑化我們本国的产品，而且过分地不公正地贊揚进口的縫紉机”。傳单攻击某些商业企业所經售的进口縫紉机是“三等貨”、“机器結構陈旧”、“工作时响声很大”、“沒有后备零件”，吹嘘自己的产品是按照“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家意大利縫紉机工厂的式样制造的，“质量是縫紉机生产的技术成就的最高峰”。受到攻击的商业企业当然不甘沉默，紧跟着在报上登广告，反唇相譏。

不擇手段，用損害別人、使別人倒臺的办法，达到賺錢的目的——这本来是資本主义社会中慣常的現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各个企业在国家的統一领导下，以人民的利益为原则，通过有計劃的合作和友誼的竞赛，互相帮助，共同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比資本主义制度优越的鮮明标志之一。这也正是铁托集团的“企业自治”制度所不可能有的东西。

在铁托集团的“企业自治”制度下，許多企业为了牟取暴利，在市場上狂热地进行投机活动，兴風作浪，哄抬物价，損害整个社会的利益。一九六〇年六月五日南斯拉夫《新聞周报》报道，由于国家增加了对建筑工程的投資，于是，投机活动的狂热“席卷了建筑材料市場”，“机灵的商人认为做好生意的时刻到了”，許多企业搶购、囤积建筑材料，造成市場上建筑材料奇缺的現象。生产部門立即乘机抬高价格，商业部門也跟着加价，



結果使木材的價格猛漲一倍至一倍半，鋼筋的價格也漲了三分之二。一些從來沒有經營過這行生意的企業也插手進來“混水摸魚”，開設建築材料“代理行”，“它們通過一些中間人，往往是在電話中會談後，就能獲取高額利潤”。前幾個月，南斯拉夫物價飛漲，企業紛紛趁機大搞投機活動。《戰鬥報》在今年二月七日的題為《混水摸魚的人》的評論中透露：“搞價格投機”的企業的“名單相當長，而且正在增加”。

企業之間互相傾軋、損人利己的鬥爭的尖銳化，突出地表現在經濟糾紛不斷增多的事實中。南斯拉夫報刊公布的材料表明，這個國家經過經濟法院處理的經濟糾紛案件是逐年增長的：一九五三年十萬六千多件，一九五四年十六萬七千件，一九五五年二十一萬三千件，一九五六年二十七萬八千件，一九五七年近二十七萬件，一九五八年近三十四萬件，一九五九年更增加到三十八萬件。僅一九五九年一年中，貝爾格萊德的“乃依馬爾”和“勞動者”兩家企業即各被控告五百多次，新貝爾格萊德的拖拉機工廠和日列茲尼克的“伊沃·洛拉·里巴爾”工廠的負責人各進過二百多次法院。在這種情況下，法官大大地不夠用了。在貝爾格萊德，一個法官每月要處理二百個案件，“遠遠超過了定額”。許多企業為了打官司而支付大量的費用，僅塞爾維亞共和國的建築企業在一年中就為此開支了二億五千多萬第納爾的巨款。一九六〇年五月以來，鐵托集團為了緊縮通貨，停止發放企業流動資金貸款，使企業普遍出現了資金

周轉的困難，債務糾紛大大增加。南斯拉夫《政治報》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報道：南斯拉夫最大的鋼鐵企業澤尼查鋼鐵公司由於人欠的債收不回來，欠人的債還不出去，“流水賬已被凍結了幾個月”，“那些向它供應原材料的營業對手已取消了某些定貨”，“供應耐火材料和鐵合金的企業”“拒絕了供應”，企業的生產處於嚴重的“危機”中。該企業向法院控告了二百多家企業，停止向六十家企業供應貨物，並拒絕同那些不能償付債務的企業簽訂繼續供貨的合同，但是，“這一切沒有使情況有較多的改善”。

鐵托集團在一九五八年頒布了一個“經濟聯合法”，規定企業可以組織“業務聯合會”，“共同生產一定的產品和共同銷售”，“共同購買原料和材料”。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執行委員米·馬林科供認，這種“經濟聯合”是“模仿資本主義把資本集中在壟斷的康采恩和卡特爾中”。據鐵托集團說，這樣可以“給一切不健康的競爭、胸懷狹隘的觀點、地方主義的利益關上大門”。大家知道，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里，由自由競爭走向壟斷，並不能消除競爭，只是使競爭在新的基礎上更劇烈地展開。南斯拉夫的情況也正是這樣。如煙草業的八家煙草工廠和近四十家煙草加工品批發商在一九五九年組織了一個“業務聯合會”，確定參加者只能通過這一“聯合會”的商業機構獲得原料，銷售產品，並且確定了每個參加者的生產規模。結果，使三家沒有參加“聯合會”的煙草工廠受到嚴厲的排擠，它們的產品只能在馬其頓一地銷

②





售，在其他地方就不能銷售。建立壟斷組織還給某些企業帶來更高的利潤，給消費者增加更多的負擔。如八家電器批發商同無線電生產者成立了“業務聯合會”，包購了後者在一九六〇年所生產的全部收音機，與此同時，他們確定把收音機的市場零售價格提高百分之五。

鐵托集團一貫吹噓說，實行“企業自治”，可以最好地發展生產，可以造成任何“國家監督”和“行政干涉”所不能有的推動生產發展的力量。南斯拉夫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

在鐵托集團的統治下，南斯拉夫的經濟已經愈來愈從屬於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體系。美國、西德、意大利等國的商品充斥南斯拉夫的市場，使南斯拉夫的本國工業遭到了愈來愈強烈的打擊和排擠。南斯拉夫很大部分工業企業實際上成了外國資本主義壟斷企業的附屬裝配車間，它們依靠購買仿制這些國家工業產品的許可證並從這些國家進口半制成品和零件來進行生產。《戰鬥報》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九日的一篇文章曾悲嘆南斯拉夫的工業是“沒有發明家的工業”，“滿足於按外國許可證生產”的工業。鐵托集團所經常吹噓的南斯拉夫工業的增長數字，很大程度上是靠帝國主義的投資和從外國進口半制成品或再加工材料來維持的。南斯拉夫報刊透露：一九六〇年頭四個月中，“發展速度最快”的電機工業，大部分產品是靠增加進口再加工材料和零件生產的，並認為“這一情況也適用於其他部門”（一九六〇年五月二

十四日《戰鬥報》）；在馬達和馬達車輛工業部門，一九五八年的三千六百五十萬美元總產值中，進口的零件和原料的價值就占一千六百五十萬美元，即占總產值的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共產主義者》週報）；製藥工業各工廠“大部分都是加工進口的藥材，或者僅是改換藥品的包裝，而只在極小的規模中生產本國的藥品”（一九六〇年三月八日《戰鬥報》）。大量進口造成了對外貿易上的巨大逆差。對於這種逆差，鐵托集團完全要依靠向帝國主義國家乞討“援助”和貸款來平衡。每當外匯發生困難時，這些依靠進口再加工材料進行生產的企業就要減產、停工甚至倒閉。

在南斯拉夫這個鐵托集團自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中，經常存在着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商品“過剩”、企業倒閉和大批工人失業等現象。在這個國家里，儘管廣大勞動人民生活水平很低，但同時却有大量商品“過剩”。企業普遍用賒銷的辦法推銷“過剩”商品。一九五八年，有五分之一工業品是靠消費貸款推銷出去的。一九五九年一年中發放了九百多億第納爾消費貸款，比一九五八年又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許多企業由於產品積壓，不得不削減生產。有些企業為了保持商品的高價，甚至採取大批銷毀商品的手段。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報》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報道，某些農場和商業企業“為了保持正在流通中的蔬菜的高額價格”，曾把成噸的蔬菜和其他農產品拋進河里。這種現象在南斯拉夫並不是個別的。一九五八年，《戰



斗报》上曾报道过在南斯拉夫的牛奶产区用大量牛奶喂猪的消息。铁托自己在一九五四年曾供认：在南斯拉夫，企业“让产品毁坏，让其一半腐烂和糟塌，以便能够通过抬高物价从另一半中得到比从全部中所能得到的更多的利益。一句话，产生了资本主义世界上最消极的现象”。一部分企业在竞争和被排挤的情况下不能赢利，无力偿付税款、银行贷款和发放工人工资，结果只有倒闭。据南斯拉夫《解放报》副刊《世界》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报道，在四年中倒闭了两千家企业。又据今年头十期南斯拉夫《联邦公报》公布的材料，在今年一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五日两个多月内，就倒闭了一百一十八家企业。工人失业的情况十分严重，失业军的庞大队伍在逐年扩大。据南斯拉夫《指数》一九六〇年第五期公布的数字，一九五五年失业者有六万七千多人，一九五六年近十万人，一九五七年十一万五千多人，一九五八年十三万二千人，一九五九年十六万一千多人，一九六〇年二月增加到二十一万六千多人。南斯拉夫报刊报道，目前南斯拉夫工人失业的现象仍在继续发展，企业中普遍出现所谓“剩余劳动力”，“除了把他们解雇以外，很难找到其他出路”。

南斯拉夫经济中的这种种困难，完全是铁托集团自己造成的，是铁托集团使南斯拉夫离开了社会主义的轨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投靠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结果。铁托集团实行“企业自治”，标榜什么“国家消亡”、“经济民主”，一方面是为了给他们的叛

徒行为蒙上一块遮羞布，借以欺骗南斯拉夫劳动群众，同时，也是为了把经济上的困难转嫁给南斯拉夫劳动者。铁托集团的“企业自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规定工人的收入要依企业赢利的状况为转移，如果企业赢利小或者有亏损，工人的收入就要大大压低。

在南斯拉夫，经常性的物价上涨，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普遍下降，生活状况恶化。有时，工人的工资名义上虽然有些增加，但由于物价上涨，这种增加实际上化为乌有。据《指数》一九六〇年第九期报道：四口之家的工人家庭，一九五九年的生活费用指数比一九五三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据《战斗报》今年三月十四日报道，一九六〇年的生活费用又比一九五九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一。今年三月三日的南斯拉夫《经济评论》报道：最近几个月来，除了毛织品外，一切纺织品都“直线地提高了价格”；食品工业“也提高了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面粉和面条的价格正在直线上涨”。据今年三月十四日的《战斗报》说，今年头两个月的生活费用比去年十二月份又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加班工作。至于在那些遭受亏损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或失业的工人，他们的生活就更加困难了。

本文以上所反映的这些材料，只是南斯拉夫报刊所透露的关于“企业自治”的情况和其他有关情况的几个侧面。即使从这些材料中，人们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铁托集团



的所谓“企业自治”和所谓“国家经济职能消亡”，究竟意味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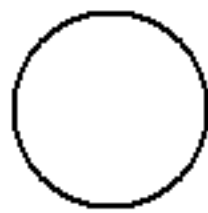
事实上，在铁托集团统治下的南斯拉夫，国家并没有消亡。铁托集团提出所谓国家消亡的主张，是为了掩盖南斯拉夫正在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并且借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是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生产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代替了无政府状态，可以自觉地利用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来为社会谋福利。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是在于认识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为全体劳动人民谋福利。就对外经济关系来说，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发展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保卫本国的经济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经济作用，代

表着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受到劳动人民的积极拥护，使国家的集中领导同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最好地结合起来。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经济作用的最好的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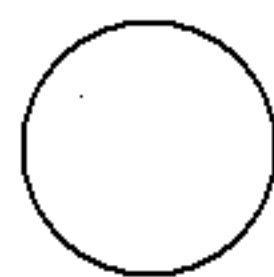
列宁曾明确指出，国家的消亡，只有在彻底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实现。列宁指出，那种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应当取消无产阶级的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主张，是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他认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必须要有管理整个社会经济的中央领导机构。

铁托集团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学说，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对经济的管理，在南斯拉夫搞什么“企业自治”，这正是他们背叛无产阶级事业、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效劳的一种表现。



# 红旗

HONGQI



12

一九六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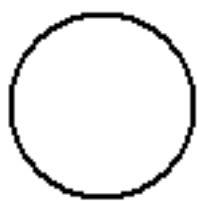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一年第十二期 ★

## 目 录



### 十年前学术界的一次

调查研究工作 ..... 本刊评论员 (1)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特点 ..... 李维汉 (5)

### 对目前音乐创作中几个问题的

理解 ..... 吕 驥 (27)

“做笨事” ..... 闻 和 润 (33)

西德垄断资本和它的向外扩张 ..... 严 希 (35)





# 十年前学术界的一次调查研究工作

## 本刊评论员

无论研究历史问题或者现实问题，要得出科学的结论，都必须搜集丰富的可靠的材料，进行认真的独立的研究。这是任何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要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举出一个事例来谈谈。

十年前，即一九五一年，我国学术界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关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问题的讨论和批判。这次讨论和批判，是在全国解放后不久思想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一次胜利。在这次讨论和批判中运用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也给思想工作和学术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武训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一个渺不足道的人物。因为他以乞丐的身份创办“义学”，受到封建朝廷的奖励；在他死后，不但反动统治者不断地给以赞扬，而且有许多人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出发把他歌颂为一个“英雄人物”。这种对武训的赞美影响很深，以至在全国解放后，还有人特意把他的生平拍成电影，企图证明，从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出发，也必须在武训面前低头膜拜。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电影《武训传》开始公演，各地报刊上除了个别的文章提出批评外，几乎只是一片赞扬，暴露了当时许多人，包括一些

在文化领域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在认识上的一个严重问题。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迅速地改变了这种状况，北京和各地报刊上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批判，发表了一些观点正确、材料丰富的批判文章。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团的调查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这次讨论和批判，对于划清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东西和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的界限，划清人民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界限，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当时，《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武训的历史地位本来是很清楚的。人们如果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规律的认识为指



导，不为资产阶级偏见所迷惑，实事求是地考察武训生平的基本事实，是不应当在评价武训的问题上迷失方向的。但是因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一个长时期中已经为武训的生平加上了许多粉饰和曲解，使许多人受到迷惑，所以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必须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工作，这就要求进一步从大量的经过审查鉴别的事实材料中，考察武训所处的历史时代，考察武训的思想行为的具体内容及其在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次讨论中，正是这样做的。人们不但从事文献史料的多方发掘，而且进行了对武训活动地区的实际调查，因此，掌握的事实材料越来越丰富全面，对武训问题的批判也就越来越深刻、准确和具体了。对武训的研究还引起了对于和武训同时、同地区的农民革命战争，即以宋景诗为首的黑旗军的研究，不久后，还有人进行了关于黑旗军的实际调查。这种从大量的可靠的事实材料中引出科学结论的做法，活生生地显示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解决方法解决具体问题的威力。

从关于武训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中可以看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要求，在研究任何具体人物和事件时，都必须“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sup>①</sup>。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武训歌颂者却是脱离武训生活的具体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去孤立地、随意地解释问题。马克思主义要求在研究一种精神现象时，必须考察它产生的社会物质条件和它的具体历史内容和阶级内容。武训歌颂者却是撇开具体的阶级内容去抽象

地谈论武训的什么“崇高精神”。马克思主义要求，在评判人物的活动时，必须把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考察，并以社会实践效果作为最后的标准。武训歌颂者却是完全不管武训兴学在实践上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事实，武断地把武训的兴学动机说成是“为了穷孩子”。十分明显，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这些要求，就一定要搜集和掌握大量的事实材料。例如，经过对武训家乡的农民斗争历史的详细考察，发现了武训的家和宋景诗的起义地点虽然相距很近，而武训却选择了投靠地主的道路，从而进一步揭露了武训在当时的阶级斗争中的具体态度。又例如，经过对武训办学的全部过程和他的“义学”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师、首事人和学生成份的详细了解，具体证明了武训办“义学”，不论就其动机和效果来说，都是适应地主阶级的要求，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他的“义学”是在地主阶级把持下办起来的。又例如，经过了对武训的高利贷剥削和土地剥削以及他的种种社会关系和思想行为的详细了解，完全证明了他的所谓“奇操苦行”，只是为了扩大他的剥削资本，同时保持一个欺騙的外衣，爬到封建统治者宝座的脚边。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足够的丰富材料，就不可能进行揭露事物内部联系的具体研究，并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

要掌握大量的、可靠的实际材料，必须进行系统的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当时，武训历史调查团直接深入到事件发生的地点，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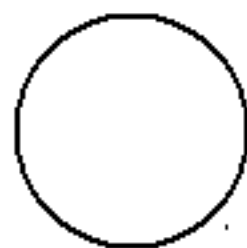
并通过群众路线的方法，力求获得丰富的可靠的第一手的材料。他们把明确的目的性和严格的科学性结合起来。他们不但尽力搜集和发掘正面材料，同时也搜集一切可能搜集到的反面材料，用正确的观点来分析和利用这些反面的材料。他们除了搜集和整理各种书面材料和实物材料外，还访问了一百六十多人，包括有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他们调查了武训本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情况，同时对武训生活的那个具体时代、具体环境里的阶级关系和政治经济情况，也做了细致的了解。他们的调查是有系统的，同时又是重点的，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了典型，作更深入细致的调查。他们对调查所得的材料，进行了比较、核对和鉴别，对于提供材料的人的阶级出身、社会经历、政治态度和谈话时的表现作了细心的观察和分析。有些歌颂武训的人，也曾经做了一些调查，但是那同科学的调查是根本不同的。调查者自己后来说，他们并不去“向被访问的十几位父老们去打听和探询武训的真实情况”，而“只根据自己主观上的需要去选择历史资料和调查资料”<sup>①</sup>。抱着这样的态度，他们即使听到一些真实的重要的材料，例如他们“听说过一次有人提到黑旗军，也没有去研究追问”<sup>②</sup>，当然就更谈不到从这个线索去探寻出更重要的历史事实来了。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不掌握必要的可靠的资料而妄作论断，是根本违反科学态度的。如果不是从大量材料中经过比较、分析，找到有代表性的材料，而是任意地拿个别的材料作为自己的根据，所达到的结论也只是片

面的、错误的。虽然有了较多的材料，但是没有经过科学鉴定，分辨真伪，在这样的材料基础上作出的判断，也是不可靠的。在研究工作中，常常会碰到不少重要的材料没有发掘出来，已有的一些材料受到种种的歪曲，其可靠性很值得怀疑的情况。所以科学研究不但要搜集大量的材料，而且要对搜集起来的材料进行认真的审查和考订的工作，清除许多蒙蔽事实真相的迷雾。对于任何有疑点的材料，都不要轻轻放过，而要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对和分析，弄清真相。缺少批判地审查材料这一步工作，也不能有真正的科学研究。在武训问题的讨论中，有一些人囿于传统的成见，轻信已有的所谓“定论”，根本不想去占有第一手的材料，进行独立的审查和研究，就轻易下判断，就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地写起歌颂文章来。有的人写歌颂文章，手头唯一的材料就是一本《武训画传》。采取这种轻率的盲从的态度，当然说不上是进行科学研究。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研究问题，必须从事实出发，而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但要如实地认识客观事物，不受假象的欺蒙，不受某种成见的束缚，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为了掌握全面的材料，鉴别材料的真伪，有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科学工作者必须亲自动手，付出辛勤的劳动。科学工作者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根据已有的真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作出适当的判断；在材料还不完备的时候，要继续进行调查，在新的调查研究的

①② 《武训和〈武训传〉批判》，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31页。



基础上，发展或者修改原有的判断，以至作出新的判断。

从上面所谈的几个问题中都可以看出，人们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是同他们的立场、观点密切联系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观点，是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立场决定了它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是尽可能揭示事件的真相，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而持有反动立场、观点的人，他们的反动观点和历史真相从根本上说来是对立的，他们不可能客观地、全面地对待事实材料，因为研究和揭露历史的真相是对他们不利的。所以他们总是在社会历史问题上采取主观主义的反科学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有些武训的歌颂者对于史实就是采取随意歪曲，或夸大或缩小的态度，对于不能歪曲的事实则干脆加以掩盖，甚至捏造事实。他们为了证明武训是如何的“高尚”，就捏造出所谓武训拒穿黄马褂一类的谎言，同时却掩盖了武训的一些丑恶事实材料。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有些总的说来持有错误观点的人，对于某些具体的事实材料并没有说错，只是他们对这些资料的解释或者从这些资料引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有时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总的说来持有正确观点的人，在研究问题时，由于没有很好地掌握科学的方法，而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对待一切社会历史问题时总是有鲜明的倾向性的，例如我们总是站在进行革命斗争的人民的这一边，而反对那种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社会势力和人物。这种鲜明的倾向性必须贯彻在对事实材料的科

学分析中，而不能用以代替科学研究。如果忽视了搜集和整理事实材料的工作，如果以为只要根据历史规律的认识，就可以任意地选用史料，任意地断定这种史料或那种史料的价值，甚至如果为了表现倾向的鲜明，走到了离开事实材料或曲解事实材料的地步，结果就会走到反面，破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要求的科学性，也就丧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要求的革命性。所以，在研究工作中，一定要把正确的立场、观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统一起来。

在科学研究中，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周密的调查，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分析研究，引出科学结论，这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的态度的。为科学进步开辟正确道路的，使科学研究得到积极成果的，正是这种有生命力的科学的态度。相反地，任何形式的概念游戏，徒托空言，随意找出片断的、偶然的事例加以夸大，用来凑合某种主观臆造出来的观点，这是主观主义的态度。这种非科学的态度只会把学术工作引入歧路，阻碍真正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研究工作要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办法，对实际情况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找出事物内部所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采取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对任何形式的主观主义态度，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的学术工作的优良传统。十年前关于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讨论和调查研究就是一个例证。我们的学术界必须更好地发扬这个传统而不能违背这个传统。



#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特点

李 維 漢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它已经胜利地经历了民主革命阶段，又在胜利地经历着社会主义阶段。在它的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特点。下面这些，是它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特点：

-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 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
- 三、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
- 四、在民主革命阶段以实行武装斗争为支柱、在社会主义阶段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统一战线；
- 五、担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革命任务的统一战线；
- 六、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统一战线；
- 七、支持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统一战线。

这些特点反映了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的发展规律。现在，我们依次来论述这些特点。

##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最根本的特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其他一切特点，都是同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根本特点分不开的。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取得彻底胜利，应当由谁来充当领导者？是只能和必须由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还是可以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来领导？对于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根本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发生过长期的斗争的。历史是最好的公证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不能取得胜利。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二十八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胜利。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为什么只能和必须由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来充当，而不能由民





进步力量（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中间力量（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此外还有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和其他爱国分子），顽固力量（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针对这种阶级组合的情况，针对蒋介石国民党一面被迫抗日、一面又坚决反共的两面性，并且鉴于过去两个时期中“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种片面政策的错误，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自主，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全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斗争，克服了在抗日战争初期发生的类似陈独秀投降主义的第二次王明路线。这个错误路线抹杀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差别，反对划分左中右，主张一切经过蒋介石国民党的同意，而放弃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的方针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在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党和毛泽东同志紧紧地抓住了一个对全局有决定影响的主要环节，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尽一切可能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争取地主阶级以及和这个阶级有联系的人们共同抗日，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停止执行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的政策，而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为了发挥民族资本和私人经济的积极性，党采取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为了团结一切抗日民主人士共同奋斗，党采取了“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联合政府政策。就这样，党在根据地内发展和巩固了工农联盟，并把其他抗日阶级阶层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由于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巩固，就使敌伪军日益陷落在中国人民的分割和包围之中，不能达到占领全中国的目的；就使全国人民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有了榜样，看到了胜利的前途和人民共和国的远景，坚定了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信心；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强有力的支柱，有利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就有力量对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并且阴谋分裂、准备投降的蒋介石集团，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之不敢公开破裂投降，并且胜利地打退了他们为公开投降、全面内战作准备的历次反共高潮。总之，由于抓住了这个主要环节，党比较顺利地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从而把抗日战争引导到最后胜利。

由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了伟大的发展和成功，积累了完整的和丰富的经验。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果，革命武装的成果，革命根据地的成果，党的建设的成果，连同各方面丰富的经验在内，为以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极为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支持之下，采取了反革





由共产党领导和发动起来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阶级的路线和群众路线，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根本路线，只有共产党才能提出和贯彻执行这个路线。正是因为这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到五四运动以后，才能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五四运动“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sup>①</sup>，因而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人民民主革命的序幕。但是，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还缺少工农联盟作基础，因为农民这个革命主力军还没有参加到运动中来；更缺少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日益成为自觉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跟着逐渐建立起来，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逐渐形成起来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話），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sup>②</sup>。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阶段中，是要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从而使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

经过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为中国人民指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虽然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中，曾经有许多人长期地固执和散布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旧民主主义的即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sup>③</sup>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要坚持资本主义的道路，谁就“有可能走到帝国主义所指引的危险的道路上去。因为他们既然坚持要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势必要同帝国主义国家联系起来，而帝国主义者却不会让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只会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统治的殖民地。这正是蒋介石卖国贼所走的道路”<sup>④</sup>。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跌入附和蒋介石反革命的泥坑，就是这个道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还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所谓“民

① 《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45页。

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7页。

③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6页。

④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页。



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随着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的转变，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但需要而且可能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因此，从三十年民主革命的战火中锻炼出来的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统一战线，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转变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统一战线。

在建国的头三年，即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胜利地进行了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镇压反革命分子、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其他民主改革的斗争，恢复了国民经济。这些斗争的胜利，大大地巩固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且为全面进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一九五三年，党中央正式宣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农业和其他个体经济是经过合作化的道路，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采取和平的方法，逐步地进行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而人民手里又掌握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国民经济的命脉，所以我们能够经过和平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很快，在一九五五年冬天和一九五六年春天，就相继出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接着就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使我国多种成分的经济结构变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工农联盟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都进到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这个时期内取得的伟大成果。但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却还远没有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也还需要一个逐步习惯的过程。不甘心于资本主义灭亡的资产阶级右派企图利用这种情况，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在一九五七年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我国人民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全民的整风运动，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和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取得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广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精神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此空前高涨，资产阶级的多数人也因此不同程度地转过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弯子，表示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个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个总路线的指导下，展开了农村



主統一战綫包含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階級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工人階級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

我們的偉大的工农联盟，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质上即农民战争）中，逐步发展和鍛炼出来的。它已經走过了民主主义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合作化这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現在又已經走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和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阶段。不論在那一个发展阶段上，工农联盟都是基本的联盟，是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基础。毛澤东同志指出：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階級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階級的联盟”<sup>①</sup>。刘少奇同志也指出：“在我国的六亿多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他們無論在革命斗争中和建設工作中都是一支最偉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階級只有依靠这个偉大的同盟軍，把他們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充分地調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农民同盟軍問題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設时期仍然是这样。”<sup>②</sup> 其他的階級、阶层、集团，他們参加革命和参加統一战綫的程度如何，主要也是以工农联盟的力量为轉移。沒有工农联盟，就沒有真正人民革命的統一战綫，就沒有真正的革命的胜利。所以，不論是民主革命阶段，或者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不論在革命战争中，或者建設工作中，毛澤东同志总是把工农联盟問題放在首要的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指导全党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因为我們党不断地发展和巩固了工农联盟，就使人民民主統一战綫获得了坚实的基础，有力量去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非劳动人民，結成广泛的統一战綫；有力量去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力量去孤立、分化和瓦解敌人。

在工人階級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里面，主要的同盟者是民族資產階級。这个联盟，对于工农联盟說来，是一个非基本的、輔助的联盟，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又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联盟。这个联盟之所以不可缺少和重要，主要地是因为中国民族資產階級是一个爱国的階級，在政治上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在經濟上和文化技术上有重要作用。他們的多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采取保持中立的态度；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又有願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階級爭得民族資產階級的合作，或者至少使之保持中立，就有利于爭取其他的中間力量，有利于孤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保持着联盟，就不但有利于繼續孤立敌人，而且能够利用他們在經濟上和文化技术上的积极作用，能够用和平的方法對他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明紳士是从地主富农階級中分化出来的、带有

① 《論人民民主专政》。《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3頁。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的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25頁。



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他们的政治态度基本上和民族资产阶级相同。开明绅士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多少力量，在经济上也没有多少作用，但是，争取和团结了他们，有利于分化和中立小地主和富农，并且对于争取知识分子（他们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大部分同土地有联系），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都是有益的。

在这第二个联盟里面，在民主革命阶段，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参加。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这次合作，对于停止内战，实现对日抗战，起了决定的作用。在抗日战争的八年合作过程中，尤其是一九三八年武汉失守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但是，由于党和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我们仍然能够利用这种合作，达到了集中主要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在抗日战争中大大发展革命力量的目的。这不但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作用，而且为以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有决定意义的条件。在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指出：“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sup>①</sup>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预见。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两个联盟的对立的统一。四十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正确地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正确地处理两个联盟的关系，这就是：第一，放手发展和加强工农联盟，使它真正成为统一战线的基础和依靠；第二，尽可能扩大第二个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第三，正确地发挥两个联盟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它们互相促进。

从四十年来的革命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很快地促进了整个革命运动的高涨，特别是工农联盟的建立和发展。后来，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注意同资产阶级的合作，不敢继续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在北伐战争的后期，甚至不惜损害工农联盟以迁就地主资产阶级，结果反而使资产阶级更加动摇，反动力量更加上升，终于把革命引导到不可挽救的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坚决地领导了土地革命，创造和发展了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曾经为发展统一战线、促进新的革命高潮，造成坚固的基础。但是，在这个期间，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只要工农联盟，反对工人阶级同非劳动人民的任何联盟。“左”倾冒险主义者以为只有这种政策才是最革命的政策，结果反使工农联盟被孤立，革命再一次遭到很大的损失。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总结

<sup>①</sup> 《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49页。



了过去两个历史时期的經驗，放手发展工农联盟，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組成广泛的統一战綫，正确地发挥两个联盟的相互作用，革命就节节走向胜利：首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接着經過三年的解放战争，最后打垮了蒋介石的反动統治。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党和毛澤东同志繼續发展了正确处理两个联盟之間的关系的經驗。一方面，在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之后，接着就领导农民逐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使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起来，并使人民政府掌握了主要的农产品，借以縮小资本主义的市場，直到堵死资本主义道路，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經過国家资本主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通过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不仅孤立了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起了有益的作用，而且經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向资本家取得工业品，作为向农民交换农产品的重要的輔助手段，对于促进农业合作化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五五年冬季，农业合作化高潮首先到来，它推动了城市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公私合营都在一九五六年春季出现了高潮。接着，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我国胜利地进行了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革命运动中，經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工农群众的革命精神空前高涨，使“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們不想变也得变”<sup>①</sup>。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人，也因此不同程度地轉过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弯子，表示願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个基础上，在三面紅旗的指导下，我們又在各項建設工作中实行领导干部、专业人員和工农群众三部分人員相結合的办法，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两个联盟互相促进的一种形式，因为“三結合”中的专业人員有一部分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識分子。

四十年来，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两个联盟，就是这样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相輔相成，互相促进，把革命一步一步地不断推向前进，不断推向胜利。今后，我們仍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繼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发挥两个联盟互相促进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設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实现非劳动人民的根本改造，使他們化为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那时，我国人民的广泛的統一战綫将变为各部分劳动人民之間的联盟。

### 三、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統一战綫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統一战綫中的两面性，或者叫做二重性，所以，这个統一战綫中的第二个联盟，即工人阶级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一方面对工农联盟有着輔助

<sup>①</sup> 毛澤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紅旗》杂志 1958 年第 1 期。





作用。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另一方面，这个联盟又对工农联盟有消极的作用。在这个方面，我们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曾经吃过大亏。为着正确发挥第二个联盟的辅助作用一面，防止它的消极作用一面，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善于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正确地对待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远在一九二六年，毛泽东同志就正确地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在分析当时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的时候说：“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sup>①</sup>“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sup>②</sup>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光辉的思想，却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拒绝和埋没了。他们不是从右边，就是从“左”边，否认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只看见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一面，看不见他们的反动性一面，因此，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只看见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一面，看不见他们的积极性一面，因此，对资产阶级只讲斗争，不讲联合。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根据过去两个时期的经验和抗战时期的新的经验，系统地分析和论证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的公式，这一个光辉的思想和正确的政策才为全党所了解和掌握。

毛泽东同志说：

“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sup>③</sup>

<sup>①②</sup>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9页。

<sup>③</sup> 《〈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99页。





“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sup>①</sup>

“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sup>②</sup>。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又联合又斗争，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又联合又分裂，即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者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一种是统一战线内部的又团结又斗争。一般说来，又联合又斗争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分别地说，这里讲的又联合又分裂，主要指同大资产阶级的关系。

由于旧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即是代表中小资本主义成分的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系较少，而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他们基本上没有掌握过政权，而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统治。这些都是他们和大资产阶级相区别的。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又没有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联系，并且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经济的、政治的地位，规定了他们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两面性，即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规定了他们在民主革命中必然处于动摇不定的地位，有参加革命的可能，也有附和反革命的可能；他们中的少数依附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统治的右翼分子，则是革命的敌人。总的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是这样：一方面，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不但残酷地压迫劳动人民，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共产党，领导着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向三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为国家的独立、自由、富强而奋斗。在这种形势下，只要共产党对这个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积极争取的政策，就能使他们的多数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我们的经验证明，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都应当对民族资产阶级坚定不移地采取争取的政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曾经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参加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而

① 《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59—760页。

②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40页。



蔣介石反动統治則沒有放松對他們的打擊。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同志明確地指出：“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前），他們中間的不少分子，曾經附和了蔣介石的反動。但是，決不能因為這一點，就認為那個時期我們在政治上不應該爭取他們，在經濟上不應該保護他們；就認為我們在那個時期內對民族資產階級的過左的政策不是冒險主義的政策。相反地，那時我們的政策，仍然應當是保護和爭取他們，以便我們能夠集中力量去反對主要敵人。”<sup>①</sup>自抗日戰爭時期以來，黨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堅定地執行了這個政策，終於使民族資產階級的多數由動搖於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中間地位，轉到人民革命這方面來，表示擁護人民共和國和共產黨的領導。這不但孤立了敵人，而且造成了一種可能，即爾後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條件下，用和平的方法，使民族資產階級逐步接受社會主義改造。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比較詳細地說過了。

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就是要根據他們的兩面性的不同情況，對他們適當地實行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這就是，對於他們的革命性方面，依據具體情況，適當地實行團結的政策，而對於他們的妥協性方面，依據具體情況，適當地實行批評或者鬥爭的政策，以便尽可能地堅定他們的革命性，克服他們的動搖性，使他們同我們建立聯盟，或者至少保持中立。我們的經驗證明，如果忽視他們的革命性一面，不在這方面對他們實行團結的政策，固然不能爭取他們；如果忽視他們的妥協性一面，不在這方面對他們實行批評或者鬥爭的政策，也會助長他們的動搖，同樣不能達到爭取他們的目的。同時，我們在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這種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的時候，還應該針對他們內部左、中、右三派的不同情況，來分別對待。

在社會主義階段，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這本來是一種對抗性的矛盾。但是由於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發展所形成的具體條件，“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sup>②</sup>所以，在過渡時期，黨和毛澤東同志對民族資產階級堅定不移地執行和平改造的政策。和平改造仍然是又團結又鬥爭，團結他們願意接受社會主義的一面，而對他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面進行批評或鬥爭；也就是求同克異，逐步克服不同的方面，使之同化於勞動人民，同化於工人階級。“為了改造，先要團結。”<sup>③</sup>改造的目的，是為了消滅這個最後的剝削階級，而把這個階級的人們同化過來，這更是為了達到更高基礎上的團結。

在中國，大資產階級，就是官僚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所代表的官僚資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種特殊形式的壟斷資本。“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

<sup>①</sup> 《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7頁。

<sup>②</sup>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頁。

<sup>③</sup> 《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綫》。《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10頁。



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同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着，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sup>①</sup> 從清朝末葉以來，隨着中國逐步走向殖民地化，中國當權的反動官僚、軍閥就逐步買辦化，一些買辦也逐步爬上統治地位，從而形成了代表這種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官僚資產階級。在蔣介石統治中國的二十二年中，尤其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日本投降以後，官僚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峰，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而統治中國中央政權、充當美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的走狗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就成了最大、最集中、最殘暴的官僚資產階級集團。這個壟斷集團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就是對中國人民的野蠻掠奪和對民族資本的無情吞併的過程，也就是美帝國主義排擠英、日等帝國主義在華勢力而獨占中國的過程。四大家族而外，還有一些地方性的官僚資產階級集團。

大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史上，歷來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革命的对象。但是，“因為中國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分屬於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在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尖銳地對立着的時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時候，屬於別的帝國主義系統之下的買辦階級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間內參加當前的反帝國主義戰綫。但是一到他們的主子起來反對中國革命時，他們也就立即反對革命了。”<sup>②</sup>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兩次合作，又兩次分裂，主要就是這樣造成的。

這裡有兩條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

第一條，必須善於利用敵人的矛盾。毛澤東同志說：“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鬥、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sup>③</sup> 我國革命根據地，從井岡山鬥爭起，就是利用敵人的矛盾和缺口，逐漸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這是毛澤東同志在領導中國革命中利用敵人矛盾的一種榜樣。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的條件下，我們還應當根據“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策略，把“過去是敵人而今日可能做友軍的人們，都從敵人營壘中和敵人戰綫上拉過來”<sup>④</sup>。同他們暫時地直接建立一定程度的聯盟，以便集中力量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第二次合作，就是毛澤東同志利用敵人矛盾的又一種榜樣。

第二條，大資產階級的本性不會改變。共產黨同國民黨兩次合作的經驗都證明，大資產階級即使在參加統一戰綫的時候，仍然是很反動的。他們被迫地暫時參加統一戰綫，是為了維持反動統治和發展反革命勢力，是為了瓦解革命力量和最後地打敗人民。他們在統一戰綫中不但極力欺騙拉攏和協持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中間勢力，而且極力限制打擊和破壞共產黨

①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3頁。

②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34頁。

③④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43—144、149頁。



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并且力求把共产党变成他们的尾巴。到了革命的发展同他们的这种反动目的相冲突的时候，他们就要掉转枪口来反对革命力量。正是因为这种反动的本性，蒋介石集团在抗日统一战线中表现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两面派。党和毛泽东同志本着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蒋介石集团任何微小的抗日积极性都充分加以争取和利用，使之有利于抗战；而对他们反共、分裂、妥协、投降的一方面，则针锋相对地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并且局部地在军事上，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放手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使蒋介石集团陷于孤立，不敢公开投降日本，不敢完全和共产党破裂。也正是因为这种反动的本性，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了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就根本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不顾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争取同他们保持团结、实现和平民主的仁至义尽的努力，而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做好了一切准备以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内战。这种种历史事实都证明，希望经过统一战线改变大资产阶级的本性，是不可能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这样，其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也是这样。

对于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推翻了他们的政权和摧毁了他们的经济基础以后（除了个别的和平起义人士和其他爱国分子，应当很好地团结他们，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以外），必须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强迫他们接受群众监督和劳动改造，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和政治教育。只有经过长期的监督和改造，他们中的多数人才有可能从反动分子改变成为人民的一分子。十多年来，经过这样的监督和改造，已经有一部分人发生了这种变化。但是，这两个反动阶级的残余仍然是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社会基础，其中有许多人还无时不在梦想复辟。在政治上充当这两个反动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因此，在我国，改造大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分子的斗争，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将持续一个整个的历史时期。这方面，不容许有任何的麻痹、懈怠或者放松警惕。

#### 四、在民主革命阶段以实行武装斗争为支柱、在社会主义阶段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统一战线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了由农村到城市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带头走了这条道路。

这条道路的中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革命战争，就是长期的农民革命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就正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此后，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直到胜利，尽管革命战争所反对的对象和参加革命战争的同盟军各有区别，但这些战争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依托革命根据地来进行的农民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为主要斗争形式，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而长期的农民革命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又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为什么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具有这样的特点呢？这是由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这一个根本特点决定的。毛泽东同志说：

“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sup>①</sup>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上开辟了这条道路，又在理论上论证了这条道路。远在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了红色政权即农村革命根据地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此后又多次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

“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sup>②</sup>

走这条道路，就是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的道路。而要走这条创造性的道路，是不能不经过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即教条主义者，硬要在中国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走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的道路。他们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从已有的经验教训中取得教益，而固执地要在中心城市发动起义，或者要求红

<sup>①</sup>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90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29—630页。





軍进攻大城市。这一場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和教条主义路綫的斗争，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會議以后，才以毛澤东同志路綫的胜利宣告結束。

統一战綫和武装斗争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統一战綫和武装斗争，是党手中的两个战胜敌人的基本武器，它們是互相依賴的。一方面，革命战争必須由党所領導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統一战綫来負担，党的正确的統一战綫政策是革命战争胜利的政治保证。“战争是政治的繼續。”战争要胜利，首先要靠政治，首先要打贏政治仗。我們进行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这种战争的政治性质使它不仅具备了胜利的可能性，而且具备了胜利的必然性。但是革命战争要胜利，还要依靠正确的政策。这里除了孤立和瓦解敌人的政策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团结和壮大自己的問題，或者说，就是統一战綫問題。如果我們沒有正确的統一战綫政策，如果我們不能正确地处理各阶级的关系，以达到团结和壮大自己、孤立和瓦解敌人的目的，那么革命战争就不可能胜利，甚至可能遭到失敗。这一点，在我們党的历史上有过丰富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

在另一方面，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統一战綫不論在那一个时期，也不論有沒有资产阶级参加，都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統一战綫”<sup>①</sup>。毛澤东同志說：“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組織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sup>②</sup>“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沒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sup>③</sup>統一战綫工作，是直接地或者間接地配合革命战争，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同时，統一战綫必須有坚强的人民武装作为它的支柱，才能巩固和发展。在我国条件下，离开了革命的武装斗争和革命的武装力量，統一战綫就不能巩固，就不能发展。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統一战綫是革命战争的負担者，而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反过来，又可以創造和发展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統一战綫。大家知道，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之下，創設黄埔軍校，組織革命军队，举行东征和北伐，曾經怎样造成了蓬蓬勃勃的工农运动和广泛的統一战綫。但是因为共产党在当时还不懂得直接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尤其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者自願地放棄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又是怎样使“那时的革命統一战綫沒有中心支柱，沒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軍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sup>④</sup>。民众运动和国共两党合作的統一战綫都一齐垮了台。大家更熟悉地知道，后来，我們在抗日战争时期，所以能够击败蔣介石集团分裂、投

① 《〈共产党人〉发刊詞》。《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04頁。

②③ 《战争和战略問題》。《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81、592頁。

④ 《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51—152頁。





降的阴谋，而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到抗战胜利，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坚强的并且日益壮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充当中心支柱。

中国民主革命的全部经验证明：工农联盟的发展和巩固，主要是经过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而获得的；同资产阶级讲统一战线，更要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手里有没有武装力量。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手里如果没有相当强大的武装力量，对武装到牙齿的大资产阶级固然没有任何发言权，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人微言轻”的。相反地，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手里的武装力量愈强大，革命战争进行得愈胜利，统一战线也就愈广泛，愈巩固，愈强大（如果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話）。总之，没有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强大的人民革命武装力量，就不可能有工人阶级领导的、足以战胜敌人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几十年的革命战争，锻炼出来了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一个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一个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依靠这三个法宝，经过农民革命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建立了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这三个法宝的结晶和集中表现，它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由以实行武装斗争为支柱的统一战线进到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实行和平改造和和平建设的统一战线。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的目的和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并且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整个社会，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然后逐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sup>①</sup>。我们党早就指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包括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统一战线，不仅对于人民民主革命是需要的，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同样是需要的。

有人以为，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建设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统一战线。他们不懂得，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分子已经有了统一战线的长期历史。在社会主义阶段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面，但是他们愿意留在统一战线之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我们没有理由不同他们继续合作。而且，这个阶级是一个具有比较丰富的现代文化知识、拥有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的阶级。工人阶级同他们继续保持统一战线，不但对于教育和改造他们有重大的作用，而且可以利用他们的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以最大限

<sup>①</sup>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页。



些假說所依据的事实还不充分，不系統，并且由于它还常和抽象的邏輯推理連結起来，就断定它是脱离实际的。

假說不仅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里經常出現，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里有时也要运用假說。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里，曾說明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由假說变成了由科学方法证明了的原理。他指出，由于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天才的假說，使得人們第一次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問題和社会問題，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使科学的社会学得以出現。他又指出，馬克思在提出这个偉大的科学假說之后，就着手实际地研究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来研究資本主义社会的材料，并根据大量材料把商品經济体系的活动規律和发展規律做了极詳尽的研究，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結为儿点概括的、彼此紧密联系的思想，揭示了資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規律。自从《資本論》問世以后，唯物主义历史观就不再是假說，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了。

使用假說的方法，并非让人们毫无根据地去玄想。科学假說的建立必須有一些事实材料作根据，或者它是某一已知原理的推广。成为科学的假說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它不能和已知为正确的事实或已由大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論相冲突。如果假說和事实不符或和正确的理論相冲突，那末这个假說就不能成立。

在人們所掌握的事实还不够充分，这些事实的可靠性还不够清楚，或对这些事实的細节以及它的准确程度还不够了解的情况下，根据这些有限的事实有时可以抽象出这种或那种假說，因而就表现为多种假說并存的局面。例如，关于天体演化过程就有好几种不同假說并存。在化学的催化理論上有好几种学說。原子核結構的理論目前就有五种模型之多。在遺傳学方面有两种学說，其一是米丘林的理論，另一种是孟德尔、摩尔根等人的古典遺傳学。在几种假說中也許只有一种假說是对的，但更多的情况却是相互补充。原子核結構理論虽然有五种之多，但有的理論只适用于解釋所謂“滿壳层”原子核附近的一些現象，有的理論只适用于解釋所謂“大变形”原子核。在科学理論研究过程中，有多种假說并存，对于科学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几种假說并存的局面，会通过不断的討論和爭論以及由于新的实验材料的出現而逐步得以澄清。結果或者是以某一种較正确的假說为基础而发展为系統的理论，或者是用“兼收并蓄、融会貫通”的办法形成一种統一的理論，有时是根本地推翻这些假說，另建新的假說。

假說有时以“出人意外”的形式出現，甚至看起来带有若干想像的成分。但是，只要它有一定的事实或理論作根据，不和已知为正确无誤的事实或已由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論相冲突，即使它带有若干假想或猜想的成分，它仍然不失为科学的假說。对于这类假說，我們不应輕易地加以排斥或否定。在科



的关系，必须争取和确保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以便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然后不停顿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全部实践证明，正确地处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同正确地解决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实现领导权的问题，是互相不可分离的。在民主革命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就能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成为担负两个阶段革命任务的统一战线。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和斯大林曾经多次论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已经脱离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个理论，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世界十月革命的一部分”和“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命题。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但是，如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时这一命题的理论意义还没有充分发挥，以致人们还只能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这个正确的命题曾受到了机会主义的反对或者歪曲。反对这个正确命题的代表、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看作旧民主主义革命，认为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阶段，因而他们把领导民主革命看作资产阶级的事情，把民主革命的胜利看作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派给工人阶级以替资产阶级充当苦力的角色。陈独秀主义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用一座万里长城隔绝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因而从右边取消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歪曲这个正确命题的代表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他们抹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因而把整个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并且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结果从“左”边严重地损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两种机会主义都不理解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区别和衔接，因此也都不能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已经脱离旧范畴的理论和中国的历史特点，反复地阐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革命按其社会经济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它的发展和胜利必然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广阔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这样，就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辩证地统一起来，正确地解决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衔接的问题，并在根本上树立了争取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



有可能去完成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sup>①</sup>

“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sup>②</sup>

“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sup>③</sup>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一方面，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严格地区别开来，反对主观地超越民主革命阶段；另一方面又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在民主革命中就尽可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这里，主要的就是：第一，不断地加强党的建设，使党成为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坚强的先锋队。第二，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使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同盟军，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第三，建设和发展革命武装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实施各项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和奖励对国计民生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一方面尽可能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因素。在各项新民主主义政策实施过程中，逐步地培养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有管理国家经验的干部。第四，执行彻底的群众路线，放手领导群众自己动手进行革命斗争，从斗争中不断地教育自己，提高觉悟。“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sup>④</sup> 我们党因为贯彻执行了这个根本路线，所以充分地发动了群众，有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经验证明，在民主革命中，各种革命力量尤其是工农群众发动得越广泛，越深入，革命就进行得越彻底；而民主革命进行得越彻底，就使各种民主力量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能够继续保持广泛的团结，使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比较顺利。走这样的道路，就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不但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而且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

①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46、642页。

③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65页。

④ 刘少奇：《论党》，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4版，第37页。



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sup>①</sup> 走这样的道路，就使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取得和巩固了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把民主革命引导到彻底胜利，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使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停顿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事实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正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以武装力量为支柱的统一战线，所以能够成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正因为它是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所以它能够成为担负两个阶段革命任务的统一战线，或者说成为彻底革命、不断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指出，“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sup>②</sup> 在民主革命阶段是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也是这样。十多年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胜利地经过了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不断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考验。现在，它正在继续团结最广泛的社会力量，胜利地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可以预见，它将长期地存在和发展下去，直到胜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地消灭阶级。这还有疑问吗？我们认为不应该再有疑问了。

## 六、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统一战线

我国人民，经过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但团结起来进行反对敌人的斗争，而且团结起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工作做好了，就可以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巩固起来，更好地担负两个阶段的革命任务。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在共产党内部，在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群众中，在全体干部和一部分同盟者中，就用团结——批评或者斗争——团结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因而组成了一个政治上一致的、坚强的革命队伍。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党和毛泽东同志把这个方法逐步地推广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中去，并且已经收到很大的效果。

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空前广泛和空前深刻的革命，不但要根本改变社会制度，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而且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根本改造一切剥削者和私有者，教育全体人民。毛泽东同志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

<sup>①</sup>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45页。

<sup>②</sup>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69—1470页。





者也要改造”。<sup>①</sup> 只有这个改造工作做好了，才能实现消灭阶级、彻底解放全体人民的伟大历史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同时解放全人类。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它启示我们，只有在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把一切都改造过来，只有对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分子实行根本改造，同时帮助一切劳动者进一步进行自我改造，才能消灭阶级差别，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改造人的工作，包括改造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分子在内，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崇高事业。对剥削阶级实行根本改造，就是要把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剥削分子化为劳动者，化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国的经验证明，改变剥削者所有制还比较容易，真正困难的是改造剥削者，这要比所有制的改造艰巨十倍，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实现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依靠一个根本条件，这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人民有了自己的国家，才能对已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用专政的方法，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也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团结——批评或者斗争——团结的方法，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毛泽东同志说：“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sup>②</sup> 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或者斗争——团结的方法，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就是统一战线的方法。经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能够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最广泛地团结各民主阶级的人民，又能够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帮助人们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十多年来，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它的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它的各级委员会，对组织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sup>③</sup> 我国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部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地进行改造中国的革命斗争，实现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同时在改造中国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实现着对自己的改造。我们相信，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部分人民，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1页。

③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5页。



领导下，继续不断地和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继续不断地和彻底地完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任务，就一定能够共同进入无限光明、无限美妙的共产主义社会。

## 七、 支持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同时，没有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胜利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没有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呢？原因在于我们是处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代。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sup>①</sup>“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sup>②</sup>所以，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历来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力争外援的方针。革命也好、建设也好，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必须首先依靠自己努力奋斗。自己奋斗愈力，就愈能取得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就愈能发生积极作用。不以自力更生为主，无疑是根本错误的。但是，不重视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不积极争取这种援助，而把自己孤立起来，或者把自己的斗争看成孤军奋斗，同样也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广大人民，从四十年的艰难经历中，对于自力更生为主，是理解得很清楚的，对于力争外援的必要，也理解得很清楚。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一切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尤其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援助，对于中国革命历来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世界的事情已经联成一气，各国革命力量需要互相援助的论断，是一个普遍真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更加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的普遍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日益威胁着一切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另一方面，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核心的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日益互相接近和联合起来。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人民，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所面对着的国内敌人不同，但又都是处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威胁或者包围之中，他们的内部敌人又往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因此，他们的斗争，不论是争取民族独立或者争取社会主义，不论是争取民主或者争取和平，都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帝国主义的阻挠，尤其要碰到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阻挠。因

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56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8页。



此，他們不能不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个最凶恶的敌人的斗争。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的人民，促使他們互相接近和联合起来，逐渐結成反对帝国主义的統一战綫，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統一战綫是如此地广泛，它以社会主义陣营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为核心，包括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包括了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一方面，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联合起来包圍世界各国人民，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包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包圍和反包圍的斗争已經遍于全世界。在这个包圍和反包圍的斗争中，东風已經压倒西風，就是說，优势已經在世界人民这一方面。这个优势在今后必然繼續扩大，并且正在繼續扩大。

中国人民的統一战綫，是世界人民的統一战綫的一个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統一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把中国人民的团結和世界人民的团結联系起来。在发展和巩固国内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同时，总是力爭“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階級和广大人民，結成国际的統一战綫”<sup>①</sup>。

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正确地指出：“中国的人民革命給帝国主义在亚洲的陣地以毁灭性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它給民族解放运动以新的有力的推动，給各国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巨大的影响。”<sup>②</sup>中国共产党深刻理解自己在世界人民面前和国际統一战綫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它将和以往一样，永远巩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結，永远巩固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各国人民的团結，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爭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将和以往一样，在中国各民族人民中經常地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結合的教育，反对各种各色的资产階級民族主义。在目前时期，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拼命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团結和各国共产党之間的团結，破坏各国人民之間的团結。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人民民主統一战綫中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克服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影响，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們的口号是：‘中国人民大团結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結万岁！’。依靠这两个偉大的团結，我們的事业是无往而不胜的。”<sup>③</sup>

① 《論人民民主专政》。《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7頁。

②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頁。

③ 刘少奇：《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頁。



## 对目前音乐创作中几个问题的理解

· 吕 驥 ·

近几年来，我国音乐创作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日益繁荣，不断提高。由于作曲者遵循党的指示，深入到群众中去，对急剧变化着的工农兵群众生活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破除了迷信，从一些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因而使我们的音乐创作能够迅速地发展，多方面反映了今天异常丰富的现实生活。

音乐创作的繁荣和提高，使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向我们提出了若干和创作有关的新问题。总结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经验，研究这些新问题，对于推动音乐创作继续向前发展，是有益的。这里仅就音乐创作上几个大家谈论着的问题，提出个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在音乐创作中，题材固然不能成为作曲者在创作上取得成就的决定因素，但在一个时期中，题材的变化，特别是选取革命斗争题材，却反映了作曲者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目前出现许多以革命历史、当前革命斗争和革命英雄人物、以及民间传说中的理想人物作为题材的音乐作品，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由于作曲者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我们深信，随着作曲者对于革命

历史、当前革命斗争和英雄理想人物的认识的加深，艺术表现手法的日益丰富和个人风格的逐渐形成，这类题材的音乐作品，不久一定会达到更高的水平。

虽然选取反映革命斗争和英雄理想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在全部音乐创作中占有很大比例，但我们的作曲者并不以为写了这类作品就可以满足广大群众多方面要求，他们在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的指导下，努力扩大自己选题的范围，从各方面反映无比广阔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进一步地发挥了各个作曲者不同的创造才能，有效地显示出不同作曲者的创作个性。

现在我想提出来讨论的是有关以革命历史、当前革命斗争、英雄人物以及民间传说中的理想人物为题材的作品中有关音乐创作思想的一些问题。

怎样去写革命斗争和英雄理想人物，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现有的这些作品中，有的基本上是按照文学著作的主要发展线索作为音乐构成的基本骨架的，像《浣溪沙》交响诗，《保卫延安》交响诗；有的是根据戏曲的基本情节构成音乐章节的，像《穆桂英挂帅》交响诗，《秦香莲》交响诗，《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这些作品，在反映人民革命斗争生活、刻画民间传说中的理想人物方面，都获得



了一定的成就。由于这些同名的文学作品和戏曲的情节已经为许多听众所熟知，这样做比较容易为听众所理解，而作曲者从戏曲和文学著作中更可以找到许多刻划音乐形象的参考，这是这种写法的优点。像《浣溪沙》交响诗的结构，既符合于毛泽东同志原诗的内容，也适合音乐的发展。但是，另外许多作品，如《保卫延安》交响诗，《穆桂英挂帅》交响诗，《秦香莲》交响诗，从音乐艺术的特殊性来看，就完全可以用不同于文学著作和戏曲结构的构思；这几部作品基本上是按照文学和戏曲的情节来构思的，虽然具有一定的戏剧情节性，却不能说是充分发挥了音乐性能的作品。这些作品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音乐和文学、戏曲在表现手法上究竟有无不同的特点？文学戏曲所能做到的，音乐是否也能做到？不用说，大家都会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别。比如文学，特别是小说，擅长于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和生活变化的细致描绘，来展示时代的面貌；戏曲是擅长于通过人物的活动、事件的发展，来揭示不同人物的思想和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矛盾；而音乐（指不与诗词相结合的器乐）则适合于通过直接抒写各种情景中人们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现实生活，却不擅长于复杂情节的叙述和事件的描写。它虽然也可以具体描写胜利和失败的情景，却是通过抒写胜利者的欢快情绪和失败者的颓丧情绪而达到的。它虽然也可以表现庄严的意境，寂寞或活跃的情景，也还是通过对处于这种情景中人们的感受和情绪状态的描绘而达到的。虽然音乐也能够具体地描绘某些特定的景色，但是，它是借描写这些特定景色，写出了作家的感受，以及他所想要表达的生活情绪。勉强要它去叙

述生活的具体情节，描写事件的发展，以及某些概念思维，必然要使得音乐艺术失去它所特有的功能。像《保卫延安》、《秦香莲》、《穆桂英挂帅》交响诗这类器乐作品，虽然作者也考虑到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却并没有根本跳出文学和戏曲的范围。试想一下，如果作者按照音乐的特长，在这些作品中突出主题的抒情部分，通过抒情的曲调去描写作者所要表现的人物的内心活动，从而塑造人物形象，将某些具有戏剧性的乐段充分展开，使生活内容从另一个角度得到深刻的揭示，删去某些不必要的生活外部形象和过场的描写，这些作品不会更精炼、更富于音乐效果吗？人物的形象不是会更加鲜明吗？

应该看到，音乐有它不同于其他文艺形式的特点，音乐构成有自己的规律。不应当把文学和戏曲的构成规律强加在音乐上。穆桂英、秦香莲这类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完全可以作为音乐题材，但应该按照音乐构成的规律去塑造他们的形象，不能完全借用戏曲的布局，更不能完全局限在戏曲的唱腔和曲调的范围中。只有按照音乐塑造形象的特殊手法加以丰富和发展，才能达到典型的高度，获得最大的音乐效果。就是这样，也还要承认音乐艺术的局限性，比如在器乐作品中，不用文字来说明，“我不挂帅谁挂帅”这个主题是借自戏曲中的一句唱腔，就很难描写“我不挂帅谁挂帅”的思想。离开了文字说明就无法理解、无法听懂的器乐曲，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最有前途的音乐。

此外，我们也看到一些以当前人民斗争和革命历史为题材的器乐曲，是以流行的群众歌曲和民间音乐作为素材而创作的。如《抗日战争》交响乐就是选用当时的群众歌曲作





为塑造生活形象的素材。这是一种可以采用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作曲者所写的音乐很容易唤起广大听众曾经亲身经历过的生活回忆，《抗日战争》交响乐在这一点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虽然作者所选用的歌曲不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也不都是很好地发挥了它们的作用的。这种方法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在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创作中都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问题是如何运用这种方法，能否完全采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能否说是唯一的方法，在概括生活、塑造形象上是否也有它的局限性。有的作者对当时的这些群众歌曲并没有经过深入的研究，没有选用那些最典型的歌曲，也没有根据这些歌曲音调加以提炼、发展，创造出概括了现实生活的音乐形象，因此这种借用只是成为一种省事的方法。显然，如果只是简单地、千篇一律地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作为表现革命军队的形象，用《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曲调去表现人民解放军的形象，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曲调去表现人民志愿军的形象，而不根据作曲者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和分析，创造出足以概括现实生活中各种形象的典型的音调，作为自己的音乐基础的话，那就只能导致音乐形象日益贫乏，也必然要导致音乐语言的日趋单调。这显然不是我们所预期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审慎地、创造性地采用这种方法。

上面谈到的两个问题，都是我们在一些以革命历史、当前的群众革命斗争和民间传说为题材的音乐作品中所常遇到的问题。这是属于音乐创作思想和创作技巧方面的问题，也是要影响到创作质量的值得重视的问题。如果我们作曲者不能克服认识上的和技

巧上的局限性，不能很好解决这两个问题，就会阻碍音乐创作水平的提高。

## 二

音乐艺术上任何一种重大的变化，都反映了作曲者思想观点的变化。题材的变化是这样，音乐艺术的日益民族化也是这样。音乐艺术上的民族化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这里我们且不去研究音乐表演上的民族化方面的问题。音乐创作上的民族化也有多方面的内容，这里也不打算展开全面的研究，这里只就音乐语言方面的问题加以探讨，因为音乐语言在音乐创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音乐语言民族特点的鲜明程度会影响到一个作品的民族风格的鲜明程度，音乐语言的丰富与否和作品的丰富性常是相关联的，音乐语言的变化必然要带来其他方面的变化。

近几年来，音乐语言发生了极其显著的变化。这是由于作曲者普遍地认识到音乐艺术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就必须为工农兵群众所理解；要为工农兵群众理解，就必须做到音乐语言具有民族风格。基于这种认识，作曲者学习了民间音乐。我们应该肯定这种努力是必要的，而且是有成效的。今天从音乐创作上所看到的音乐语言的日益民族化，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现在音乐创作中表明，作曲者在学习民族音乐语言和创造新的民族音乐语言方面，遇到一些新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仍然是如何批判地继承民族音乐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新音乐的问题。

我们已经听到许多改编的优秀民歌（包括各民族的），根据民间音乐写成的民族器乐



曲，在民間音乐基础上創作的交响音乐，以及那些受民間音乐影响很深的大合唱和各种形式的歌曲，这許多作品和民族音乐語言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广大听众对于这些音乐是欢迎的。我們对于作曲者的这种努力和他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应当加以肯定的；但是如果看不到現有工作的局限性，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也是不对的，那样就不能繼續推动工作前进。我們认为應該肯定在民歌和民間音乐基础上进行加工創造，这是学习民族音乐遗产的一种必要的工作。貝多芬就曾經为許多国家的民歌写过伴奏，也用民歌作主题写过一些不同形式的作品。許多古典作曲家和現代作曲家，都在这些方面作过許多工作。这样的工作，可以帮助我們进一步理解民族音乐的特点、发展民間音乐和在民間音乐基础上的創造的可能性。但是这只是工作的一个方面。我們还必须根据这方面工作所取得的經驗，进一步去創造。我国杰出的音乐家聶耳、冼星海、張曙在这方面是我們学习的典范，他們正是从民族音乐遗产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而能够創作出許多既具有革命內容，又具有新穎的民族風格的优秀作品。但現在有些作曲者却不是这样。他們的創作或者拘泥于原来的民間音乐，原封不动，不敢作任何新的发展，或者只是因襲原来民間音乐的音調，沒有增添任何新的內容，因此，使人觉得依然是旧調重彈。这样的創作是不能滿足广大群众日益提高的要求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仍然脫离了群众。这是以保守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民族音乐傳統。事实证明，这样的音乐并不能表現这个时代的人民精神，这样的音乐在表演的当时，群众虽然也欢迎，可是不要很久，群众也就忘記了，因

为在音乐上沒有給他們什么新的东西。

从这里可以看到，如何創作具有民族風格的、新的音乐語言，是我們音乐創作上的一个新的課題。过去我們有些作曲者深受民族音乐虛无主义观点的影响，脫离了民族音乐傳統去創造新的音乐語言，这样当然是要失败的，因为他們的立脚点錯了。有些深受資产階級唯美主义思想影响的作曲者，脫离人民生活去創造新的音乐語言，也必然要遭到失败，因为他們完全失去了音乐創作的生产基地。事实证明，以虛无主义观点对待民族音乐傳統，是不可能創造出具有民族風格的新的音乐語言的。而以保守主义的观点对待民族音乐傳統，也难以創造出真正具有民族風格的新的音乐語言。許多成功的作品表明，音乐語言的創造，必須从群众生活中去寻找根据。因此，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作为指导，从人民生活出发，批判地学习民族音乐遗产，是創造具有民族風格的新的音乐語言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里还有一个問題值得提出来討論。有些同志把音乐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風格并列，并且把地方特点和民族風格等同起来，甚至认为沒有本地特点就是沒有民族風格，并且狹隘地排斥所有不具有本地特点的音乐。有些強調本地特点的人，事实上只承认一个狭小地区的民間音乐作为一个省区的地方風格的典范。这样，不仅縮小了这个省区的音乐特点，同时也把音乐的民族風格理解得过于狹窄了。当然，民族風格可能具有某一个地方音乐的特点，但不能反过來說，沒有某地音乐特点就不具有民族風格。比如《义勇軍进行曲》、《大路歌》、《打长江》、《黄河大合唱》等許多具有民族風格的声乐作品，誰能說它



們只是具有某一省的民間音樂特點呢？不用說，鼓勵作曲者深入地研究地方音樂，作為創造新的民族音樂風格的具體基礎，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地方風格和民族風格並提，甚至於把地方風格強調到超過民族風格，這對於繁榮音樂創作也是不利的。必須特別說明，這裡完全不是反對我國五十幾個兄弟民族的音樂不應該具有自己的民族特點。各民族完全应当發展自己的特點。這裡所反對的只是在漢民族內部不適當地強調某一地區音樂的地方特點，把它作為我國音樂民族風格的標尺的觀點。否定音樂上的地方個性是錯誤的，借抽象的民族風格以逃避對地方音樂進行深入研究，更是錯誤的。但只承認個別地方特點，而不承認在別的地方音樂的基礎上、或者在較為廣泛的基礎上而創造的民族風格也是不對的。那樣只能導致音樂語言的單調。

在學習民族音樂遺產方面，應該說目前面還不夠廣。建國十多年來，大家接觸比較多的還是民間音樂和幾個兄弟民族的音樂。而對唐宋流傳下來的大量古典音樂遺產，如六百多首七絃琴曲，四千多首詞曲音樂，等等，我們還未曾進行過全面的探索；對於五十幾個兄弟民族的豐富的音樂遺產，也還未曾進行全面系統的調查、整理，大家也就無法展開深入的研究。學習民族音樂遺產，從民間音樂入手是完全正確的，因為活著的民族音樂遺產，正是民間音樂。它的豐富的人民性，風格的多样性，都容易為大家看到，內容和當前人民生活更為接近，而且各地都有許多優秀的民間藝人，學習起來比較方便。但是不能把我們的學習範圍局限在這一方面。在古典音樂遺產中，雖然封建性的糟粕和民主

性的精華同時並存，但經過科學研究，批判其消極的部分，繼承並且發揚其民主性的精華，對豐富與發展新的音樂語言是有積極意義的。歷年來在發掘整理七絃琴音樂工作中，以及最近開始着手研究《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的工作中，已經使我們看出，這些古典音樂遺產蘊藏著古代人民光輝的創造。我們有什麼理由把這份寶貴的音樂遺產置之不顧呢？我們必須把繼承音樂遺產的面放寬，把古典音樂和各兄弟民族音樂遺產包括進來。這樣，我們在音樂遺產中就能夠吸收豐富的營養，創造出更富於感染力、更富於色彩的、個性鮮明的音樂語言。當然，批判地學習外國音樂語言也是不可少的。只要根據生活的需要，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對我們總是有益的。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sup>①</sup>而且告訴我們，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要從外國語言中吸取我們所需要的成分，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毛澤東同志在這裡談的虽然是學習一般語言的問題，可是對我們學習音樂語言，也是有指導意義的。

### 三

音樂形象，這是一個借用詞。音樂是聲音的藝術，不可能有形象。所謂音樂形象，是指某種情緒鮮明的音樂，由於準確地反映了現實生活，因而在聽眾頭腦中喚起某種生活形象的感覺。為了塑造出特定的音樂形象，首先要求作曲者對於這個特定形象的性格，它的社會意義以及它的音調特點，都有深刻的認識。只有經過充分的醞釀，真正達到了胸

<sup>①</sup> 《反對黨八股》。《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38頁。



有成竹的时候，作曲者才能运用他的音乐写作技巧精心雕塑。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在听众的感觉中引起某种特定形象的感受。

近几年来一些成功的作品，为我们塑造了各种不同的生活形象，留给人们以鲜明的印象。但是也有一些作品没有留给听众任何印象。分析起来，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作曲者对所选定的题材和所反映的现实，缺乏明确的认识。当然，也有的作品，的确是由于创作得过于匆忙，作曲者对于形象的探索，缺乏充分的酝酿，也没有充裕的时间对于所塑造的形象进行精雕细琢。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作曲者把音乐形象的塑造，看作仅仅是技术性的工作，因而忽视了音乐形象的生活思想内容，这样，他所创造的音乐虽然不能说没有形象，可是他所创造的形象和听众在生活中所感受的形象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而使听众觉得这个作品缺乏生活的真实性。比如钢琴曲《双飞蝴蝶》，我们不能说这个作品缺乏形象性，但却有许多人觉得它的形象缺乏生活的真实性。这可能是由于作曲者不是从生活思想内容出发去进行音乐创作，没有把反映一定的生活思想感情作为音乐创作的任务，因而不要求自己的创作真实地反映生活，自然也不严格地要求自己所塑造的形象是否符合于生活的真实。结果，音乐创作变成了技术性的游戏。这显然不是作曲者所期望的。

此外，也还有另外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作曲者在塑造英雄形象的时候，常常不是在作品中把他的英雄作为一个阶级集中的代表，最高的典型，反而在思想上把他平庸化了，因此，尽管作曲者把主要曲调写在高音区，全部乐队都用上，再加上四五个

强音记号，听众仍然觉得黯然无光。像这样的音乐，我们不能仅从技术方面去寻找作品的缺点。缺点的根源在于作曲者的思想认识上，在于作曲者对现实生活，对英雄人物缺乏分析，没有提到思想性的高度来认识，对于英雄人物的典型意义缺乏深刻理解。因此在音乐创作中，不敢放手把他的英雄塑造得更崇高些，更伟大些，更美些。现实生活在这样的作品中失去了丰富的色彩，英雄人物被简单化了，作品的形象也失去了生活中的多样性，矛盾和斗争失去了它们在生活中所具有的复杂性。我们只要拿像《赵氏孤儿》、《打龙袍》、《四进士》这类古典戏曲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和我们今天的某些音乐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对照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某些作曲者在音乐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尽管在思想本质上远不是古代英雄人物所能比拟的，但在艺术形象上，却不如古典戏曲中的英雄形象那么生动、富有艺术的感染力。分析起来，原因很多，但主要的还是由于作曲者对他所描绘的英雄人物和他所处的生活环境，缺乏深入的分析，作曲者自己的思想水平还没有达到完成他的艺术创造所要求的高度。虽然有些音乐作品的作者还有另外一些缺点，比如音乐语言贫乏、写作技巧（包括和声配器等）修养不深，但是，最根本的认识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即使其他方面的问题解决了，中心问题——英雄形象——典型的塑造仍然得不到最后的解决。我们只有完满地解决了音乐创作中形象塑造这个难题，使塑造的音乐形象具有生活的真实感，才有可能创造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音乐作品。我们相信，作曲家们在不断的实践中，一定能够经过努力来解决这个难题。



# “做笨事”

聞 師 潤

钻研学问，就认真地学习，学了不会，再学，还不会，又再三再四地学，不是不懂装懂，也从来不偷懒取巧。这种人做事，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有些“呆板”，不大

“灵活”。因此，把它叫作“做笨事”。

有人认为，这样“做笨事”，花的力气最多，进度最慢，最不合算。但是，事实并不如此。凡是这种肯“做笨事”的人，他们的事情总是办得比较牢靠，问题解决得比较彻底，工作质量比较好。所以，比起那些不愿下苦功夫的人，为贪便宜，图省事，结果走了弯路，不得不重新补课来说，还是最省力、最合算的。这样，看起来似乎慢，实际上却是快，看起来好像“笨”，实际上并不笨。

我们在工作中需要有巧干。但问题是如何做到巧。这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把巧看做是创造性的劳动，是需要通过辛勤锻炼才能产生的。所以任何巧事都要从“笨事”做起。不愿做“笨事”，不愿下“笨功夫”的人，就不能做到巧。艺术上的灵巧熟练，首先要从基本功练起，按照严格的规矩和程序把功夫练到家。这就是一件“笨事”。但是，只有经过长期的勤学苦练，实实在在地打好了根底，认真地掌握了这些基本动作的规律之后，才能得心应手，做到熟能生巧。科学技术中的许多创造发明，同样也要经过几十次、几百次以至更多的试验，经过无数的挫折和失败，才能获得成功。没有百折不挠的科学实践，根本不可能有创造发明。由此可见，实干是一切巧干的基础。人们要做好任何工作，都必须在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充分

要做好任何一件工作，或者要掌握任何一种本领，必须有认真的态度，踏踏实实地下功夫，才能收到效果，达到目的。事业上的成就，工作中的成绩，总是人们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勤劳苦干的結果。世界上从来没有不花力气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工作做出贡献，或者不经过艰苦的锻炼就能够真正学会本领的事情。

著名京剧艺术家盖叫天在谈到练功时，有过一个比喻。他说：初学练功，大致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一教就懂就会，会了就往旁边一摆，睡觉去了。这种人学“会”比谁都快，但比谁都懂得少，忘得多。另一种人是师傅教他时，不懂就捉摸，问它十七八个为什么。这种人，学“会”虽然比较迟缓，可是会了之后，懂得最深，忘得最少。有人把前一种人称为“伶俐鸟”，后一种人称为“笨鸟”。“笨鸟”有个笨办法，那就是别人安寝了，“笨鸟”还在踢腿，别人睡梦正浓，“笨鸟”已经起床，正在翻旋子，下腰。结果：“伶俐鸟”虽然聪明又伶俐，但一无所得，而“笨鸟”却学到了许多本领。

在实际生活中，也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一种人，无论说话、做事，总是要求有根有据，说到那里做到那里，从来不说瞎话。做起事来有板有眼，有头有尾，一步一个窝，非常扎实。不论是执行重大任务，还是做小事情，总是认真去做，不肯马虎。





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讲究技巧，讲究方法。反复地学习，反复地研究，反复地试验，反复地向群众请教，有了这种务实精神，才能为巧干提供动力和前提。

另一种看法，却是把图省力，贪方便，走“捷径”，当成是一种“巧”办法。但是，这不是真正的巧，而是一种蹈虚取巧。就像“伶俐鸟”的练功，学了一些皮毛，就不再去进行刻苦的锻炼，结果一无所得。同样地，如果以为用不着掌握科学的基本知识，就可以攀登科学顶峰，用不着认真研究前人的成果，就可以批判地继承遗产，用不着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满足于一般号召，就可以完成工作任务，这也一定是要落空的。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需要我们切切实实地去做，不可有贪图侥幸成功的心理。他说：“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sup>①</sup>他又说：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灰尘不经过打扫，是不会自动去掉的；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这正是说，不经过耐心的切实的工作，不付出辛勤的劳动，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办成功。灰尘是需要一寸一寸去扫的，工作是需要一件一件去做的，艺术高峰是需要一步一步去攀登的，科学堡垒是需要一座一座去夺取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功夫没有做到，或者做得不牢靠，任何预期的目的也达不到。

正确的方针和原则，是我们工作的向导。但正确的方针和原则不是凭空来的，而是人们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有关的情况，在实践中进行必要的试验，然后才能规定出来

的。而且有了正确的方针和原则，还远不是事情已经办好。要实现原则和方针，还必须切切实实地做许多具体的工作。拿我们过去在全国范围内所进行了的土地改革这件大事来说。长期的斗争经验使我们有了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标准，有了关于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各项政策，这是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正确向导。党和人民政府向农民群众发出了土地改革的号召，并且派出了工作队深入到一个一个的乡村中去。这些工作队在所到的每一个村子中，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耐心地启发群众的觉悟，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去发动群众，并且把党的政策详细地交代给群众。在工作队的帮助下，群众自己动手，一户一户地划分阶级，把恶霸地主一个一个地斗倒，并且解决了在平分土地中所遇到的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土地改革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其中又包含着极其细致和复杂的工作。事实证明，只有这样地下“笨功夫”，才能真正达到土地改革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抛弃了这一套正确的办法而另求“捷径”，采取简单地从上而下“恩赐”的办法，那就既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也不可能把土地改革工作做好。

总之，我们做事情，要不怕困难，不嫌麻烦，不贪便宜，不图轻便；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工作做好。如果有人看不起这种踏实认真的工作态度，认为这是“做笨事”，那么我们要说，我们所要提倡的，就是这种“做笨事”的工作态度。

<sup>①</sup>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79页。



# 西德壟断資本和它的向外扩张

· 严 希 ·

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十九世紀末叶才完成自己的資本主义工业化，但到二十世紀初叶便成为“比英国帝国主义更新鮮、更强大、更有組織、更高明”<sup>①</sup>的帝国主义。当后起的德国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时候，世界殖民地的大部分已被英、法等帝国主义大国所瓜分，直到一九一四年，德国搶占到的殖民地的面积，只有法国的四分之一强，不及英国的十分之一。强烈要求重新分割世界的德国帝国主义，一九一四年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以失敗告終。一九三九年德国帝国主义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招致了更加惨重的失敗。德国帝国主义丧失了全部国外市場和投資。德国东部已經脫离了資本主义体系，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德統治的地盘只相当于战前（一九三七年）德国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三。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帝国主义很快就恢复和发展了自己的經濟力量。西德的工业生产一九四六年只及一九三六年（西德地区，下同）的百分之三十四，到一九五〇年就超过了一九三六年的水平，一九六〇年則达到了一九三六年的百分之二百七十六。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十年期間，西德工业生产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九点五强。在主要資本主义国家中，除日本以

外，战后以西德的工业增长速度为最快。目前西德的整个工业生产虽然还没有赶上英国，但在若干重工业产品方面却已遥遥領先。一九六〇年，西德鋼产量达到三千四百一十万吨，汽車产量二百零五万四千辆；英国鋼产量为二千四百七十万吨，汽車产量一百八十八万八千辆。

随着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西德資本的集中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战前一九三八年，德国股票資本总額为一百八十七亿四千四百八十万馬克，其中百分之五十是集中于十九个大壟断集团。一九六〇年五月，西德股票資本总額上升为二百八十八亿二千五百一十萬馬克，而其中百分之八十为十七个大壟断集团所掌握。目前，在西德全部企业家数中占百分之零点四的大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占全部銷售額的百分之六十。据一九五八年統計，克虏伯、蒂森等十家康采恩控制着西德鋼铁工业生产的百分之九十四，铁矿开采量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硬煤开采量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九。通用电气公司和西門子康采恩控制着电气工业銷售額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法本康采恩控制着化学工业銷售額的将近一半。五个石油康采恩控制了石油生产

<sup>①</sup>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3頁。



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三。

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西德的对  
外貿易总額从一百九十八亿馬克，增为九百  
零六亿馬克，增加了三点五倍；其中出口貿易  
的增长特別迅速，增加了四点七倍。在資  
本主义世界出口貿易中，西德的比重已經于  
一九五九年超过英国而居于第二位。以整个  
資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額为一百，美、英、西德  
三国的比重如下①：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估計数)
美国	20.7	21.0	18.9	17.4	18.5
英国	9.7	9.5	9.5	9.3	9.0
西德	8.0	8.7	9.4	9.7	10.3

在資本主义世界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中，  
西德超过英国的情况更为明显②：

	1955	1958	1959
美国	24.5	23.3	21.3
英国	19.7	17.9	17.3
西德	15.4	18.5	19.1

西德的对外貿易从一九五二年开始連年  
出超，从而积累了大量的黄金外汇儲备。到  
一九六〇年年底为止，西德黄金外汇儲备已  
达三百二十亿馬克（約合七十六亿美元），在  
資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大量的黄金外  
汇儲备，为西德进行資本輸出提供了有利条  
件。西德从一九五二年大規模进行資本輸出  
以来，国家資本輸出达九十亿馬克以上，私  
人資本輸出达一百九十亿馬克以上。

西德帝国主义經濟力量的迅速恢复和发  
展，是和美帝国主义的积极扶植分不开的。扶  
植西德，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  
策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一九四六年杜勒斯  
就說过：“德国（西德）以它的各种条件而言，

是除原子彈以外的一支巨大的軍事力量。这  
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放手的”③。在美帝国主义  
的心目中，西德不仅在战略上占有特殊重要  
地位，而且是美国壟断資本擴張經濟势力的  
重要工具。美国扶植西德壟断資本，可以在  
西德攫取巨大的利潤，并且通过西德而更方  
便地打入西欧和某些不发达国家。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美国就竭力  
避免破坏西德的工矿企业。根据美国自己的  
調查，西德工业中心魯尔区因美国“战略轰  
炸”而損失的煤矿生产能力，只占全部煤矿  
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二，鋼铁生产能力的損失  
也只有百分之五。与此相反，魯尔区所在的  
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的工人住宅，却有百  
分之六十八点四被夷为平地。战争结束后，  
美国无理拒絕了苏联关于由苏、美、英、法  
四国管制魯尔区的建議，并从一开始就阻撓  
对西德企业进行拆卸。一九四六年美、英、  
法三国協議拆卸西德企业的項目为一千七百  
四十項，后經几度削減，到一九四九年拆卸  
項目减少为七百三十九項，事实上就連这七  
百三十九項也未如数拆除。根据某些英国資  
产階級經濟学家估計，尽管經過战争破坏和  
战后拆卸，一九四九年西德工业生产能力仍  
然等于一九三六年的百分之一百一十至一百  
二十五。战后初期，美、英、法占領当局在  
世界人民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經实行过所謂  
“非卡特尔化”，以“分散”西德的壟断組織，但  
这是一种遮人耳目的手段，被“分散”的企业

① 苏联《国际生活》杂志，1961年3月号。

② 英国《經濟学家》杂志，1960年4月30日。

③ 轉引自海因尼格：《西德战后的經濟周期1945—  
1950》，德文版，第91頁。



只是形式上成为独立的企业，实际上仍归原来的康采恩所有。一九五六年西德联邦议院通过“工、商、矿业改组法”之后，这种形式上的限制也已取消，被“分散”的企业都纷纷正式宣布重新归并入原来的康采恩。此外，美国占领当局还对费德门格斯等纳粹银行巨头宣判无罪，并提前释放了克虏伯等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战后初期，美国向西德输出了大规模的国家资本，对西德垄断资本起了“输血”作用。根据美国商务部发表的数字，从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起到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止，美国给予西德的政府补助金和信用贷款，共达三十八亿六千八百万美元，其中从战争结束起到一九五一年为止，就给了三十四亿美元。在这些补助金和信用贷款中，对西德经济恢复起作用最大的是“马歇尔计划”的贷款。

“马歇尔计划”对西德的贷款共为十五亿三千万美元(约合七十一亿五千万马克)，这同战后西德整个投资相比虽然为数不大，但由于计划执行的第一年(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就支付了贷款的百分之四十，帮助西德垄断资本解决了大规模恢复生产时期极端缺乏外汇的困难。同时，“马歇尔计划”所设立的“马克对等基金”，也给西德的企业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周转资金。“对等基金”是用西德厂商偿付“马歇尔计划”的贷款的马克构成的，西德政府在美国有关部门的同意之下，把这笔款项用短期信贷的方式投入急需资金的部门，然后收回贷款和利息再投入另一部门，如此循环反复，到一九五六年为止，利用这项基金进行的投资已达一百亿马克。这项“对等基金”几乎资助了西德的一切经济部门。

西德垄断财团的代表艾哈德说：“马歇尔计划”的贷款是西德“复兴的第一个决定性的动力。”<sup>①</sup>

随着美国国家资本的大量投入西德，美国私人垄断资本也大量渗入。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九年，美国在西德的私人直接投资由二亿零四百万美元增加为七亿九千五百万美元，增加将近三倍。美国私人资本分布在将近五百家西德企业之中，遍及一切部门，特别集中在石油、汽车和电气三个部门。在石油工业方面，美国垄断资本的投资最多，达二亿零一百万美元。美国洛克菲勒集团开设的“艾索石油公司”和其他石油公司就控制了西德石油生产的百分之五十。在汽车工业方面，西德四大汽车公司中的奥培尔和福特两家公司分别属于美国的杜邦集团和福特集团。这两家公司的小汽车产量约占西德小汽车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六，卡车产量占百分之十七。在电气工业方面，摩根集团的通用电气公司占有西德通用电气公司的多数股票，美国国际电话和电报公司控制着西德的罗侖茨公司；梅隆集团的威斯汀豪斯公司在西门子康采恩中也拥有投资，双方并在日内瓦联合开设了一个企业。

美国垄断资本通过缔结合作协定同西德垄断资本密切勾结。一种是技术合作协定和专利权协定。美国垄断集团把自己的专利权出让给西德，作为投资，牟取利润，而西德垄断集团则由此获得某些自己还不能掌握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例如，美国轧钢公司对西德蒂森康采恩钢铁企业的改建提供了技术

① 艾哈德：《德国重返世界市场》，德文版，第92页。



援助,并同曼纳斯曼康采恩、克虏伯康采恩和德馬格机器制造公司签订了专利权协定。美国威斯汀豪斯公司同西門子康采恩签订了交换原子情报的协定等等。另一种是关于瓜分市場的协定。例如,美国馬林克罗德化学公司同德占薩公司签订了后者可以在英国以外的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經售前者产品的协定。

近年来,美国壟断集团又以各种方式把資金和技术投入西德的軍火生产。美国在这方面渗透的方式,有以下四种:一、出卖专利权。如西德麦塞施米特公司和海因克尔公司获得了美国洛克希德公司“星”式飞机的仿制权;巴伐利亚汽車公司則向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取得了“星”式飞机发动机的仿制权。过去两年,美国壟断集团从西德企业获得的专利費达一亿一千三百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軍火专利費。二、购买西德企业的股票。如美国联合飞机公司购买了克虏伯康采恩的威悉尔飞机公司的百分之四十三的股票。三、在西德設立分公司。如美国佩金斯—厄墨尔公司在西德設立了一家由西德資本参加的子公司,生产該公司的“响尾蛇”导彈;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在西德設有子公司从事导彈电子技术和原子技术的工作。四、美国和西德企业共同制造軍火。如美国凡尔托公司与西德多尼尔公司联合設計和制造“飞行起重机”式直升飞机;制造遙控武器和飞机的美国馬丁公司則同西德特勒丰肯公司、海因克尔公司及麦塞施米特公司合作。

美帝国主义执行分裂德国的政策,保存了壟断資本在西德的反动統治。战后美国从一开始就蓄意破坏波茨坦协定关于重新統一德国的規定,首先在一九四七年合并了美、

英两国的占領区,接着在一九四八年片面实行了货币改革,彻底割断了东西德之間經濟上的有机联系,到一九四九年又成立了分裂德国統一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壟断資本的波恩政府。在这以前,美国保留了希特勒德国在各州的国家机器,西方占領当局在所謂“非納粹化”名义下进行的活动,不是肃清法西斯,而是替納粹骨干开脫罪責,并保留他們的职务。以阿登納为首的波恩政府,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阿登納政府的許多部长,过去在希特勒的国家机关里担任过重要的职务。

美国对西德的經濟和政治上的扶植,以及至今仍然存在的軍事占領,决定了西德在政治上依附于美国的地位。美国耶魯大学教授多以奇和密歇根大学副教授艾丁格在合著的《德国重新加入大国之列》一书中承认,西德的“外交决策是完全意識到这个事实的(指美国对西德的扶植)……因此,在德国(西德)外交政策的每一重大决定之中,美国政府都是无形的——有时也不完全是无形的——伙伴。”<sup>①</sup>西德的复仇主义叫囂和备战活动,都是得到美国的支持和慫恿的。美国力图利用西德作为它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工具,但是,西德也并不是单纯处于被动地位。西德追随美国,也是企图通过美国的計劃来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西德帝国主义并不甘心永远依附于美国。战后初期阿登納就說过:“应该这样开始,現在让外国代表坐到德国(西德)企业的监事会里来,然后有一天再让德国工业家坐到西方国家企业的监事会

<sup>①</sup> 多以奇、艾丁格:《德国重新加入大国之列》,英文版,第153頁。





里去。”<sup>①</sup>一九四九年九月波恩政府成立的时候，他更明确宣布西德要争取“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的地位”<sup>②</sup>，要“与西方三国占领当局同心协力，一步一步地争取我们的更多自由，更多权限”<sup>③</sup>。目前西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仍然要受美国的控制，但是，近年来西德对于美国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唯命是从了。例如，西德要求美国对于重大问题要与“盟国”磋商，不要“发号施令”。西德不仅对美国在西欧的核武器的使用要求有共同决定权，而且还要求自己拥有核武器。对于美国要求西德出钱解救美元危机，西德也没有完全满足美国的要求。美国和西德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正在愈演愈烈。

由于美国的“输血”，西德在经济上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现在，在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斗争中，西德不仅是英、法的劲敌，而且在某些地区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者。西德帝国主义参加资本主义市场的争夺，大大加剧了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

西德首先夺取的阵地是西欧市场。美国战后推行的以西德为核心的西欧“整体化”政策，为西德向西欧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一九四九年，西德加入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打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西德由于工人劳动强度高、工资低、战后实行了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因而在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竞争中居于有利的地位。一九五〇年美国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之后，其他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大力从事军火生产，当时尚未大规模生产军火的西德，抓住时机展开民用产品的出口攻

势，加强了自己西欧的地位。西德对西欧的出口，一九五二年超过了英国，一九五八年又超过了美国而成为最大的输出国。一九五九年，西德在这一地区的出口达五十八亿八千万美元，法国为二十四亿五千六百三十万美元，英国为三十亿零八千万美元，美国也只有四十三亿七千六百万美元。在对西欧的贸易中，西德赢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到一九六〇年二月为止，西欧各国对西德的贸易欠款仍有二十九亿九千六百万马克。其中英、法两国就欠十九亿一千一百万马克。西德对西欧国家的资本输出也在急速增长。西德对欧洲货币协定国家的长期投资（每年新投入数），一九五六年为三亿五千七百万马克，一九五七年为四亿五千二百万马克，一九五八年为十四亿五千万马克，一九五九年则高达二十四亿七千八百万马克。

一九五八年，西德同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组成了西欧“共同市场”，这标志着西德向西欧的扩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西德是六国之中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一九六〇年西德钢产量占六国钢产量总和的百分之四十六点八，小汽车产量占百分之四十九点四），它企图凭借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优势，通过“共同市场”的安排，逐步取得西欧大陆的经济霸权。“共同市场”条约关于逐步取消缔约国内部关税和建立共同对外关税税率，关于逐步取消彼此之间进口定额和关于六国内部实行资金和劳动力自由流通的

① 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版，第211页。

②③ 魏玛尔：《西德联邦总理阿德诺》，高雄版，第250、258页。



規定，为西德向其他五国进行經濟渗透提供了便利条件。一九六〇年上半年，西德对“共同市場”的出口达到六国内部貿易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三(按月平均值計算)。西欧大陆的資本貨物有百分之六十是西德供应的。西德还向“共同市場”实行大規模的資本輸出。在“欧洲投資銀行”的十亿美元資本之中，西德承担了三亿美元。西德在“共同市場”国家的长期投資(每年新投入数)，一九五八年为五亿五千三百万馬克，一九五九年为十二亿四千三百万馬克，其中西德壟斷資本购买其他五国企业股票的数目，一九五八年是一亿二千六百万馬克，一九五九年則达九亿五千一百万馬克，一年之間增加了六倍半。

法国是西德壟斷資本在“共同市場”内部进行經濟渗透的主要对象。西德壟斷資本不仅对法国本国进行渗透，而且企图通过同法国壟斷資本的勾結进一步打入非洲。几年来，西德壟斷資本已大量滲入法国的一些企业，如曼納斯曼康采恩掌握了法国薩尔鋼管公司百分之四十的資本。克虜伯康采恩通过它在瑞士的子公司在法国两家五金公司拥有投資。弗利克康采恩拥有法国納夫—曼松—夏蒂容鋼材公司百分之三十五的資本，并在法国麦古利投資公司中拥有投資。蒂森康采恩参加了修建馬賽—斯特拉斯堡油管工程，并占有利比亚石油联合公司百分之二十五的資本。霍希康采恩在法国独资開設了一家鍛造品制造公司。汉尼尔康采恩通过它的子公司德意志石油公司分別在法国的地中海油管公司和南欧油管公司中拥有投資。郎德康采恩在撒哈拉的四处石油钻探工程中拥有百分之

二十至百分之四十二点五的資本。德意志銀行則掌握了法国欧洲工业开发銀行百分之五十的資本。

法国壟斷資本加紧同西德壟斷資本勾結，指望借助西德的經濟力量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尤其想通过“共同市場”来实现所謂“欧非共同体”的幻想。但另一方面，法国壟斷資本对西德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又怀有极大的戒心。在协商“共同市場”計劃的过程中，法国同西德曾展开过勾心斗角的斗争。“共同市場”条約包含許多有利于法国的保留条款，在条約实施的过程中，法国又采取了某些保护本国貿易的措施。对西德保护本国农产品的关税政策，法国也表示极为不满。同时，法国和西德都力图把“共同市場”变成在自己控制之下的政治工具，两国在爭夺政治霸权上的斗争也在不断尖銳化。

英国在历史上同德国是老对头。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都同英德两国矛盾的激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后西德和英国在西欧市場上的斗争十分剧烈，西德在西欧的扩张，大大排挤了英国的势力。在西欧各国的进口总值中，西德的比重从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十一·三上升为一九六〇年(前三季度)的百分之二十四·四，同期英国的比重則从百分之二十下降为百分之十一·七。“共同市場”的存在和发展，对英国越来越不利。“共同市場”是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广大市場，对英国利害关系很大。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〇年，英国对“共同市場”出口的增长額，比对英联邦的出口增长額要快得多，西德市場对英国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增加。但是由于“共同市場”六国加速降低内部关税和调整对



外关税，结果将使英国商品进入这一市场的困难越来越多。例如，英国小汽车输入西德，在一九五八年以前，关税的税率是百分之十三，但在今年“共同市场”第一次调整统一对外关税后，税率就提高到百分之十六点九，以后还要逐步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九。而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小汽车输入西德，现在的税率是百分之十一点九，将来关税还要全部取消。“共同市场”国家的政治“合作”，特别是(西)德法轴心的形成，对英国利用德法矛盾玩弄欧洲“均势”，以保持英国在西欧领导地位的傳統政策，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为了同“共同市场”对抗，英国纠集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瑞士和葡萄牙，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组成了西欧七国的“小自由贸易区”。七国也达成了逐步取消内部关税的协定，这将使西德在这一地区同英国的竞争处于不利的地位。英国企图通过“小自由贸易区”来保持自己在西欧的地位，同时以此迫使“共同市场”特别是迫使西德作出某些有利于英国的让步。西德同英国的竞争，就这样发展成为西欧两个经济集团之间的斗争。

西德在西欧同英法争夺经济和政治霸权的同时，越来越积极地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扩张。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西德同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增长三倍以上，其中出口增长了五倍半，以出口信贷为主的资本输出，仅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便达到一百一十二亿马克以上。

拉丁美洲是西德战后最先进行扩张的地区之一，因为这一地区不仅是德国帝国主义的傳統市场，而且还是美帝国主义的“后

院”，西德垄断资本认为这里“风险”较少。早在一九五三年，西德就在这个市场上把英国排挤到后边，而占据了第二位。西德对拉丁美洲的出口，一九四八年还只有三百九十万美元，一九五九年增加到七亿三千九百五十万美元，一九六〇年头七个月就已达到四亿三千七百二十万美元。西德同二十个拉丁美洲国家都签订了贸易协定。一九五八年，西德对拉丁美洲的资本输出达到拉丁美洲全部外国资本的百分之十七左右。西德在这一地区扩张的重点是巴西。一九五九年西德对巴西的出口达一亿四千万美元，占巴西进口的百分之十以上。到一九六〇年九月为止，西德在巴西的私人直接投资达五亿三千一百四十万马克，是西德私人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西德许多康采恩在巴西设有子公司，其总数达二十七家之多。中东也是西德扩张的重点。西德对中东的出口一九四八年只有二百六十万美元，一九五九年已上升为四亿二千八百九十万美元。一九五八年中东非英镑区各国的进口总额中，西德的比重为百分之十三点七，超过了英法，仅次于美国（百分之十五点八）。而在阿联和伊朗的进口中，西德已经居于第一位。对于东南亚地区，西德在近年来才加紧进行扩张。在这一地区，西德的扩张重点是印度。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九年，西德对印度的出口增加了十四倍。西德在印度进口中的比重，已从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一点四上升为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十一点二，而同期英国的比重却没有变化。到一九六〇年底为止，西德给予印度的各种贷款和“援助”已达十三亿四千六百万马克，同英国（十四亿三千九百万马克）相差不多。



非洲是西德帝国主义久已垂涎的地区，但西德壟断資本的經濟势力滲入非洲，目前还是处在开始阶段。

西德帝国主义积极向不发达国家进行擴張，侵入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这就不能不加深它同英、法帝国主义的矛盾，同时也使西德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趋于表面化和尖锐化。西德在資本輸出方面近年来力图摆脱国际壟断組織的控制，自己单干一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西德联邦議院議長格斯登迈尔公开宣称，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具有外交政策的职能”，因此，“无论如何双边援助要优先于多边援助”。到一九五九年为止，西德資本輸出的主要途徑，是通过美国控制下的世界銀行、国际投資公司和国际貨幣基金等組織。西德不仅大量承担这些組織的基金份額，給予貸款，而且对不发达国家的信貸，也大多是通过它們进行的。但是，一方面由于西德經濟实力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新殖民主义的面貌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識破，为了更狡猾地欺騙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西德在繼續利用国际組織进行“多边援助”的同时，已經以更大的力量直接进行所謂“双边援助”。一九六〇年二月八日的西德《世界报》写道：“在非洲和亚洲，联邦共和国今天也許是西方最重要的国家。英国已經由于苏伊士、法国則由于阿尔及利亚而声名狼籍。美国虽然热心和具有善意，但行动却往往不很成功。（西）德国沒有殖民地，而联邦共和国是富有的。这是一个机会，同时也是一項要解决的任务。”一九六〇年下半年，西德政府和壟断集团筹集了五十亿馬克作为今明两年“援助”不发达国家的基金。美国要求在“共同的基

础”上管理这笔基金，企图控制西德的擴張，并利用西德的資金来替自己服务。但西德却决定只将其中的七亿五千万馬克交由国际机构运用，而四十二亿五千万馬克完全由西德自己支配。波恩政府外交部和經濟部等部門已为此組成联合委员会，总管其事。战后初期西德为了接受和經管“馬歇尔計劃”的“援助”而設立的复兴信貸局，現在則轉而具体掌握西德援助不发达国家的基金。

西德为了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搶夺銷售市場和投資場所，在向不发达国家擴張方面采取了一些狡詐的手法。

首先是标榜同不发达国家的所謂“伙伴关系”。德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丧失殆尽。战后西德帝国主义竭力宣傳自己是“非殖民主义国家”，标榜同不发达国家的关系是所謂“伙伴关系”，它甚至宣称贊成扫除英、法、比等帝国主义者的殖民統治，借此排挤它的竞争对手，欺騙不发达国家的人民。然而，欺騙宣傳并不能掩盖西德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实质。艾哈德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曾說：“德国（西德）企业必須越来越多地把出口轉为在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在新兴国家開設分支企业……許多新兴国家由于拥有巨大的人力后备，丰富的資源和有利的地理条件，替每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企业家提供了理想的前提。”<sup>①</sup>西德壟断資本在“伙伴关系”的幌子下，巧立种种名目向不发达国家进行資本輸出和商品傾銷，掠夺这些国家的財富，剝削这些国家的人民。西德同一些不发达国家所簽訂的“投資保护协定”和

① 西德《联邦政府新聞情报局公报》，1960年11月18日。



“免征双重税协定”，都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到今年五月为止，西德已先后同巴基斯坦、马来亚、伊朗、希腊和多哥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规定西德在这些国家开设的企业与当地企业享有同等权利，西德在当地企业中投资的股份不受限制，只有在等价赔偿的前提下才能没收西德的财产，而且必须经过法律手续审查等等。西德还同印度等十六个国家签订了“免征双重税协定”，使西德在这些国家的企业和资本享受税收上的优待。

其次是通过“技术合作”和“文化合作”扩大西德的影响。西德在伊朗、伊拉克、西班牙、希腊等国家设立了技术学校。在希腊、土耳其、约旦、泰国和利比里亚等十六个国家设立了“示范性”的工厂和农场。在许多国家设有各式各样的“技术諮詢处”，如在阿富汗有“水文服务处”，在苏丹有“植物保护处”。西德的“联邦地质调查局”更在七十多个不发达国家设有“服务处”、派有“勘测队”或专家，其任务是替西德垄断资本摸清资源情况。西德帮助印度钻探石油，条件便是“如果发现石油蕴藏，联邦共和国本身将参加开采。”<sup>①</sup>西德还在国外设有一百二十三所德文学校，并且与不发达国家大量交换留学生和实习生。此外，西德还准备仿效美国的作法，派遣所谓“和平队”前往不发达国家进行活动。

再次是放宽投资和贷款等方面的条件来排挤竞争对手。在给予不发达国家信贷方面，西德自恃拥有大量黄金外汇储备，不顾帝国主义国家一九三四年关于资本货物出口信贷不得超过五年、消费货物出口信贷不得超过半年的“伯尔尼协定”，而通过“债务延期”等

方式予不发达国家以五年以上的长期信贷。同时，政府对出口信贷的担保适用于一切出口部门。对于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帝国主义一般采取阻挠的态度，特别是不愿意这些国家的钢铁工业得到发展。西德也竭力鼓吹不发达国家应优先发展消费品工业，优先发展小型企业，但在某些情况下，对不发达国家发展重工业也提供一些“援助”，以便打入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美国向不发达国家投资往往以这些国家不实行国有化为前提，而西德则不坚持要求不进行国有化，只要求得到所谓合理补偿的保证。

西德帝国主义不仅在争夺西欧经济霸权和向不发达国家实行经济扩张，而且在同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争夺西欧政治上的霸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德的军事扩张活动也正在日益加强。西德现在已经成为西欧大陆兵力最强的国家。十二年来，阿登纳政府一贯追随美国制造“冷战”，要求恢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德国疆界，拒不承认波茨坦协定规定的奥得河和尼斯河边界，甚至狂妄地叫嚣要“收复东部失地”。西德帝国主义一方面正在加紧准备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同时，它又在准备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战争的借口之下，加紧向西欧进行军事扩张。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西德帝国主义已经构成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但是，今天的国际形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大不一样，美帝国主义扶植并勾结西德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一切阴谋必将失败，其结果将会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① 西德《每日镜报》，1959年7月5日。





# 红旗杂志一九六一年第一期到第十二期总目录

(题目后面括弧里前一数字是期数, 后一数字是页数)

##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

- 全体会议公报.....(3-4·1)  
 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关于各国  
 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3-4·4)  
 社论: 在总路线的伟大旗帜下前进.....(1·1)

## 学习毛泽东著作

- 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衔接  
 .....施东向 (1·29)  
 伟大的战略决战.....叶剑英 (2·9)  
 关于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许涤新 (3-4·38)  
 民主革命中的农民问题.....林一舟 (5·27)  
 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农民问题.....肖述 (6·28)  
 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  
 一个法宝.....李维汉 (11·1)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特点...李维汉 (12·5)

## 工作作风

- 社论: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一切  
 从实际出发.....(3-4·7)  
 社论: 坚持政治挂帅 抓紧具体措施... (6·1)  
 调查研究的态度.....关锋 (5·22)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  
 方法.....施东向 (9-10·1)  
 十年前学术界的一次调查研究  
 工作.....本刊评论员 (12·1)  
 “做笨事”.....闻师润 (12·33)

- 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施东向 (2·1)  
 整风推动了生产.....顾建鹏 李兰桂 (7·12)  
 心目中时时刻刻要有群众.....凌南标 (7·16)  
 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肖述 (8·4)  
 有事同群众商量.....林一舟 (8·10)

## 工业

- 争取我国工业生产建设的新  
 胜利.....薄一波 (3-4·19)  
 加速发展化学肥料和农药的  
 生产.....李超伯 (9-10·48)  
 京西煤矿生产持续跃进的經驗  
 .....王政 (3-4·51)  
 大抓原料材料, 增产更多更好的  
 轻工业品.....宋孟邻 (2·21)  
 解决轻工业原料供应问题的途径  
 .....孔祥麟 (6·9)  
 努力提高轻工业产品质量, 满足  
 人民需要.....陈克奇 (8·29)  
 人民公社工业的创建、巩固和  
 发展.....李成瑞 左春台 (8·20)  
 一个从铁业生产合作社发展  
 起来的农具修造厂.....陶石 (3-4·33)  
 发展修理服务业是组织人民经济  
 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陈扬 (3-4·47)



## 农 业

领导农业生产的几点經驗……王任重 (1·17)  
 鼓足干劲, 力争丰收……廖鲁言 (3-4·26)  
 加强国营农场的建設……王震 (7·1)

粮猪并举, 互相促进……本刊評論員 (8·1)  
 江洲人民公社大办粮食的胜利  
 ……………刘光辉 梅国宝 (2·27)

一个人民公社大办粮食的經驗  
 ……………中共醴县委员会調查組 (7·8)

东日生产大队公养私养并举,  
 发展养猪业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农村調查組  
 中共新会县委员会 (8·14)

一个实行粮食生产和畜牧业  
 并举的生产大队……赵明 曾源 (3·17)  
 充分利用肥源, 增积有机肥料  
 ……………土丰 (9-10·53)

进一步加强生产队的建設……林一舟 (2·5)  
 做支援农业的尖兵……張維城 (6·24)  
 为农业服务是气象工作的首要  
 任务……饒兴 (7·19)  
 查明地下水資源 支援农业  
 生产……何长工 (9-10·42)

## 劳 动

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劳动力  
 問題……馬文瑞 (5·6)

## 文教·科学

社論: 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爭鳴的方針…… (5·1)

关于百家爭鳴的一个問題……黎庶之 (11·23)  
 《不怕鬼的故事》序……何其芳 (3-4·13)  
 文化遗产的学习和批判問題……吴江 (6·18)  
 对目前音乐創作中几个問題的  
 理解……吕驥 (12·27)

在胜利发展中的內蒙古文化教育  
 事业……胡昭衡 (1·22)

論形式邏輯的对象和作用……王忍之 (7·28)  
 再談机床內部矛盾运动的規律和  
 机床的“积木化”問題  
 ……………侯鎮水 鄭明  
 关士續 陆紀培 (9-10·18)

实验、抽象和假說在科学研究中  
 的作用……何祚麻 (11·12)  
 关于中国近代經濟史中一个材料  
 的調查……謝商 (11·27)

## 国 际

紀念巴黎公社……施东向 (6·5)  
 世界人民斗爭的新形势……于兆力 (1·6)  
 阿尔巴尼亚人民胜利的斗爭……罗士高 (5·17)  
 古巴人民抗美爱国斗爭胜利的  
 偉大意义……于兆力 (9-10·11)

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  
 政策的經濟根源……严耀群 (2·34)  
 西德壟断資本和它的向外扩张……严希 (12·35)  
 笑里藏刀的“亲善”……郭济洲 (7·24)

走在資本主义道路上的南斯拉夫  
 农业……廖原 (8·35)  
 南斯拉夫“企业自治”的真相……廖原 (11·31)



# 红旗

HONGQI

13



一九六一年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一年第十三期 ★

## 目 录

###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刘少奇 (1)

社论: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14)

###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要求.....范若愚 (19)

谈胸中有“数”.....闻仲润 夏金 (25)

认识规律, 运用规律.....卢之超 (30)

稻田水旱轮栽和“以田养田”.....丁颖 (37)

肯尼迪的二三事.....黄钢 (45)



#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

刘 少 奇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英勇斗争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四十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四十年。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人民曾经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长期的、前仆后继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但是，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直到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中国人民才找到解放自己的最好的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运用这个武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提出了正确的斗争目标、方针和方法。从此，中国人民的节节胜利就成为不可抵抗的了。

在四十年中间，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一起，做了许多事情。概括起来说，主要是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在中国进行人民民主革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本身的软弱性，不可能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达到胜利。这个革命的领导责任，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承担。有许多人，在很长时期内，企图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制度，但是，最后都破产了。在中国要建立的共和国，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党团结了全国人民，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一共用了二十八年的时间，终于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





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件事，是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十二年，现在正在继续做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十二年来，我们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则需要经历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但是，谁都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建立起来了，中国已经不再是停滞不前的国家，而是正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的国家了。

在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民主革命得到了彻底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第一步的胜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大事。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多次预言，中国革命和亚洲各国革命，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发生深远的影响。这个预言，开始成为现实。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有利于全世界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因此，它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和爱好和平人民的欢迎，也受到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仇视。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过去和现在都恶毒地诅咒我们，将来还要继续诅咒我们，这是必然的，不足为奇。但是，这对我们丝毫也不会有所损害。

四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它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忠贞不渝的。它对于国内国外的敌人是不屈不挠的。它已经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且将要领导中国人民继续取得更大的胜利。

当我们回顾四十年历史的时候，我们对于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解放事



业而牺牲的光荣的先烈們，表示崇高的敬意。他們之中，許多是共產黨員，許多是劳动人民，許多是党外人士。他們在斗争中，流尽了自己的鮮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們是永垂不朽的！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結合的历史。毛澤东同志說：“我国的革命和建設的胜利，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們党的一貫的思想原則。”

在我們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站在我們最前头的，最善于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就是我們党的領袖毛澤东同志。

毛澤东同志面临中国革命的极端复杂的情况，正确地提出了和解决了一系列的理論和策略的問題，使中国革命能够繞过一个一个的暗礁，夺取一个一个的陣地。

毛澤东同志，从对中国社会階級的具体分析出发，提出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规划。他指出，中国革命必須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人民民主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民主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他們是很强大的。但是，中国人民中蘊藏的革命力量則是更强大的。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絕大多数。中国工人階級同广大的农民建立了强固的工农联盟，并且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团結了各民族、各革命階层的人民群众，就能够战胜这个强大的敌人。毛澤东同志正确地解决了农民运动、武装斗争、統一战綫和党的建設等問題，这些都是我国民主革命中最根本的問題。

在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八年的长时期中，絕大部分時間，我們党的領導是正确的。但是，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右倾和“左”倾的錯誤。其中，以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錯誤，和一九三一到一九三四年以王明同志为首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錯誤，最为严重。这些錯誤，都違反了毛澤东同志所提出的正



确主張，使党和人民革命事业遭到損失。我們党在斗争中所积累的許多正面和反面的經驗，教育了全党，提高了同志們的觉悟。党在毛澤东同志领导下，克服了右傾和“左”傾的錯誤。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會議，确立了毛澤东同志在全党的領導。从此以后，我們的革命事业就順利得多了。

一九四二年在我們党内开始的整風运动，經過三年多的時間，使全党干部得到一次最深刻的教育，更多地学会了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党的总路綫和各项具体政策，真正为全党絕大多数干部所理解。联系群众、調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風，成为全党統一的作風。因此，在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全党在毛澤东思想旗帜下，达到了空前一致的团結。这样，就保证了我們党能够正确地領導全国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結束以后，又胜利地进行了偉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使人民民主革命迅速地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当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时候，毛澤东同志发表了《論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論文。这篇論文，說明了自从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以后，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篇論文，总结了我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經驗。同时，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指出了从民主革命轉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們又在全国的新解放区内进行了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同时还进行了鎮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的偉大斗争，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进一步地扫清了道路。

在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所制訂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指导下，可以說，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比較迅速，比較順利。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們运用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工农联盟的理論和农业合作化的理論，总结了我国革命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經驗，并且按照解放后的我国具体条件，依靠貧农和下中农，巩固地团結其他中农，通过各



种过渡形式，使我国农业由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

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运用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的思想，运用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思想，总结了我在革命根据地中关于工商业政策的经验，并且按照解放后的我国具体条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相结合的政策，通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实现这种改造。

在执行上述这些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党中央及时地克服了某些右的和“左”的偏向。同时，在运动中不断地总结经验，规定了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所必要的一整套具体政策。于是，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在农业还没有机械化的情况下，五亿多农民就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由此而促进了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特别是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还将长期进行。一九五七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今后我们应该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指示，严格划清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根本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界线，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去继续解决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两类不同的矛盾。除开对于敌人应该采取专政的方法以外，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应该坚决执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成就。

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中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吸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在我们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的



基础上，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这条总路线的根本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可能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实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地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使我国能够比较迅速地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为先进的国家。

我国现在还处在经济落后的地位。帝国主义还在欺负我们。我国人民迫切要求摆脱落后的地位。毫无疑问，我们党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符合我国全体人民的愿望的。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从一九五八年<sup>○</sup>以来，我国实现了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同时，在我国农村中，出现了由农业合作社联合组成的人民公社。这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成为引导中国人民前进的三面红旗。

在大跃进的三年中，工业方面，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建立了相当大的现代化的工业基础，使基本工业的生产设备能力有了成倍的增长。农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为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文化教育事业，在这三年来，也有很大的发展。

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建设各个战线上，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民群众在大跃进运动中，发挥了创造新生活、新历史的伟大力量。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

我们的总路线，是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备起来的，为实现总路线所必要的各项具体政策和具体办法，也是要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完备起来的。在三年大跃进中，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具体办法都有了发展。同时，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再加上连续两年的大灾荒，就造成了一些暂时





的困难。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经济和文化都落后的大国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件新的事业，不遇到困难，不发生缺点，是不可想像的。历史经验证明，任何困难和缺点，不仅不能吓倒我们，相反地，我们总是在发扬成绩、克服各种困难和缺点的过程中，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正确的。我们完全相信，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全党全民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克服暂时困难，继续胜利前进。

中国共产党四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都是和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我们一切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从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斗争过程中锻炼出来的，是经过各种考验的，因而是最巩固的团结。

我们的一切成就，应该归功于全国各族的人民群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向各个战线上正在进行英勇斗争和辛勤劳动的工人、农民、工程技术人员、教员、教授、科学家、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卫生工作者和其他劳动人民表示敬意！我们向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爱国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海外侨胞们表示敬意！我们向保卫祖国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表示敬意！我们向在各个斗争岗位上勤恳工作的全体干部和党员表示敬意！

工人阶级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领导力量。我国工人将继续发挥他们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先锋作用。工人阶级要继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更好地担负起领导阶级的责任，在实际行动中表现自己是最能为全体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阶级。

工农联盟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基础。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只有充分调动五亿多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全面地发展各项农业生产，才能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前提。我们必须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根本方针。工业



和其他有關部門都必須全力支援農業，尽可能地多生產農業生產資料，保證農業發展的需要。各級黨委和各級人民政府，都必須認真、徹底、全部地執行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的一系列的政策和辦法，健全和鞏固以生產大隊所有制為基礎的人民公社，發揮人民公社制度對於促進農業生產發展的優越性。

知識分子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我國知識分子的隊伍不斷地擴大了，他們在思想上的自我改造中有了很大的進步。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各個戰線上，作出了寶貴的貢獻。我們要繼續擴大知識分子的隊伍，繼續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使我國社會主義的科學文化事業更加繁榮起來。

我國人民的大團結，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包括兩個聯盟，一個是工人階級同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的聯盟，另一個是勞動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勞動人民的聯盟。我們應該繼續執行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在經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在政治、思想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中也有了新的進步。應該幫助他們，繼續進行根本改造，使他們成為自覺的社會主義勞動者。

中國共產黨是團結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說：“雖然我們有一千多萬黨員，但是在全國人口中仍然只占極少數。在我們的各個國家機關和各項社會事業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黨外的人員來作。如果我們不善于依靠人民群眾，不善于同黨外的人員合作，那就無法把工作做好。”

為着把全國人民大團結的工作做好，為着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好，我們全體黨員必須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進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健全黨的組織，加強黨的團結。

我們黨現在有一千七百多萬黨員。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



后入党的，百分之七十是一九五三年以后入党的，这是党的新的血液，但是他们缺少经验，许多人还没有受到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在解放以前入党的党员，经历过流血的革命斗争，现在是我们党的骨干，他们对于革命是熟悉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还是经验不多的。因而，不论新党员，或者老党员，都有一项严重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系统地学习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同志说，“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在全党展开一个新的学习运动，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学习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帮助全党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以便多快好省地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全体党员干部，都应该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学习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所阐明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学习党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于大量的新党员，还必须给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教育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

全党干部都应该通过这个学习运动，自觉地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发扬我们党的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这就是必须像毛泽东同志一贯所说的那样，要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的环境作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从客观的实际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出来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要使中国革命得到胜利，就一定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说：“共产党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从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的。因为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有正确的阶级势力的估量，才能产生出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才能保障革命的胜利。为了这个，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这种作风，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并不是所有干部都具有这种作风的，更不是一开始就具



有这种作风的。在我国革命的各个时期中，我们党内产生的脱离实际的右倾错误或者“左”倾错误，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忽视对客观实际的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以为凭主观想像、凭一时的感想、或者仅仅摘引某些书本上的个别语句就能指导中国革命。大家知道，这些错误倾向，曾经使中国革命遭受各种挫折。我们的同志必须记住这种教训，在工作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防止和克服各种主观主义的作风。

我们党是善于学习的。对于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经验的，经过在实践中努力学习，我们认识和掌握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力戒自满。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地告诉我们戒骄戒躁。他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他说，“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我们知道，满足于—知半解，自以为懂得很多而懒于学习，就是对人民革命事业缺少责任心的表现。这种错误态度是我们坚决反对的。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学会的。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只要我们努力，我们一定能够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我们的党，不只是同中国人民共命运、同呼吸，而且从来认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全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的一个部分，是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部分。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一贯地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紧紧地同全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

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得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和各国进步势力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中国人民也用自己的努力和斗争，来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进步的、正义的事业。这种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国际主义的团结，对于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兄弟党，向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向斗争中的各国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基本方针是：发展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項原則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我国所实行的对外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它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我国已经同四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同遍布全世界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的、文化的、友好的联系。我国建设的成就，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烈赞扬。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美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孤立我国的阴谋，已经被粉碎了。

坚决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至今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在我国附近的许多地方继续保持着军事基地，配备着庞大的军事力量，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严重地威胁东方和世界和平。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正义完全在我们这边，全世界人民同情和支持我们。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战争威胁，是一定要失败的。我国人民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的目的，是一定要实现的。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帝国主义制度固有的各种矛盾愈益深刻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帝国主义统治的地区已经大大缩小。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堤防，不断地遭到人民革命洪流的冲击。帝国主义各国之间，首先是美国同英、法之间，争吵和倾轧正在加剧。帝国主义的处境很不妙，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美帝国主义尽做坏事，充分表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它的所作所为，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至今顽固地坚持扩军备战政策，到处侵犯别国的



主权，并且积极扶植西德和日本軍国主义，在西方和东方正在形成两个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在亚洲的老挝和南越，在非洲的刚果，在拉丁美洲的古巴，都出现了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战争势力，挑起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險，仍然威胁着世界各国人民。美国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极力推行反革命的“两手”政策，一面狡猾地使用“和平”手段，一面加紧推行战争政策。斗争中的各国人民懂得，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具有危险性。但是，不论美帝国主义玩弄什么手段，都不能阻止世界人民的觉悟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决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意願，把已经解放的人民的手足重新捆绑起来。他们任意横行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显。社会主义、民族解放、民主和世界和平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

莫斯科会议声明說：“这几年的主要总结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和它的国际影响的急剧增长；殖民主义体系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下迅速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阶级搏斗日益加剧；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更加衰落和腐朽。在世界舞台上，社会主义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和平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战争力量。”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下的这种伟大团结，是全世界人民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建设事业，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苏联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的成功，极大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各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作了不懈的努力。它们所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世界范围内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普遍裁军、停止核试验和締结对德和约等和平倡议，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广泛支持。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日益深入和广泛地开展着反对帝国主义及





其走狗的革命斗争。在亚洲，老挝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和侵略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日本人民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追随它的日本反动派，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中立，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斗争。在非洲，一系列国家获得了独立；阿尔及利亚人民不屈地坚持着民族解放斗争；刚果、安哥拉和其他非洲国家的人民，正在继续为反对新老殖民主义者而斗争。在拉丁美洲，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正在发展着，古巴人民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雇佣军以后，继续胜利地巩固和发展着自己的革命事业。

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加入了反对垄断资本压迫、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和维护民主权利的斗争行列。

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是全世界人民最迫切的要求。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已经成为当代最强大、最广泛的群众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全世界人民日益团结，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力量为核心、包括民族解放力量、民主力量和和平力量的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只要全世界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取得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新胜利。

国际经验和中国经验，都在不断地证明着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人民的力量，是创造人类历史的真正伟大的力量。归根到底，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在有了正确领导的、团结一致的人民力量的面前，任何困难都一定会被克服，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挡我们胜利前进。

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 社論



## 发揚党的优良傳統

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到今天，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光荣的伟大的四十年。在这四十年当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英勇奋斗，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并且卓有成效地进行了規模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設工作。

中国民主革命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进行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資产階級对中国人民实行的极端野蛮的反动統治，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无比深重的灾难。中国資产階級政党虽然曾經领导过中国的民主革命，但是它們沒有也不可能提出彻底的民主革命綱領，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以后，中国革命出現了一个新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克服了右傾和“左”傾机会主义的錯誤，正确地規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綱領、政策和策略，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我們党在民主革命中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并在此基础上同一切民主力量建立了广泛的統一战綫，經過长期地领导农民进行武裝斗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圍城市，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統治，在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中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继偉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国际上出現的重大事件。

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我們党又领导中国人民不停頓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階級专政。我們沒收了官僚資本为国家所有，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經濟。我們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問題上，紧跟着土地改革以后，迅速地、逐步地經過互助組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使农民的个体經濟轉变成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經濟。我們又通过国家資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使民族資产階級的工商业轉变成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这就在我国消灭了資本主义制度及其产生的根



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又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一九五七年我们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贯彻执行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并且在农村中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在这三年中，工业生产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工业生产水平大大提高，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大大加强。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生产的主要指标。在农业方面，三年来人民公社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农田水利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在广泛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所有这些，不仅减轻了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连续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而且为今后农业的增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同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特别是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分不开的。中国人民的胜利，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促进了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成熟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党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培养和发展了自己的优良作风，在一切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坚决执行群众路线，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虚心向群众学习。过去，我们坚持和发扬了这样的作风，保证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当前，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党党员和干部应该继续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的作风，来为实现这个艰巨的任务而奋斗。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根本作风。毛泽东同志指出：“‘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党从来认为，必须用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研究中国的实际問題，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我們党在各个时期所执行的正确的路綫、政策和方法，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产物。

在民主革命的二十八年中，我們党从沒有經驗变为有了一些經驗，以至有了丰富的經驗，这个过程也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結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同志犯了教条主义的錯誤，有的同志犯了經驗主义的錯誤。教条主义者和經驗主义者从两个不同方面違反了理論和实践相結合的原則，違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則。他們的思想和工作都不是从客观情况出发，而是从主观願望和主观想像出发，所以他們必然在工作中碰壁。毛澤东同志說：“这种反科学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純的一种表现。”通过反对右傾錯誤和“左”傾錯誤的斗争，特别是經過了一九四二年的整風运动以后，全党多数干部深切地懂得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性，懂得了必須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方法，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我們的行动才能有正确的向导。这样，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結合的問題，就在全党範圍內得到了解决。

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結合起来，認識和掌握各方面工作中的客观規律，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快要开始的时候，毛澤东同志就說，許多我們所不熟悉的事情正在強迫我們去做，許多我們所不懂得的东西正在要求我們去学会。十二年来，我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作風，运用理論和实践相結合的方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已經学到了很多東西，取得了許多經驗，因而制定出符合于实际需要的路綫和政策，使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設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績。在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中建設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的事业，它包括各方面的复杂工作，我們的經驗还不足。要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实践完滿地結合起来，从而更完全地、更深刻地認識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設工作中的客观規律，仍然是摆在我們面前的一项严重任务。这就要求我們必須繼續发揚实事求是的作風，虛心地、認真地了解客观情况，不断地研究和总结工作經驗。我們党的正确的路綫和政策都是严格地依据事物的客观規律而制定的。我們必須从实际出发，研究不同地区、



不同时间、不同条件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执行党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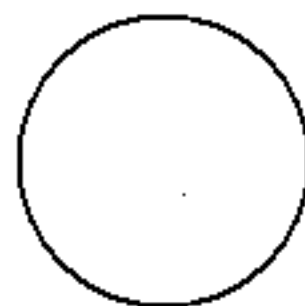
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我们必须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地学习毛泽东著作，认真地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对于每一个重大事情，都要深入群众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只有经常地进行这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才会有一切工作的胜利。

坚持实事求是，进行调查研究，离不开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在任何时期都是党的一条根本路线。我们在革命中的一切胜利，没有群众路线是不可能取得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样需要坚持执行群众路线，紧紧依靠群众的力量，集中群众的智慧。在过去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在大跃进的三年中，都显著地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人民大众的利益。我们党员和干部越是认真地为群众谋福利，群众就越能深刻地认识到党和国家的事业就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干部，不论有过多大功劳，不论担任什么工作职务，都必须以平等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和群众同甘共苦，密切关心群众的利益，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要关心群众的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时必须重视群众的个人利益和当前利益。我们党员和干部必须每时每刻了解群众的要求是什么，群众心里想的是什么，使我们的一切工作符合于群众的要求，符合于群众的觉悟水平。

人民群众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才能解放自己，人民群众的事情一定要由人民群众自己作主，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个原则同资产阶级的恩赐观点是根本对立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从群众的觉悟水平出发，从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出发，依靠群众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收到好的效果。领导者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意见，有事同群众商量，这样就能正确地指导群众运动。群众的事情，要由群众自己下决心，出主意，干部不应当包办代替，不应当采取恩赐观点。领导者应当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并且帮助群众通过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经验而获得正确的认识，正确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都要求我们具有谦虚谨慎的态度，努力学习，反对骄傲



自滿，自以为是。毛澤东同志說：“必須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毛澤东同志还經常告訴我們，自己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就要虛心学习，就要向群众請教，切不可強不知以为知。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繼續做学生，才能繼續做先生。我們黨員和干部，愈是謙虛謹慎，同群众的联系就愈加密切，学到的东西就愈多，进步就愈快，工作上的成績就愈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在全国处于执政地位，我們的各項事业都有了很大的进展，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我們的成績无疑是巨大的，但是我們永远不能滿足于已經取得的成績，否則就不能繼續前进。群众对党是衷心拥护和热爱的，这首先是由于我們党能够很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是由于我們黨員和干部甘心做人民群众的勤务員，而且能够恭恭敬敬地做群众的小学生。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新的为我们所不熟悉的事情会不断地提到日程上来。我們一定要繼續保持和发揚謙虛謹慎的态度，戒驕戒躁，虛心向群众学习，經常进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接受群众的監督，把工作做得更好。

四十年来，我們取得的胜利是偉大的。当前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是很好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和各項方針、政策在實踐中証明是正确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設的积极性是高漲的，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是團結一致的，全党干部在社会主义建設的實踐中积累了許多經驗，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有了相当的提高。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民主的力量，和平的力量，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东風压倒了西風。回顧过去，成績輝煌，使我們兴奋鼓舞；展望未来，前途无限光明，使我們信心百倍。我們全体黨員和干部應該更好地发揚党的优良傳統作風，更好地貫徹执行党的路綫和政策，更好地联系群众，組織群众，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各級党組織，应当把教育和提高干部作为当前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务。在党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下，广大干部經過刻苦努力，虛心学习，就一定能够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

讓我們全党在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團結全国人民，高举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满怀信心地繼續前进，从胜利走向更加偉大的胜利。





# 理論和实践相結合

## 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要求

范若愚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澤东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学习》的著名报告中，提出了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問題。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問題，是共产党人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問題。

毛澤东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結合的历史；同时指出党内在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方面，还存在着不注重研究中国现状、不注重研究中国历史、不注重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应用等等极坏的作风。必須克服这些极坏的作风，把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加以改造，才能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地結合起来。

早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中，毛澤东同志就一再強調，馬克思列宁主义必須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結合。他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說来，就是要学会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sup>①</sup>在《改造我們的学习》

一文中，毛澤东同志又着重地提出了这个問題。在毛澤东同志的号召下，經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党内整風运动以后，全党深刻地認識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危害性，进一步采用理論联系实际的方法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注重了調查研究工作，注重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历史已經证明，全党干部坚持了毛澤东同志提倡的这种好的作风，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偉大胜利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經驗的概括。只有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才能找到彻底摆脱奴役的出路。人們从一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不論在經濟先进的国家，还是在經濟落后的国家，不論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如果没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是不可能取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頁。



得胜利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取得的。毛澤东同志說：“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則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①

在毛澤东同志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努力的就是，使自己能够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善于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則，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設的各种問題。

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原則，乃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根本要求。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創始人三番五次地指出，他們的学說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們要求各国共产党人要善于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具体地、創造性地运用他們的理論原則。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必須通过一定民族的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偉大的作用。

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在經濟、政治、文化、历史傳統和風俗习惯等方面都不相同，无产阶级在各个国家的具体任务，以及实现这

些任务的方法，也就不能不有很大的差别。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是进行直接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却首先要领导人民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还有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则要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如此等等。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环境、斗争任务和斗争形式的区别，决定了他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中，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列宁說得很对：“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②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正是要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从实际情况出发，认真地对各国的具体特点做出具体分析。共产党人如果离开一定国家的特点来談馬克思列宁主义，这只能把馬克思主义变为抽象的、空洞的教条。离开一定国家的特点来生硬地套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是絕不能够取得革命胜利的。真理是具体的，只有善于具体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問題

①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5頁。

② 《論对馬克思主义的諷刺和‘帝国主义經濟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4—65頁。



时，馬克思主义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圍之內，此外，如果談到某一国家（例如，談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綱領），那就要估計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sup>①</sup>

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死板的公式，它給无产阶级提供了进行革命斗争的一般指导原理，提供了能够科学地認識客观现实的立場、观点和方法。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但要善于运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要善于运用他們观察問題和解决問題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机械地抄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結論，这是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不取的。这样作不但会損害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而且会破坏生气勃勃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本身。列宁指出，馬克思主义者應該从馬克思的理論中，利用已經創造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来具体研究和把握本国的社会关系及其演进情形。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不論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是适用的。运用这种立場、观点和方法独立地分析本国的具体实际，从中引出固有的客观規律性，指导自己的活动，这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列宁曾經对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說过：“我們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來說，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討馬克思的理論，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部分地說，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

国。”<sup>②</sup> 列宁还对东方的共产主义者說过：“你們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沒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須根据欧洲各国所沒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論和共产主义措施，必須看到农民是主要的群众，要反对的不是資本而是中世紀殘余，要根据这种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論和共产主义措施。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別崇高的任务”<sup>③</sup>。

各国无产阶级的最終目的、最高綱領、策略原則是相同的，但是，这种統一性并不否定各国共产党在制定具体斗争策略时的多样性。列宁指出：“只要各个民族之間、各个国家之間的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以后，也还要保留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統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取消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則（苏維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运用到各民族、各民族国家的不同情况时，在細节上把这些原則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适用于这种情况。当每个国家采取具体的途徑来解决統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內部的机会主义与左傾教条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

① 《論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1頁。

② 《我們的綱領》。《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7—188頁。

③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組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8頁。



維埃共和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时候，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測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性，这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sup>①</sup>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各国共产党組織群众进行斗争的武器。馬克思主义者应该努力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定国家具体化，应该按照民族特点去应用它。馬克思主义者愈是善于这样做，就愈能使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地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就愈能发挥它的教育、組織和改造的作用。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同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对立的。对于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都作了正确的说明。修正主义者借口民族特点，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閹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否认实行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必要性，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否认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则。这是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教条主义者只知道背誦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的若干詞句，机械地搬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个别原理和現成結論，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生动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死板的公式。我們也必须坚决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

理是无产階級斗争經驗的科学总结，是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轉移的一般規律。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就能够从总的方面判明无产階級斗争的局势，了解周圍事变的內在联系，預察事变的进程。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解决本国革命的具体問題，是最好地在本国实现馬克思列宁主义。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不同的国家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来解决本国革命的具体問題，就会經過自己的革命实践总结出自己的新經驗。这样做就能够保证統一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在不同的国家里以不完全相同的形式实现。这样做不仅不会損害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可以用自己国家的經驗来丰富和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个逐步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認識本国具体特点的过程，也是一个反对右傾机会主义或者“左”傾机会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或者經驗主义的斗争过程。在我們党的历史上，正如毛澤东同志所指出的，在党的幼年时期，革命虽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由于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也发生了錯誤，在革命历史的紧要关

<sup>①</sup>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3—74頁。



头党内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他们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党一党的私利，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完全没有警惕，因而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到了革命的第二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领导群众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然而，这时也有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特别是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最为严重。犯这些错误的同志不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不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历史状况、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不根据这些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曾经又一次地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教育了全党，教育了干部，使全党干部认识了毛泽东同志从第一次大革命以来所主张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使全党干部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获得了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了解。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就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

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只要我们继续努力，进一步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就一定能够继续取得新的胜利。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本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本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具体地研究本国的现状和本国的历史，从中求出本国革命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导师们在运用自己的理论分析一定国家的一定问题的时候，总是要大量占有关于这个国家的这一问题的现状的、历史的材料。恩格斯在评价《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一书的时候说过，“马克思把图画描绘得如此巧妙，使得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一些新的证据来证明这幅图画曾是把现实反映的极为真确的。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了解的如此卓越，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把事变的意义洞察的如此明白，这真是无可伦比的。”<sup>①</sup>马克思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恩格斯接着指出，这就是因为马克思平日“不只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详细考察了法国当时的历史，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所以，事变是从来也没有使他张皇失措的。”<sup>②</sup>《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是经过对于法国的历史、现状进行了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4年版，第22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22页。





调查研究写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导师们论述其他问题的著作，也都是经过调查研究写出来的。如果他们还没有对某一国家的某一问题进行过调查研究，他们宁可暂时不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恩格斯在《给豪威克的信》中说：“至于俄国革命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农民对革命运动可能有什么贡献等等，在我还没有把整个问题事先再加以研究，还没有用最新的材料来充实我对事实真相的极不完备的了解以前，我不能问心无愧地对这些问题提出可以公开发表的意见。”①在《给阿塔贝库茨的信》中又说过：“不管我怎样感谢你向我有趣地描述了阿尔明尼亚的状况，但是要对那些不是由于亲自调查研究而知道的事情作出判断，我仍然不能认为这是

正确的和公正的。”②列宁在批评考茨基的时候说过：“让卡·考茨基那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关于我党的分裂单听一面之词就用痛切的言词去搪塞吧。他们不了解真相还是情有可原的，——虽然，硬要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妄加议论当然是不可原谅的。”③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运用自己的理论解决一定国家的某一实际问题的这种严格科学态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① 《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5—3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俄文第1版，第341页。

③ 《色房内菲》。《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5页。



延安枣园——毛主席故居（木刻）

修 军





# 談胸中有“数”

聞師潤 夏金

运用数量和质量統一的規律，来研究事物及其变化，是毛澤东同志领导我国革命斗争的一种工作方法。关于这种工作方法，毛澤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作了概括，并用我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个成語来表述，叫它做“胸中有‘数’”。他說：“胸中有‘数’。这是說，对情况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沒有数量也就沒有质量。”<sup>①</sup>

为什么必須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作基本的数量分析？这是因为，要做好任何一件工作，都需要系統地深刻地掌握和研究事物的全部情况；而从数量上把握事物及其变化，是深入地具体地認識和掌握情况所必需的。

按照客观事物自己的特点，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它的数量方面和质量方面，并且二者之間表现为一种辯证的关系。沒有一定的质量的数量是不存在的，同样，沒有一定数量的质量也是不存在的。要真正認識一个事物，必須从质与量的統一上来把握，忽略质量方面，固然不可以，不注意数量方面，也不能对事物有完整的認識。事物的数量方面，如位置、大小、多少、程度、运动速度等，反映着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具体状态。因此，只有对于事物的这些数量方面有一个切实的了

解，我們对于事物的認識才是詳細的而不是粗略的，是具体的而不是籠統的，是精确的而不是馬虎的。而为了在實踐中改造事物，首先便需要对事物具有精确的具体的認識。

在工作中，对于情况和問題的数量方面掌握得愈精确，提出的任务和制定的政策就愈为符合实际和愈有实现的可能性。在《毛澤东选集》第四卷中，我們看到，毛澤东同志为了具体把握敌人軍事力量的情况，在了解研究敌军质量的同时，对于数量方面的情况也給予了极大的注意。在他的指导軍事斗争的文章里，都用許多篇幅，詳細地列举了有关敌人兵力的各种統計数字。不但有对敌人正規軍的統計，也有关于地方杂牌軍的統計；不但注意总兵力的統計，也注意敌人兵力的分布；既統計一定时期敌人在第一綫和后方的兵力，又对第一綫的兵力多少用于守备和多少用于机动作了調查，以至于在一定的部署下，各地区敌人的数量和距离，由一地到另一地增援需要多少時間等等，都作了詳細而精确的調查和研究。正因为这样，所以对于敌人的軍事力量，便真正做到了了如指掌。显然，毛澤东同志在指导軍事斗争中的英明預見，以及他总是能及时地識破敌人的軍事

<sup>①</sup> 《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3頁。



阴谋，善于巧妙地制定歼敌的策略，是和他对敌人的军事力量从质量方面又从数量方面的详细把握分不开的。为了制定正确的土地改革的政策，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农村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对农村封建剥削的程度，以及各阶级和各阶层对土地改革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等等，都有一个明确的数量方面的统计和分析。在民主革命总路线的指导下，毛泽东同志依据这些统计和分析，正确地制定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方针。由此可见，要具体地认识和掌握对象，就需要在注意质量方面的同时，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注意对事物作数量的分析，而具体地认识和把握对象，是做好任何一件工作的基本条件。

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每一方面的数字对于了解这一事物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一个特定的事物来说，都有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数量是基本的、带关键性的、能表现事物本质的，而其余一些数量可能只有辅助的补充的意义。要真正地把握事物，便需要从许多数字中进行分析研究，找出这种基本的数字。这就是，要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和主要的百分比。

在军事斗争中，决定每个时期、每个阶段军事形势的，是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状况，包括地区大小、人口多少、人心向背、经济力量的强弱、武装力量的大小等等对比的情况。要争取军事斗争的胜利，必须全面地研

究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尤其要着重研究敌我双方武装力量的对比。掌握了这个基本情况，就能更好地把握住斗争的发展，找出斗争的规律，从而解决战略和策略上一系列的问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每个阶段的军事斗争任务以及战略和策略方针，都是以敌我力量对比的基本估计为依据的。毛泽东同志一贯地指出，人心向背、战争的性质，是战争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解放战争初期，他又指出，蒋介石战争的卖国的、非正义的、反人民的性质，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因此，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但是由于解放战争初期，敌军有四百三十万人，我军只有一百二十万人，我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因此，毛泽东同志又指出，要打败蒋介石，我们的作战方针必须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经过了一年作战，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敌我军事形势开始转变以后，毛泽东同志根据新的力量对比，提出了举行全国性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的方针。战争的第三年，由于敌军从战争初期的四百三十万人减至二百九十万人左右，我军由一百二十万人增至三百余万人，转变了我军在数量上长期居于劣势的状况，而蒋介石反动派发动反人民内战的政策，业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以致陷入不能维持的境地，大群大群的人民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革命的力量迅速增长，全



国人民的团结空前发展。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力量对比的情况，指出这是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这是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并进而提出了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作战方针。正由于毛泽东同志不仅紧紧掌握了敌我斗争发展的规律，而且在每个阶段，都从数量方面去研究敌我军事力量消长的情况，因而也就能够正确地指导每个阶段的军事斗争，使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在经济问题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如何把握住带有关键性的、起决定作用的基本的数量估计，正确地规定革命的任务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党的经济政策的论述，就是从对中国的经济情况的基本的数量估计出发的。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sup>①</sup>。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们党关于实现国家工业化、加强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作用，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并对它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通过集体化和机械化的道路，逐步改造农业和手工业等等一系列的任务和政策问题。毛泽东同志反复地论证了这个基本情况，要同志们记住中国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个基

本数字，并十分强调地指出，谁要是忽视了这个基本情况，谁就要在工作中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说明了，掌握基本的数量统计，对于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制定正确的政策，是极为重要的。

从数量方面把握情况，还必须找出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毛泽东同志在从数量方面把握情况的时候，总是将各种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和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统一起来考虑的。对于情况和问题的数量方面作了统计和研究，也找出了带有关键性的基本统计、主要百分比，但是，如果不去找或找不出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那么我们对这个事物现在是处于什么具体阶段，以及由现阶段转入下一阶段，或由此事物转化为另一事物还有多大距离，还需要做多少工作等等，仍然是胸中无“数”的。这是因为，事物的数量界限是与事物的质直接联系着的。我们知道，事物的变化都是从量变开始，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的质变，最终必然引起整个的质变。因此，要改变一种事物的质，没有量的变化的积累，不经过许多部分的质变，是不可能的。由量变到质变，在新的质的基础上进行的不断量变和部分质变，又引起新的整个质变，如此不断地推移，事物便由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由这一事物转化为另一事物，这是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一个根本规律。事物的数量界限也就是某一个事物由这一部分质变到另一部分质变的关节点，是这一事物转变为另外一个事

<sup>①</sup>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31页。



物的关节点。突破了这一事物发展的某一部分质变的关节点，这个事物的发展就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突破了事物发展整个质变的关节点，事物的性质就起了根本的变化，甲事物就不再是甲事物，而变为乙事物了。因此，掌握住数量界限，也就有可能把握住事物的发展过程，把握住由一事物转化为另一事物的规律，从而才有可能清醒地认识把一个事物由一个阶段推进到另一个阶段，还需要作多少努力。否则，我们就不能算懂得事物的性质和事物发展的过程，对形势的变化还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还不能算真正了解情况，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确地知道为了改变事物应该进行什么工作，应该进行多少工作。由此可见，在指导斗争、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掌握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总是十分强调要有一个政策的界限，哪些人属于团结的范围，哪些人属于打击的范围，哪些事情应当办，哪些事情不应当办，都必须划分得一清二楚。这个政策界限往往与数量界限相联系，或者是根据某个数量界限所决定的。如果混淆了事物的数量界限，也就必然破坏了政策。土地改革中，正确划分富农和中农的界限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政策问题。但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毛泽东同志经过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在一九四八年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指出：“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以下者，应订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sup>①</sup>有

了百分之二十五这个数量界限，就从富农和富裕中农这个分水岭上明确地划分了团结面和打击面。这就是务须团结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口百分之九十左右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打击不超过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左右，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和旧式富农。当时，有的地方的同志由于没有重视百分之二十五这个数量界限，把一些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使工作遭受了损失，这正是由于他们超越了事物的数量界限，因而也就必然破坏了政策界限。

由战略防御阶段到战略进攻阶段，由战争开始到根本打垮敌人的军事力量，也有它们军事上的数量界限。在一场特定的战争中，这些转变的关节点即数量界限，是由建立在一定政治、经济力量基础上的斗争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及其变化的具体情况所规定的。军事斗争的领导者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整个估计中，正确地找出和掌握住这些数量界限，就可以依据当前的情况提出适当的任务，以促进战争向新的阶段发展。如前所述，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因此，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军事力量对比变化到何种程度，我们才能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也就是说什么是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到战略进攻阶段的数量界限？经过对战争开始后七个月敌我力量消长变化情况的观察和研究，毛泽东同志指出，歼敌一百个旅左右就可使我军由防御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69页。



阶段轉入进攻阶段；在这个認識基础上，提出了在已經歼敌五十六个旅的情况下，再歼敌四十至五十个旅的任务。毛澤东同志說：“我軍如能于今后数月內，再歼共四十至五十个旅，連前共达一百个旅左右，則軍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sup>①</sup>。毛澤东同志的預見是如此准确，在經過一年的作战，歼敌九十七个旅，完全实现了毛澤东同志提出的作战任务后，我軍就結束了战略防御阶段，轉入了全国性的战略反攻阶段，使人民解放战争达到一个轉折点。接着，毛澤东同志对在变化中的敌我双方的情况以及双方兵力在数量方面变化的情况加以分析，找出了彻底打垮敌人的在軍事方面的数量界限，提出了五年左右時間歼敌五百个旅的总任务。后来，毛澤东同志根据战争进展的新情况，敌我双方力量消长变化的加速，又及时地提出完成歼敌五百个旅，根本打垮国民党反动派的軍事力量的任务，只要三年多的時間就可以了。事变的发展证明，正是在三年半的時問里，我軍完成了彻底打垮敌人，夺取全国胜利的偉大任务。

当然，事物的具体数量界限，由于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处的具体条件不同，因而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然界的事物是这样，社会中的事物更是这样。因此，我們在制定或执行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各种不同条件对事物的数量界限的影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注意基本的統計和主要的百分比，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句話，做到胸中有“数”，这是毛澤东同志一貫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正因为毛澤东同志在每一个革命时期、每一个革命

阶段，都能在掌握不断发展着的事物的质量的同时，又具体的把握它的数量方面的具体情况，掌握住正确反映这种具体情况的各种基本統計和主要的百分比，掌握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因而他能够始終对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了如指掌，把握住斗争的全局，把握住整个事变发展的具体进程，并根据每一时期的实际情况，提出斗争的任务，制定为实现这个任务所必需的各项政策，保证中国的民主革命能够取得彻底的胜利。

毛澤东同志經常提醒全党同志們，在工作中要做到胸中有“数”。他說：“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sup>②</sup>正确反映事物情况的数的概念，不是头脑里臆想出来的，而是人們在长期的实践斗争中、刻苦的調查研究中，抽象出来的。要做到胸中有“数”，就需要我們进行艰苦的工作，細致耐心，不怕麻煩，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認真地进行調查工作；同时又要以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調查来的各种数字进行周密的分析，这样才能不为各种各样的数字所迷惑，从中找出确实能够表現事物本质的基本数字，找出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

毛澤东同志的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对于一切工作，都是适用的。只有对我們的工作对象做到了胸中有“数”，才能把各种革命工作放到踏实的基础上。

①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10頁。

② 《常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3頁。





# 認識規律，運用規律

——學習《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筆記

· 盧之超 ·

二十五年前，即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同志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系統地說明了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問題，總結了我們黨內兩條軍事路線的爭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一開頭就指出研究和認識戰爭規律對於任何一個指導戰爭的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這部著作里，毛澤東同志把戰爭或作戰的一切重要問題，都提高到規律性的認識上去解決，闡明了我黨正確的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這是一部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取得勝利的偉大軍事著作，同時又是一部極其生動的、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著作。從學習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著作中，使我們了解到，不僅在指導戰爭的時候，而且在進行任何工作的時候，都必須認識和運用客觀規律，以客觀規律為自己行動的嚮導。本文僅就這方面談一些體會。

\* \* \*

科學的任務在於從實際出發，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主觀臆造的規律性。只有認識了規律，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人們的行動才能得到預期的結果。毛澤東同志說：“不論做什麼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物的關聯，就不知道那件事

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規律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們決不可以用自己頭腦的虛構去代替客觀規律，決不可以拿自己所臆想出來的聯系去代替客觀事物中固有的真實的聯系。人們對於客觀實際的正確認識，是通過實踐來達到的。離開實踐，便不能正確地認識任何事物及其發展規律。“要直接地認識某種或某些事物，便只有親身參加於變革現實、變革某種或某些事物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觸到那種或那些事物的現象，也只有親身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暴露那種或那些事物的本質而理解它們。”<sup>①</sup>對於戰爭，當然也是如此。毛澤東同志說：“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讀書是接受前人的經驗，這是完全必要的，就是在革命戰爭的環境里，對於學習戰爭說來，也需注意這一點；但是，為了真正地領會前人的軍事理論，從中吸收真正有

\* 凡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① 《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6頁。





用的东西，必须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只有在战争的实践中，才能学会战争。

在十年内战中，“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懂得又不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认为只要照抄一般战争的规律，只要照抄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或者只要照抄北伐战争的经验，就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针对这种错误观点着重指出，在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上，要彻底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既要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又要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他说：有一般战争的情形、性质和规律，而革命战争有它的特殊的情形、性质和规律，中国革命战争又有它的更加特殊的情形、性质和规律。“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和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因此，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机械地搬用已有的一般规律和一般结论。不仅外国资产阶级总结的一般战争的规律不能机械地搬用，就是苏联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中北伐战争的规律，也不能机械地搬用。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问题在于如何接受别人的东西。毛泽东同志指出这里的原理是：应该“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

西。”这就是说，学习和运用一般规律、学习和运用前人和别人的经验，也必须从当前情况出发，着眼于当前战争实际情况的研究，这样才能具体地决定，究竟吸收些什么，拒绝些什么，增加些什么。否则，就谈不到真正的学习，就会把一般规律和结论看成是脱离具体条件的抽象概念，不顾客观条件而机械套用，因而脱离唯物主义的原则。

毛泽东同志以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为依据，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是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情况的全面的、本质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说：“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有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

这些主要特点和根本规律，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上一系列的具体特点和



具体规律，例如内战的持久性和由此产生的“围剿”和反“围剿”两种战争形式、进攻和防御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反复，战略防御的重要性，基本的是运动战，游击战的特殊地位等等。机会主义者不承认、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他们拒绝了解中国的特殊情况，因而在上述一系列战略问题上都提出了和毛泽东同志相反的錯誤主張。这种不同主張的分歧从思想实质上說来，是从实际出发的观点和从抽象概念出发的观点的分歧，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反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分歧。

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分析，生动地告訴我們，要从实际出发，发现事物的规律性，就必须从分析事物的矛盾特殊性开始，从事物的发展变化的特点上去研究它。毛泽东同志在这部著作中再一次引述了列宁的話：“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主观主义者在認識客观规律的问题上恰恰是忘記了这一点，所以毛泽东同志說：“他们自称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馬克思列宁主义也沒有学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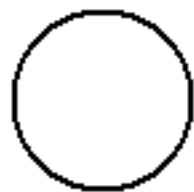
\*     \*     \*

进行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是認識事物的规律性的基础一环。在軍事上來說，是認識战争规律性的基础一环，是正确地判断形势和正确地决定战略方針、正确地部署战役或战斗的首要前提。毛泽东同志指出：“指揮員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

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对于各种偵察材料的联貫起来的思索。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将偵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計劃，——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計劃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認識情况的过程。”这种調查研究进行得愈充分，認識情况就愈明，决心也就愈大，据以作出的战略、战役和战斗的計劃也就愈可靠。

人們的認識在未經過实践反复檢驗以前，不一定能够完全和客观情况相符合，特別在战争中，客观情况发展很快，常常发生难以預料的变化。因此，毛泽东同志又強調指出下面这点：“認識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軍事計劃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計劃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終結止，这是又一个認識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檢查。如果計劃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認識，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間或有的。”

这里所說的两个認識过程，就是說調查研究是不能間断的，是需要經常进行的。只有經常进行調查研究，才能摸熟自己的部队的脾气，又摸熟敌人的部队的脾气，摸熟一



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例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指导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多打胜仗。毛泽东同志批评了那些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他们不懂得任何军事计划应当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而是相反地把军事计划建立于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并且在计划一经作出之后，就不愿意重新加以检查，不愿意在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时改变已定的计划，这样的军事家是一定不免于碰壁的。

毛泽东同志在本书中用大量事实材料，用红军反“围剿”的丰富经验说明，对当时各种情况的系统的、周到的调查和侦察，对于反“围剿”的胜利有着决定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本书《反攻开始问题》一节中，详细地说明了这种经验。红军在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都详细地调查和估计了各方面的情况，例如调查了“进剿”军的总人数、战略部署、指挥、分进情况；调查了分进敌军中各军的派系如何，是否蒋介石嫡系，兵力的强弱多寡如何，驻地分布情况及群众条件如何，是白区还是游击区、根据地，有无 AB 团活动，敌军战斗情绪如何，是久驻还是新到，是恐惧还是骄横，是胜军还是败军；还调查了各方面的自然条件，有无有利阵地，等等。另一方面还考虑了我军各方面的情况，例如群众条件好坏，有无有利阵地，是否经过休整，兵力集中情况，等等。在进行了这种周密调查之后，在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的情况下，才下“初战”决心，动手消灭敌人。因此，

这几次反“围剿”的“初战”都能迅速获胜，并且连战皆捷，迅速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唯独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不注意对周围情况作系统的了解和分析，震惊于一城一地之得失，仓促进行“初战”，一再攻打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的城镇，屡战屡败，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证明，离开了实际调查，必然产生唯心主义的形势估量和作战指导。

毛泽东同志说：“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所谓“想一想”，就是“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就是进行科学分析的工作。人们依靠自己的头脑，对从实践和调查中得来的材料进行“联贯起来的思索”，下一番“改造制作”的功夫，用理论的形式再现客观事物的复杂过程，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既是“改造制作”，就包含有对于感性材料的扬弃，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在这里，有无正确的方法，关系很大。

例如，在如何对待进攻和防御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指出，一方面，应该看到，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另一方面，又应该看到，革命和革命战争也有防御和退却。这二者本来是相互联系着的。毛泽东同志总是在进攻中，同时指出防御和退却的作用。他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



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毛泽东同志指出战略防御的重要作用，并指出我们的防御不是消极的防御，而是积极的防御，即攻势防御。与这种看法相反，“左”倾冒险主义者只是固执地坚持片面的观点，他们认为革命和革命战争只能是进攻，认为红军根本不应该采取防御和退却手段。而当军事上遭到失败时，他们又往往陷入军事保守主义，主张消极防御，一直发展到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为什么对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进攻和防御问题会得出如此相反的认识，除了重视不重视调查和掌握材料以外，还在于在思索中有没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所谓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把它形象地叫做“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个体，是发展变化的。必须采用分析的方法，从对立统一中去分析和认识它们，才能深入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应当从进攻中看到防御和退却，从防御和退却中看到进攻，在胜利中看到困难，在失败中看到胜利的前途，而不是把问题绝对化、片面化、简单化。现象和本质是有矛盾的，现象的认识往往只是反映了矛盾着的事物的某一方面，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才反映矛盾的总体。因此，对复杂的事物不作深入的分析研究，抓住一方面的现象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规律性的认识的。辩证法坚决反对把事物的任何一个方面绝对化，把它抽象地夸大为事物的全体。辩证法认为只有

在对立的统一中去认识和把握事物，才是正确的、可以理解的和合乎实际的。例如进攻，本来是革命和革命战争所需要的，但如果把它绝对化，以至否认进攻的条件，否认必要的防御和退却，就变成荒谬的、脱离实际的了。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一种全面的、深入事物本质的分析，贯穿了全书。毛泽东同志在战争问题上批判了“左”的和右的两种片面性和绝对化的观点，总结了十年内战的经验，概括地指出：“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权威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思想方法上处处是在要求认识上的全面性，反对认识上的片面性，从而解决了这些问题。



认识规律是为了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使用这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以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在战争中，就是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实际存在的客观规律在一经认识之后，就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导方法，就能够帮助我们在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更好地改造世界。

客观物质条件、客观形势是我们进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物质基础，是人们开展主观活动的舞台。“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没有一定的客观形势，没有一定的条件，人们就不能实现某种任务，甚至不能提出某种任务。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始终只会抱定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因为我们仔细去看时总可以看出，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sup>①</sup>因此，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在战争中，“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始终注意分析为提出和完成各种任务所必需的条件，并努力为完成各种任务准备条件。以战略退却阶段准备反攻的问题为例。毛泽东同志根据历史经验和我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指出，红军要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所造成的下列诸条件：（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二）有利作战的

阵地；（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五）使敌人疲劳沮丧；（六）使敌人发生过失。而其中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只有在退却阶段中取得这些条件中的“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如此注重客观条件的分析，如此重视客观条件的作用，正是他重视客观规律的表现。

不懂得条件的作用，不重视条件的分析，不懂得根据客观可能性创造条件，就不懂得如何运用客观规律。军事冒险主义者不顾条件，坚决反对战略退却的步骤，主张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正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在客观事实面前碰壁。

重视条件，并不等于说，要待一切客观条件都完全具备了，才能开始行动。前面说过由战略退却转为战略反攻，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因为“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主张消极防御的军事保守主义者，不懂得主观努力的重要作用，不懂得人们可以根据客观规律创造条件、改变条件，不敢在有利时机到来时及时组织进攻。他们同样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同样只能把战争引导到失败的道路。

我们所说的主观努力，或主观能动性，

<sup>①</sup> 《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序言第3页。





其一是指正确認識客观規律的能力，正确分析和估量客观条件、客观形势的能力；其二是指根据对客观規律的正确認識，自觉地进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对于战争指导者來說，这就是正确地决策和正确地組織、使用自己的力量。这种主观努力，在战争中，就是对于自己的軍事力量的組織、动員和使用。

客观条件是我们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但具备了条件并不等于我們的实践任务的完成。战争的勝負，不仅仅决定于各种客观物质条件，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毛澤东同志在分析了战略反攻所需的各种条件之后說：“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軍的勝負。”要实现这种可能性，即要在战争中获胜，就需要正确的方針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就是决定的了。因此，人們可以而且应该充分發揮主观能动性，努力去做那些經過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也就是說：“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质条件許可的範圍內爭取战争的胜利。”战争中的两軍决战阶段，主观努力是最重要、最緊張的。毛澤东同志說：在反攻决战阶段中，“無論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脫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創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給

敌人更大的損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脫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由此可見，人們依据客观規律經過自己的主观努力，不仅能够充分地利用客观条件，而且能够在客观可能的範圍內創造和改变某些条件。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一书，一方面充分分析了中國革命战争中作战双方既存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条件，指出我們的行动必須以这些条件为依据；一方面又充分闡明了战争的主观指导上一系列正确的原則和方法，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下，如何創造实现胜利的可能性的諸条件，以求改变敌我形势。毛澤东同志說：“軍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軍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許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劇来。……我們不許可任何一个紅軍指揮員变为乱撞乱碰的魯莽家；我們必須提倡每个紅軍指揮員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駕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們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驟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規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

我們的一切規律性的結論都是从客观实际中正确地总结出来的，当它一經总结出来之后，就又轉为指导我們行动的方法。我們在一切工作中所以要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去認識和利用客观規律，就是为了在这些工作中寻找最正确、最有效的革命方法，以爭取工作的胜利。



# 稻田水旱輪栽和“以田养田”

丁 穎

水稻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粮食生产中占着重要地位。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一九五七年）为例，全国水稻种植面积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强（百分之二十一点一），而产量则将近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一半（百分之四十六点九），这明显地表现出水稻的高产性和它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重要性。我国农民栽培水稻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认真地总结和研究农民群众的这些经验，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地提高水稻以及稻田旱作物的产量，对争取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胜利，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粮食增产指标，具有重大的意义。

通过水稻与旱作物輪栽，实现“以田养田”，就是农民群众栽培水稻的一项很重要的经验。这项经验，早在六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就有过记载。一千多年以来，我国各地农民群众根据本地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不断地发展和丰富了这项经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輪栽方式，对于提高水稻和稻田旱作物的产量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根据一些地方的调查资料，试就我国南方和

北方稻区实行水稻与旱作物輪栽和“以田养田”的生产经验，以及水稻的栽培特性与水旱輪栽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以作为研究粮食增产问题的参考。

## 南方稻区水旱輪栽的经验

淮河以南的长江和珠江流域是我国水稻的主要产区，具有气温高、雨量多、作物生长季节长的特点。这些地区，除了一些不便于排水的田（如圩田、潮田、冬水田等），或土质过粘，以及劳动力特别少的地方以外，一般都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实行一年两熟或多熟的复种輪栽制度。

南方稻区，与水稻年内复种輪栽的旱作物，在秋、冬季的，一般有紫云英、黄花苜蓿、苕子、肥田萝卜等绿肥作物，蚕豆、豌豆、冬大豆（在华南）等豆类作物，油菜、萝卜子等油料作物，甘薯、马铃薯等薯类作物和小麦、大麦等麦类作物。在春、夏季的，一般有田菁、绿豆等绿肥作物，大豆、花生等豆类作物和甘薯、马铃薯、芋头等薯类作物。水稻与旱作物分年輪栽的，一般有稻、棉輪栽，稻、蔗輪栽，稻、麻（黄麻）輪栽等。所有这些輪栽方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利



用了水稻与旱作物在輪栽中相輔相成的关系，达到了增产的目的。以水稻和綠肥、豆类作物輪栽为例，这种輪栽能够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加强土壤微生物的活动，增加土壤的腐殖质含量和水稳性团粒结构，改善砂土分散或粘土板結的状况，加强土壤养分的貯蓄和釋放能力，調整土壤的保水性和透水性，因而能促进作物根群发育，增加产量。这就是农民群众所說的“以田养田”。栽培綠肥和豆类作物还可以增产飼料，用来养猪或飼养其他家畜，再以猪粪和其他畜粪肥田，这就是农民群众所說的“以田养猪，以猪肥田”。种植綠肥和豆类作物，只要施用少量肥料，就能得到大量的鮮草充作肥料，这就是农民群众所說的“以小肥养大肥”。

在“以田养田”方面发挥作用最大的，是种植豆科綠肥。豆科綠肥作物可以利用与其共生的根瘤菌，吸收和固定空气中的游离态氮素，利用其下伸的根系，吸收深层土壤中的矿质养分，以生长莖叶、繁殖种子。种植綠肥作物，只要施用少量肥料，并加以必要的管理，一般就可亩产鮮草二、三千斤，栽培得好的，亩产可达五、六千斤。一千斤紫云英鮮草的肥分含量大約是：氮四点八斤，磷酸零九斤，氧化鉀三点七斤。苜蓿、苕子、蚕豆、豌豆等鮮草的氮、磷、鉀含量比紫云英更高，肥效更大。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三年的試驗，在其他条件配合下，施用一斤紫云英的氮素，約可增产稻谷八点七斤至十一点五斤。根据湖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試驗，施

用一斤紫云英的氮素，后两季稻谷約可增产十四点二斤。从各地的情况来看，种植綠肥的多少同水稻及其他旱作物增产有密切关系。如江苏省东台县时堰人民公社莫庄大队，一九五四年实行稻、麦、棉輪栽，一九五五年改为稻、麦、棉、綠肥輪栽（綠肥占冬作物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一九五六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四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一，棉花总产量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点八。一般地說，在精耕細作的高产地区，綠肥所占的比重也往往較高。例如水稻产量較高的江苏省苏州专区，綠肥占冬作物面积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浙江省宁波专区，綠肥占冬作物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各种綠肥作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較强，可以根据气候的冷暖、干湿和田土的砂粘、酸碱等条件，选择不同的品种；可以根据前后茬作物的关系和耕作措施的不同，采用单作、間作、套作或混作的栽培方式。除了豆科綠肥作物以外，其他如肥田蘿卜等，虽然沒有固氮作用，但同豆科綠肥相似，也具有栽培容易、对土质选择不严、管理簡便、收获較早、鮮草产量多等优点。

豆类作物中，在冬季种植的有蚕豆、豌豆，在春、夏季或秋季种植的有大豆（华南有冬季大豆）、花生等。浙江、安徽、江西、湖南等省，很多农民把大豆类的泥豆、禾根豆同早稻、中稻套种或复种，增产作用也很大。关于稻、豆輪栽的增产效果，根据福建省福安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試驗，在春大豆后栽种晚稻，每亩稻谷产量为七百四十八



斤，比在早稻后种晚稻，晚稻亩产五百八十二斤，增产百分之二十八点五。湖南省实行稻、豆两熟栽培制度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一九五七年全省实行这种轮栽制度的田有一百一十万亩，分布在四十五个县。据衡南、衡山等县经验，种豆以后种早稻，比种双季晚稻以后种早稻，需肥量减少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并能获得高产。在稻田复种花生，不仅能收获油料、饲料和肥料，而且能使下茬水稻增产。广东省原潮汕县梅云农业社（丘陵地区），有一块重壤土稻田，面积一亩三分，一九五五年春分成两半，一半种花生，一半种水稻，收获以后全部种晚稻，种花生的这一半收了稻谷三百一十二斤（折合亩产四百八十斤），种水稻的这一半收了二百六十斤（折合亩产四百斤）。湖南省衡阳、邵阳等地，在秋作豆类之后，冬播肥田萝卜充作稻田绿肥，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薯类作物与水稻轮栽，由于种植薯类作物需要深耕起畦和中耕培土，可以为水稻根系发育创造深耕熟化的土壤条件。在薯茬地上种稻，稻的茎秆坚强，能够抗倒伏，提高产量。广东省原潮汕县枫溪二社，有一块犁地困难的轻粘土壤稻田，一九五六年早稻亩产三百八十斤，晚稻亩产五百六十斤。一九五六年底改种甘薯，一九五七年夏鲜薯亩产五千斤，晚稻亩产七百五十斤。另一块高产稻田有三十五亩，多年连作水稻，产量不易进一步提高，一九五五年早稻亩产四百斤，晚稻亩产五百五十斤。一九五六年改种旱作物以后，一九五七年早稻亩产五百五十斤，晚

稻亩产六百八十斤。各地生产实践证明，在丰产的薯类作物田里种植水稻，由于根群一般入土较深，发育良好，茎秆健壮，不易倒伏，穗粒充实，因而能够保证水稻的高产。此外，甘薯的蔓既是很好的饲料，又是优良的稻田有机质肥料。但是，华南地区冬季栽培甘薯，到来年四、五月间，正值薯块快速膨大增重的季节，而四月中、下旬也正是连作早稻插秧的季节，在栽培季节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有些地区在五月收薯后，把薯茬田用作晚稻秧田，或种植夏季绿肥，在七月底收割绿肥后再种晚稻，这样既可提高晚稻和旱作物的产量，又可以把水稻与其他作物的收、种时间错开，便于调剂劳动力。此外，油料作物与水稻轮栽，也和薯类与水稻轮栽有相似效果。

麦类作物与水稻同属禾本科，所需肥料与水稻相似，因而在需肥上有一定的矛盾。但只要适当增施肥料，这种矛盾可以得到协调。太湖流域及云贵高原的农民，在深耕、增施肥料的麦茬田里种水稻，稻株生长健壮，稻、麦两季都获得丰收。上海市松江县城东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的晚稻高产田，云南省富民县一九六〇年亩产千斤左右的水稻田，前茬多属丰产的小麦田。值得指出的是，云南省澄江县的水旱轮栽制，第一年为水稻——蚕豆或豌豆（或油菜），第二年为水稻——苦草，第三年为水稻——小麦。在种过绿肥苦草的稻茬田里种小麦，地力较肥，可以保证小麦的生长良好；在种过小麦后的稻茬田里种豆类作物，可以促使地力的



迅速恢复，并可以在小麦收获以后，利用干燥天气，翻土晒垡二周左右，以促进土壤熟化和养分分解。这样，就使高产的小麦茬田对水稻的丰产发挥促进作用，同时把水稻、小麦、苦草、豆类换茬时间错开，便于安排劳动力。

水稻与旱作物轮栽，由于水旱栽培条件交替，使那些和水稻、旱作物伴生的病虫、杂草，失去相应的生活条件，可以减少病虫害和草害。

如上所述，南方稻区水旱轮栽的经验，是以轮栽绿肥和豆类作物来增加土壤有机质，以轮栽薯类和麦类作物来熟化土壤，并通过轮栽来合理错开茬口，调剂劳动力，减少病虫害，从而达到水稻和旱作物全面增产。但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在安排水旱轮栽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对于整个轮栽体系中的旱作物种类、面积比例、茬口安排、肥料来源、劳动力调剂和农牧业关系等，都要作出适当的规划，才能够充分发挥水旱轮栽的优越性，收到全面增产的效果。对于那些没有条件实行水旱轮栽的水稻田，则不能勉强实行轮栽。例如有些地方的圩田、潮田、冬水田以及粘土板结田等，目前多为连年种稻，一年一熟或早、晚稻连作（如在华南），这样的耕作制度，和当地的水利、土壤、肥料、劳动力等具体条件和栽培技术有着一定的关系。在这些地方，如果在排水干田后水源不能保证，耕作整地跟不上，以及作物品种的收、种季节安排不合适，勉强实行水旱轮栽，就不能得到增产效果，甚至会造成损失。至

于有些地方，有充分的水利、肥料和劳动力条件，实践证明连种水稻能够保证稳定增产时，就不必改为水旱轮栽。

### 北方稻区水旱轮栽的经验

我国北方气候干旱，水源不足，作物生长季节较短，每个劳动力负担的耕地面积较大，主要是种旱作物，稻区比较分散。虽然农民很早就有在盐碱地种稻的经验，但以往水稻栽培面积很小，只是在解放以后，才得到迅速发展。在水稻生产中，农民群众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栽培方式，以改良利用盐碱洼地，不断提高粮食及其他作物的产量。

在盐碱地上栽培水稻，由于播种前灌水洗盐和稻生长期的灌溉排水作用，可以降低土壤中的盐碱成分；通过稻田淹水灌溉的作用，还可以冲淡地下水的含盐量。河北省国营柏各庄农场，在中等盐碱地种二年水稻后，在零至一百厘米深的土层内，氯的含量平均降低至万分之一点七，可以使小麦正常生长，不受毒害。但是，目前北方稻区水源不足，不能满足普遍洗盐种稻的需要。同时，多年连作稻田，如果施用有机质肥料不足，土壤就会呈现板结状态。多年种稻，容易使杂草丛生和病虫蔓延；使稻田周围旱田的地下水位不断上升，增加盐分积累。如对稻田规划不当，还会引起土壤次生盐渍化，加以种稻过程中长期淋洗，土壤中有效养分损失也多。因此，多年连作容易影响水稻产量的提高。而实行水旱轮栽，可以经济用水（例如一亩小麦生育期的用水量仅占水稻用水量的





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增加利用盐碱地种植作物的面积,调剂土壤中的养分,消灭杂草,进一步提高水稻产量。同时,还可以调剂劳动力和提高机具使用率,促进农业、牧业和副业综合发展。河北省国营芦台农场,一九五三年正式采用水旱轮栽制度,即在一个地段种一年至二年水稻后,换种二年至三年旱作物(小麦、大豆、玉米以及饲料、绿肥作物等)。根据该场调查,大豆茬的稻田亩产六百七十点五斤,比两年都种水稻的稻田(亩产六百四十五斤),约增产百分之四,比四年都种水稻的稻田(亩产五百斤),约增产百分之三十四。小麦茬稻田亩产六百七十六斤,比相邻两年都种水稻的稻田(亩产六百三十八斤),增产百分之五点九。一九五三年以前在沒有种过水稻的盐碱地上种小麦,出苗率仅百分之四十一至六十,亩产三十八至六十九斤;一九五五年在稻茬地种小麦,出苗率达百分之九十五,八千多亩麦田平均亩产二百五十八斤。

通过水旱轮栽,种植绿肥或其他豆科作物,实现“以田养田”,在北方稻区也是十分重要的。根据河北省军粮城农场的试验,种植夏季田菁,生长仅六十六日,每亩可收获鲜茎叶二千一百六十五斤,折合氮素十点六五斤,根系六百七十三点三斤,折合氮素二点三二斤,地上、地下部合计氮素十二点九七斤;种植草木樨,每亩可收获鲜茎叶一千零二十五斤,折合氮素九点六三斤,根系一千二百五十二点九斤,折合氮素五点九七斤,地上、地下部合计氮素十五点六斤。又

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调查,当地农民,在种稻前一年的春、夏季旱作物(如小麦、大麦、糜子、谷子、高粱等)田中复种或套种苜蓿、草木樨等绿肥,于秋季收获旱作物后,绿肥作物仍留存田间,到来年四月返青生长,六月间水稻插秧时,取作稻田绿肥。草木樨每千斤鲜草含氮素五点六斤,每亩如产鲜草二千五百斤,即折合氮素十四斤,大约相当于硫酸铵七十斤。一般每亩田翻压下苜蓿、草木樨等绿肥二千至三千斤,可产稻谷五百至六百六十斤,这些绿肥约相当于当地常用的土粪一万五千斤至二万斤,而其成本远比土粪的成本低,肥料质量也高。除苜蓿、草木樨外,其他如蚕豆、扁豆等,也可作为夏季绿肥,供当年旱作物肥田用。又如以干旱著名的甘肃省河西走廊盐碱地的老稻区,当地农民一般都采用严格的水旱轮栽方式,以保证水旱作物的增产。轮栽年限和旱作物种类等,则主要根据田土肥瘠、反盐程度、劳动力多少等不同情况分别安排,但是一定安插有绿肥或其他豆类作物在内。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卫县和中宁县等地区,有第一年水稻,第二年小麦间播大豆或混播草木樨的二年轮栽制;有第一年水稻,第二年小麦复种糜子,第三年小麦间播大豆或混种草木樨的三年轮栽制。由于当地重视种植绿肥,水稻产量也不断提高。如中卫县在一九五二年全年播种绿肥面积不足二万亩,仅占稻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二,稻谷平均亩产量是四百一十五斤;到一九五九年,绿肥面积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稻谷平均亩产量上升到



五百六十三斤。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灌区的调查，水旱轮栽以第一年水稻，第二年小麦间种青豆，第三年小麦间种青豆并混种苜蓿的轮栽方式，收成最好。这样，水稻亩产可达五、六百斤，小麦可达五百斤左右，青豆约二百斤，平均年产量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四百斤的产量指标。由于采取三年水旱轮栽制，在水稻前作种小麦并插入青豆和苜蓿，不仅不会降低粮食产量，而且由于豆类作物在生长期間固定了大量氮素，绿肥又翻压充作稻田肥料，因而增加了土壤的肥力，节省了积肥、运肥的劳动力，又可以把原有肥料增施于旱作田。此外，绿肥在生长过程中还可以遮蔽地面，减少水分蒸发，抑制盐分上升，消除影响旱作物正常生长的一些障碍。

在滨海地区，也有实行稻田复种水旱轮栽的。据天津市一九五六年调查，南郊的二十二万五千亩稻田中，复种面积为六万三千五百五十六亩，复种作物主要是大麦、小麦、马铃薯等，后作都是水稻。根据五一农场试验，实行稻麦两熟比单一连作水稻增产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

如上所述，水旱轮栽在北方稻区起着两项重大作用：第一，可以经济用水，改良利用洼地和盐碱地，扩大稻田和旱作物的种植面积，保证增产；第二，可以稳定旱作中的绿肥和豆类作物的种植面积，有利于增产肥料、饲料，实现农牧业结合，以解决水稻增产中具有关键性的肥料问题，全面提高水稻

以及旱作物产量。根据各地的经验，增加复种面积必须考虑到劳动力和肥料等情况，统筹安排，才能够达到增产的目的。由于各地区的具体条件（如田土肥瘠、盐分高低、作物种类、水源条件等）有所不同，水旱轮栽的方式也有多种多样。在实行水旱轮栽的时候，同样应该从当地的具体条件出发，因地制宜。

### 水稻的栽培特性和水旱轮栽的关系

水稻原属沼泽植物，由其处于野生状态的祖先起，就生活在淹水土壤中，经过长期的人为选择和培育之后，形成对于淹水深浅不同的水田土壤都能适应的性能。水稻的整个生长发育过程，都需要得到水的保证。它还借水来调节温度，防霜抗寒，以减少自然灾害的威胁。因而在水源有保证的条件下，产量比较稳定。这是水稻与旱作物显著不同的特性。但另一方面，水稻与旱作物也有其共同性，它也需要空气，也要求一定的“旱”的土壤条件。水稻植物体中具有通气组织，但通过这个组织经常由地上茎叶输送到根部的氧气，只能满足其所需氧气的五分之一，其余的氧气还需要通过“旱”的土壤条件来供给。如果稻田淹浸过深，或土壤排水不良，土壤中氧气供给不足，就会妨碍稻株的正常生长发育。栽培水稻所采取的技术措施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供给水稻以充足的氧气条件，有效地调节水稻需“水”与需“旱”的矛盾。



从土壤物理和土壤化学方面，都可以看出，水稻的生长发育过程是既需要“水”，也需要“旱”的。

从土壤物理方面看，一般土壤中空气的多少与水分的含量是有矛盾的。土壤空隙中充满了水，空气就被排挤出来。如果稻田长期淹水浸渍，土壤的团粒结构遭受破坏，孔隙度小，渗透性弱，排水困难，就会造成水分停滞，氧气不足，妨碍稻根正常生长。相反，排水良好的稻田或经常排水烤田的稻田，土壤的团粒结构好，孔隙度大，氧气供给充分，则水稻根群生长粗壮，伸展也较深。然而，在生产实践中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如云南省的发红田和湖南省的鸭屎泥田等，由于土壤缺乏腐殖质，冬季如果放干，土壤结构会变坏，形成板结或泥团，耕耙不易，泡水后也难以恢复原来比较膨软的性状，在这种土壤中栽培水稻，往往生长不良，形成减产，只有在常年淹水的条件下，才能保证产量稳定。这种情形，看来似乎同水稻需“水”需“旱”的道理有矛盾。其实，这不过是一些现象，如果深入一步追究问题的本质，正可以为这一道理作一个补充的说明。如所周知，上述这些田，要获得较高产量，一般都要在秋收后进行犁耙、整田，使土壤氧化层与还原层搅乱并混入空气，还要把田外的灌排措施搞好，冬、春期间施入大量厩肥或割草压青，增加田里的有机质，以至改善土壤的结构和通气性、透水性。土壤结构改善以后，再进行水旱轮栽，不但可以提高产量，还可以增加复种次数。

从土壤化学方面看，淹灌的稻田土壤，除表面薄层因接触氧气较多，成为氧化层以外，绝大部分耕作层的土壤属于还原状态，称为还原层。还原层中的腐殖质和还未完全腐殖化的有机质，对改良土壤和供应水稻营养都起着重大作用。一般水田中的有机质分解和形成腐殖质，主要是依靠嫌气性细菌的活动。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由于嫌气性细菌的分解活动，伴随着生成一系列还原性物质，如二氧化碳、甲烷、有机酸、硫化氢等。这些物质数量少时，对水稻生长影响不大，如果长期积累数量增多，就会妨碍稻根呼吸和吸收养分，发生黑根、烂根等现象，对水稻生长直接产生有害作用，甚至使全田稻株萎黄，以至枯死。同时还使地力逐渐瘠薄，出现产量减低的倾向。实行水旱轮栽，土壤有机质在种植旱作物期间氧气供给充分，或者在施用有机质肥料的同时施用石灰，使土壤酸性环境得到改善，土壤中不致积累有害物质，土壤贮藏和释放养分的能力就会增强，产量就不致于减低，并且还可以提高。这也就是水稻与旱作物实行轮栽对于熟化土壤、增进地力的实际效果。

我国农民通过长期生产实践，体会到水稻的生长发育过程是需“水”与需“旱”矛盾统一的运动过程。因而，在栽培技术上，采取犁冬晒垡、施用有机质肥料，以及在水稻生育过程中，实行浅水勤灌、间歇灌溉、湿润灌溉、排水烤田、耕耘管理等措施，对生长在淹水土壤中的水稻，人为地给以旱生条件和空气条件，以协调其需“水”与需“旱”的



矛盾关系。并在认识水稻的水旱矛盾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为水旱轮栽制。有些地方由于对水稻的栽培特性了解不够，对于水旱轮栽能够培养地力、促进水稻及早作物持续增产的作用考虑不足，只看到水稻需“水”的一面，而忽略它需“旱”的一面，不恰当地追求一年内连种水稻两熟或三熟，而不顾及水稻对于土壤物理性和化学性等物质条件的要求；或者只看到当季、当年的水稻增产，而忽视它与前后茬作物的全面增产和连年持续增产的长远关系，其结果对生产都是不利的。当然，豆类不是主粮，绿肥更没有直接的粮食收获，而且它们和粮食作物有一定的争地、争肥、争劳动力的矛盾，如果豆类或绿肥种植面积过大，也会影响粮食增产。但是，如果只看到这一面，在目前有机质肥料和化学肥料还不足的情况下，将绿肥和豆类作物的栽培面积缩减，因而不能实行“以田养田”，也会使水稻及其他粮食作物的增产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样就不如实行水旱轮栽、适当地种植部分绿肥和豆类作物的增产效果大。

\* \* \*

水稻与其他旱作物轮栽，是我国农民的宝贵经验。有计划地实行水旱轮栽，适当种植绿肥和豆类作物，做到“以田养田”、“以小肥养大肥”，是多快好省地解决当前增产关键的肥料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由于我国稻作环境错综复杂，有关水旱轮栽的具体条件多种多样，因而轮栽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某一种轮栽方式适合于这

一个地区，不一定适合于另一个地区。在推行某一种成功经验的时候，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认真分析当地的生产条件、耕作习惯和采用这种轮栽制度的经济效果，并且要经过反复试验。在推广的时候，一定要由群众作主，不要包办代替。此外，从研究工作的角度来看，水旱轮栽在理论上和技术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作深入的研究。在研究时，应该把水稻和与其轮栽的旱作物的内在因素和外界条件的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各地生产实践和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耕层土壤的熟化程度和贮积、释放养分能力的强弱，对保证水稻高产有着重要的作用。像亩产四、五千斤以上的甘薯田，三、四百斤以上的小麦田，其后茬水稻在增施肥料进行丰产栽培时，一般都获得良好的效果，很少发生早期倒伏和空秕粒过多等不良现象。进一步研究这种现象的科学根据，对于今后的水稻增产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有些地区对于绿肥和豆类作物的栽培，多采取粗放方法，产量不高，在选种、留种、施肥和灌溉管理等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绿肥和豆类作物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例如大豆一般含有蛋白质百分之四十，脂肪百分之十八，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又是很好的家畜饲料，因而如何提高绿肥和豆类作物的产量和产品质量，也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 肯尼迪的二三事

黄 钢

## 肯尼迪与情报

有人說，肯尼迪和共和党的总统比較起来，不过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没有什么不同。

的确如此。

比方美国的新聞电讯早就报道过：艾森豪威尔“总统每天早晨通常接到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向他汇报世界局势的极端秘密的报告。”而肯尼迪总统呢？他要求最近成立的冷战“特别活动中心”“在24小时的基础上搜集美国政府可以得到的关于紧迫关心的局势的全部情报和活动资料。”这就可以看出：间谍情报资料这项工作，是美国前后两位总统每天必上的一课。

在艾森豪威尔任职期间，对古巴反革命流亡分子，給过一百万美元；而从肯尼迪上台到美国雇佣軍入侵古巴之前，为时不到三个月，肯尼迪撥給古巴反革命分子进行顛复活动的費用，就已經高达四百万美元。

为了进一步施行美国情报机构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特务渗透，肯尼迪上台以后，馬上就把国务院原訂的“非洲计划”費用增加到一百五十万美元（比原计划增加三十五万美

元）。不久以前，肯尼迪还要求美国新聞署扩大它对亚非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活动規模，并要求将它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地区的活动經費增加到一亿二千一百多万美元。

美国政府早在肯尼迪上任前就拥有十万名从事間諜情报活动的人员，每年都以三十亿美元来作为从事特务工作的經費。肯尼迪除了继承过去的一切之外，还想出了以“和平队”的美丽称号，去打扮那从事間諜情报与顛复活动的特务派出机构。不仅如此。艾森豪威尔在任时打算要撤回一些駐在外国的美軍家屬，肯尼迪却在考虑，如何利用那数目近于五十万人的美国海外駐軍家屬中的成員，去扩大和加强对于外国政治生活的渗透作用。

在从事諜报工作方面，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做得更加急切。他露骨地要求亲手参預美国的間諜情报活动。而这一点，也就是美国政府新近成立的高级情报机构和策划冷战的中心——“特别活动中心”应运而生的来由。

什么是“特别活动中心”呢？

它是美国各个情报系統联合的統一





組織。

它是美国各个情报中心的中心。

它是美国各个特务首脑机构中的首脑。

据合众国际社报道，这个“特别活动中心”的常任工作人员，包括中央情报局、国防部、还有国务院的有关人员，也许还可能包括一位美国新闻署的代表。美国官员们形容这一机构时说：“成立这个小组（中心）是为了加速把现有的机构的情报连同采取行动的建議一起轉給总统。它然后将负责使总统的命令迅速得到执行”，并且还“有责任一直負責到底”。

这就是說，肯尼迪总统的一项新建树就是：负责策划与检查督促美国冷战政策的高级决策机构是进一步的强化了！

在这个冷战高级指挥所里坐上了一个最具权威的司令官，这就是肯尼迪本人。

肯尼迪一点儿也不满足于他那間接控制与所謂“监督”美国情报系统的地位（如像艾森豪威尔所曾做过的那样），而是空前热心地把自己的座位移进了間諜与情报系统。既是美国白宫的总统，又是情报系统的主脑，一身而二任焉；誰还能說他不是一个人物呢？

### 肯尼迪的“迷信”

肯尼迪宣誓就任总统以前，在馬薩諸塞州議會（今年一月九日）的演說中，曾經說過，他今后工作的“成敗”，首先取決於他“是不是真正有勇氣”和“是不是真正善于決斷。”

入侵古巴事件证明了肯尼迪的“勇氣”。

这一事件如今已“作为‘肯尼迪的愚行’載入史册”（四月二十三日新加坡《海峡时报》）。

美国在古巴的慘敗，还证明了肯尼迪是否“善于决断”。

“总统判断的健全性，至少可以说是有問題的”（四月二十三日《星期日泰晤士报》）——这是倫敦对于肯尼迪先生智力水平的回答。

尽管美国入侵古巴的行动已經被世界輿論认为“是不合适的、愚蠢的、笨拙的、狂妄的

等等”（美国新聞处五月四日电訊），但美国却有一些报刊替肯尼迪遮遮蓋蓋，說什么美国在古巴的出丑，似乎主要是由于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的錯誤；說毛病似乎是在于“低能的情报分析”。

其实，事情的关键并不在此。

五月十二日出版的英国《新政治家》杂志对这一点作过分析。它說：“經驗证明，如果使情报机构也負責政策的話，他們搜集的情报将附加色彩，以适合他們的政策。古巴事件的大失敗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美国中央情报局恰恰是在肯尼迪的干涉与顛复古巴政策的指导之下，因此才对他們尊敬的总统，拿出了附加了色彩的、把古巴局势說成是“有机可乘”的情报資料。



为了追根溯源，人们稍稍回想一下肯尼迪对中央情报局的特殊关连是有益处的。

在上面举到的肯尼迪对马萨诸塞州议会的演说中，他说到自他当选以来的六十天之内，对于“建立政府（按即挑选班底）的工作”，“是一个长时间的、深思熟虑的过程。”可是，仅在肯尼迪当选后两天，人们很快就看到他宣布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倫·杜勒斯和另一名特务头子埃德加·胡佛（联邦调查局局长）留任原来职务的消息。这是肯尼迪当选后所做的第一桩事情。

肯尼迪当时解释这一任命的时候，就给予了艾倫·杜勒斯政策方针方面的大力支持。他认为使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个职位继续保持它的稳定和方针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说：肯尼迪继承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全套特务衣钵。

在这一星期以后，特务首脑艾倫·杜勒斯就被邀请到肯尼迪的海滨别墅里去，“磋商各项全球性的问题”，“包括加勒比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汇报“极端机密的情报。”合众国际社说他们这次的会见，商谈了两小时又四十分钟。

这些都说明了：新任总统肯尼迪对于冷战与颠覆活动，已经热衷到何等的程度！说明他对于插手干预古巴的事，早就是急谋而不可待了……。

在这以后，在古巴发生的事情，很快就 在世界人民面前露出了底细……这是人所熟知的了。

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的么？

果真是仅仅因为对于中央情报局的“失信”，才使得肯尼迪发动了对古巴的入侵并落得大败而回么？

不！连英国《新政治家》杂志都指出过：问题的渊源是“在四十年代后期，美国有意識地选用颠覆活动。”不过，《新政治家》杂志同时也认为：“基于人们有深切的道德感，而且也基于常情”，美国中央情报局经常采用的这种“颠覆活动”方法，往往却招致到“削弱了西方”的相反效果；特别是那些例如U—2型飞机入侵与古巴事件等等“声名狼藉的失败”，“使西方丢脸”。

即使是对于美国特务机构“声称获得的一些暗下的‘成功’”（例如“把卢蒙巴赶下台”），英国《新政治家》也还是感到忧戚满怀。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它们担心人们很容易从卢蒙巴被害的血迹之中，辨认出美国刀斧手的血印的缘故吧……

——例如肯尼迪总统最小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在被派往非洲“调查”之后，在纽约海外记者俱乐部的一次演说中就不得不承认道：非洲的领袖们认为，卢蒙巴之所以被废黜是因为“他失去了西方的欢心”，“卡萨武布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产物。”

这就可以看出：美国的颠覆政策并不能在任何地区换来好的名声。相反地，正像是《新政治家》评论所表示的那样：美国颠覆者“破坏了国际法治，他们自己将首先遭殃。”——遭殃的明显后果就是：颠覆者首先颠覆了自己装扮的声名。



## 肯尼迪与“失密”

肯尼迪埋怨美国报界过多地泄漏了他的国家的机密。

四月二十七日，他在纽约美国报纸出版者协会的演说中“要求美国报纸对与安全有关的新聞，实施战时尺度的自我检查”。

日本共同社对此评论道：肯尼迪的“这种呼吁，在美国来说，除了在战时，是从来没有发出过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肯尼迪总统所抱的危惧之感是多么大。”

你的恐惧是为了什么呢？肯尼迪先生！

肯尼迪回答：他已经感到“在一次秘密的冷战中面临的两难处境没有解决办法。”

肯尼迪还说：“我对于我所提出的两难的处境并无容易的解决办法”。

肯尼迪总统一方面要标榜“自由”，标榜“和平”，另一方面既是公开进行冷战，又是加紧准备热战——为此就必须严格控制新聞，撕碎自由的遮幕。这的确是“两难的处境”。肯尼迪在两难之下，自感心虚，羞人答答，讲不出口。

不过，他终究不得不讲出来。而且并不算是吞吞吐吐——讲得还算干脆俐落。虽然他也曾承认：“在和平时期，就这个问题（按即新聞保密要求）进行的任何讨论以及随后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痛苦的和没有先例的。但是（在这一个‘但是’之后，肯尼迪宣布——）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与危险的

时期。”

肯尼迪在纽约演说中明白地说：“如果我们从事公开的战争，无疑，它们（按指美国报刊）原不会公布这种消息。但是由于没有进行公开战争，他们只认识到新聞工作的标准，而没有认识到国家安全的标准。”环绕着这一点，肯尼迪埋怨美国新聞界没有认清形势——这就是他们的总统对他们所提醒的：美国当局既不想放弃冷战，又还要加紧准备热战的微妙的时刻。

总统先生当时在阐述这种形势与任务的时候，又说：虽然现在“并没有宣战、没有越过边境、没有发射导弹，”虽然“现在没有宣战——不论斗争多么激烈，也许决不会以传统的方式宣战”，但是，肯尼迪总统所阐述和意识到的“史无前例的和平与危险”“要求政府、人民，每一个企业家、工会领袖和报纸改变看法，改变策略，改变任务。”

这就是四月二十七日肯尼迪的演说的一个中心。一个极其重要的中心。这次演说，活生生地概括出美国总统在那里既要想伪装成和平与自由的天使，但同时又决心充当冷战与热战的祸首的两面态度，两面政策。

肯尼迪这次空前严厉地警告他的新聞界说：“如果报界等到正式宣战以后才对战斗情况的报道实行律己行为，那么我只能说没有任何战争对我们的安全的威胁比这（按指



报界的失密)更大的了。”很显然,肯尼迪这里是責怪他們的报界在对待美国不宣而战地入侵古巴的时刻,沒有“实行律己行为”。

美联社的新聞分析員罗伯茨在报道肯尼迪这次演說背景时写道:以肯尼迪为代表的美国官方当时曾經考虑要提出一項报界保密法令,而这一点“首先的考虑是为了保护中央情报局”。

被肯尼迪和美国官方渲染得有声有色的所謂“失密”,难道真的怪它們的新聞报刊嗎?

对美国报界进行指責的肯尼迪,大概是忘記了,就在他讲这些話的五个月以前,即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已經当选但还未上任的总統本人,就曾經指責过“艾森豪威尔政府一貫地采取封鎖重大公众情报的政策。”当时,肯尼迪再一次要求副总统尼克松发表一項有关美国实力的秘密报告。在这份秘密报告里,据說“有十个国家认为美国的軍事力量落后于苏联”。当时的国务卿赫脱,以及掌管这类秘密情报的主管人之一(美国新聞署前任署长)艾倫,都曾經干脆拒絕了肯尼迪提出的公开秘密情报的這項要求。

同肯尼迪一起大喊“不要声張”(加强保密)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納馬拉,在他沒有正式上台以前,同样也叫喊过,“放宽保密”應該成为国防部新聞机构今后的新方針之一。

可見得問題的玄妙并不在这里。

我們对于美国报章是否違背了它們的所

謂保密事項,当然不发生什么討論的兴趣。

引起我們兴趣的是:在世界公众面前,如果真正要說到美国的政治失密,那倒是确有其人!那就是美国今天的軍政头号首脑。不是別人,正是他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当前美国全盤的战略与战术。

卢蒙巴的被謀杀,暴露了肯尼迪笑臉之下的刀口是何等鋒利!

入侵古巴的慘敗,使肯尼迪很快贏得了“二十世紀海盜总統”的声名。

無論是派到老撾丛林里去的美国軍事“专家”,还是那派到南越土地上去的美軍“特种部队”,都暴露了肯尼迪准备进行有限战争的高度积极性。

派到东南亚去巡行的約翰遜的活动,說明了美国总統府的公事皮包里,究竟有多少骯髒的貨色,有多少玩弄政治阴谋的魔术棍!

如此等等,对于那些原来沒有认清和正在认清肯尼迪真正面貌的人們說来,都可以算是华盛顿白宮的真正失密!

肯尼迪亲手丢失了这一切重大“机密”。但是这又有什么奇怪?他的第一号助手、副总统約翰遜不久前还明白公开地表示:美国并不安于那一种让半个地球留在別人手中的和平“共处”!約翰遜的这种好战的申明,真正是泄露了肯尼迪的“和平战略”与冷战策略的根底。

美国当前最大的“失密者”,原来就是肯尼迪总統自己!



红旗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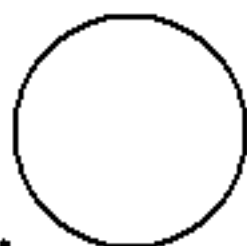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一年第十四期 ★

## 目 录



###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

领导方法 ..... 杜 敬 張先嘯 (1)

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增加市場供应 ... 季 龙 (9)

听书漫笔 ..... 王朝聞 (15)

論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 吳 江 (23)

美国种族关系上的“良好记录” ..... 陈 原 (33)

形式邏輯研究什么？怎样研究？ ..... 吳家國 (36)

关于形式邏輯对象和作用問題的討論 ..... (43)



•  
•



红旗



14



#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杜 敬 張先疇

关于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毛澤东同志根据我們党的丰富的实践經驗，概括为如下的一段話：“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屬正确的领导，必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說，将群众的意見（分散的无系統的意見）集中起来（經過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众中去作宣傳解釋，化为群众的意見，使群众坚持下去，見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驗这些意見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sup>①</sup>

这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見的方法，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是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相对立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它是我們党在各个时期中坚持运用的方法。当前我們党已經在全国处于执政党地位，毫無疑問，必須繼續运用这种方法来从事一切工作。

路线造成极为便利的条件。过去，反动統治阶级控制着国家政权，掌握着反动军队、警察等等镇压人民的工具，利用种种办法限制和剝夺人民群众的自由。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在革命根据地这部分地区我們党可以不受限制地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以外，在反动統治的地区，我們党不得不冲破重重障碍，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工作。我們党的許多优秀党员和革命群众，为此曾遭受敌人的监禁、拷打，甚至流尽了他們最后的一滴血。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情况根本改变了。反动統治的国家机器，已經被彻底打碎。人民共和国已經成立，政府和人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人民政权的各項制度，都是保障和便利人民群众享受各种民主权利的。党的政策一經制訂，就可以通过各級政府、党的各級組織、各种群众团体，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等各种工具，用各种方式向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傳，提高群众的觉悟，使他們在党的领导下自觉自願地行动起来，为实现党的政策

执政党的地位为我們在工作中运用群众

<sup>①</sup>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問題》。《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01頁。



而斗争。这种条件使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大大地加强了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但是，由于我们党处于全国执政党的地位，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有些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在他们看来，在过去的困难环境下，必须执行群众路线，而在新的条件下，似乎用一种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就可以完成任务，不必再作艰苦的群众工作了。同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等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还会从各个方面向我们党侵袭，并在一部分意志不坚定、作风不健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到寄生的场所。甚至可能有极少数品质恶劣的人，滥用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滥用群众对党的信任，站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做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在我们党处于全国执政党的地位以后，对于我们某些党员来说，脱离群众的危险性不是比过去减少了，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警惕。

我们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当前我们党的任务，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利用今天的联系群众的一切便利条件，十分注意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性，更好地发扬党的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遵照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指示，坚决地、彻底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 二

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首先要求我们的同志必须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sup>①</sup>。这是坚持群众路线的起码条件。

我们党的一切正确的政策、措施、领导意见，都是根据群众的意志和要求，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提出的，都是符合群众的利益和群众的觉悟程度的。而群众的意志和要求是什么，群众的觉悟现在达到了什么水平，客观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做什么和怎样做才符合群众的利益，只有深入于群众之中，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得到真正的确切的了解。解决任何问题的正确办法，都不是坐在屋子里空想，或者只凭道听途说的一点零碎片断的消息，就能找到的。主观任意地想出来的办法，只能是盲目的，不切实际的，不符合群众利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我们党所一贯反对的，是群众所不需要的。

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广大党员和干部，和群众同生死共命运，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正因为这样，我们党才能够经常地、深切地了解群众的心情，正确地、具体地了解客观实际情况，定出切合群众需要

<sup>①</sup>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6页。



的政策和措施。这是我們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建立了全国政权的时候，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就已經要求全党同志提高警惕，决不要因为胜利而驕傲起来，决不要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而不願再过艰苦的生活。我們的同志如果沾染上这些不正确的情緒，就会障碍他們深入到群众中去，就会脫离群众。毛澤东同志早在全国胜利的前夕指出：“中国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偉大，更艰苦。这一点現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务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風。”<sup>①</sup>

我們已經取得的革命和建設的胜利是巨大的，我們的事業在不断前进，然而我們永远不能为已有的成績而自滿。任何成績都是群众創造的。領導者只有深入于群众之中，充分依靠群众，虛心向群众学习，不断总结群众的經驗，才能领导群众前进，因而沒有任何理由驕傲自滿。群众对党愈信任，愈景仰，对党愈寄予偉大的希望，就要求我們黨員和干部愈加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切实深入于群众之中，恭恭敬敬地做群众的小学生。这样我們才能从群众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識，才能领导得更正确，为群众办更多的好事，领导群众取得更大的成績，而不辜負群众的信任和希望。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必須付出巨大的努力，进行艰苦的工作。因此，貪享受，图安逸，不願同群众一起过艰苦的生活，不願到群众中去做艰苦的工作的情緒，必須防止。如果有些人产生了这种情緒，就

必須坚决糾正。

干部要真正深入于群众之中，必須时时刻刻想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員，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分子。任何人不論职位有多高，都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群众中出现，用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决不許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气。这样，群众才会感到干部是他們自己人，是他們的知心朋友，他們才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讲出自己心里的話。如果干部沒有坚强的群众观点，沒有做人民群众的勤务員的决心，沒有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而自认为比群众高一等，那末，即使同群众接触，仍然会“高踞于群众之上”，而不能做到真正“深入于群众之中”。

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这是我們党对每个黨員的根本要求。剝削階級卑視人民群众，把社会上的人們分为貴賤尊卑的不同等級，把人民群众当作牛馬，当作牟利的工具。我們黨員和干部是同人民群众站在同等地位的。我們党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党相反，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我們党一貫地教育黨員，要不断地同剝削階級的那种旧观念的殘余进行斗争，彻底清除其影响，更自觉地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做人民群众的勤务員。在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干部对群众愈尊重，愈能用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群众的主人翁感就会愈强。群众的主人翁感愈

<sup>①</sup>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屆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上的报告》。《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440頁。





强，就愈能主动地出主意、想办法，同干部一起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样，领导工作中的“从群众中来”，就有了更好的基础。

### 三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一切正确的领导意见，各项正确的政策、措施、计划和方案，没有不是来自群众的实践经验的。离开了群众的实践经验，就必然陷于主观主义的错误，就不可能有任何正确的领导。

任何领导机关制订的政策、措施、计划、方案，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领导机关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在物质生产部门中，要生产产品，必须有原料。有多少原料，就可以生产多少产品；有好的原料，就可以生产好的产品。领导机关在制订政策、措施、计划或方案的时候，也是如此。群众的意见和经验好比是原料或者是半成品，领导机关好比是加工工厂，政策、措施、计划、方案等就是加工工厂生产的产品。领导机关必须“从群众中来”；根据群众的意志和要求，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进行分析研究，进行加工制作，然后才能订出恰当的政策、措施、计划或方案。集中起来的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愈丰富，或者说集中起来的原料和半成品愈充足，领导机关制订出的政策、措施、计划或方案就愈正确，愈能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的需要。

思想是客观实际的反映，这是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观点。不用说凭空想出来的东西

决不可能符合实际，就是只看到一点，只搜集到群众中一些片面的意见和零散的经验，就贪图便宜地、不加分析地借以制订政策、措施、计划或方案，也不是尊重唯物主义的态度。

群众的意见，群众的经验，往往是比较分散的，不系统的，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但是，决不能因此而贬低群众的智慧，否认群众的伟大创造力。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sup>①</sup>毛泽东同志这里说的是文艺，但是它的道理适合于一切观念形态的领域。任何领导者如果不从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这个唯一源泉中吸取营养，就不可能形成任何正确的领导意见。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把群众分散的、不系统的、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意见和经验集中起来，综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sup>②</sup>，使它成为集中的、系统的、有条理的意见和经验。这个过程，也就是领导者发挥加工工厂作用的过程。我们必须认识这样一个真理：任何领导者在把群众的分散的、不系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2页。

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0页。



統的意見和經驗集中起來，加工成為集中的、系統的、有條理的意見和經驗的時候，除了運用群眾提供的原料和半成品以外，決不能把自己任何主觀主義的空想附加進去，否則，他就不是唯物主義者。

要認真地搜集群眾的意見，必須深入實際、深入群眾，進行細致的調查，而不能只靠在辦公室里聽匯報、看報告。聽匯報、看報告是需要的，但是，只靠這個，是不能得到對實際情況的真正具體的了解的，更不用說對所聽的匯報、所看的報告進行認真的審查了。“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對於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sup>①</sup>只有按照毛澤東同志指出的辦法，經常有計劃地進行這樣的調查，我們才能獲得對於實際情況的正確的了解，才能真正集中群眾的意見。而且，領導者的親身調查，能夠造成一種實事求是、大興調查研究的風氣，還能夠在調查方法上給一般同志，特別是缺乏工作經驗的比較年輕的同志（他們在我們的各個工作部門中占多數）做出榜樣，使他們學會怎樣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來進行調查研究工作。

當然，我們在向群眾進行調查，聽取群眾意見的時候，應該置身於群眾之中，虛心向群眾學習。群眾的智慧和經驗是最豐富的，群眾的創造力是最偉大的。毛澤東同志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

起碼的知識。”<sup>②</sup>毛澤東同志就是我們虛心向群眾學習的榜樣，他說：“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sup>③</sup>我們只有像毛澤東同志那樣具有謙虛謹慎的態度，群眾才願意同我們坐在一起討論問題，研究問題。否則，我們就會聽不到群眾心裡的意見，即使下去調查了，也會得不到對真實情況的了解。

#### 四

群眾的利益，群眾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客觀標準。因此，經過調查研究，根據從群眾中來的東西所制訂的一切政策、措施、計劃、方案等等，再到群眾中去實行的時候，還必須接受群眾的檢驗，接受實踐的檢驗，才能證明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

在到群眾中去的过程中，凡是被群眾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東西，都要堅持；凡是被群眾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東西，不符合群眾要求、不切合實際的東西，都必須堅決修正。這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態度，這是真正對人民群眾負責的態度。毛澤東同志說：“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sup>④</sup>毛澤東同志又說：“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

①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89頁。

② 同上書，第790頁。

③ 同上書，第791頁。

④ 《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6頁。



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負責。”<sup>①</sup>这就告訴我們，判断正确和錯誤的唯一标准，是合乎还是不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如果某一个领导机关提出的政策、措施等等有了缺点或錯誤，就必须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評，勇于改正；在自己觉察到了某种缺点錯誤时，就应当主动地、誠懇地向群众作自我批評，主动地加以改正。这样，群众就会亲切地感到这个领导机关是代表群众利益的，是对群众严肃負責的，他們也就能够更信任这个领导机关。相反地，如果有了缺点或錯誤的时候，不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首先考虑领导干部个人的“荣誉”、“威信”，計較个人得失，因而遮掩搪塞，不去正視，不认真改正，他們就会損害群众的利益，丧失群众对他們的信任。

我們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的結果，都是对成績和缺点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結果。要繼續取得胜利，就必须繼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单位所提出的某項办法或措施，經過实践的考驗已經证明不符合群众的要求，不符合实际情况，仍然不改正，还要繼續推行，那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不是对人民負責的态度。我們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們必須像刘少奇同志所說的那样，“要善于为人民服务，要服务得很好，而不要服务得很坏。因此，我們在人民面前，一切都不应采取輕率态度，而应采取严肃的負責的态度。”<sup>②</sup>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而提出的政策、措施等等，即使是完全正确的，在拿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时候，也必须同群众商量，启发群众的自觉，使政策的实行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当群众还没有这种自觉的时候，我們就要耐心地等待，繼續向他們做工作。以为在“集中起来”的时候，要听群众的意見，在“坚持下去”的时候，就不要再听群众的意見了，只要按照领导者的意見办事就行了，这种看法是完全錯誤的。毛澤东同志告訴我們，进行工作要遵守两条原則，“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願”<sup>③</sup>。把群众的意見和要求集中起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見，这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领导机关形成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以后，还要有比較恰当的方法告訴群众，引导群众自願地行动起来，这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我們必須了解，即使我們提出的政策确实符合群众的需要，但是如果群众还没有这种觉悟，还没有决心，还不自願来实行这种政策，任何领导机关都没有权利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强制群众执行。否則，好事情也会办坏。

有一些政策和任务是上級领导机关提出的，要下級去执行。在这里就有一个对上級負責和对群众負責的問題。由于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对上級领导

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們的方針》。《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128頁。

② 《論党》，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4版，第46頁。

③ 《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战线》。《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11頁。



机关負責同对群众負責是一致的。凡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就是对党有利的事情，就必须坚决地去做。凡对人民不利的事情，就是对党不利的事情，就必须反对，必须避免。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每个党员对人民負責，就是对党、对上級負責；对人民不負責，就是对党、对上級最不負責。我們必須把对党、对上級負責和对人民負責这两者完全一致起来，而不要对立起来。但是，要在执行政策、完成任务的实际效果上达到这种一致，必須經過深入細致的工作过程。因为，上級领导机关提出的政策和任务，是集中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加以系統化、条理化了的东西，必須經過深入的宣傳解釋，才能使群众理解它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并为群众自願接受。而且群众当中总是有觉悟得比較快的和觉悟得比較慢的，对于后者則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如果认为上級领导机关提出的政策和任务既然是代表群众的利益的，就可以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执行，那是錯誤的。同样，如果因为群众还不願意实行上級提出的正确的政策，需要耐心等待，因而根本不向群众做工作，以致使正确的政策不能实行，那当然也是錯誤的。这两种做法，从不同的方面把对上級领导机关負責同对群众負責割裂开来，其結果既不能对党負責，也不能对群众負責。

在不同地区、不同具体情况下，需要有不同的具体措施，才能正确地执行政策，圓滿地完成任务。因此，对于上級领导机关所提出的正确的政策和任务，也必須充分地同群众商量，根据群众的意見定出适合于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具体措施，决不当简单从

事。如果认为上級已經把政策和任务規定好了，我們就可以不动脑子了，可以不进行艰苦的工作了，那是不会有好的效果的。

在执行上級领导机关的政策或任务的时候，如果实践证明某項具体政策或具体任务不符合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不符合实际情况，就应当以对党和对群众負責的态度，向上級反映，要求上級修改該項政策或任务。上級机关必須傾听下級組織的意見，認真处理，并且按照党章的規定切实保障党员干部和下級組織在这个問題上所享有的权利。

我們党员和干部对党負責，对上級领导机关負責，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对群众負責，为了群众的利益。“必須对人民群众負責，才算是尽了最后与最大的責任。”<sup>①</sup>如果明明知道上級提出的某項政策或任务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自己也不反映，馬虎敷衍，勉强执行，那就是对人民群众沒有負起責任，也就是对党、对上級领导机关沒有負起責任。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要經過艰苦、复杂、深入、細致的工作；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仍然需要进行艰苦、复杂、深入、細致的工作。这样才是完整的群众路綫，才能把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

## 五

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方法，我們就可能获得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認識，就可

<sup>①</sup> 刘少奇：《論党》，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4版，第46頁。



能制訂出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计划、方案，就可能对工作实行正确的领导。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客观过程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全被人们所认识；同时，客观过程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认识如果不随之发展变化，思想就会落后于客观实际。因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能只是简单的一个过程，而必须是反复循环，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这就是说，我们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意见的工作，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进行加工制作的工作，将系统化的意见拿回到群众中去考查检验的工作，都不能只进行一次就引为满足，而必须循环反复、不断地进行。不仅制訂总的政策、方针和整体的计划、方案，需要多次反复地坚持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就是制訂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局部的计划、方案，也需要若干次这样的反复；不仅认识重大的客观规律需要多次这样的反复，就是认识具体工作的规律性也需要若干次这样的反复。而每一次集中起来，每一次坚持下去，就会使我们对客观情况的认识一步一步地深化，从而使我们的政策、措施、计划、方案不断地得到新的补充、修正和发展，使它们更符合外界的客观世界，使我们的领导经验一次比一次更丰富，更正确。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紧密地依靠群众，在实践中努力学习，认识和掌握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因而取得了两次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党继续坚持群众路线，

继续在实践中努力学习，我们也已经学到了许多东西，增长了許多知識，积累了許多經驗，这是我們今后进行建設工作的巨大財富。但是，要彻底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我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东西要学。这就要求我們要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更好地总结群众在实践中的經驗，向群众虚心学习。我們必須像毛澤东同志告訴我們的那样：“我們必須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学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sup>①</sup>要做到这一点，我們又必須像毛澤东同志告訴我們的那样，“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sup>②</sup>只要我們不断地向实践学习，不断地向群众学习，进一步提高我們执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在一切工作中都认真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我們就可以进一步掌握社会主义建設的客观規律，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任务。

① 《論人民民主专政》。《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485頁。

②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5頁。





# 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 增加市場供应

· 季 龙 ·

日用小商品同人民日常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 举凡衣、食、住、行, 从物质生活到文化生活, 都离不开日用小商品。日用小商品是由手工业和輕工业部門生产的, 其中主要是由手工业部門生产, 它的品种繁多, 行业复杂。就品种来說, 从簡單細小的发卡鞋眼, 鎖針刀剪, 到鍋碗瓢勺, 桌椅板櫈, 衣帽鞋袜, 等等, 其中有很多是享有声誉的傳統名牌产品, 丰富多采, 数以万計。生产日用小商品的行业, 主要有日用小五金、日用小百貨、炊事用具、日用家俱、竹藤棕草編織、服装鞋帽、文教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日用陶瓷、日用杂品、修理服务, 等等。日用小商品生产的經營也很灵活, 既有成批生产, 也有零活加工、翻新补旧; 既有固定工厂, 也有串街串乡、流动服务。由于日用小商品生产具有这些特点, 就能够适应广大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多样的需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們对日用小商品的需要, 不仅在数量上越来越多, 而且对品种、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这就要求迅速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 增加市場供应, 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

目前, 各地都根据日用小商品生产的

特点, 从有利生产、方便群众出发, 对广大人民的需要和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的情况, 进行深入系統的調查研究, 认真总结已有經驗, 这对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有着重要意义。

**充分发挥傳統生产力量, 具体安排日用小商品生产的供产銷关系。**

我們国家的經濟是计划經濟, 日用小商品生产也必須有計劃, 在整个国民經济中, 对于日用小商品的供产銷要做到統籌兼顧、合理安排。日用小商品虽小, 但不可缺少, 如果忽视了对它的生产安排, 就会給人民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因此, 在整个国民經济計划中, 必須有日用小商品的“戶头”。只要安排得当, 工作細致具体, 日用小商品生产就会得到很快的发展; 否則, 某些品种就有被挤掉的可能。当然, 日用小商品生产的計划, 不可能同大工业生产的計划一样, 它需要更多地強調地方的积极性, 还要給企业有安排生产的灵活性。根据中央和地方相結合的原則, 实行按行业、按产品分級管理, 做到上下左右密切协作, 責任分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管理的計划产品, 只能是主要产品, 不





能統得过多过死。

做好日用小商品生产的全面规划、合理安排，在当前必须以傳統产区、傳統产品为重点。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傳統名牌产品和出口产品，需要在全国范围或省、市、自治区范围内进行重点安排，发挥傳統产区的生产基地作用，用傳統的合理的生产方法，制造历来为群众所欢迎的傳統产品，注意保持和发扬这些产品的特色，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增加数量，增加品种。同时，把合理的傳統的供銷关系适当地固定下来，采取傳統的合理的經營方式，有计划地組織各地自由訂貨，以适应傳統市場的需要。在重点安排傳統产区、傳統产品的同时，要适当地发挥一般产区和新兴产区的作用。对于近几年来建立的一些日用小商品生产基地，凡是产品合乎规格质量要求的，也应该很好地安排生产，积极发挥它們的作用。除了現有的生产力量以外，各地还可以根据需求和可能，建立一批新的生产基地，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供应。

保证日用小商品生产稳定增长的一条重要措施，就是把生产单位、生产人員、产品品种、原料材料供应以及协作关系固定下来。各地行之有效的經驗是：县以上各級管理的計划产品，技术比較复杂的重点产品、傳統名牌产品和出口产品，要坚决定住，把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人員长期稳定下来，固定原料材料供应和协作关系。上述产品以外的日用小商品，凡是人民生活和市場普遍需要的，一般都要通过这类办法，适当地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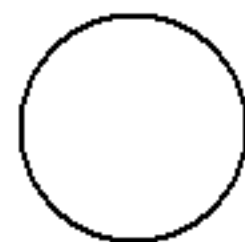
定下来。有关多种經營、季节性生产以及其他不宜定死的产品和企业，可以采取一业为主或几业为主、多业为輔的办法，或者以生产日用小商品为主、兼营其他方面服务的办法，分别进行具体安排。

**正确对待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的所有制，充实和加强日用小商品的生产力量。**

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的所有制，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应该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以集体所有制为主，同时允許必要的社会主义經濟领导下的个体經營。

毫无疑问，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需要有一部分机械化程度較高、适宜于較大規模集中生产的国营工厂作为骨干。但是，日用小商品的品种繁多，国营工业生产的只能是其中一部分技术性較高的主要品种，絕大部分日用小商品更适合于由手工业合作組織和人民公社工业生产。因此，从事日用小商品生产的国营工业，一方面，应当“安于小、精于小”，集中力量把承担的主要产品搞好；另一方面，要积极帮助手工业合作組織和人民公社工业提高技术，改进設備，培养技术力量。

集体所有制，在目前和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內，对于大多数手工业來說，它能很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手工业工人的觉悟程度，因而，手工业合作組織和人民公社工业是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的主要力量。它們小而分散，經營灵活，产品多样，可以充分利用地方資源，适应地方需求，所



需的技术、設備也較简单。为了适应群众多种多样的需要，在安排日用小商品生产的时候，应该重视并且加强各种手工业生产組織，充实手工业生产的基本队伍。在充实和加强日用小商品生产队伍的时候，应该重视技术力量的培养。各地采取的发挥能工巧匠的积极性，組織老手带新手，熟手带生手，提倡师傅带徒弟，提倡尊师爱徒等培养接班人的办法，应当加以推广。同时，还要有计划地安排青年徒工学艺。鼓励手工业工人带自己的子女进厂进社学艺。允許个体手工业者自己收徒弟。

某些适宜于由个体手工业者經營的修理服务业和零星产品，也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应当允許他們在手工业合作組織或人民公社的领导下进行独立劳动，自产自銷，或者流动修理，串街串乡，方便群众。

城乡家庭手工业，对于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的补充作用也不可忽視。城乡居民所使用的日用小商品，不少是由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特别是某些零星、細小的日用小商品，由家庭手工业来生产最为适宜。它們承担一部分日用小商品生产任务，既經濟方便，有利于挖掘人力、物力的潜力，增加生产，增加市場供应，增加家庭手工业者的收入，又可以使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的力量，更多地集中在比較主要产品的生产方面。家庭手工业，可以自产自銷；可以由商业部門加工訂貨；可以由人民公社或者手工业联社，組織手工业供銷生产社或生产小組，統一領導，分散生产，发原料，收成品，支付

工繳費。

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除了极少数产品适宜于集中生产需要較大的規模以外，一般說来，規模适宜于小一些，分散一些，不宜过大。这样，才有利于生产，方便群众。

### 改进工资制度，保证职工的合理收入。

随着日用小商品生产的发展，职工收入应该有相应的增长。我們既要教育职工群众認識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也要坚决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則。在評定职工工资的时候，应该根据技术繁簡、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的不同，評定合理的工资等級，保证技艺高的职工有較高的工资待遇。对年老体弱的老师傅，要适当加以照顾。师傅带徒弟，要給师傅一定的教学津貼，带得好的还可以給予奖励。农村中学徒的待遇，应当不低于当地同等农业劳动力的收入。

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的工资，应当采取不同的形式。凡是任务比較固定，分工比較明确，便于按成品、按工序計算产量的，可以采取个人計件或者小組計件工资制。凡是产品零星复杂、生产变化性大，或者工序之間协作性强，难以按件計酬的，可以采取計时加奖励的工资制度。无论采用哪种工资形式，都要貫徹“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則。实行計件工资的，要特別注意产品质量和劳动定額問題，防止单纯追求数量，忽視质量的傾向。实行計时工资的，要特別注意做好奖励工作，可以采取单项奖和綜合奖相



結合的办法。

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工人和人民公社工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必須同企业的生产水平和社会工资水平相适应。在城市，可以大体相当于当地同工种、同等技术条件的国营工厂工人的工资水平，现在工资水平偏低的，要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在农村，可以按照历史习惯，高于当地农民收入的水平。至于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职工福利待遇，更要根据企业的生产发展水平和经营好坏来决定。企业办得好的，福利可以多一些；企业办得差的，福利应当少一些。

**日用小商品所需的原料材料极为复杂，必須根据国家分配和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解决原料材料的供应问题。**

根据各地的经验，在解决原料材料供应问题的时候，一般是根据各种产品所需原料材料的不同情况和当地的具体条件，把加强国家统一分配的計劃性同发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积极性结合起来，通过主管部门同地区相结合、并以地区为主的办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多方面开辟原料材料的来源。

日用小商品生产所需的原料材料，有一小部分需要纳入計劃由国家统一分配。这些原料材料，主要是鋼材、有色金属和某些化工原料，虽然需要不多，但是缺了不可，如果在計劃中稍加平衡，就可以解决很大问题。例如，一吨鋼絲可以做三百多万根縫衣針，一吨鋁可以电鍍七千多万把民用剪刀。

日用小商品生产所需的原料材料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需要依靠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建立和发展原料材料基地来解决。大工厂的边角下料和社会廢棄物資，是日用小商品生产的原料材料的重要来源。这些原料材料，除了某些廢品要由国家统一分配以外，其余都应优先用于日用小商品生产和修补行业。在利用大工厂的边角下料方面，某些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采取了同大工厂建立固定协作关系的办法，解决了原料材料的供应问题。某些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和修理服务点，按照传统习惯，接受来料加工和带料修理，回收某些廢品自用等办法，也应当加以提倡。

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所需的属于第三类物資的原料材料，商业部門经营的由商业部門负责供应。但是，这类原料材料的品种很多，不可能完全由商业部門来供应，需要由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自行收购一部分。特别是某些日用小商品所需的特殊原料材料，如硬杂木、小杂竹、玉石、鱗皮、馬尾、犀牛毛、蚌壳等，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可以直接到产地自购自用。

**适应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应当广开生产門路，增加花色品种，改进产品质量。**

利用“土”原料，生产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土”产品，是我国手工业劳动者长期积累起来的一条宝贵经验。例如，利用葫芦做水瓢，利用高粱秆編鍋盖，利用柳条編水斗，等



等。发展这些“土”产品，既可以就地取材，又经济适用。这些“土”产品，是我国群众首先是农村群众所习惯使用的。以多种原料生产同类产品，既经济，又丰富多采。采用机器生产同手工业生产相结合的办法，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从多方面安排生产，开辟货源，对于增加日用小商品的品种、数量，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我国历史上某些日用小商品生产具有制造、销售、修配相结合的特点，在不影响商业部门统一安排和市場管理的前提下，适当开展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的自产自销业务，提倡前门设店、后门设厂的傳統经营方式，使产销直接见面。这样，就有利于加强生产部门和广大群众的联系，有利于改善经营管理和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有利于鼓励生产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人民群众对于日用小商品的要求，不仅是数量多，花色品种多，而且要经久耐用。所以，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不仅要注意增加数量、品种，而且要更多地注意提高质量。为了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应该明确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尽可能地制订产品质量标准，并且采用群众检查和专人检查相结合的产品检验制度，坚持和提倡包退、包换、包修的傳統做法。对于一些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声誉的傳統名牌产品，更要注意保持、继承和发扬这些产品的固有特色，精益求精。傳統名牌产品，其所以能够流传久远，以至远近驰名，是因为那些生产单位和名工巧匠集中了多年来群众的智慧，并經

过无数次創造和改进的结果。这些产品一般具有质地优良、式样美观、独具风格、经久耐用的特点，一向为群众所欢迎，生产这些产品的技艺人员也永远为群众所尊敬。至于工艺美术品，更是我国手工业丰富多采的花丛中一簇鲜艳夺目的花朵。很多精致美观、瑰丽动人、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的工艺美术品，既是实用品，又是艺术品；既有经济价值，又有艺术价值。它同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保护、发展和提高的方针指导下，广大技艺人员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創造出许多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工艺美术品。这些工艺美术品，在美化人民生活、增加出口和促进国际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必須在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中，继续进行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根据需求和可能，有计划地试制新产品，在试制成功的基础上进行生产，以适应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

**民主办企业、勤俭办企业，是办好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的根本方针。**

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要根据这一方针，来努力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建立和健全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一般说来，生产日用小商品的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是生产日用小商品企业的骨干，应该有一套比较健全



的規章制度。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小组和人民公社工业的規章制度，要更多地注意簡便易行。为了有计划地安排生产，企业应当根据自己的生产特点和經營管理水平，依靠群众，制訂年度、季度和月度生产計劃。农村手工业、公社工业要适应农村特点，注意农业生产的季节性，除了某些必須常年生产的以外，都要实行亦工亦农，农闲多办，农忙少办或不办的方針。城市公社工业要适应这些企业以家庭妇女为主要成員的特点，对参加公社工业的家庭妇女，要注意工作時間不要过长，有些可以領料回家生产的，应当让她们領料回家生产。修理服务业的管理制度，要更多地从便利群众出发，營業時間要适应顾客要求，交貨時間要尽可能地縮短，修理的质量要有保证，价格要公平合理。

一切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都要貫徹执行群众路綫，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办好企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要充分发揚原有的民主办社的优良作风，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各項民主管理制度，民主选举理事会、监事会，生产計劃、供銷安排、組織調整、收益分配等一切重大問題，都要經過社員大会或者社員代表大会討論決定。人民公社工业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經驗，同时充分吸收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好的經驗，加强民主管理。从事日用小商品生产的国营工厂，也要結合本身特点，扩大民主管理范围。这样，才能充分地發揮广大职工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办好企业。

一切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要严格实行經濟核算，加强财务管理，厉行节约，发揚因陋就簡、精打細算的优良傳統。为了防止和克服劳动力浪费和生产中无人負責的現象，企业还要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力求减少脱离生产的管理人員，合理地組織劳动力。为了合理使用原料材料，必須建立和健全原料材料收发保管和合理配料制度，制定原料材料消耗定額，充分利用廢品、廢料和代用原料，防止原料材料丢失、霉烂和大材小用、优材劣用等浪费現象，并且力争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少用料、多出貨。此外，企业还要合理地使用資金，认真控制一切非生产性的开支。

为了更好地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一切生产日用小商品的企业，必須在各級党委的领导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干部和工人，进一步树立一切从国家和人民需要出发的思想，正确認識到我們社会主义国家中，尽管社会分工不同，但是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同样都是光荣的、崇高的工作，决没有什么高低貴賤之分。从事日用小商品生产的企业不能棄小就大，見異思迁。作雨伞的、作鈕扣的、修鍋的、补碗的等等百行百业的职工，都要充分認識到日用小商品生产是一項青春常在的事业，安心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满腔热情地去增产日用小商品，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 听书漫笔

王朝闻

理的演说，正如轻音乐不轻松，漫画不滑稽，工艺美术不美观，动机是好的，可惜效果和动机难免吵架了。

说唱艺术的娱乐性，不只表现在嘴上，也表现在说、表、弹、唱、做等各个方面。不论那一方面的欣赏，都需要发挥它的娱乐性。满足娱乐要求和发挥教育作用，都要依靠调动听众想像，启发听众思索。完全不动脑筋的曲艺欣赏是不可思议的；怎样适当地让听众开动脑筋，使他们和演员一同“创造”形象，得到了欣赏的满足，从而接受思想上的影响，是曲艺的技巧高低的重要标志。

说唱，特别是评书，塑造形象的主要长处是细致入微，唯妙唯肖。不如此不能满足听书（而不是读小说）的要求。细致入微不只是为了生动地再现生活，也为了更有思想的力量。评书《林海雪原》描写杨子荣的马看见老虎时的各种反应，如果不是描写得有声有色的，那么，杨子荣打虎的故事就不那么动人吧！打虎的故事，例如几种打法，如果只有一些粗略的线索，也不能引起更大的感动。但是，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它究竟是一种艺术，不应当和生活本身没有区别。包括语言在内，不能不避免噜囔。“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是对于诗的要求，也是对于评弹

艺术作品能不能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要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要看作品的内容是不是切合人民的利益，一方面要看它的形式合不合人民的审美兴趣。作品是不是民族化群众化，关系它能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曲艺对听众起娱乐作用，同时又是一种教育工具。曲艺的教育作用，和满足娱乐的要求不冲突。它的好处是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曲艺运用形象的有趣的形式，诱导人们体会其中的思想内容，作为教育工具，不采用枯燥的说理的形式。曲艺有它的特殊规律，可是就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而论，它也包含着不只是对于曲艺家才有借鉴意义的一般的艺术规律。

曲艺的教育作用是广泛的。具有重大主题包含着革命的思想内容的作品，它的教育意义自不必说。就以不包含什么深刻思想的某些噱头来说，由于它表现了人民的智慧、才能、创造性，应当说也是有教育作用的。

问题在于怎样发挥教育作用。听众来听曲艺，首先为了娱乐，不是到娱乐场中来听教训。把教育解释为教训，把相声变成讲道





的要求。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效果上看来，从听众的感受而不是从段子本身看来，唯妙唯肖，细致入微和洗炼、明快、单纯、含蓄的要求可以统一。张效生说杨子荣的马，怎样在雪地上踏出与非雪地不同的蹄声，细致极了；但是用语那么干净利落，不至令人感到腻味。语言和动作的堆集，不是评弹所要求的丰富和充实。真正的丰富和充实，不能只从表现形式本身来考虑，也要从它在听众中所形成的效果来考察。张效生说常遇春要座下的马跃过围墙，只抓住马的几根鬃毛，让它感到疼痛，服从指挥。在这儿利用了评弹的自由，作了如下的比喻：马鬃像人的头发一样，大把抓住不疼，只抓几根就疼极了。这样的比喻，已经够细致了吧？但它的力量在于能够让听众联想到人的生活经验。不能引起听众运用想像，从而好像进入了更大的生活境界的语言和动作的模仿，都不是艺术所需要的丰富和充实，因为它是没有多大力量的。

在群众中长期受到考验而成长起来的这种艺术样式，当它反映生活，例如塑造人物的时候，为了形成形象的真实感，方式多种多样。有时是实写，有时是虚写。虚实相生，变化无穷。曲艺的形象必须具体，可是在方式上，有时不过分着力模仿角色的具体动作，以细致入微、淋漓尽致见长的评书，也讲究含蓄。为了具体描写人物的行动，有时说书人只依靠头和视线的倾向稍稍一点醒，听书人也就想像到此时此地角色在行动中的具体表现。描写角色面对可惊的事物，不一定模仿其惊恐的状态，只是在适当的时机，用一

种从容的专注的有时甚至可以說是沉吟的神气，吸引听众关心演员所介绍的生活，诱导听者发挥想像，深入体会角色的心情，让听众自然而然地接受作品的思想。曲艺，就怎样运用有限的说、表、弹、唱、做，使形象较之生活本身更集中，更有概括性这一点而论，它和诗有共同点。

虚虚实实的表现形式，是拥有丰富经验的曲艺演员懂得听众的审美能力的表现。在《闹江州》里，林红玉描写鲁莽的李逵，常常是像善于给孩子们讲故事的人那样，低言细语。包括李逵向酒家要酒和张顺斗口在内，唱和做都不作兴简单地表面地模仿李逵的外形而大喊大叫。这种力求神似而不满足于形似的演唱，巧妙地表现了李逵的神情。又如，在相声《文章会》里，演员描写一个湖和湖中的一座山，用了两个看来显得轻而易举却也巧妙的手势。表演者在说湖的同时，把双手向中间一围，给人们带来了湖的形象。这种仿佛抽象的手势，不见得比笨拙的如实描写逊色。有些不信任听众的审美能力，也忽视艺术的集中性和表现力的演唱者，在一段唱词中描写几个人物同场的时候，一会儿面朝左，一会儿面朝右，老在台上转换位置，其结果不是丰富了形象，加强了表现力，而是表现形式的简单化。不是扩大了艺术的境界，而是缩小了艺术的境界。拉长了听众与作品之间的距离，演出吃力，听众也感到吃力，节目的鼓动作用就被削弱了。

不仅听评弹才有想像以至思索的心理活动，就是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只听见上半句话就猜出了下半句话，不只因为听话的人有



敏捷的感受能力，而且因为听话的人在迅速地进行猜测。当孩子们高兴地谈论一些有趣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不都是大说大笑的；有时仿佛唯恐趣味会受惊吓而溜走，故意低声讲述。听者不大容易听见，也就更想要听得一清二楚，一点不漏。在这儿，我感到有经验的说书人，有时故意用小声说表的技巧的现实根据。在艺术欣赏里，有了欣赏者的关心、注意以至想像活动，有限的形象才能使人感到它是饱满和丰富的。苏轼认为：“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没有欣赏者的“合作”，意味深长的语言很难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传统的曲艺运用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语言，有些是貌似肯定，实系否定的。正如寓庄子谐、俗中见雅那样，貌似肯定、实系否定的语言形式，其妙处在于能够引起思索，加强了说唱的娱乐性，也加强了内容的说服力。相声行家侯宝林介绍相声的手法之一的“道反”，也是为了给听者造成怀疑，不信任，然后由听者自己解除了怀疑，从而取得更深的信任。评弹《探监救兄》里的狱卒，其实并不精明，犯人和来访者调换了他也不明白。可是他吹牛，说自己十分精明，有“苍蝇飞过能辨雌雄”的大话。这种朴实的技巧也具备和“道反”相同的性质。引起思索也是发挥曲艺娱乐作用的手段。怎样引起思索要靠表演者的技巧。

演员常说，表演要避免“瘟”和“火”。这也是从欣赏者的审美要求出发的。“瘟”的对立面不是“火”，而是认真，有表现力，“坑”得住人。“火”的对立面不是“瘟”，而是游刃

有余，似不经心而又丝丝入扣。“瘟”和“火”其实和真实反映现实的要求不一致。这一问题所以重要，不仅关系形象的真实感，而且关系对听众的影响。听众不欢迎“瘟”的表演，也不欢迎“火”的表演。有人认为说书人应当忘记自己是说书人，最好像戏剧演员那样进入角色，这种想法未必正确。那怕是戏剧演员，要是完全忘了台下的观众，毫不意识到自己同时是演员，表演容易“瘟”。曲艺演唱者首先是处于第三者的叙述者，而不首先是书中的角色，不是书中的事变的参与者，必须防止表演的“火”气。“火”气很盛的表演，其实是还没有深刻认识描写对象、胸中无数、抓不住要点的表现。这种表演，妨碍听众的想像活动，因而和“瘟”一样，结果都不适应群众的审美要求，影响表演应得的教育效果。比如说，处处用手势、表情以至身姿来给词句的含义作翻译的不留余地的表演，好像卖劲，可是不能确切地把词句的含意翻译过来，更不逗人喜爱的是，它妨碍听众深入体会词句所包含的深刻内容。根据自己的欣赏经验，面对着评弹或其他艺术，感到不是一种简单的接受，而是有所体会的。欣赏的乐趣在于接受，也在于发现。如果艺术家只把生活现象简单地转交给听众，而不争取调动听众的想像，“参加”到形象的“创造”中来，那么，不论你在台上笑得多么起劲，哭得多么难受，说真的，听众可能除了在理智上承认你是在卖劲之外，情感是激动不起来的。

通俗易懂是一切曲艺的特色。口头文学的评弹，和供人阅读的诗歌、寓言、小说的区别之一，是前者不是个人手中的书本。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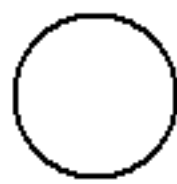
讀快讀慢，可以自由支配。后者是多数人在公共場所里共同欣賞的对象，說唱按着一定的速度进行，听众不便于反复吟咏，所以，說唱的詞句力求通俗易懂。为什么曲艺必須說得“伸展”，唱得“伸展”，做得“伸展”，也包含易懂的要求。但它既是一种文艺作品，单說詞句，不能是乏味的水詞，仍然力求其有味道，經得起吟咏。曲艺的說表，不論時間多么短暫，也必須是可供吟咏的。所謂吟咏，其实也就是一种运用想像的心理活动。在評彈段子《梨園》里的高力士，向唐明皇报告楊妃突然来到，說：“启禀陛下，大事不好！”唐明皇說：“何事惊慌？大不了兵临城下”。高力士說：“兵临城下还没有这样危險！”这是噱头。只看見这儿句易懂的引文而不听評彈，也会感到可笑的吧？但是，为什么我們会感到这样的對話可笑呢？能不能說，完全没有自己的吟咏以至思索的心理活动在起作用呢？

高尔基給小說《卡巴耶夫》的作者富曼諾夫的信上說：你“写得不經濟，話太冗长，有很多的重复，还有很多的說明。这些說明是您对自己和讀者的智慧不信任的明显标志。”評书不是小說，沒有較之小說更多穿插和鋪叙是不动听的。而且既然有評，說明式的話語总少不了。但是，包括說明式的話語在內，也必須是洗炼、明快、單純和含蓄的，不然也不动听。前几年我在南京听当代評书老将王少堂的《武松醉打蔣門神》，觉得連說明式的語言在內，也不是枯燥无味的，而是符合高尔基对小說所要求的艺术性語言。他說明蔣門神为什么不懂得躺在地上的武松使用的

拳术“醉八仙”是一个备战的架势，同时又說明他为什么能从武松此刻瞄他一眼的那种灵活的眼光，发现了武松装醉的破綻。这些說明，不只是一种說明。从效果看，它以蔣門神的心理活动为重点，其实是矛盾冲突的一种变形的描写，它关系着人物性格和斗争的发展，所以听起来一点不觉得噜囂。至于蔣門神印象中的武松那种灵活的眼神，究竟是怎样灵活的样子，信任听众的王少堂却省略了，有待听书人加以想像。

強調欣賞者的想像活动，不是忽視艺术必須是生活真实的反映这一原則。恰恰相反，正因为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又能喚起欣賞者相应的想像，讓他們联系着更廣闊的生活，更便于認識生活的內涵意义。只有真实的形象，才能够調动听众相应的想像活动。形象所直接反映的内容总是有限的；只有能够調动听众相应的想像的形象，听众才能够在感受上丰富它。說书人信任听众，把他們当成知音，运用高明的技巧，塑造活生生的形象，从而启发听众，喚起想像，听众感到亲切，才乐于接受鼓动。

我国傳統的說唱艺术，好处之一，在于一个人的表演可以把听众带进人数众多，行动复杂的廣闊境界。集中化精炼化不是艺术落后的表现，而是人民拥有丰富的智慧和卓越才能的表现。四川金錢板《秀才过沟》，是靠一个人表演的节目，具备上述优点。这段金錢板的主题，是諷刺本本主义的知識分子，一切行动都要在本本上找根据。正要到人家作客，不明白怎样过沟的秀才，問道于农民。农民告訴他跳，他并着双脚一跳，掉进水沟里。



弄髒了新衣，做不了客人的秀才，埋怨农民捉弄他。农民向他解释，说让你跳是让你两脚一前一后跨过沟，谁叫你并着双脚来跳呢？秀才不接受这种解释。理由在于：本本上的“跳”字和“跨”字有根本不同的解释，可见自己不错，错在对方。表演效果的好坏，起决定作用的，是说唱艺术的质量，不是演员的数量。金钱板《秀才过沟》举重落轻，一个人说出几个人的说话和行动，在单纯中见丰富，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如果不信任听众的智慧，不顾说唱艺术的特点和优点，改成满台歌手来演唱，用人教来“丰富”它，用人教来“提高”它，说表和对白的界限搞得混乱不清，不明白歌唱家们什么时候是角色，什么时候是叙述者，结果人多反而显得人少，缩小了艺术的境界，也埋没了合唱艺术的特长。

## 二

只有深深懂得欣赏者，艺术反映生活的手段才可能是大胆的，自由的。艺术家除了必须深刻感受生活，也必须深刻体会欣赏者的审美要求和审美能力。听众在生活实践、欣赏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是构成他们审美能力的一些重要因素。基于这，他可能欣赏艺术，欣赏那些对他来说即使是生疏的生活的反映。

明末清初的说书大家柳敬亭，正如当代有成就的评弹演员一样，是在和广大听众的联系中培养起来的，也是在听众喜闻乐见与否的考验中锻炼出来的。他很懂得书中的人

物，也很懂得听众的要求和能力。他那创造性的劳动，不只反映了现实，也间接地反映了听众的文化水平，审美能力，审美趣味。他说《水浒传》里的武松，生动地再现了武松，也适应了听众。《陶庵梦忆》（张岱）记述了他武松打虎的出色技巧。其中有一个特点是“闲中著色”：“武松到店沽酒，店中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壁皆瓮瓮有声。”为什么柳敬亭的“闲中著色”，能够借此打动听众，接受他歌颂英雄的内容呢？这只能从书的内容、形式和听众的感受的关系，求得应得的解释。一般说来，客观存在的艺术形象，不受听众精神活动的直接影响而有所改变。但是，基于每个听众不同的生活经验，不同的兴趣和偏爱，不同的着眼点，同一阶级的听众，面对客观的艺术形象，所得到的感受也不尽相同。曲艺的群众性，也在于它能够适应一般听众的感受。就一定意义说来，如果没有听众的“补充”或“再创造”，那些描写武松性格特征所使用的“闲中著色”的手法，不见得还能发挥它应有的魅力。说唱能不能收到动人的艺术效果，不只要把作品和生活比较，也要看形象能不能借有限的笔墨，诱导听众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形成和作品的形象密切联系的想像。形象是想像的出发点，也是想像的落脚点。如果形象不能比生活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那么也就不能和广大听众从生活中得来的丰富经验相适应。因为评书已经把武松的行动的描写得很生动，即令没有如实模仿武松怎样喊叫的声音本身，听众也可能从这种生动描写出发，看见更为广阔的生活，



由衷地接受了作品歌頌英雄的基本內容。如果和这相反，演員过高地估計具体模仿的力量，过低估計听众由生活实践欣賞实践所培养起来的感受力，在听众面前大喊“酒家拿酒来”，未必能够获得上述“闲中著色”那样的力量。

評书里的醒木，顾名思义，当然是促使听众注意評书內容的东西；也是一种表現力的构成因素。它有点像中国画的焦墨点子，用得恰到好处能够加强形象的刻划，濫用就丧失它的特殊作用和必要性。有功夫的說书人，决不为了造成緊張气氛，不惜把醒木当惊堂木使用，多拍，拍得很响。有时，似要拍响而輕輕放下，也加强了注意。更值得重視的，是醒木的使用，不仅可能加强听众的注意，誘导听众深入书的境界，而且也可以說是听众的反映的特殊形式的反映。正因为它是听众反应的反映，所以它就有可能成为加强注意的一种刺激力量。当然，醒木的使用有基本上固定的程式。这种相当稳定的程式，主要是在評书演出的长期实践过程中，說书人和听书人交流的长期过程中，不断深入体会一般听众的心理，而逐渐形成的。这就是說，所謂听众的反映的反映，不是指現場听书的听众，临时影响了使用醒木的程式，而是指程式的形成是包含了听众的反应在内的，因而它才能够成为听众精神上的启发和誘导。正如优美的唱能够使听众击节欣賞一样，醒木可能是不只拍在听众耳里，而且拍在听众的心上，原因就在于既是影响听众的，又是反映听众的。

在曲艺中，噱头所以是能逗乐的，也在

于它和欣賞者的生活經驗有密切联系。張效生在《馬跳圍牆》里說馬，有如下的噱头：“馬的面孔一板。馬总是板着面孔的，笑嘻嘻的时候見不着。”这不一定为了影射什么人，逗乐而已。欣賞者为什么会被这一种噱头逗乐了呢？显然，正如由馬的鬃毛說到人的头发，如果听书人不了解馬也不了解人，那么，这样的噱头对他說来可能是沒有作用的。

懂得听众的需要和能力，曲艺塑造形象，有更多的自由，可能大胆运用多种多样的手段。有本領的說书人手中的扇子，当它和曲艺的情节、演員的表情結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在听众的感觉上，常常是扇子又不是扇子。它是火焰，是墙，是一切。說书人在适当时机，有意暂时中断了說表，形成一种适合时宜的停頓。这种似断实联，以断为联的停頓，好像中国画布局中的空白，显然不是为了放松鼓动听众的目的，而是給予听众更大鼓动的一种特殊的手段。有时，在叙述緊張的战斗，偏偏要把話扯远，說一些和战斗本身关系不大的东西。这种扯远，仿佛只为了輕松，其实和上述的停頓那样，近似战术中的以退为进，是一种为一定目的服务的灵活性的措施。停頓是对于听众的反映的期待，也是对于听众的反映的促成。配合着前后的表演，它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获得征服听众的效果。問題在于，如果听众根本沒有相应的心理的条件，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懂得听众心理的相声演員，为了“包袱”能“响”，在“結包袱”的时候，讲究“垫穩”。所謂“垫穩”，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听众分心，引起不必要的联想，妨碍“包袱”的“响”。演





員在“揭底”之前，为什么有时要故意露出破綻，引起听众的怀疑呢？这正如上述“道反”一样，其实就是为了給听众接受噱头准备心理的条件。意料之外的“底”是逗人笑的，因为听众經過意料而又料不着，特別感到意外到来的“底”的有趣。不論說唱技巧多么复杂，归根到底，是如何真实反映生活，适应听众的心理条件，从而喚起相应的想像以至思索，使他得到欣賞的滿足，在思想上受到积极的影响。

“結果包含着自己的开端”，“結果就是原因的表現。”这是哲学家論認識客观事物的見解。这种說法，也可以用来解釋說唱艺术的形式的特点。評彈的某些特殊手法，例如寓因于果，果中見因；說东为了說西，說南可以代替說北，就是以此为依据的。青年演員石文磊的小唱《乒乓比賽》，特別着重表現乒乓热潮中的人們怎样兴奋的情緒，不一一描写为什么使人們兴奋的原因（運動員怎样杀球等等），也表現了上述特点。临时赶出来的这一小唱还不很成熟，但是就結果着手而使人体会原因，或者着重表現原因而使人預料結果这一点而論，它是新时代的曲艺艺术家創造性地体现了傳統艺术方法的表現。

曲艺描写客观事物，有一些非常自由，非常大胆的方式。用声音来描写視觉形象的手法，正如用色彩来描写声音一样，就是一种在別的艺术样式中不多見的手法。用声音的描写来代替視觉形象的描写，也和扇子、醒木的运用相似，这种描写，就一定意义而論，也是听众的生活經驗、形象記憶和情緒

記憶的一种再現的形式。

評彈《求雨》描繪午时三刻快要到来，众百姓不忍目睹用火燒人，天气突然变化，轉晴为雨的景象，使用了在一般情况下只用来形容声音，而不能用来形容物象的詞来形容物象：

……唉，真叫天有不測風云。

正在午时三刻，那边东北角上，一朵烏云，“嗚～～”飄过来，頃刻烏云滿天……

还没听见風声，只看見天上一片流动的烏云，对人說来，这还不过是一种視觉性的形象，怎么可以像形容海浪或江濤的声音那样，用“嗚～～”的声音来加以描写呢？所以是合理的，可以动人的原因，在于听众的感觉經驗以至情緒記憶，在欣賞过程中起了作用。突然出現的這一片烏云，那种滾滾而来的气概，它是期待下雨的人的心情的曲折的变形的反映，是落雨的預見和喜悅心情的形象化，同时也和听众过去的印象、感觉有联系。这一声“嗚～～”，和詩詞里那些傳神而且傳情的詩句，例如岑参的“朝登劍閣云隨馬，夜渡巴江雨洗兵”相似，都不是現象的簡單的記錄，而是以艺术家和欣賞者的感受为依据的。这些似不合理，讀起来却很动人的詩句，在于就一定意义說来，它反映了欣賞者的感受。演員这种不拘于現象的复写，富于独创性的說表，不只表明他們熟悉生活的修养，再現生活的才能，也表明他們深深懂得听众的要求和能力。

就怎样适应听众而大胆虛构这一点而論，上海評彈团的演出，一再显示了上述长



处。彈詞《青春之歌》的演唱者趙開生，在描寫余永澤回到家來，透過玻璃窗戶，看見他的妻子林道靜和男同學盧嘉川談話時，余永澤的視線，是用“嗖”的聲音來描寫的。視線不是飛鏢，不是子彈，怎麼可以說是有聲響的呢？這，對於眼光充滿了忌妒，心情卑賤的角色的描寫，是巧妙的也是確切的。說唱者要是拘於視覺特徵，不敢借用聽覺感受，未必能夠構成這樣的感染力吧？對余永澤這樣的角色的諷刺，這一声“嗖”是有力量的。在一定意義上再現了欣賞者的感覺經驗，這種諷刺才具有特殊的感染力量。

在曲藝藝術中，這種用聲音來模仿可視的物象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說，兩個互相傾慕的青年男女，眼光在不約而同地相遇的時候，評書演員把這種現象說成是：“場堂，碰上了”。描寫英雄注視他的敵人時的眼光，有時用“咄、咄、咄”的聲音來形容。壓抑着的怒氣的突然爆發，有時用“嘯”字來形容這種爆發。這一切，正如醒木或扇子的運用那樣，也如戲曲表現人的情緒的激變而使用“變臉”、“甩髮”或“跟斗”那樣，很特別。這是一種巧妙的富有表現力的手法。這較之把現實主義了解得很狹窄，以為“照着葫蘆畫瓢”就是高級的藝術，不惜把一些乏味的現象記錄拿出來煩人的作品，至少在技巧上要高級得多。一切符合了人民的審美要求和審美經驗的藝術手法，是包括前輩在內的作者們的高度智慧的表現。《青春之歌》等評彈所運用的這種群眾化的表現形式，體現了我國傳統藝術的卓越成就。

最近聽了上海的評彈，再一次感到文藝

為政治服務的途徑非常寬廣，方式多種多樣。我進一步感到，一切為群眾服務的藝術，不論是內容莊嚴的紀念碑還是娛樂性的節目，都必須通過感人的形象，爭取藝術欣賞者成為知己，在自願而自然的情勢之下，成為反映現實和認識現實的“合作”者，從而受到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教育和鼓舞。教育，包括正確的審美標準和健康的審美趣味的鞏固和培養，在藝術上的表現是潛移默化，而不是耳提面命。在藝術上任何生硬的方式，都不能產生應有的潛移默化的效果。我再一次感到，適應群眾的欣賞要求和欣賞習慣，發揮說唱藝術的特長，較之生硬的說教，顯然要困難得多。因為它的思想內容不是硬貼上去的，而是自然地流露出來的，這就要求藝術家有豐富的生活，充沛的感情，深入了解生活的內在意義。

曲藝是一種群眾性的藝術形式，群眾不只是曲藝家的教育對象，同時也是曲藝家的學習對象。傳統的曲藝是在群眾的需要和鼓舞之下發展起來的，它在反映生活和表達思想上積累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和技巧。新時代的曲藝家，為了探索反映新的人物和生活的藝術方法，創造新的節目，需要學習和繼承過去一切有益的表演經驗和表演技巧；更有必要深刻了解新時代的群眾，熟悉人民的生活、思想、願望、心理和情緒，了解他們那種既有繼承性却又是發展着的審美要求。只有這樣，才能夠滿足新時代群眾的要求，同時培養聽眾的審美能力，幫助他們深刻地認識生活。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提高曲藝藝術的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



# 論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吳 江

量变质变規律，是唯物辯证法的根本規律之一。事物的发展，就是由事物內部矛盾引起的从量变到质变、又从质变到量变的过程，是质和量互相轉变、互相推移的过程。量变是指某一事物本身的逐渐发展，而不改变該事物的根本性质；质变則是量的渐进过程的中断，是事物根本性质的改变，也就是旧事物的消灭和新事物的产生。量变和质变这两者又是互相渗透的：质变过程中有量的扩张；量变过程中也有质的某种变化，有个別新质因素的产生和部分质变的发生。

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这是一种客观現象，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規律性。在事物的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我們如果仔細去看时总可看出：每一具有特定性质的事物，在它发展的长过程中，在发生根本质变以前，一般处于下面这样的状态，就是：从总体上、全局上說，事物处于量变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事物的根本的质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发展是連續性的、渐进的；但从局部或某些方面來說，事物則又存在着某种质变的現象，由于矛盾的发展，事物的质局部地显出不安

定的状态，发展局部地呈現着非連續性、飞跃性。这两种情况，即量变和部分质变，准备着事物的根本质变。这种情形，不論在社会現象中，或自然界和思想領域中，都是普遍存在着的。

在社会現象中，拿中国革命來說。中国的民主革命，在这个革命完成以前，其反帝反封建的根本性质（或质的根本規定性）不变，但其中經過了好几个发展阶段，除开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这两个性质不同的大的历史阶段的区别之外，新民主主义革命也經過了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等几个发展阶段。新民主主义的各阶段的基本性质是相同的，它們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但是各阶段之間，不但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有量的区别，而且打击的对象有时主要是本国的反动势力，有时主要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同资产阶级的团结和斗争的具体情况也各有所不同，因此，各阶段之間又有若干质的区别。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这样，在它本身中包含着若干性质不同的阶段。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經依次地經過下列几次阶段性的部分质



变，而完成了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根本质变，就是：从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再到具有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在我国条件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依次经过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几种不同的形式，也就是依次经过了几次阶段性的部分质变。社会形态的发展，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形成，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经过了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这三个阶段，这些阶段都具有部分质变性质。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阶段，也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一次深刻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在其发展长过程中，同样要经过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大的方面说，包括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到基本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比较不发达的阶段（从基本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时候算起）和比较发达的阶段（这是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阶段）。

在自然界中，这种现象同样存在着。例如，植物的个体发育周期，从幼芽到结实之前，是一个总的量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般要经过种粒发芽、长茎（形成植物个体）、开花等几个阶段，这些发展阶段有着部分质变性质，到最后结实而完成根本的质变。蚕的一生所经过的蚕、蛹、飞蛾等阶段，也都是部分质变性质，到产卵而完成了根本质变。人的机体的发展是细胞新陈代谢过程，人从出生到死亡之前，是一个量变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经过婴儿、童年、青年、壮年、老年这样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同样具有部分质变性质。

在思想领域中，我们同样看到，形成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之前，要经过一个积累大量事实材料（这是量变），并从中提取许多个别性原理的过程，使认识一步一步地发展，从不完全的认识到比较完全的认识，从不深刻的认识到比较深刻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个别性原理的获得，也带有部分质变性质。人们的思想改造，情形也一样，某种根本改造的目标，常常不是一下子所能达到的，而需要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的质变。

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除了表现为在同一发展过程中几个不同发展阶段一个接一个地向前推移的形式以外，有时也表现为一个事物的全局未变而其个别部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例如，在我国长期的人民民主革命过程中，打碎旧的反动国家机器、建立新的革命国家机器，是一块一块、一片一片地进行的，即旧的国家机器在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地区上被打碎，新的国家机器随之在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地区上建立起来。凡是新的革命政权统治的地方，那里政治上已实现了民主，经济上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因素，就是说，那里社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不是原来的旧性质，而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了。但是，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前，这种变化还只是局部的，是个别新质态的逐步扩展，而不是全局性的变化。在我国现时条件下，实现生产的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自动



化的革命，也是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进行的，首先在某些方面、某些部门实现机械化或半机械化，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即实现局部范围的质变，然后逐步扩展开去，以至于达到全局性的根本质变。

所以可以说，发展过程中有两种部分质变的形式，即一、在同一发展过程中几个不同阶段逐个推移的形式；二、全局未变而个别部分发生质变的形式。这两种形式的部分质变是互相联系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往往互为条件或者互为因果。中国革命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形成的新形势，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革命在局部地区首先夺得了政权，建立了红色区域，这也就是引起中国社会在局部范围内发生质变；而红色区域、红色政权的逐步扩大，又成为强有力的因素，推动了革命向下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发展。

上述这些现象说明了：量变过程中包含着质变，一种量变的大过程的内部也存在着局部的小的飞跃。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事物的根本质变，不仅是由不断的量变准备起来的，而且是由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质变（它们像一系列的阶梯）准备起来的。这些现象同时也说明：事物总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一种事物向另一种事物推移的过程是如此，一种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整个事物的根本质变，是发展过程中涌起的较大的波峰，而部分质变，则是发展过程中涌起的一些较小的波峰。

研究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无疑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量变质变规律的一个重要内容，研究它，无论在认识论方法论上，或者对于我们的实际工作，都有重要的意义。

## 二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论述矛盾的特殊性的时候，曾着重地指出：我们在研究和处理事物的矛盾时，不但要注意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的特点，而且要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点。他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sup>①</sup>

毛泽东同志这段话告诉我们：所谓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各阶段互相区别，不但是指量的区别，而且是指质的某些区别；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殊性，既要注意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2页。





各个阶段上量的特殊性（事物发展的不同规模、程度、速度等等），又要注意各个阶段上质的特殊性，即被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许多大小矛盾的变化所引起的质的特殊情况。不懂得这一点，拒绝对于各种事物的质、各种事物的特殊性进行研究，并拒绝对于一种事物发展过程中各阶段上的质的特殊性进行研究，那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事物，就会在实践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根据毛泽东同志这段话，也可以看到，事物发展过程中各个不同阶段的质的变化，即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因为它根源于事物内部的复杂的矛盾运动。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的本质，是由该事物所具有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例如，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由资本主义本身具有的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所规定的，它通过资本主义的诸特性，如发达的商品交换、剩余价值的占有、产业后备军、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经济危机等等表现出来。中国民主革命的本质，由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所规定，通过民主革命的许多特性，如反帝反封建斗争、无产阶级为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并在其中起领导作用、农民是这个革命的主力军、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可以参加革命或保守中立，等等表现出来。事物的各种特性、各个方面，并不是一下子展开，而是在事物发展的各阶段上展开，有的在这一阶段上展开，有的在

那一阶段上展开。这里，我们就看到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下述两种情形：一方面，只要事物的根本矛盾不解决，事物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不管它在各阶段上会显出何种差别；但另一方面，随着根本矛盾的发展和逐渐激化，随着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各种大小矛盾的变化（有些激化了，有些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有些发生了），事物的个别特性和方面却是要发生变化的，在各个阶段上，有些加强了、向前发展了，有些减弱了或暂时地减弱了作用，有些消失了，有些发生了，也有些原来是非本质的东西而变成了本质的东西，或者相反，等等。正因为这样，事物的本质也不可免地要发生部分性的变化。

例如，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这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它的矛盾发展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资本主义突出地展开了或产生了垄断、财政寡头统治、资本输出、加紧掠夺殖民地和进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等方面，因而使资本主义自身发展到了垂死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说：“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的继续而成长起来的。”<sup>①</sup>正是指的这种情况。

<sup>①</sup>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7页。



中国的民主革命，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全过程，其根本矛盾及为此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根本性质（反帝反封建），在过程结束以前，是没有变化的。但在五四运动以后，由于矛盾及矛盾双方的变化，这个革命的领导权转入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手，使过程在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发生了变化，这就有了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因此形成了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形成了新式的民主革命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互相交错和互相推移，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又联合又斗争，国共两党在不同时期有特殊的相互关系，革命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等等。所有这一切，使整个过程不断地展开新的方面，获得日益丰富的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三十年间所经过的几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的矛盾都呈现出许多特殊的情况，都有自己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各阶段的具体矛盾不同，各阶段也就随之而有自己不同于其他阶段的特性，提出了自己不同于其他阶段的具体任务。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说：“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sup>①</sup>这就是说，不仅事物的整体在发展中向对立面转化，而且它的每一个特征、方面、特性都在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整个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当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

的主要方面不变、即事物整体的质不变的情况下，矛盾双方的斗争以及它们各自所发生的变化，也要影响事物的个别特性，引起它们的互相转化。例如，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向垄断转化，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无产阶级手里，等等。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sup>②</sup>

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一书依据敌我双方对比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抗日战争三阶段的分析，是一个非常辉煌的例子。毛泽东同志在这部著作中指出，例如，在敌是优势我是劣势的第一阶段，我方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特别是经济力量的减缩，但是，“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sup>③</sup>第二种是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这些“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sup>④</sup>敌方的变化则与此相反。在战争的长过程中，敌我双方各自所经历的这种质和量的变化，使双方力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9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3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57页。



量对比的形势不断发生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促成了战争过程由一阶段向另一阶段推移。

事物的全局性质未变而其个别部分的性质发生变化的情形又是怎样来的呢？这在根本上说来，是由于矛盾双方的特点所引起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矛盾双方的力量在各个局部上发展的不平衡而来的。我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局部地夺取政权，主要就是因为我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敌人方面是内部不统一，矛盾重重，革命力量则以武装斗争为支柱，以土地革命为基础。敌人虽然在城市中有强大统治势力，但在农村中相对薄弱，而革命在农村中则可以征集强大的同盟军，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因此革命力量首先有在农村地区胜利的可能。在广大农村中，敌我力量的发展也极不平衡，革命首先在自己力量积聚较快而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突破，建立起根据地，然后一块一块、一片一片地扩展。

由此可见，事物发展从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是根源于事物内部的复杂的矛盾运动，根源于矛盾发展的特殊性和不平衡性，因此，它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形而上学观点或庸俗进化论观点不同，不仅注意事物的量，从量的方面来认识事物，而且更着重地注意事物的质，从质的方面来研究事物和区别事物。毛泽东同志说：“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

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sup>①</sup>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得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要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必须特别注意对事物的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而要把握事物的质，毫无疑问，首先必须考察这种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区别和联系。例如，要把握资本主义的质，就要找出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各方面的特殊性；要把握社会主义的质，也必须找出社会主义之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自身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的诸方面的特殊性。我们目前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从这两方面的区别去弄清楚社会主义的相对独立的形态及其特殊本质，弄清楚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性，如此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政策，并有把握地进行工作。

为了具体地精细地研究事物的特点，特别为了具体地指导改造事物的实践，像前面所分析的，我们还必须深入到每一个事物本身，去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质的局部性变化，找出该事物本身各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质的特殊情况。只有通过这种研究，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事物的质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性阐发出来，才能够更完全地认识事物和更恰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这也就是说，对于同一种矛盾，在其发

<sup>①</sup>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6—297页。



展过程中，由于阶段性的变化，在各阶段也須用适应于这种变化的具体方法去解决。

### 三

毛澤东同志曾再三指出，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者，我們既須承认发展过程的不間断性，又須承认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既須懂得照顾全局的必要，又須懂得关照各局部和各阶段的必要（因为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毛澤东同志在談到指导战争的时候，曾經指出：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問題。这个观点，对于指导革命，是普遍有效的。

毛澤东同志根据事物发展須經過不断的量变和許多部分质变而达到根本质变的規律，把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相统一的原理，不但应用于互相联系的性质不同的过程，例如应用于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应用于同一过程内部的不同发展阶段，例如应用于民主革命过程的不同阶段。所謂对于全局和各阶段关照得好，就是：我們从事革命事业，或变革某項事物，必須全局在胸，目标明确；同时又必須脚踏实地，按照客观程序，着重于分阶段、有步驟地进行。这也就是说，必須全力抓紧当前的阶段，完成当前的任务，在完成当前任务中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之后，再进入后一个阶段，如此使我們的事业能够不断地而又有秩序地向前推进。

毛澤东同志把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

变規律作为指导革命实践的一項重要方法。他在中国革命的长过程中，总是按照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适合于这些阶段的具体情况，并能够解决各阶段的具体矛盾的新的工作方針和方法，促进总的量变过程，更好地准备全局性的根本质变。这是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业能够迅速地 and 不断地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澤东同志正确地把握了和說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轉变，并且正确地提出了适应于这种轉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論和策略，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一系列极复杂的問題。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澤东同志同样是这样做的，他指出：“在整个资产阶級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們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綱領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們的具体綱領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sup>①</sup>

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是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而战争現象是較之別的任何社会現象都更多变化，更少确定性，即更带所謂“盖然性”的东西。但毛澤东同志对于战争阶段性的掌握，其准确性却达到令人惊奇的程度，当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往往就能根据战争发展的規律，預見到战局的进一步发展，除規定当前阶段的具体方針外，并提出一种貫通几个战略阶段的长时期的指导方

<sup>①</sup> 《論联合政府》。《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63頁。



針，以夺取战争的胜利。

同样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澤东同志也总是按照事物发展的量变质变规律、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规律，逐步地变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关系由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以不断地解放生产力，有步骤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在完成将我国五亿以上的农业人口引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件特殊复杂、特殊困难的事业的过程中，早在一九五一年，在土地改革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完全结束时，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就已经规划出了一条包含三个发展阶段（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在完成了合作化以后，紧接着又找到了人民公社的道路，并且由此出发，指出在我国条件下，集体所有制发展成全民所有制，必须经过下列三个阶段，即：以生产大队的所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过渡到将来的公社基本所有制，再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一发展过程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由农业合作社联合组成的人民公社，是一般地由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成而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它是集体所有制本身的一次部分质变，它不是否定集体所有制，而是发展和提高了集体所有制。

我们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是这样有预见地、有步骤地向前发展的。在我们的主观指导上，注意了这一个过程到那一个过程的推移，同时又注意了一个过程内部不同阶段的推移，这样，就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

的原理。

我们承认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规律，从认识上说来，就是承认事物发展中包含着下述两个方面情况，即：从一方面说，在变革一个事物的长过程中，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过程内部必然会有阶段性或局部性的变化发生。无视这种必然性，不承认这种变化是事物本身的客观趋势，在实践中必然会犯错误，其结果就会阻碍或延缓这一过程本身的发展。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任何事物或任何阶段，又都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由自身性质所决定的界限，我们在实践中决不能忽视这个界限。事物的部分质变状态，同根本质变一样，都不是突然来的，而是由量变积累起来的，质的突变是由量的渐变准备起来的。量变不达到一定的限度，不到一定的关节点，事物也不可能发生部分质变。例如，互助组的生产力如果不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使土地分散经营和集体劳动之间的矛盾显得突出，互助组就不可能进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同样，初级农业合作社的生产力如果不发展到使土地分红制度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也不可能进到高级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之联合成为人民公社，也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此等等。

世界是绝对地永恒地发展着的，任何事物、过程的界限都不是绝对不变的，在过程内部各阶段之间当然更是如此；但是，一切个别的事物，个别的阶段，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的时间内，又都具有质的相对固定性，就是说，是有确定的性质的，它是某种固定的事物。人们认识事物，首先须判定该事物





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对于事物的性质有一定的认识，才有可能进一步研究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的变化发展。不懂得一事物一过程或过程内部各阶段的质的相对固定性，就无从理解事物的发展。因为事物的发展总是由一种质到另一种质，由一阶段到另一阶段。这也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客观程序，不断地突破旧的界限而形成新的界限（成为新的事物，或达到新的阶段），形成了又突破，突破了又形成。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主要条件”<sup>①</sup>。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对于变动性最大的战争这一社会现象，也曾这样说过：“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sup>②</sup>，因此，我们“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sup>③</sup>“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sup>④</sup>

各种事物的发展都是如此。当着某种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应当使这种生产关系状态有一个改变，有一个质变或者

部分质变，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在生产关系经过某种变革已经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或基本相适应的时候，就应当使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巩固和稳定下来，并使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各项工作制度、政策、方针等，在一定时间内获得相对的固定性。例如，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或在社会主义的某一阶段内，就应当使社会主义的或者社会主义某一阶段的各项原则、方针、政策，获得相对的固定性。我们在工作中所需遵守的政策界限，乃是客观事物本身的界限的正确反映，是经过实践从客观事物抽象出来的，并不是人们随意设定的。我们只有严格遵守事物本身的界限，不主观随意地突破这种界限，这才有利于事物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工作的发展。

承认过程或过程内部各阶段的相对固定性，并不等于形而上学或者保守主义，这是不应有所混淆的。只有不懂得事物的界限、物质的固定性的相对意义，有意无意地赋予事物的界限以绝对的意义，才有可能成为保守主义者。我们所说的事物的相对固定、相对静止，并不是事物的凝固不变，而是事物变化的一种状态，即事物的量变状态，它是相对于事物的质变状态而言，为质变作准备。我们革命者固然重视质变，要积极促进

①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0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8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8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85—486页。



事物的质变，但是，沒有量的准备，就沒有部分质变，更不能有根本的质变。忽視量变就要走上冒險主义。因此，我們在任何时候决不能不顾量的准备而实行无根据的部分质变以至根本质变。对于我們的主观指导說来，必須力求認識事物发展的量的基础，認識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引起部分质变，經過若干部分质变才能达到根本质变，以便按照客观进程，發揮主观能动性，踏踏实实地进行工作，促进事物量的增长，扶植新质因素的生长，以获得預期的部分质变以至根本质变。

任何质变，都包含着量的擴張，并把量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我們看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生产关系发展的每一个部分质变，都使社会主义的新质因素大量增长，促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們說部分质变是全局性的根本质变的准备和前导，我們如果認識它，掌握它，就能促进总的量变，加速全局性的根本质变。为什么我們要重視部分质变这种現象呢？归根到底，其原因正在这里。但是，部分质变并不改变事物的根本規定性，并不代替全局性的根本质变。部分质变和根本质变是不同的两回事，因此，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把它們混淆。

如果事情已发生了全局性的根本质变，而认为只是部分质变，那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事情只是发生部分质变，而就认为已达到了全局性的根本质变，这在社会变革方面，依据具体情况，也将或者犯右的錯誤，或者犯“左”的錯誤。右的錯誤，例如把资本主义国家中自由资本主义向壟断资本主

义的发展，或者一般壟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壟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本性的改变，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因而否认革命变革的必要，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堕落成为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左”的錯誤，例如中国过去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有所謂“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轉变之时”的說法，这就是把民主革命中的部分质变看成是全局性的根本质变，看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

毛澤东同志曾反复地向我們指出：我們的認識和行动既不可落后于客观过程，也不可超越客观过程。他要求我們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承认事物发展阶段的客观性，不能作任意的处置，而当某一客观过程已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轉变的时候，我們自己的主观認識也必须跟着推移轉变，以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我們对待事物的矛盾，需要很好地考察发展过程中量变和质变、总的量变和部分质变、部分质变和根本质变等諸方面的关系，認識它們，并且正确地处理它們。事实证明，注意研究发展过程中部分质变的規律，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更好地加以应用，将会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一步一步地，积极而又稳妥地推动我們各項工作、各項事业前进。



## 美国种族关系上的“良好记录”

陈 原

近年来，美国官方老爷们对掩盖国内种族歧视的丑恶现象，确实是煞费苦心。

去年十月间，肯尼迪在一次竞选演说中提出：“美国必须在国内消除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的一切痕迹”。他还尽力表白：“种族隔离和暴行，这些在国外恶劣地歪曲我们的形象和在国内削弱我们的力量的东西，只是美国真相很小的一部分。”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斯，比他的上司讲得更动听。他在今年三月访问尼日利亚时竟大言不惭地说：“我敢说，尽管有一切渲染，但是在种族关系上，美国几乎和其他国家一样有着良好的记录。”

在威廉斯讲这番话以后为时不过两个多月，美国国内在种族关系上又出现了一次“良好的记录”。

今年五月二十日，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城发生了凶殴黑人的政治性暴行，一千多名种族主义者，毒打一群黑人青年和反对种族歧视的白人青年。这些青年是美国“种族平等大会”发起的“自由乘客运动”的参加者，他们共同乘着公共汽车到南方各州去进行反对种族隔离的示威。他们在进入亚拉巴马州之后，已先后在安尼斯顿和伯明翰两地遭到种族主义分子的毒打。在蒙哥马利城的暴行中，至少有二十个黑白青年被殴重伤，呻吟路旁，尽管暴行进行了几小时，而

这“文明”国家的警察，却竟然熟视无睹。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完结。这些参加“自由乘客运动”示威的黑白青年，继续乘公共汽车到邻近的密士失必州，向美国的“文明”挑战。当他们在警察“护送”下到达这个州的首府杰克逊市时，当局借口他们在车站进入“白人休息室”，以“破坏秩序”的罪名，将他们逮捕并判处徒刑和罚款。看，在自称为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国家里，统治者竟以维护种族歧视的法规来惩办和监禁挺身反抗种族歧视的正义的青年男女，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

这次暴行遭到了世界进步人士的谴责。西方“自由世界”的舆论对此也议论纷纷。肯尼迪政府陷入了十分狼狈的境地。一个肯尼迪(司法部长)劝导人们要“冷静”，另一个肯尼迪(总统)呼吁不要“再事挑衅”。美国的统治阶级显然担心这类事件会无情地揭露美国种族关系的真相。众院外交委员会非洲问题小组委员会主席奥哈拉忧虑这将对美国国际关系产生“不良影响”；参议员汉弗莱也担心这个事件“使美国的民主和国家目标成了一种笑料”。他们的忧虑是有来由的，野蛮的暴行的确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文明”和“自由”究竟是什么货色。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说，亚拉巴马州已经“堕落到足以同当年希特勒德国的悲惨日子相比拟的野蛮状态。”驻在美国的一位外国大使认



为，美国种族事件的继续发生对他造成了一种“危险的后果，使他日益难以在美国活下去。”

西方“自由世界”的那些有几百年对付非洲人民的血腥“经验”的老牌殖民主义者，趁机奚落美国。英国保守党的《每日快报》忿忿然说：“美国没有权利评论英国在罗得西亚的问题。”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也不放过对美国报复的机会，因为不久以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美国为了把自己装扮成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者”，以欺骗、拉拢非洲人民，曾经假惺惺地投票赞成关于调查葡萄牙镇压安哥拉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提案。现在，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反唇相讥，说你美国连国内的“种族障碍”也“粉碎”不了，有什么资格来投反对葡萄牙的票？这样一来，“自由世界”的一池烂泥水，因亚拉巴马州的新暴行，搞得更加混浊不堪、其臭难闻了。

亚拉巴马州暴行是否只是个别的事件，是否像肯尼迪说的只是“美国（种族关系）真相很小的一部分”呢？

其实，种族歧视在美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黑人每日每时都有可能遇到种族隔离、私刑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政治上或经济上的迫害。对黑人的迫害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正如美国《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所供认的：种族主义的“四处散布的、无孔不入的细胞已侵入我们（美国）社会的每一个组织。”

美国的黑人处在严酷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同白人有平等的地位。例如，在城市中划分了黑人区，黑人只准住在某几条街上，不许住在白人住宅区中；黑

人区不仅设备恶劣，而且房租租金奇昂。据不完全的统计，有二十二个州的法律规定或事实上不许黑人儿童跟白人儿童同上一所学校或同在一个班级；有三十个州不准黑人与白人通婚；有十四个州的火车和十一个州的公共汽车只准黑人坐在指定的车厢或后排；许多州事实上不许黑人进入一般戏院、电影院、饭店、旅馆、公园、图书馆和医院。正因为如此，近年来，许多非洲国家的外交官在美国受到了侮辱。《纽约先驱论坛报》承认，一个非洲外交官可以连续几个月走遍每一所像样的住宅和旅馆，但只能得到同样的答复：“不租给黑人！”事情弄得如此之糟，以致美国政府当局竟异想天开地要在某处开辟一个专门让非洲国家的外交官能与美国“优秀”白人享受平等权利的海滨游乐场！

黑人的政治权利也是没有保障的。美国许多州的法律都有限制黑人参加选举的规定，例如选民必须交纳一定数量的人头税和要具有一定的“教育程度”等等。有些地方的选民登记处的白人官员用各种所谓“考试”、“智力测验”等办法，剥夺黑人的选举权。他们甚至提出“一块肥皂有多少泡沫”“白宫有多少窗子”等这类稀奇古怪的问题刁难黑人。即使是纳得起人头税、通过了“考试”的黑人，他们在走向投票的道路上也绝不是平安的，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的恐吓和迫害在等待着他们。在许多地区，黑人选票的代价，就是“一张票一条命”。

在经济上，黑人的命运也是极其悲惨的。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往往只被雇佣当苦工，不能担任高级技术性的工作。黑人和白人同工不同酬，黑人的工资通常只及白人工资的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他們也是遭受失业痛苦最深的人，經常是先被解雇，后被雇用。

更令人发指的是，三K党、“白人至上”集团、“白人公民委员会”和納粹党等法西斯組織，經常施用惨无人道的私刑迫害黑人。他們对黑人施用私刑的“理由”是很多的，如黑人进入了供白人享用的飯館，靠近白人妇女的身旁走过，在会见白人时脱帽不够迅速，回答白人的問話时不够“恭敬”等等，都会使黑人遭到私刑的凌辱与杀害。

列宁早在一九一三年就說过，“美国黑人的一般状况是同文明国家不相称的：資本主义不可能使人們彻底解放，甚至也不可能使人們完全平等。”<sup>①</sup>随着美国壟断資本主义的发展和政治上的愈加反动，黑人經過长期斗争所爭取到的、并为美国宪法所承认的“平等”，愈来愈受到蔑視和摧殘。

美国統治階級多年来散播种族仇恨的种子，挑撥白人迫害黑人。他們的真正目的，正如列宁所說的，是为了“蒙蔽工人的眼睛，使他們看不到劳动人民的真正敌人——資本。”<sup>②</sup>然而，人們也要提出这样的問題，为什么美国統治階級，現在忽然特別担忧种族歧視的“家丑”外揚，想尽办法要把它掩盖起来呢？其奥秘在于：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入非洲，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視这桩“家丑”大大不利于美国爭取非洲人民的“尊重”和“友誼”。参議員丘奇就担心“如果（美国）再发生悲惨的种族暴动的話，就会使撒哈拉以南的每一个新国家的信仰和友誼受到損害。”肯尼迪在上台之前就大肆喧嚷什么要“在国内消除种族歧視”，并对他們中意的黑人（如哈奇尔、本奇之流）吹吹捧捧，封官賞爵，而在上台之后，又

对非洲左一个“和平队”，右一个“訪問团”，假獻殷勤，目的都是一个——用肯尼迪的話來說，这是为了“爭取非洲黑种民族的尊敬和友誼”，保证在非洲“打贏爭取人心的仗”。

美国統治者处理国内种族关系的“良好記錄”与对非洲人民的“尊重”和“友誼”，非洲人民是清楚的。南非《兰德每日邮报》編輯勞倫斯·甘达尔在訪問美国后說：“美国对国内有色人种的歧視和迫害絕不亚于以种族歧視而臭名远揚的南非联邦。”《加納时报》在一篇文章中揭露美国对非洲人民进行欺騙宣傳时指出：“当非洲人一接触到美国实际时，他們馬上就会認識到美国这种宣傳的虚伪性。甚至非洲各国委派到华盛顿的官方代表也已尝到了美国种族歧視的滋味。”文章还說：“美国在本国实行着种族主义政策，那末很自然它在非洲也会照样实行种族主义政策。”

在亚拉巴馬州事件之后，美国很多大城市爆发了黑白人联合示威游行，例如洛杉磯参加示威的黑白群众，同唱着新編的战歌，高呼着这样的口号：“我們不要干涉古巴。我們不要干涉老撾。我們需要干涉亚拉巴馬。”这些事实表明：不管美国統治階級迫害鎮压也罢，欺騙麻醉也罢，人民爭取民主和自由的意志是消灭不了的。他們正在团结起来向反动統治階級进行愈来愈坚决的斗争。《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說：“在通往南方各州的道路上，新的“自由乘客”的小組接踵而至，向南方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挑战。”这何尝是仅仅向“南方”，这是向整个美国种族歧視制度的挑战！

① 《俄罗斯人和黑人》。《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42頁。

② 《論殘害犹太人》。《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1頁。





# 形式邏輯研究什麼？怎樣研究？

· 吳 家 國 ·

讀王忍之同志《論形式邏輯的對象和作用》一文后，學到了不少東西。其中有些看法我是同意的，例如：形式邏輯是從形式方面來研究思維的，它不研究思維內容；思維形式與思維內容是統一的，又是矛盾的，形式邏輯可以把思維形式抽取出來進行研究；學習形式邏輯有重要意義。但同時，覺得其中有些問題還需要商榷。例如，王忍之同志認為，形式邏輯研究“思維形式結構”，“揭示思維形式結構的規律”；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時“把內容放置在一邊作為不相干的東西”，“在純粹狀態中”去進行研究；形式邏輯的作用是“把思維內容確定地、不矛盾地、有條理地組織起來和表達出來”<sup>①</sup>，等等。這種看法我以為是不對的。本文就這些問題談些不同的意見。

對於形式邏輯這門科學研究的對象是什麼，人們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大體上可以歸納為兩種：一種認為形式邏輯的對象是一般的思維形式，另一種認為形式邏輯的對象是思維形式結構。這兩種看法雖然不是絕對對立的，可是卻有不同。所謂“一般的思維形式”，其含義是比較廣的，它可以指思維的各部分之間的聯系方式（如推理中前提與結論

之間的聯系），也可以指用符號表示的思維形式結構（如S是P），同時，還可以指思維形式的邏輯特征（如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等）；所謂“思維形式結構”，只是思維形式的一部分。王忍之同志卻把這兩個不同的概念等同起來，有時說“思維形式結構”，有時又說“思維形式”。不過，從整篇文章看來，王忍之同志的基本主張是前者，而不是後者。那麼，王忍之同志的看法是不是正確呢？我認為是不正確的。

形式邏輯科學是由亞里士多德創立的。列寧在論述亞里士多德對邏輯的貢獻時指出：“亞里士多德如此完滿地敘述了邏輯形式，以致‘本質上’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的。”<sup>②</sup>列寧所說的邏輯形式（即思維形式）有哪些呢？這就是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工具論》中所提出並加以研究的“概念”、“判斷”、“三段論式”、“證明”、“證明的方法”、“下定義的方法”、“反駁的方法”等。此外，亞里士多德

① 王忍之：《論形式邏輯的對象和作用》，《紅旗》1961年第7期，以下引文凡未註明出處者，均引自此文。

② 《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2—193頁。



还提出了矛盾律、排中律，并在实际上提出了同一律的思想。在十七世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弗兰西斯·培根在《新工具論》一书中，对科学归纳法諸問題作了系統的闡述，奠定了归纳邏輯的基础。后来，保尔——罗亚尔派明确地把形式邏輯的对象确定为研究概念、判断、推理、方法。十八世紀初，莱布尼茨对充足理由律作了明确的闡述。这样，形式邏輯这門科学的内容，有了很大的发展。

形式邏輯的上述内容，是否都屬於形式結構的問題呢？这应当作具体分析。

形式邏輯所研究的内容，就它們有无形式結構來說，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有形式結構的，如直言三段論式等；（二）既有形式結構，又不全是形式結構的，如归纳、思維規律等；（三）根本沒有形式結構的，如邏輯方法等。对于这三个部分，不应当过分強調某一部分，而忽視另外的部分，也不应当以其中的一部分来概括形式邏輯的全部内容。

王忍之同志虽然沒有說明形式邏輯的基本内容，也沒有說明归纳邏輯、充足理由律、邏輯方法是否也是形式結構問題，但是，由于他既沒有否定这些基本内容，却又认为形式邏輯的对象是思維形式結構，这就不能不使人认为，王忍之同志把归纳邏輯等看作为形式結構的东西。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以归纳邏輯为例。归纳邏輯虽然也有形式結構，但归纳邏輯还包括观察、实验等邏

輯方法，它与思維内容的联系更加密切，与人們的認識的联系也更加密切，因此，归纳邏輯不只是形式結構。

再以充足理由律为例。充足理由律是正确思維的一个基本的邏輯規律。充足理由律要求之一，就是理由应当真实，否則就会犯虛伪理由的錯誤。这能說是对形式結構的要求嗎？不能。因此，充足理由律不是思維形式結構的規律。

形式邏輯所研究的分析、綜合、抽象、概括、定义、划分等邏輯方法，它們都沒有形式結構，如果要去寻找分析、綜合等的形式結構，那是找不到的。因此，更不应当把形式邏輯的对象限制为“思維形式結構”。

既然归纳邏輯、充足理由律、邏輯方法等都是形式邏輯的对象，所以把形式邏輯的对象局限为“思維形式結構”，就必然要把它們統統排斥在形式邏輯之外，这是不妥当的。

根据以上理由，我认为可以把形式邏輯的对象，作如下的概括：形式邏輯是研究思維形式及其基本規律以及普通邏輯方法的科学。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形式邏輯科学的实际，否則，就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这在实质上，就会把形式邏輯的内容貧乏化，变成只研究推論方式的純演繹的邏輯了。

王忍之同志說得对，“形式邏輯所研究的問題，相对于思維内容來說，乃是形式方面的問題。”形式邏輯決不去研究思維内容。但是，在肯定这一点之后，不应当由此得出結論說，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时，就可以不管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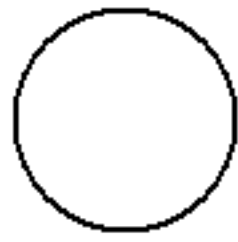
容,而把內容放置在一邊作為不相干的东西。我認為,“不研究內容”與“不管內容”,這是兩個概念,而不是一個概念,是兩個問題,而不是一個問題,不能把它們混為一談。所謂“不研究內容”,主要是指形式邏輯不去判明思維內容是真是假,何以為真,何以為假,以及判明真與假的客觀標準。要解決這些問題,只能依靠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各門具體科學。所謂“不管內容”,實際上是指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的時候,根本不管內容是真是假,在推理中,就是不管前提內容是否真實,“大前提一出,形式邏輯便可以據以為推”<sup>①</sup>。王忍之同志雖然沒有明確說出這一點,但是,從他的文章看,他所說的在研究思維形式時,把內容作為不相干的东西,實際上只能作這樣的理解。顯然,在這兩個概念中,只有前者是適合於形式邏輯的。所以,我認為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時,應當聯繫思維內容,即在思維形式與思維內容的聯繫中來研究思維形式。

· 什麼叫聯繫思維內容呢?怎樣聯繫思維內容來研究思維形式呢?一般地說,“思維內容”這個概念有兩種含義:一種含義是指思維的具體內容,比如“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個判斷的具體內容,就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只是貌似強大,實則虛弱,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群眾等;另一種含義是指思維的一般內容,比如“丙是乙的一部分,甲是丙的一部分,所以甲是乙的一部分。”這個推理的一般內容,就是三個概念之間所表現的正確的種類包含關係。形式邏輯研究思

維形式,主要是聯繫思維的一般內容,即要考慮到思維形式的客觀根據。比如:在研究推理時,就是要考慮到從前提到結論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事物的種類包含關係。除了聯繫這種思維的一般內容之外,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時,還要聯繫思維的具體內容。當然,這種聯繫不是主要的,但卻十分必要。所謂聯繫思維具體內容,主要是說:第一、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時,要考慮到由於客觀事物發展變化或由於人們的認識的發展變化所引起的思維內容的變化,以便使思維形式相應地改變,使形式為內容服務;第二、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時,要考慮到思維內容的真與假,在推理中,就是要考慮到前提內容的真與假,並且主張一個正確的推理,除了要求遵守推理的規則以外,還必須要求前提內容是真實的。(注意,這裡說的“考慮”,並不等於研究,更不等於解決。)

以概念為例來說。形式邏輯是從內涵和外延這兩方面來研究概念的,而內涵與外延是指具體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離開了具體概念,也就沒有什麼內涵和外延了。因此,形式邏輯研究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時,就必須結合或通過具體概念來進行。而且,為要真正明確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就必須考慮到概念的歷史發展。例如,當研究“人民”這個概念時,就必須考慮到“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着不同

<sup>①</sup> 周谷城:《形式邏輯與辯證法》(見《邏輯問題討論集》第8頁)。



③

④

⑤

⑥



的內容。”<sup>①</sup>而不能在純粹狀態中來研究“人民”這個概念。只有考慮到“人民”這個概念的歷史發展，才可能真正掌握它的內涵與外延。

再以王忍之同志在文章中所舉的一個推理的例子來說，“所有的英雄人物都是上應天象的，岳飛是個英雄人物，所以岳飛是上界星宿下凡。”這個推理是古人所作，現在看來，前提內容異常荒謬，但是，由於受到當時的科學發展水平和人們的認識水平的限制，古人在主觀上是斷定這個前提為真的，所以才進行推理。今天，人們不會再斷定這個前提是真的了。既然大前提已假，就不必再推，如果仍然要推，雖然它的形式可以是正確的，可是，必須指出，在這時形式已經脫離了它的客觀內容，因此，這種形式就不能幫助人們獲得真理。而且必須指出，這種客觀情況並不能否定作為一門科學的形式邏輯是要求內容和形式統一的。

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時所以應當聯繫思維內容，是有理論上和事實上的根據的。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內容，並以一定的形式存在着或者表現出來。有什麼樣的內容，就決定有什麼樣的形式，內容變了，形式也應當變，內容和形式是統一的；但是同時，辯證唯物主義還認為，任何事物，當它的形式形成之後，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內容和形式又是矛盾的。思維也是這樣，思維形式和思維內容是統一的，又是矛盾的。正由於思維形式具有相對獨立性，人們才可能把思維形式抽取出來加以研究，從而產生了一門獨立的科學——

形式邏輯。

可是，形式邏輯之成為一門科學，決不僅僅是因為它研究的是思維形式，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它研究的思維形式是人們頭腦對於客觀現實的反映。形式邏輯科學正是在思維形式和思維內容的統一中來研究思維形式的。當然，科學可以把互相聯繫的某一方面相對獨立出來進行研究，但是，在研究時決不能否定或割斷它們之間的聯繫。如果人們只是注意了思維形式對思維內容相對獨立的一面，在研究思維形式時，把這種相對獨立性加以誇大（王忍之同志正是這樣），甚至忘記或忽略了它和思維內容的聯繫的一面，只研究純粹形式，那麼，就不能夠把握思維形式本身的本质、規律。因為思維內容與思維形式是互相矛盾的統一體，人們要了解這個統一體中的一方（思維形式），就必須把它放到與它對立的另一方（思維內容）的相互聯繫當中，只有這樣，才可能真正掌握它的本质。

大家知道，生產力同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係。政治經濟學只是研究生產關係，而不研究生產力，但是，政治經濟學是聯繫生產力來研究生產關係的，而不是脫離生產力去研究純生產關係，只有這樣，人們才可能真正掌握生產關係本身發展的規律。這就說明，雖然一門科學可以研究某種形式，但是，在研究形式時，不能不聯繫內容。

形式邏輯也是如此。例如，直言三段論

<sup>①</sup>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頁。



中第一條規則說：“在每一個三段論中，只能有三個名詞。”並且指出，違反了這條規則就要犯“四名詞”錯誤（“四名詞”錯誤，實際上也就是偷換概念的錯誤）。有這樣一個例子：“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黑格爾的方法是辯證法，所以，黑格爾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這個推理犯了“四名詞”錯誤。形式邏輯為什麼能指出這個推理的錯誤呢？主要是因為它聯繫了推理的內容，即考慮到大小兩個前提中所使用的“辯證法”這個概念含義是不一樣的。如果不聯繫內容，要知道這個推理是否有錯是困難的。這說明形式邏輯規律、規則的本身就要求要聯繫思維內容，否則，是不可能真正掌握這些規律、規則的。

這樣說來，是不是完全否定了有研究純思維形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呢？不。但是，應當指出，根據形式邏輯本身的性質和特點，形式邏輯不能進行純思維形式的研究。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意見，形式邏輯首先是認識的工具，同時又是證明工具。恩格斯指出：“他（指杜林——引者注）認為辯證法是某種單純證明的工具，正像由於狹隘的理解可以把形式邏輯或初等數學看成是這樣的工具一樣。可是甚至形式邏輯首先也是尋找新結果的方法，由已知進到未知的方方法。”<sup>①</sup>恩格斯的這話，說明形式邏輯雖然只研究思維形式，但是它研究思維形式的目的是服務於思維內容，服務於人們的認識，即是為了獲得新知識，也為了正確的表達已有的認識。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是把形式邏輯當作必要的、比較簡單、初級的認識方法和證明方法。列寧指出：形式邏輯“是根據最普通的或最常見的東西來做形式上的定義，而且只是這樣做定義。”<sup>②</sup>在這裡，列寧雖然只指形式邏輯的定義方法，可是這卻比較集中地、突出地表現了列寧認為形式邏輯有局限性的思想。

形式邏輯的這種初級的認識工具和證明工具的性質，決定了它在研究思維形式時，不能把思維形式放在與內容毫不相干的純粹狀態中來研究。因為純粹狀態的空洞的形式是不能把握真理的。

充足理由律是形式邏輯的一條基本規律。它要求任何一個論斷都必須有充足理由。有了這一要求，就能為達到真理提供必要條件。人們要真正掌握這一條規律，就需要聯繫思維內容。充足理由律同時也是形式邏輯的證明理論的根據。從這裡，也就說明，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時，為要達到正確的認識，是不能不聯繫思維內容的。

這種情況還突出地表現在“證明”這一思維形式中，形式邏輯的證明本身有幾條邏輯要求，諸如論題保持同一、論據必須真實、論據應為論題的充足理由等。這些要求對於正確的證明都是不可少的。而要運用這些規則，就必須聯繫思維內容。

①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8—139頁。

② 《列寧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3頁。





由上述可知，我們所以主張要联系思維內容來研究思維形式，是從形式邏輯本身的性質和這門科學的實際情況出發的。我們並不否認，思維形式可以在純粹狀態中研究，事實上，數理邏輯就是這樣來研究思維形式的。恩格斯在論述數學對象時說：“為要能夠在其純粹狀態中去研究這些形式和關係，那麼就必須完全使它們脫離其內容，把內容放置一邊作為不相干的东西；這樣我們就得到沒有面積的點，沒有厚度和寬度的綫， $a$  和  $b$ ， $x$  和  $y$ ，常數和變數。”<sup>①</sup> 恩格斯這段話當然是正確的。問題在於王忍之同志認為：“恩格斯的這段話也適用於形式邏輯。”這樣，王忍之同志就把數學與形式邏輯在性質上的差別忽視了。這是不妥當的。

數學和形式邏輯這兩門科學的研究對象的側重方面以及他們的研究方法，是比較相似的，即數學只研究事物的量的關係這一方面，形式邏輯只研究思維形式這一方面；數學在研究事物的量的關係時，是撇開事物的具體本質的，形式邏輯在研究思維形式時，在一定的時間內也是可以暫時撇開（不是完全撇開）思維內容的。可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數學與形式邏輯是有差別的，而且這種差別是基本的方面。因為這種差別是由這兩門科學的不同的性質和特點決定的，形式邏輯是初級的認識方法和證明方法，而數學就不是這種方法。因此，形式邏輯與認識論的關係，要比數學與認識論的關係更為接近、密切。因此，把形式邏輯與數學等同起來，認為恩格斯那段話也適用於形式邏

輯，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此外，形式邏輯要以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為指導，要貫徹實踐的觀點。可是，如何達到這一目的呢？重要的問題之一，就在於形式邏輯要不要從大量的思維材料中總結、概括新的邏輯理論。在這一點上，王忍之同志有一段話是說得很好的：“應當研究大量的豐富的思維材料……。只有進行了這樣的 research，在大量的思維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抽象概括，我們才能獲得思維的形式結構的種種類型及其相互關係的知識。”不過，也正是在這一點上，王忍之同志在另一個地方卻說：“要在純粹狀態中研究思維形式及其關係，……這樣我們才能認識思維形式的種種類型，認識它們的本質、規律”。這是自相矛盾的。

其實，研究大量的豐富的思維材料，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抽象概括，這就是說，要在思維內容與思維形式的統一和聯繫中來進行抽象概括，因為所謂思維材料，其中有內容，有形式，它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物。既然是這樣，為要達到同一個目的，即“認識思維形式的種種類型，認識它們的本質、規律”，所以，就不能如王忍之同志所說，必須“在純粹狀態中”去研究，而必須在思維形式與思維內容的統一和相互聯繫中來研究。

這樣一來，形式邏輯會不會代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各門具體科學呢？回答是否定的。這裡的關鍵是在於：聯繫思維內容並不等於研究思維內容，考慮思維內容的真假并

<sup>①</sup>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8 頁。



不等于判明思維內容的真假，要求遵守充足理由律并不等于能够达到充足理由。

例如，前面曾提到直言三段論的第一條規則。我們主張必須联系推理的內容來考察這一規則，即考慮到大小前提中，名詞是否發生歧意。不過這僅僅是考慮到，而不是根本不問。要真正判明前提中的各名詞是否同一的外延和內涵，只能依靠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各門具體科學知識。形式邏輯是無法完成這項任務的。

根據以上分析，我不能同意王忍之同志提出的“在純粹狀態中研究思維形式及其關係”的觀點。

正由於王忍之同志把形式邏輯的對象局限為“思維形式結構”，並且主張要在“純粹狀態中”去研究，因此，他就把形式邏輯的作用限制為“能判定思維的形式結構是否正確”，“能保證我們的思維具有正確的形式結構”，“能夠把思維內容確定地、不矛盾地、有條理地組織起來和表達出來”。雖然王忍之同志也曾提到：“在判明前提正確的條件下，遵循了形式邏輯的規律規則進行推理，那我們就能夠獲得包含某種新知識的結論。”但是，必須指出，這種新知識的獲得，仍然只是通過“檢查思維形式正確與否”來達到的。這就是說，即使是王忍之同志也似乎提到了形式邏輯的認識作用，但是，這決不是主動的、積極的認識作用，即通過推理就可以獲得新知，而是意義非常狹窄的、消極、被動的認識作用，即通過檢查思維形式結構來獲得新知的。由此看來，王忍之同志心目中的形式邏輯的作

用，實際上就只是組織思想、表達思想和檢查思想。我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

形式邏輯能不能“把思維內容確定地、不矛盾地、有條理地組織起來和表達出來”呢？回答是肯定的。形式邏輯的作用是否只是如此呢？回答是否定的。

在前面，曾提到形式邏輯既有證明的作用，又有認識的作用。所謂“證明作用”，一指表達思想，一指論證思想。王忍之同志所說的組織思想和表達思想，並不包括論證思想的意思。事實上，形式邏輯在論證思想方面所起的作用，相對地說，比表達思想要大。比如，“證明與反駁”是形式邏輯的重要內容，我們掌握證明的理論，正確地運用證明的方法、反駁的方法，就能夠在證明真理、駁斥謬誤時增加思想的邏輯性和說服力。特別是在階級鬥爭中，邏輯工具的作用是很明顯的。形式邏輯在這些方面所起的作用，就不能僅僅歸結為組織思想和表達思想。

形式邏輯是能幫助人們獲得新知識的。為了獲得新知，達到真理，在進行推理時，形式邏輯決不是置前提於不問，雖然依靠形式邏輯並不能判明推理前提內容是否真實，但是形式邏輯卻必須過問前提內容，要求前提真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應當承認形式邏輯是要管前提內容的真假的。否則，如果根本不問前提如何，便據以為推，是不可能達到真理的，是和形式邏輯這門科學的本性——為真理服務不相符合的。



# 关于形式邏輯对象和作用問題的討論

《紅旗》今年第七期发表了王忍之《論形式邏輯的对象和作用》一文后，引起了邏輯学界对于形式邏輯問題的进一步的討論。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先后召开了座談会。《文汇报》、《光明日报》和《数学与研究》等也刊登了討論文章。从目前討論的情况看，对王忍之的文章大致有两种意見：一种意見是，同意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但对其中有些問題还有不同的看法；另一种意見是，根本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或基本上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而只是在个别問題上表示同意。

在討論中，有些同志，例如金岳霖，认为王忍之在文章中对下面几个問題的分析是正确的，这些問題是：肯定形式邏輯是一門科学，这門科学对于表述、論证、探求、验证知識的眞理性說来，是必要的、有用的；思維形式和思維內容是矛盾的統一，思維形式有相对独立性，錯誤的思維內容可以具有正确的思維形式；单独依靠形式邏輯本身不能駁倒一切具有錯誤內容的思想。<sup>①</sup> 溫公頤也认为，王忍之所說的，形式邏輯“不研究思維的具体內容，形式和內容是統一而不可分割的，但不妨从这統一体中抽出它的形式作为单独研究的对象，形式邏輯正是作这种研究的科学”，这些都是正确的。<sup>②</sup>

在討論中，在有些已发表的文章中，对王忍之文章提出不同的意見，大致有下面这一些：

王忍之认为，“形式邏輯所研究的問題，相对于思維內容來說，乃是形式方面的問題，它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揭示思維形式結構的規律。”<sup>③</sup> 馬特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sup>④</sup> 馬特說：“研究思維形式的不仅有形式邏輯，同时还有数理邏輯和辯证邏輯。”“数理邏輯是从思維形式量的側面去研究思維形式”，就是把概念、判断、推理抽象成为用符号表示的公式和公式与公式之間的形式結構的关系。“辯证邏輯是从思維形式

的运动方面去研究思維形式。”馬特认为，形式邏輯实质上是一种“普通邏輯”，它所研究的思維形式，就是已經“形成了的抽象的固定范疇”，而这种思維形式“是以事物最普通、最常見的关系和特性作为它的客观根据的”。他說，如果研究思維形式的只限于形式邏輯这一門科学，那就会“取消数理邏輯和辯证邏輯存在的权利”。

形式邏輯这門科学包括不包括归纳邏輯，包括不包括充足理由律，是邏輯学界爭論的一个問題。王忍之的文章沒有涉及到这个問題。很多同志对此提出了意見。他們认为，归纳邏輯和充足理由律都是形式邏輯的对象；根据这种观点，他們以为，王忍之对形式邏輯对象的說法，是不全面的。馬特說，“普通邏輯”所研究的抽象、分析、綜合、实验等是邏輯方法，而不是思維形式結構。充足理由律也不完全是思維形式結構的規律。归纳推理虽然有形式結構，但归纳方法却是一种邏輯方法。馬特說，按照王忍之的說法，形式邏輯是研究思維形式結構及其規律的科学，就会把上述邏輯方法、充足理由律、归纳等排除在“普通邏輯”这門科学之外。金岳霖认为，形式邏輯有“狭义的”形式邏輯和“广义的”形式邏輯。所謂“狭义的”形式邏輯，就是演繹邏輯；所謂“广义的”形式邏輯，就是既包括演繹邏輯，又包括归纳邏輯。金岳霖說，从“广义的”形式邏輯看

① 《讀王忍之文章之后》，見1961年7月8日《光明日报》，以下所介紹的金岳霖的意見，均引自此文。

② 《研究思維形式能够完全撇开思維內容嗎？》見1961年7月9日《光明日报》，以下所介紹的溫公頤的意見，均引自此文。

③ 見《紅旗》杂志1961年第7期。

④ 見馬特《形式邏輯的对象和作用》一文，該文将于《哲学研究》1961年第4期发表，以下所介紹馬特的意見，均引自該文。



来，王忍之所說的形式邏輯的对象，只包括概念、判断、推理，而沒有提到歸納和充足理由律，这是錯誤的。他还說，如果王忍之所說的形式邏輯的对象，包括了歸納，那么按照王忍之对形式邏輯的对象的说法，也“只是演繹地看待歸納的形式邏輯”，这也是錯誤的。黃順基也认为，王忍之对形式邏輯对象的想法，只較适合于亞里士多德的演繹邏輯，而对于現在的形式邏輯說来，就远远不够的了，現在的形式邏輯应当包括歸納邏輯等。<sup>①</sup>总之，他們都认为，王忍之所說的形式邏輯是研究思維形式結構及其規律的科学，这种說法，对于現在的包括歸納邏輯和充足理由律在內的形式邏輯說来，是不全面的，这种說法只是适合于演繹推理的范围，或演繹邏輯的范围。

形式邏輯的对象是思維形式結構，一般都承认这对判断、推理来说是适合的。但这种說法是否同样适合于概念，这就涉及到概念是否也有形式結構的問題。討論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見。一种意見认为，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也可以說是概念的形式結構，因此，王忍之关于形式邏輯对象的说法，对概念也是适合的。另一种意見則认为，概念本身不存在形式結構的問題。持有这种看法的同志认为，王忍之的說法不适合于概念。

在形式邏輯的对象問題上，什么是演繹推理形式，也有不同的看法。王忍之說，金岳霖“他們以为要判定一个推理形式是不是正确，乃至它算不算推理形式，单对推理形式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看这个推理形式和怎样的内容相結合”。金岳霖认为，王忍之这种批評是沒有根据的。他說，推理形式和蘊涵是有重大区别的。推理形式即“所以”，它断定前提内容正确，“并且通过前提的断定过渡到断定結論”；蘊涵即“如果——那么”，它并不断定前件内容和后件内容的正确。金岳霖說，王忍之却“沒有理会这一点”，把蘊涵当作推理形式来“处理”了，这种批評“就針鋒不相对”。

关于形式邏輯对象的討論，还涉及到“思維形式”、“思維形式結構”是否同一概念的問題。不少同志认为“思維形式”和“思維形式結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王忍之在文章中却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作为同一概念来使用了。馬特、黃順基等认为，思維形式結構是用符号表达的公式，它只是思維形式的一个方面，思維形式和思維形式結構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不完全相同的。

王忍之在他的文章中說，形式邏輯是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揭示思維形式結構的規律，它不研究思維的具体内容，而只是把思維形式从大量的思維材料中抽取出来进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說，形式邏輯是暂时撇开具体思維内容，在純粹状态中研究思維形式及其关系，这样才能認識思維形式的种种类型，認識它們的本质、規律。王忍之又說，如何研究思維形式結構及其規律，那就必須“研究其内容已被实践证明的思維材料，考察其中的内容是以怎样的方式构造起来的”。在討論中，不少同志都不同意王忍之的上述說法：“为要在純粹状态中研究思維形式及其关系，那就要暂时使它們脱离其具体内容，把内容放置在一边作为不相干的东西。”他們說，形式邏輯研究思維形式不能完全脱离思維内容，必須“联系”、“結合”、“考虑”思維内容，并认为必須結合各門科学来研究，这样才能概括出新的思維形式，不断丰富这門科学的内容。馬特提出，在純粹状态中研究思維形式，只适用于数理邏輯，而不适用于形式邏輯。李世繁认为，必須結合思維具体内容来研究思維形式。<sup>②</sup>有些同志认为，不联系思維内容，就不能判断推理形式是否正确。溫公頤說，思維形式既然是反映客观对象而有一定内容的，“所以关于思維形式的研究就不能完全抛开思維内容，完全抛开思維内容就无从断定思維形式本身的正确”。例如：“物质是不灭的，毛呢是物质，所以毛呢是不灭的。”他說，如果不联系思維内容，怎么能知道这一具体推理是犯了“四名詞”的錯誤呢？

有些同志认为，思維形式就是指推理中的三个概念之間所表現出来的种类包含关系，这种包含关系必須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包含关系。徐怀启說，

<sup>①</sup> 見《从历史、现状和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的指示看形式邏輯的对象問題》，1961年7月12日《光明日报》。

<sup>②</sup> 見1961年6月18日《光明日报》第1版。





“如果一个前提是不真实的,不仅这一个前提里的种类包含关系不可能是正确的,整个推理的种类包含关系也不是正确的。既然‘所有的英雄人物都是上应天象的’这个大前提是不真实的,那么,不仅这个前提里的种类包含关系不可能是正确的,‘岳飞是个英雄人物’这个小前提里的种类包含关系也不可能是正确的,从而‘岳飞是上界星宿下凡’这个結論里的种类包含关系也不可能是正确的,于是,这整个推理的种类包含关系都不可能是正确的。”<sup>①</sup>徐怀启认为,这种推理就不能认为是合乎形式邏輯的,因为形式邏輯不仅要求前提和結論前后一贯,不自相矛盾,而且还要求前提內容必須正确。

由于人們对形式邏輯的对象持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对形式邏輯这門科学究竟起怎样的作用,也有不同的看法。王忍之认为,如果說形式邏輯“要求”推理前提內容正确,还很难說得上“管得到”推理內容是否正确。人們在进行推理时,总是自以为从正确的前提出发的,但实际上,“人們对正确的标准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而且許多推理所依据的前提其实是錯誤的。”不少同志強調提出,形式邏輯这門科学要求推理的前提必須是正确的。他們所依据的是充足理由律,认为充足理由律必須要求前提是正确的。馬特认为,根据形式邏輯这門科学的本性,必須“要求前提判断是經過证明的有充分根据的判断”。有些同志认为,前提內容錯誤的推理尽管其推理形式是正确的,而且这种推理形式的正确是应当承认的,但这种推理仍然是不合形式邏輯的。金岳霖說,“如果一个人把AAA运用到违背了充足理由的思想內容上去的話,AAA虽不因此就不正确,然而他的普通形式邏輯仍然是不正确的。”李世繁认为,形式邏輯“管”前提的正确,就是能“断定、判明”推理前提內容的正确。<sup>②</sup>馬玉珂提出三段論的規則应当增加“前提必須真实”一条。<sup>③</sup>不少同志还认为,王忍之在文章中只談到演繹推理在表述、論证、探求、驗證知識的真理性方面的作用,就整个形式邏輯这門科学來說,只是这一点还是不够的。馬特认为,演繹推理所起的認識作用,仅仅是形式邏輯的一个部分,形式邏輯的認識作用还通过“归纳推理、类比推理以及分析和綜合、抽象和概括、

假設和实验等等邏輯方法而实现”。

什么是形式邏輯对象和作用問題上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馬特认为,人們“在运用思維形式进行推理活动时,就不能不考虑到据以出发的前提的真假”,“否則,推理活动就不是認識真理和证明真理,而只是作符号构造和概念游戏”。黃順基认为,从形式邏輯的“科学的证明”說来,要求推理形式結構的正确,也要求推理的前提、結論的內容正确。不承认这一点,就是把“推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过分的夸大了,絕對化了”。他认为王忍之所說的形式邏輯承认一个推理虽然其前提、結論的內容錯誤,但是只要其形式結構正确,这个推理就是合乎形式邏輯的,这就是說,形式邏輯只是研究推理形式的正确,这个观点实质上就是现代邏輯实证主义的观点。可以看出,什么是形式邏輯对象和作用問題上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人們的認識还是不一致的。

除上述問題外,討論中还涉及到推理形式有无階級性的問題。王忍之认为,推理形式是沒有階級性的,他說:“金岳霖同志认为,同样的一个推理形式,当它和无产階級的思想內容相結合的时候,它才是推理形式,当它和资产階級的思想內容相結合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推理形式了”。王忍之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金岳霖不同意王忍之的批評。他說,不同的階級是“根据不同的階級根源和認識根源”来进行判断,因而就“沒有共同的推理形式”,共同的形式是蘊涵。金岳霖說,王忍之却混淆了蘊涵和推理形式的区别,把蘊涵看作为推理形式,“这是我无法同意的”。

討論正在繼續深入。不少同志正在写文章。有些同志对于討論中提出的問題,如充足理由律、归纳邏輯是否屬於形式邏輯的对象,概念有无形式結構,推理形式有无階級性,等等,表示有兴趣研究。討論将有助于形式邏輯科学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洛文輯)

① 《思維形式的“內容”和思維形式的“形式”》,1961年6月2日《文汇报》。

② 見1961年6月18日《光明日报》第1版。

③ 見1961年6月29日《北京日报》第2版。





红旗



1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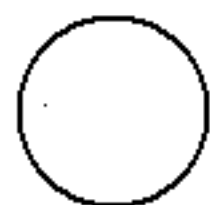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一年第十五、十六期 ★



## 目 录

自然科学与世界观 ..... 龔育之 (1)

认真扶植新生事物 ..... 甘子玉 (17)

关于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 ..... 刘际启 周 璞 (22)

論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 ... 許濂新 (27)

因地制宜地实行

    “三包一奖”制度 ..... 舒代新 富文业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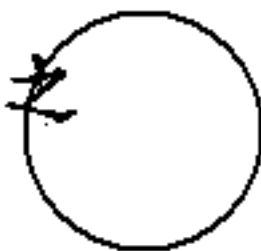
把矿山工作放在冶金工业的首位 ..... 高揚文 (46)

肯尼迪岂能扭转历史潮流 ..... 郭济洲 (53)



# 自然科学与世界观

龔育之



自然科学是人們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获得的关于自然界的规律的知識。作为生产斗争知識的結晶和生产的潜力，自然科学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直接联系着的。这种联系决定了自然科学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本方面。同时，作为人們对自然界的認識的总结，自然科学又同各个时代各个阶级的哲学、世界观发生一定的联系。正确地分析自然科学与世界观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促进自然科学学术問題上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推动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馬克思主义哲学，有重要的意义。

## 自然科学与世界观之间的联系

自然科学与世界观之间的联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正如毛澤东同志所說的，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識和社会知識的概括和总结”<sup>①</sup>。任何世界观的基本核心，是由哲学观点构成的。各个时代的各种哲学，不仅表现着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而且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

式反映着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

唯物主义哲学总是同自然科学紧密联系着，以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重要立足点的。“唯物論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sup>②</sup>。历史上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实践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水平。同古代的萌芽状态的自然科学水平和对自然界整体的直观观察相适应的，是原始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处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依賴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形成了它的唯物主义哲学。这种唯物主义哲学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状况。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自然界的发展过程和普遍联系的日益揭露，唯物主义必須、也有可能突破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而上升到新的阶段。馬克思、恩格斯創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概括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經驗，以及

<sup>①</sup> 《整顿党的作风》。《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18頁。

<sup>②</sup>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頁。



批判地改造了以往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结果；同时也综合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和当时的最新成果。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书中，又概括了从恩格斯逝世起，到列宁的这一著作出版止这整个历史时期内在科学方面、首先是自然科学方面所获得的最重大最实在的成果，进一步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列宁指出，战斗唯物主义必须注意自然科学领域里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否则，它根本就既没有战斗性，也不是唯物主义<sup>①</sup>。

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的不断深入，日益证明着和推进着唯物主义哲学的原理，促使唯物主义哲学改变自己的形式和丰富自己的内容。

至于唯心主义哲学，則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可以说是以“反面的”方式，来反映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它是人们对自然界认识不足的反映；是自然科学突进到新的领域，旧的理论和概念发生急剧变革的时候，人们认识上的迷乱的反映；是人们对自然科学成果的片面的、绝对化的、歪曲的理解的反映。自然科学的历史是逐渐从宗教迷信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束缚下摆脱出来的历史。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宗教和唯心主义也同样在改变自己的形式，并且极力歪曲自然科学的成果，来寻找新的论题和新的“论据”。

其次，自然科学在它的历史发展中，又总是处在各个时代的哲学思潮的影响之下

的。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发展的自然科学，一經进入理论的领域，就不能没有哲学思想的指导。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由于概括和整理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料而进入理论的领域，引起自然科学的革命。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当时自然科学的状况，指出理论的自然科学必须求助于理论的思维。而理论思维能力的发展，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是没有别的手段。他说：“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高兴采取怎样的态度，他们总还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问题只在于他们究竟愿意某种坏的时髦的哲学来支配他们，还是愿意由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绩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来支配他们。”<sup>②</sup>由于庸俗的资产阶级的教养，当时的自然科学家大都是从大学必修课程中，或者从胡乱读到的流行哲学著作中，来接受哲学影响的。因此，他们大多数都作了形而上学、经验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的最坏的时髦哲学的俘虏，从而造成了自然科学理论思维上的巨大混乱。恩格斯用大量的研究和论证令人信服地指出，“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的困难”<sup>③</sup>。

二十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以其一系列的重大发现，引起了新的深刻的革命。物理学

① 見《論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3頁。

②③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3、24頁。



由于进入前所未知的研究领域，产生了许多同传统概念和日常经验相违背的新的概念和理论，这就相继地引起物理学理论领域的几次“危机”。在数学理论的领域中，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在这样的“危机”中，许多自然科学家由于得不到正确的哲学指导，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哲学的影响，而堕入各种“物理学的”主观主义、“数学的”主观主义。列宁深刻地分析了二十世纪初物理学的“危机”和当时各种“物理学的”主观主义的根源，指出许多物理学家陷入主观主义是由于不懂得辩证法。他说：“自然科学进步得很快，正处于各个领域都在发生极为深刻的革命变革的时期，因此自然科学离开哲学结论，无论如何是不行的。”“现代的自然科学家在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黑格尔辩证法时，可以找到（只要他们善于去找，只要我们能学会帮助他们）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的解答，而崇拜资产阶级时髦的知识分子在这些哲学问题上却往往‘跌入’反动的泥坑。”①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是反映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不仅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而且是唯一正确的自然科学哲学；不仅是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社会，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科学的思想武器，而且是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界，进行生产斗争和自然科学的思想武器。

最后，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不同，它不以社会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它本身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和阶级利益的表现<sup>\*</sup>。但是，由于自然科学与世界观的联系，在阶级社会中，某些自然科学问题上的争论，有时也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各个阶级之间的思想斗争。

欧洲近代自然科学是在同宗教世界观的统治作尖锐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的最初篇章，不仅是用科学家的辛勤劳动，而且是用许多科学“殉道者”的受难和生命写出来的。科学世界观同宗教世界观之间的斗争，是当时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进步阶级同反动的封建阶级之间的思想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说：“哥伯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②在这些问题上的斗争之所以十分艰苦，并不单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主要地是由于反动势力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对这些学说进行

①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5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 有些资产阶级学者曲解自然科学成果来论述社会政治问题。例如，曲解人类遗传现象的研究，来“论证”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国家的种族优越和资产阶级对劳动群众的家族优越；或者曲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宣传科学技术发展可以代替社会革命，等等。不过，这些东西已经超出自然科学学说的范围，而成为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流派了。





压制的緣故。

現在，曾經支持过自然科学反抗宗教的起义的西方資產階級，已經陷入沒落和反动的地位了。他們在利用自然科学和技术成果来謀取自己的物质利益的同时，又竭力企图使自然科学同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調和起来。資產階級所支持的現代教会，有时仍然采取赤裸裸的手段，以“違背上帝造人的教义”的罪名，禁止自然科学家进行人体卵子体外受精之类的研究<sup>①</sup>。同时，資產階級現在更多地采用的却是一种新的策略，那就是极力歪曲自然科学成果来“論证”唯心主义哲学，甚至“論证”宗教教义。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种新发现和新概念的出现，就会有一批僧侶、資產階級哲学家以及一些受他們影响的自然科学家出来，宣傳一通，說什么这些发现和概念又一次证明了宇宙的創造、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死，或者唯物主义的破产、唯心主义的胜利等等。列宁說：“只要回忆一下欧洲各国經常出现的大多数时髦的哲学流派，从那些和鐳的发现有关的哲学流派起，到那些正在竭力想拿爱因斯坦学說作根据的哲学流派止，就可以知道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階級立場及其对各种宗教的扶持同各种时髦的哲学流派的思想内容之間的联系了。”<sup>②</sup>

只有无产阶级和它的辯证唯物主义哲学才是自然科学的最忠实的同盟者，是自然科学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斗争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和最好的指导者。

从以上的简单闡述中可以看到，自然科学与世界观是有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自然科学为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基石，它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战胜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中所必須运用的重要武器。另一方面，反科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限制和束縛的作用，而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則起着推动它前进的作用。

在自然科学与世界观的关系問題上，有一种简单化的看法，以为自然科学上各种不同的意見和学說，都是各种不同世界观的产物，这种看法是同事实不符合的。自然科学以生产实践和实验研究作为自己的基础和出发点。在形成自然科学的理論概括的时候，世界观发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自然科学家毕竟不是离开实践經驗和实验事实，单纯地根据某种世界观来构造自然科学的理論和学說的，并不是从不同的世界观中形成不同的自然科学，而是相反地，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充分依据和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而唯心主义世界观則反对和歪曲自然科学的成果。

另外有一种看法，认为自然科学与世界观没有什么关系，自然科学家用不着关心世界观問題。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以自然科学的成果作为自己的

① 見《人民日报》1961年1月21日。

② 《論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9頁。



重要依据，反过来又成为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自然科学的理论概括和研究方法，究竟为怎样的世界观所支配，不能不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发生深远的影响。

在自然科学与世界观的关系问题上，采取这种或者那种错误观点，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许多实际上存在的复杂现象。例如：许多自然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虽然抱着唯物主义观点，但是，这种唯物主义观点往往是不自觉的。同时，许多自然科学家，虽然在哲学上接受了唯心主义影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但是在自然科学上，却仍然做出了重大的成就。又如，自然科学学术观点上的是非和争论，科学试验和研究工作中的成败和得失，其中有些虽然与世界观的影响有关，但是更多地却不是属于世界观性质的问题，不能把它们都提到世界观的高度，等等。

下面，我们试图对自然科学与世界观的关系上的某些复杂现象，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 “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

在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他们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进步的。但是，也有一些自然科学家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落后的，他们在自然科学上也有重大成就。牛顿是经典力学的奠基人，但是他的形而上学思想是很严重的，并

且是笃信上帝的。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创始人，但是他的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影响是很多的。海森堡是量子力学的建立者之一，但是他在哲学上公然宣传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列宁把这类人概括地称之为“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他说：“这些教授们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sup>①</sup>

这种矛盾现象应该如何理解呢？

自然科学家的自然科学成就同他们的世界观的矛盾，归根到底，表现了他们的世界观本身的矛盾。这些人之所以有可能在自然科学上取得重大成就，是因为他们在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中，总是抱着自发的唯物主义态度的缘故。但是，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们在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往往成为唯心主义的自觉的信徒，特别对待社会历史领域内的种种事物，他们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就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恩格斯说，许许多多自然科学家“在自己那门科学的范围内是不屈不挠的唯物论者，但在这以外就不仅是唯心论者，而且甚至是最虔诚的正教教徒”<sup>②</sup>。

对待自然界的态度是唯物主义的，对待社会历史的態度是唯心主义的，这样的矛盾，

<sup>①</sup>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2页。

<sup>②</sup>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可以說，普遍地存在于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一切唯物主義者的身上。舊唯物主義的根本缺陷之一就在這裡。只有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才真正建立了關於自然界、社會和人的思維的發展的統一的唯物主義觀點。

人們的階級地位，對於人們認識社會的過程和認識自然界的過程的影響，是不相同的。在認識社會的過程中，處於反動沒落地位的剝削階級，不可能也不願意去揭露歷史的真實，揭露社會發展的規律。因為客觀歷史規律是違反他們的階級利益的。馬克思在談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時說過：“經濟學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會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喚起，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到戰場上來阻礙它（指自由的科學研究——引用者）。”<sup>①</sup> 斯大林也說過：“在經濟學領域中，發現和應用那些觸犯社會腐朽力量的利益的新法則，却要遇到這些力量極強烈的反抗。”<sup>②</sup> 因此，從根本上說，在社會現象的研究中，一切代表社會腐朽力量的學者，都不能不採取唯心主義的、根據主觀意願任意歪曲客觀真實的態度。在認識自然界的過程中，情況則有所不同。資產階級要利用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來牟取更多的利潤和製造更大威力的殺人武器。因此，在這裡，總的說來，資產階級的階級私利同採取客觀的、唯物主義的態度研究自然界的的要求之間，一般是不存在衝突的，毋寧說是一致的。雖然自然科學研究的某些理論概括會同資產階級

的宗教和哲學的意識形態相衝突，但是同物質利益要求上的一致比較起來，也是居于次要地位的。所以，“在自然科學中，發現和應用新的法則是或多或少順利地進行的”<sup>③</sup>。

這就是為什麼資產階級學者<sup>④</sup>在社會歷史領域內受唯心主義支配，在研究自然科學的時候卻能夠採取唯物主義態度的緣故。

自然科學就其本性而言，是只能同唯物主義相容，而不能同唯心主義相容的。自然科學以其全部成就日益向人們清楚地表明：自然界是客觀存在的；在人類存在以前自然界就早已存在；人類是自然界生物發展的高級階級的產物；思維是人腦的產物；自然界的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並且可以被人們認識的；人們認識了客觀自然規律就獲得了改造自然界的力量，等等。因此，自然科學研究的實踐，迫使自然科學家不得不接受這些作為唯物主義的基礎的原理。在自然科學家中間，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種特殊形態的唯物主義，即所謂“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按照列寧的定義，這種唯物主義，“即絕大多數自然科學家對我們意識所反映的外界客觀實在的自發的、不自覺的、不定型的、哲學上無意識的信念”，它同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唯物主義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sup>④</sup>。

① 《資本論》第1卷初版序，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頁。

②③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版，第5頁。

④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8頁。



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力量。在“物理学的危机”的影响下，虽然少数自然科学家在哲学上陷入唯心主义，但是“一般自然科学家以及物理学这一专业部门中的自然科学家，极大多数都始终不渝地站在唯物主义方面”<sup>①</sup>。

就是那些在哲学上陷入唯心主义的少数大自然科学家，尽管他们在阐明自己的哲学观点的时候，喋喋不休地“证明”上述的那些唯物主义原理的破灭，但是，在真正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仍然不能不接受这些原理作为前提。否则，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不可能取得任何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

牛顿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是站在自发的唯物主义立场上，以实验和观察的事实为出发点，力求寻找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理解。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中，他提出的研究自然的四条规律<sup>②</sup>，清楚地表明了他研究自然所依据的、建立在自发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基本方法。

爱因斯坦也曾经一再宣称，“相信有离开感知的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sup>③</sup>。“物理系统的‘实在的状况’，客观地、独立于任何观察或测量之外地存在着，并且原则上可以用物理学的表示法描述出来。”<sup>④</sup>他不同意海森堡等自然科学家断然抛弃这个基本原理的态度。他说：“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是不能赞同的，我以为它会变成贝克莱的原则‘存在就是被感知’之类的

东西。”<sup>⑤</sup>

海森堡是一个公开宣传“唯物主义的破产”，“回复到唯物主义本体论的不可能”的学者。但是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也不得不承认，在研究自然规律的时候，物理学家必须以下列的最一般的观点为指导，这就是：“物质是存在的，它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中，它未来的状态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是它过去的状态的必然结果；存在着力和相互作用；原因总是导致由它所引起的结果，等等”<sup>⑥</sup>。

至于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中曾经仔细分析过的马赫和奥斯特瓦尔德，他们的唯心主义也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列宁指出，当他们“只是”以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来发言时，他们仍然是以自发的唯物主义观点谈论问题的。

有人或许会以为，既然自然科学的本性同唯心主义不相容，既然自然科学家在他们的自然科学研究中自发地倾向唯物主义，那

①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8页。

② 见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第8分册，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2—25页。

③ 见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第200页。

④ 参看巴斯金、巴希托夫编：《现代主观唯心主义》，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56页。

⑤ 见P.A.Schilpp编：《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纽约杜德出版社1951年版，第669页。

⑥ 海森堡：《论建立物质的统一场论的可能性》。见苏联《自然》杂志1959年第12期，第41页。



末，唯心主义就不会对自然科学有什么影响，现在我們提倡自然科学家自觉地学习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我們不仅要看到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积极作用，同时还必須看到它是不彻底的，有很大局限性的，在哲学上是軟弱的。它不能防止由于把認識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而自发地产生唯心主义观点，更不能有力地抵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統治地位的唯心主义哲学的进攻。

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表现在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牛頓把世界不是看作发展形成中的东西，而看作始終不变的东西，因而邏輯上不可避免地要提出“第一推动力”的問題，得出上帝存在的結論。他就是这样通过形而上学走向神学的。近代許多物理学家之所以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他們不懂得辯证法，特别是認識发展的辯证法，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辯证法，从而通过对理性和抽象的绝对化理解，通过相对主义走向唯心主义。爱因斯坦說得很清楚，他說，一个自然科学家像是一个实在主义者（这里爱因斯坦其实是說的唯物主义者——引用者），因为他企图去描述一个独立于知觉的动作之外的世界；他像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因为他把概念和理論当作人的精神的自由約定；他像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因为他认为

邏輯的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中不可缺少的有效工具<sup>①</sup>。这实际上正是他对自己的哲学观点的写照。

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它的直观性和对社会实践在認識中的作用的无知。許多自然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同生产实践的关系、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的动力、劳动群众和自然科学家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作用这些問題上，往往陷入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而对待这些問題的唯心主义观点，对于发展自然科学是不利的。

正是由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这些局限性，許多偉大的自然科学家在哲学上不能抵擋唯心主义的进攻而成为“渺小的哲学家”。反过来，由于哲学上的渺小，由于唯心主义的侵蚀，这些自然科学家所能够取得的成就，也不能不受到一定的有时是很大的限制。自然科学家馬赫和奥斯特瓦尔德从他們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出发，否认当时提出的原子学說，否认原子的实在性。奥斯特瓦尔德甚至預言将来原子“只能在图书馆的尘土中得見”。曾几何时，“只能在图书馆的尘土中得見”的，不是原子，倒正是奥斯特瓦尔德的破了产的預言。

列宁說：“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論据，是无法对资产階級思想的侵襲和资产階級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

<sup>①</sup> 見P·A·Schilpp編：《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紐約杜德出版社1951年版，第684頁。





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作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作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信徒，也就是说应当作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sup>①</sup>。

自然科学家能不能通过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自发地达到辩证唯物主义呢？

应该说，自然科学家虽然一般地能够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但是，这种自发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之间的区别，不是简单的量的区别。从前者到后者是一个质的飞跃。为了实现这个飞跃，不经过自觉的努力是很难做到的。

恩格斯和列宁对这个问题都作过很好的分析。恩格斯说，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复归于辩证法。“它可以仅仅经过自然科学的发现本身而自然而然地达到，因为这些发现再也不能让自己束缚在旧形而上学的枷锁中。但这是一个比较长期、比较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克服非常多的多余的阻碍。这个过程大部分已经在进行了，特别是在生物学中。假如理论自然科学家愿意从其历史地既定的形态中仔细地研究辩证哲学，那末这一过程便可以大大地缩短。”<sup>②</sup> 列宁也说：“现代物理学正在走这一步，而且将来还会走这一步，但它不是笔直地而是曲折地，不是有意识地而是自发地走向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它不是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终极目的’，而是在摸索着接近这个目的；它动摇着，有时候甚至倒退。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

义。分娩是苦痛的。”<sup>③</sup>

自然科学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的这些“多余的阻碍”、动摇、倒退和分娩的苦痛，乃是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统治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已经成为居于指导地位的思想，并且为广泛地组织自然科学家学习这种哲学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我国的自然科学家认为，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所必需的，而且对于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掌握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比较顺利地克服那些“多余的阻碍”，也是大有益处的。

总之，对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一方面必须承认它在自然科学历史上和现在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它的局限性，必须积极提倡自然科学家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自觉地掌握这一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哲学。对于“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一方面必须承认这种矛盾现象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在我们今天的条件下，又要努力去克服这种性质的矛盾，使自然科学家努力获得同自然科学的发展相适应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从而有可能在自然科学上取得更加伟大的成就。

①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4页。

②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

③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0页。



## 关于自然科学的学术爭論

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充滿着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各种不同学派之間的爭論。自然科学就是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学术爭論的不断解决和不断产生，通过各种新旧理論的不断嬗替，而永远向前发展的。

下面我们想通过若干实例，对自然科学学术爭論和新旧理論嬗替的某几种形式，进行一些簡略的分析，并且由此說明世界观問題在自然科学学术爭論中所占的位置。

### (一)比較正确的認識代替錯誤的認識。

随着認識的进展，旧的、錯誤的理論被拋棄，而代之以新的、比較正确的理論，这是很常見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那些在自然科学中曾經存在过較长时期、发生过較大影响的錯誤理論來說，这种更替，往往不是一个簡單拋棄的过程。

“不正确的观念(如果抛开观察的錯誤不讲)，归根到底都是关于正确事实的不正确的观念”<sup>①</sup>。虽然我们拋棄了某一种錯誤理論，但这种理論所判明的并且企图加以解釋的全部事实仍然繼續存在。

某些錯誤理論有时是以一种歪曲的形式反映了一定的真实关系。燃素說和燃素說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这些學說，是同当时流行的一种关于神秘物质的錯誤观念联系起来的。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被燃素說統

治的物理学发现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关于热的定律，后来的正确見解不过是把前人在錯誤見解指导下发现的定律順了过来。燃素說經過百年来实验的工作把材料收集起来，而在这些材料的帮助之下，后人发现了空想的燃素的真实对立物——氧气，因而拋棄了燃素說。但是并不是拋棄燃素說者的研究結果，而不过把它們的公式順了过来<sup>②</sup>。

由此可見，即使在正确的認識和錯誤的認識之間也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

### (二)比較全面的認識代替片面的認識。

“統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認識，是辩证法的实质。”<sup>③</sup>对于光的矛盾本性的認識过程，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人們对光的本性提出了两种學說。一种是惠更斯的波动說，一种是牛頓的微粒說。对于一些光学现象，两种學說都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釋。当时还缺乏足够精确的实验材料来判断两种學說的是非。由于牛頓的威望，微粒說占居統治地位，达一个世紀之久。直到后来发现了一些为微粒說所无法解釋而波动說却能很好解釋的现象，波动說才取得了胜利。

旧的波动說把光設想为具有机械性质的

① 恩格斯：《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7頁。

② 見《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頁。

③ 《談談辯证法問題》。《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7頁。



介质中的弹性波，它本身存在一些困难和矛盾。十九世纪中叶，馬克斯威尔提出电磁波学说，解决了这些矛盾。然而，由于机械的世界观的影响，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人們不能接受光是电磁波的学说。直到赫兹从实验上证明了这个学说以后，它才得到公认。

但是，后来又发现一些实验事实，波动说不能加以解释，需要新的微粒说才能加以解释。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从这些事实出发，推广了普郎克的量子论，建立了光的量子说。

光的量子说反映光的波动性与微粒性的矛盾的統一，它把波动说和微粒说当作各自反映了光的矛盾本性的一个片面的学说予以抛弃，同时在新的基础上，综合了两者的成果，建立了新的、比较全面的学说。

(三)更加深入的認識代替表面的認識。

“人对事物、現象、过程等等的認識从現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是辩证法的要素之一<sup>①</sup>。人們对化学元素周期律的認識史，为这一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說明。

在周期律发现以前，人們就从現象上观察到一些元素之间的联系，陆续提出了“三联律”、“八音律”这样一些反映了某些局部的、表面的联系的学说。門德列也夫发现元素的性质随它們的原子量的递升而周期地变化，建立了統一的元素周期律，闡明了这些联系的本质。但是，門德列也夫的以原子量为基础的学说，仍然是对事物的不甚深刻的

本质的認識。其中还包含几处矛盾的地方，有几个元素不能按原子量递升的順序来排列，必須顛倒过来才符合实际。

后来，摩斯莱根据各个元素的特征X射线频率来排列元素的次序，提出了原子序数的概念，代替了以前按原子量順序排列的方法，解决了原来方法中的矛盾。

原子结构理論的建立，更加深刻地闡明了元素周期律的本质。原子序数所代表的正是各种元素的原子结构中核外电子的数目，而元素性质的周期性不过是其电子的壳层结构的表現。而門德列也夫在建立周期律的时候，却是反对把他的学说同任何原子结构理論联系起来的。

(四)更加普遍的認識代替局部的認識。

在这种情况下，新理論不是推翻旧理論，而是指明旧理論应用范围的局限性，同时把旧理論作为一种局部情况包含在具有更大的普遍性的新理論之中。

相对論和量子力学的建立，对牛頓力学是一个很大的革命。牛頓力学不再被当作可以用来說明一切运动的理論了。牛頓力学中关于绝对時間、绝对空間的概念，关于物质质量同它的运动状况无关的观点，被推翻了。粒子运动的轨迹概念和机械的决定論，对微观粒子成为不适用的了。物理学的基础概念因此发生了重大变革，以对牛頓力学的绝对化理解为基础的机械的世界观受到严重打击。

<sup>①</sup> 《黑格尔〈邏輯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9頁。



不少自然科学家由于旧的机械世界观的束缚，在很长时间内不能理解和接受新物理学的概念。另外不少自然科学家由于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在抛棄机械論的同时，抛棄了唯物主义。圍繞着相对論和量子力学引起了热烈的学术爭論，其中也反映了各种哲学观点的激烈斗争。

但是，从自然科学的内容來說，相对論和量子力学并没有整个推翻牛頓力学，而是从两个方面指出了牛頓力学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在可以同光速相比較的高速領域中和普郎克常数起作用的微观領域中，牛頓力学不再适用了。只是在低速和宏观領域中，牛頓力学仍然适用，仍然是客观真实关系的反映。牛頓力学成为具有更大普遍性的新理論的局部情况。就是說，在物体运动速度同光速相比可以忽略不計的条件下和普郎克常数可以忽略不計的条件下，相对論和量子力学中的公式轉变为牛頓力学的公式。在这种条件下，新旧理論互相符合。

我們在这里所引述的不过是自然科学发展历史中的几个片断。自然科学理論发展的形式，当然比这里所說到的要丰富得多。而且，在复杂的認識发展过程中，上述的这些新旧理論嬗替的形式和其他的一些形式，实际上是常常交織在一起的。

从这些粗略的分析之中，我們可以作出一些什么結論呢？

我們看到，人們認識自然界的過程是极为复杂的。对自然現象的正确認識不是一下

子就可以达到的。認識的前进不是通过正确認識的簡單积累来实现的，这里有着十分曲折的道路，充滿着各种矛盾和斗争。不同的学术观点并不总是由于人們世界观不同而引起的，单是由于人們掌握材料的不同，观察問題的角度与深度的差別，研究方法和途徑的殊異，会产生各种学术見解和各种学派的分歧和矛盾。因此，自然科学中的各种学术爭論，是認識发展中必然的、正常的現象。人們对自然界的認識，正是随着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发展，通过这些不断解决着又不断产生着的認識上的矛盾的斗争和統一，使比較正确的認識代替錯誤的認識，比較全面的認識代替片面的認識，比較深入的認識代替表面的認識，比較普遍的認識代替局部的認識，从而經過无数相对真理的环节而向絕對真理不断前进的。

在从相对真理到絕對真理的过程中，旧的認識不断地被新的認識所否定。但是，在这里，否定不是絕對的否定，不是簡單的拋棄，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否定”<sup>①</sup>。旧的認識，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相对真理，其中包含着或多或少絕對真理的因素。这些絕對真理的因素，被当作肯定的东西而包含到新的認識之中。在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一切經過实践檢驗的关于自然界的規律的知識，不管它們是在什么社会制度下，在什么世界观

<sup>①</sup> 《黑格尔〈邏輯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4頁。



的影响下，在什么自然科学理論的指导下获得的，都世代继承和积累下来，成为人类認識的財富。一切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而产生的錯誤的东西，或者片面的、表面的、局部性的东西，則被拋棄和克服，作为認識过程的复杂曲折的見证而記入史册。

自然科学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認識过程的辯证法。

在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各种学术爭論，具有許多不同的性质。其中有些是反映在理論概括和研究方法之中的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辯证法同形而上学的爭論。更多的則不屬于这种性质的爭論，而是認識过程中具体的是非之爭、新旧之爭和不同見解之爭。还有一些則是上述两者交織的产物。对于这些爭論的不同性质，必須进行細致的分析。既不能忽視自然科学学术爭論中存在着世界观性质的問題，又不能把不同性质的爭論混为一談，把一切自然科学的学术爭論都提到世界观的高度。

在自然科学的爭論和发展中，涉及的内容是十分复杂而丰富的。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一）經驗、事实、材料的搜集和甄別；（二）定律、关系、公式的发现和檢驗；（三）概念、理論、学說的提出和論证；（四）哲学的結論、世界观的概括。这些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而又相互区别的。不能說有关事实、材料和定律、公式等的是非正誤問題，都是世界观的問題。也不能說，一切理論、学說的爭論都是世界观的爭論。例如，

牛頓的光的微粒說和惠更斯的光的波动說之爭，就并不是由于世界观的不同。在認識自然界的复杂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錯誤和偏差，一切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和局限性，并不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产物，而往往是由于經驗、事实、材料之不足等原因所导致的，是認識的历史发展中难免要經過的阶段。当然，这些主观性和片面性等等，又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認識上的根源。如果把某种带有主观性、片面性的結論加以絕對化，就有可能从中做出各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結論。

从自然科学中作出的哲学結論和世界观的概括，反过来，又影响着自然科学的发展。

反映自然科学发展的旧的水平的世界观，例如机械論的世界观，反过来，成为一种傳統的保守力量，阻碍着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歪曲自然科学成果而作出的唯心主义哲学結論，更是把自然科学的理論发展引入迷途。从牛頓力学到相对論和量子力学的发展过程，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歪曲自然科学成果作出的哲学結論，同自然科学成果本身，必須加以区别。既不能因为机械論的世界观是以对牛頓力学的絕對化理解为基础，而否定牛頓力学的科学价值。也不能因为許多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歪曲相对論和量子力学的成果，作出不少唯心主义哲学的結論，甚至宗教的結論，而否定相对論和量子力学的巨大成就。

至于反映着自然科学发展的現代水平的





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則反過來對於自然科學的發展，起着促進的作用。

##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我們黨關於學術文化工作的根本方針。這個方針是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真理發展的規律、關於認識在矛盾的鬥爭和統一中發展的規律制定的。貫徹執行這個方針，對於迅速發展我國的學術文化，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為了在自然科學中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需要我們認真地總結幾年來實踐的經驗，同時，也需要我們很好地總結自然科學發展的历史規律。根據历史的經驗和幾年來我們實踐的經驗，正確認識自然科學與世界觀的關係，對於執行這個方針，有很重要的意義。

根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自然科學學術問題上，必須鼓勵不同的學派和持有不同學術見解的人，自由探討，自由爭論，互相尊重，互相學習。自然科學學術問題上的爭論，無論是具體學術上的是非之爭，或者是涉及唯物主義同唯心主義、辯證法同形而上學的爭論，都是屬於學術性質的問題，都必須通過科學界的自由討論，通過科學的實踐，通過時間的考驗來解決，而不能採取簡單的方法來解決。否則，會不利於科學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對於自然科學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們必須積極提倡自然科學家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來指導自己的工作。

但是，為了正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來指導自然科學，第一，必須認識，世界觀的問題，是不能用強制的辦法去解決的。不能強制人們放棄唯心主義，也不能強制人們接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同志說：“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sup>①</sup>在自然科學學術問題上，尤其是這樣。唯心主義的產生，不僅有其階級的根源，而且有認識論上的根源。在人們對於自然現象的研究不斷深入地發展中，由於認識論的根源而產生不同形式的唯心主義的傾向，有時是難免的。至於不同形式的形而上學的傾向就更是容易出現了。對於反映在自然科學理論概括和研究方法中的世界觀問題，只有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通過自由的討論，通過自由的批評和反批評，通過反復的相互比較，才能逐漸地解決。

第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條根本原理。一切自然科學學說的是非以及反映在這些學說中的世界觀的是非，都必須而且只能通過生產和科學

<sup>①</sup>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頁。



的實踐來判明。別的途徑是沒有的。自然科學的一切學術爭論，都是在實踐的基礎上來解決的。在自然科學學術爭論中，不能僅僅去分析各種學說、學派所持的哲學觀點，更重要的是要根據實踐、實驗、事實來檢驗它們是否符合客觀實際。離開實踐、實驗、事實來空談哲學觀點，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的。

第三，對於具體事物進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自然科學中的各種學術爭論，常常具有不同的性質。必須進行具體的分析，區別哪些是涉及世界觀的問題，哪些不是世界觀性質的問題。對於那些涉及世界觀問題的學術爭論，也必須進行具體的分析，指出其中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表現在什麼地方，導致怎樣的錯誤結論，同實驗事實和科學發展發生了怎樣的衝突，它的產生的根源又是什麼，等等。不能不做具體的分析，輕率地把自然科學中的任何爭論問題都當作世界觀性質的問題，並且簡單地給戴上“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帽子，便算了事。因為這樣做也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的。

第四，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一種駕凌於自然科學之上的“科學之科學”，不是用固定的思想框框去束縛和限制自然科學的僵死的东西。它本身是一門科學，是關於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的普遍發展規律的科學。它最忠實於自然科學的事實，尊重一切自然科學的成果，並且總是精心地去概括自然科學的基

本結論和基本方法，研究自然科學的最新成就，用來不斷地豐富和發展自己。正因為如此，所以它才能夠為自然科學提供一種同自然界的發展，同自然科學的發展相適應的理論和方法。這種理論和方法是最富有創造性的。它把批判和創造結合起來。它幫助人們解放思想，克服因循守舊的保守習氣，鼓勵人們敢於自由地去進行各種新的探索，在思想為人們開辟寬闊的境界和道路。因此，它是推動自然科學向前發展、自由創造的強有力的思想武器。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工作者同自然科學家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創造性的合作關係。這種關係建立在同志式的互相探討、互相學習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向自然科學家學習自然科學的歷史、方法和最新的成果，同自然科學家一起來研究和討論自然科學發展中提出的各種哲學問題，並且幫助自然科學家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理，通曉思維的歷史及其成績，正確解決在理論概括和研究方法上遇到的複雜問題。自然科學家不僅要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來研究自然科學問題，而且要用他們的自然科學知識，用科學研究的最新成果，來幫助宣傳、論證、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這樣的創造性的合作關係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能夠對於促進自然科學的發展起積極的作用，自然科學家也能夠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和發展起積極的作用。

最後，必須認識，要正確運用馬克思主



义世界观来指导自然科学，获得更好的自然科学成果，絕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真正掌握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就需要經過艰苦的学习过程；为了要在自然科学上做出成果，还必须通过深入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实践。仅仅哲学观点正确，并不能保证某一种学說、学派在自然科学上的正确。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也不能从哲学出发简单地推演出自然科学結論来。在正确的哲学指导下，自然科学家还必须对具体的自然现象进行具体的研究，通过实践，通过实验、計算等等，来建立和檢驗自己的自然科学学說。恩格斯說得好：“不論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必須从既定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須从物质的各种对象形态和各种运动形态出发；因此，在理論的自然科学中不能虛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就要尽可能地用經驗去证明”<sup>①</sup>。他还批評过一些德国青年作家把唯物主义当作套語，“用这个套語去处理各种事物，再也不花什么气力去作进一步研究，也就是說，他們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一切都解决了。然而，我們的历史观首先是个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一种用以按黑格尔学派方式

构造体系的手段”<sup>②</sup>。他认为“即令只要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發揮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种需要多年靜心研究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讲空話是无济于事的，这样的任务只有依靠大量的、經過批判审查了的、完全領会了的历史材料才可解决。”<sup>③</sup>恩格斯对历史科学所說的这些話，对于自然科学同样是极有教益的。

总之，貫徹执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针同提倡用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指导自然科学，是一致的而不是互相冲突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针本身就是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产物。在自然科学学术研究和討論中，提倡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首先就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针。同时，只有采取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针，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引导和帮助自然科学家自觉地学习馬克思主义世界观，促进自然科学更迅速、更健康地发展。

① 《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7 頁。

②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2 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5 年版，第 487 頁。

③ 《論卡尔·馬克思著〈政治經济学批判〉一书》，《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1 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4 年版，第 347 頁。



# 认真扶植新生事物

· 甘 子 玉 ·

怎样正确地扶植新生事物成长壮大，是各项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扶植新生事物，首先必须对新生事物抱有最大的热情。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表面上弱小但是正在生长的力量，战胜表面上强大但是正在衰亡的力量。新事物总是要代替旧事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制度给新生事物的成长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制度所不能比拟的。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客观规律，对新生事物采取热情对待、坚决保护的态度，依靠群众，积极扶植和促进新生事物的发展，有意识地推陈出新，使各项工作迅速前进。

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新生事物这个问题上，是有着鲜明的区别的。早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一再强调正确对

待新生事物的问题。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用最大的热情，歌颂和支持了农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指出这些革命行动，完全是“好得很”，而不是什么“糟得很”。毛泽东同志曾经满怀信心地预言，几万万农民起来以后，“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sup>①</sup>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当革命的力量还显得弱小，反革命力量还显得强大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看到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英明论断。果然，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我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怎样对待社会主义的新事物的问题上，我们也有不少的经验教训。一九五五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页。



年，全国农村出现了一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当时，有些人对于五亿多农村人口中发生的这个新事物，曾经提出了很多的疑问。他们怀疑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否办得太快、太多了？是否能够发展、巩固？已经办起来的合作社是不是要“砍掉”一些？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回答了这些疑问，指出这些人的错误是：“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sup>①</sup>。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热情积极地领导和支持这个革命行动。果然，在一九五六年秋冬，农业合作化在全国范围内就迅速实现了。

在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三年大跃进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事物。虽然不少的新事物现在还处在生长发展的过程中，有待于进一步巩固、充实和提高。但是，可以肯定，它们的巨大生命力，今后一定会越来越明显地为人们所看到。

## 二

我们在热情对待新生事物的同时，对每一项具体的新事物（新创造、新方法、新经验、新技术等等），又应当保持最清醒的头脑，“把最大的热情和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sup>②</sup>。

新生事物在它们生长壮大的过程中，暂时的部分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只有通过反复的试验、实践，才能使它逐步发展完备起来。当然，我们应该首先看到新生事物优越于旧事物、大有希望的一面，不应当借口新生事物还存在问题就对它采取不积极的态度。但是，在肯定正确的方向、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它目前还不完善的一面，冷静地对待那些已经遇到的问题。而且宁肯把这些问题估计得充分一些，以便作足够的准备来克服困难。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一切事情，成绩有几分就是几分，问题有多少就算多少。

比如，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中涌现的大量革新创造，一年多以来，经过不断努力，有许多已经在生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有一部分新东西，还有待于改进和完善。由于革新技术往往是由浅入深、由易入难，留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是比较难的、关键性的课题。不少新产品、新工艺，在原理上、基本结构上虽然表现了它的优越性，但是在设计制造上还不够完善，比较粗糙，配套成龙的工作还

<sup>①</sup>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

<sup>②</sup>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3页。





未做完。因此，在某些单位中，还存在着革新项目应用不多的情况，还存在着試制过的品种比定型生产的品种多，試驗时的效率比实际使用时的效率高，孤立試用时的效益比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时的效益大等等情况。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革新創造从开花到結果，总是需要一段过程的，要經過若干反复的。問題在于我們既要有最大的热情，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視这些問題，通过科学的和群众的鉴定、改进，把工作做到家，才能把成果真正拿到手。

保持清醒头脑，还意味着我們要根据实践的验证，及时修改和变更原来的不完全符合或不符合客观規律的設想和方案。即使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設想和方案，也必須到群众的实践中去，經過反复验证，反复修改和补充，才能符合或更加符合客观实际。

革新創造的方向是不是正确，这是一个重要的問題。但是，只靠方向正确，还是不够的，必須經過反复的实践，多次的比较，找出具体的途徑、方法和方案，革新项目才能比較的“定型”。高压电桥，是测量高压电路絕緣体性能的“眼睛”，許多重要工矿、电站都离不开它。为了滿足我国仪表工业上的迫切需要，上海青年工人王林鶴試制一万伏高压电桥，失败了三百

七十次，修改了三百七十次，到三百七十一才得到成功。一成不变地按照原来的設想来办事，而不根据实践結果去修改，事情是办不好的。只有認識了客观規律性，按客观規律行事，才能实现我們的理想。而对客观規律性的認識，總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够完善和深刻的。

列宁曾經說过：“我們应当縝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細地对待它們，尽力帮助它們成长，并‘照护’这些柔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是不免会死亡的。不能担保說，‘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会起特別重要的作用。問題不在这里。問題在于支持各种各样新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sup>①</sup>从长远來說，人們改造世界的任何科学的美好願望，都是可以成功的。但是，从一个阶段來說，从某一个具体事情來說，并不是任何一项变革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也不是任何一项設想都有必要在現時进行試驗、实行。这里需要我們进行科学的具体分析。比如，在生产中，对于大量的革新創造，就應該加以清理、排队，分別輕重緩急，按照需要和可能，采取领导、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員三結合的办法，逐件鉴定：成功的納入工艺規程，投入正常使用；基本可用而不

<sup>①</sup> 《偉大的創举》。《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7頁。



完善的，抓紧改进提高；需要进行试验的，继续进行试验。有少数的项目，或者由于脱离了当前现实的可能，或者由于不适合需要，就不必在当前大力去试验，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还可能有一些少数的项目，实践已经证明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就应当明确废除。当然，对于那些现在还看不清楚的问题，也不要轻易地作出完全否定的结论，而要让实践来做结论。

### 三

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壮大，除了要有最大的热情、最清醒的头脑之外，还要有最切实的措施。新生事物在成长中，需要我们解决许多具体问题，克服许多困难。工夫不到，问题和困难是不会“自动”让路的，新事物是不会“自动”胜利的。

固然一切工作任务，都要有切实的措施才能实现，但是扶植新生事物则更需要有切实的措施。新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旧事物的习惯势力对人们还有相当影响，需要的条件一般又不是那么现成，所以，会遇到许多估计不到的新问题。因此，扶植新生事物，措施必须尽可能地切实、周密，工作要尽可能地抓得紧，否则许多问题就不容易得到顺利的解决。采取最切

实的措施，及时地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撑新生事物的腰，撑群众创造的腰，就是对新生事物最有效的支持。

“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是我们的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比如，技术革新中的革新创造要经过典型的、小规模或小面积的试验，经过总结或技术鉴定，加以修改、完备，其中有些重大的改革，要经过相当时间的反复的试用、改进，然后才能大量推广。领导要抓住重点，深入调查研究，详细了解典型试验中的发展过程，向群众、向实践学习，并且和群众在一起，及时地具体地解决试点中的各项实际问题，修改那些不适当的东西，使新事物逐步完善，并从其中取得经验，为推广准备条件。

典型试验或种试验田，是扶植新生事物的第一步。在向其他单位推行这一新事物的时候，同样要进行必要的试验。由于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的不同，由于新事物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在推广时必须注意结合实际情况，看实际效果，不可把它绝对化，千篇一律地去硬套。即使是完全成功了的好东西，如果群众还不理解这种变革的意义，或者是群众还没有掌握具体的方法和技术，也不可勉强推广。群众的实际需要和群众的自愿，是做好推广工作的决定性条件。应当向群众进行耐



心的、生动的宣传教育工作，并且组织群众自己来实地试验，由一点试验到多点试验，把方针、方法和技术交给群众，用事实来教育群众，使群众能够自觉地进行改革。这种群众性的试验，不仅可以提高群众的认识和技术水平，而且还可以使新东西通过更广泛的群众实践而补充新的内容，使它更为完善。经过这样的工作，新事物一旦在更广大的群众中牢牢地扎下根来，就能够巩固、发展，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为新生事物开辟道路，既要有高度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心，又要作深入细致、精雕细刻的工夫。有两种偏向，都是不好的。一种偏向是看不到新生事物在出现的时候，往往是不够完善的，总要求它完美无疵，才敢进行试验。这样就会障碍新生事物的发展。另一种偏向是粗枝大叶，急于求成，不注意解决具体问题，不采取切实措施，不作周密的准备和组织实施工作，那也是要碰钉子的，往往事后还要反过头来补课，并且招致损失。一般地说，在发动群众的阶段，在为新生事物鸣锣开道的时候，我们要坚决防止和反对前一种偏向，使群众的热情得到充分的支持和鼓舞，使新生事物取得普遍的承认和生存发展的权利。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在新事物的试验、改进和推广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防

止和反对后一种偏向，这样才能把群众的热情和智慧引导到关键性的实际问题上来，并使新事物得到比较严格周密的科学的考验和改进，增强新事物的生命力。这样做，看来似乎要费事一些，多花一点时间和工夫，但是它的结果一定会比“揠苗助长”的做法快得多，有效得多。

我们应该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话：“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sup>①</sup>

当新生事物处在顺利发展的时候，当新生事物已经开花结果、获得丰收的时候，我们要对它采取热情欢迎的态度。而当新生事物碰到艰难、挫折的时候，我们更要有最坚韧的毅力，认清光明远大的前途，鼓舞和团结广大群众，为克服困难、为扶植新生事物而奋斗。

我们要用最大的热情、最清醒的头脑、最切实的措施、最坚韧的毅力去认真扶植新生事物，使大量的生机勃勃的新生事物得到迅速的成长壮大。

<sup>①</sup>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 关于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

刘 际 启      周   璞

几年来，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大促进了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使科学界呈现出活跃的景象。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以促进科学的发展，进一步开展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是十分必要的。

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发展情况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实践的需要，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根本力量。但是，任何一门科学的新原理的发现，又是通过揭露和克服已有的原理与新的实际材料之间的矛盾，通过科学工作者不同观点、不同见解的争论而实现的。科学界各种意见的争论，能够促进科学取得新的成就，更好地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

我国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发生了巨大变动，使学术上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今天，我们具有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发展科学的有利条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科学能够繁荣发展的社会基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下，我们能够自觉地、有领导地开展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以实现科学的迅速发展。毛泽东同志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要求上提出来的”<sup>①</sup>。我们科学界的任务，就是要认真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充分揭露和克服各个科学研究领域中所处理的各种矛盾。开展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鼓励各个不同学派、各个持有不同学术见解的人，自由发表意见，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就是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充分展开矛盾、解决矛盾的最基本的方法。

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能否很好地展开，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学派、持有不同见解的人之间能否采取互相尊重的态度。互相尊重，并不是说要无原则地放弃自己的意见，接受别人的意见，而是说要允许别人发表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并且认真地考虑别人的意见，慎重地对待别人的意见。在学术问

<sup>①</sup>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



題上互相尊重對方的意見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科學的任務是通過對各種現象的分析，探求客觀事物本身的規律性。人們的認識只有符合客觀事物的規律性才是客觀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同各種錯誤思潮作鬥爭，並經過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鬥爭實踐而充分證明了自己的真理性的。在學術問題上的任何一種見解是不是客觀真理，都只有經過充分的自由討論，經過科學實踐和時間的考驗，才能逐步辨明。不同學派的不同觀點，在未經過實踐證明之前，都不應該認為是一定沒有任何缺點、任何錯誤的，因此不同學派就需要認真考慮對方的意見。任何學派或個人都沒有理由把自己的沒經過嚴格驗證的學術見解，武斷地自封為客觀真理，更沒有理由把自己的見解強加給別人。

學術問題上的不同見解、不同學派的區分，大体上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正確的或基本正確的見解同錯誤的或基本錯誤的見解的對立。另一種情況是，不同見解是由于分別在不同的條件下，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來研究同一的對象而形成的。它們都是事物的某一個或某幾個不同的側面的反映，因而它們都是片面性的，必須加以更高的綜合，才能達到正確的結論；或者它們在某種限度內都是正確的，它們的正確的意見可以互相補充、互相結合，而如果只承認一種意見是正確的，否認和排斥另一種意見，也會陷入片面性的錯誤。

屬於後一種情況的不同學派，在科學史上是很多的。例如，在自然科學方面，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歐洲物理學界有關於光的微粒說學派和波動說學派的爭論。一派物理學家，根據光所具有的一些表現了非連續性的現象，斷定光是微粒性的；另一派物理學家，則根據光綫所具有的一些表現了連續性的現象，斷定光是波動性的。其實，這二者都是片面的不完備的學說。到二十世紀初，量子理論建立以後，這兩派的意見才逐漸統一起來，公認光是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統一物，是波動和微粒的統一物，光綫是具有波動性質的光量子流，從而形成了現代光學的理論。在我國醫學界，中醫和西医可以說是兩大學派。這兩派的理論體系和醫療原則都不相同，但它們都各具有真理性。醫療實踐的效果是它們真理性的最好試金石。對許多疾病，中西醫都能運用各自的理論和方法進行診斷，並將疾病治好；也有些疾病，在中西醫合作下能夠取得顯著的療效。

在邏輯史上，有過演繹和歸納兩個學派，它們之間進行過長期的爭論，恩格斯說：“歸納和演繹正如分析和綜合一樣是必然相互聯繫着的。我們不應當在兩者之中犧牲一個而把另一個高高地抬上天去，我們應當力求在其適當的地位來應用它們中間的任何一個”<sup>①</sup>。我國歷史上關於儒家經典著作的研

<sup>①</sup> 《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9頁。





究，也曾出現過治學方法上不同的學派。產生于漢代、後來被稱為漢學的一派，注重用訓詁考據方法來解釋儒家經典；產生于宋代、後來被稱為宋學的一派，則注重從義理方面來解釋儒家經典。它們所注意的方面不同、所採用的方法也不同，但是就對於儒家經典的解釋來說，都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既然存在着不同學術見解，存在着不同學派，存在着正確和錯誤的對立，就必然要發生學術上的論爭，就需要我們正確地處理不同學術見解、不同學派之間的複雜的關係問題。

在前一種情況下，應該是正確的學派克服錯誤的學派，錯誤的學派放棄自己的錯誤觀點和謬說，服從真理。而這也是隨着自由討論揭露真理和錯誤的矛盾，隨着實踐的發展，而逐步地得到解決的。在後一種情況下，因為不是正確和錯誤的對立，而是各自包含着部分真理，所以不存在一個學派克服另一個學派、一種見解克服另一種見解的問題，而是應該在各自提出的積極貢獻的基礎上，共同發展，共同提高，以便達到對真理的更完全的認識。屬於後一種情況的不同意見的并存，在未达到最後結論以前，往往也被認為是正確和錯誤的對立。抱着這一種片面見解的人，自以為是正確的方面，而把抱着另一種片面見解視為錯誤，這在科學發展史上是常常可以看到的情形。某一具體的學術爭論究竟屬於上述兩種情況中的哪一種，往往也需要

經過一個較長時期的討論才能弄清楚。因此，開展學術問題的自由討論，在討論中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探討是十分必要的。

學術問題的自由討論，自然會有而且應該允許不同意見的互相批評，尤其是應該允許被批評者的反批評。這是因為，一方面，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另一方面，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判明的。某些被認為是錯誤的東西，後來卻被證明是正確的東西。毛澤東同志說：“為了判斷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時間。歷史上新的正確的東西，在開始的時候常常得不到多數人承認，只能在鬥爭中曲折地發展。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哥白尼關於太陽系的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都曾經被看作是錯誤的東西，都曾經經歷艱苦的鬥爭。”<sup>①</sup>一種新的學術見解是否正確，往往不能立即鑒別清楚，由於缺乏實踐經驗，或只是由於思想方法上的缺陷，也會把正確的見解誤認為錯誤的。對別人提出批評意見的人應該注意到，自己的批評意見也有可能是錯誤的，它的真理性也同樣需要時間的考驗，不能主觀地把自己的意見看成是絕對真理。為了使正確的意見不致被忽視，不致被湮沒，為了儘可能順利地找到真理，一定要

<sup>①</sup>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頁。



允許被批評者保留意見，允許反批評，保護反批評。

科學研究是複雜的創造性勞動，它的特点是向新的未知的領域進行探索。在這樣的勞動中，人們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作為科學研究對象的客觀事物包含着許多矛盾，反映這些事物的人的認識也不能不充滿矛盾。人們在認識過程中，或是由於知識不足，或是由於某種傳統的成見；或是由於過分地夸張了事物的某一個側面，或是由於其他原因，都有可能做出錯誤的結論，甚至會不自覺地在某些問題上陷入唯心主義的錯誤。這種錯誤，往往不是或者主要地不是由階級立場決定的，而是由於認識論上的根源造成的。在複雜的認識過程中，在探索真理的科學研究過程中，人們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本是不足為怪的。事實上，古今中外，完全不犯錯誤的人也是沒有的。

在自由討論中怎樣正確地對待錯誤，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任何學派和個人，如果發現了自己有錯誤都應該改正，堅持錯誤是不對的。但是，我們應當懂得，對於認真從事科學研究的人來說，錯誤是具有兩重性的，就是說，它不僅僅是一個錯誤，而且常常是正確的先導。甚至可以這樣說，在科學研究工作中，不犯一些或大或小的錯誤，就不可能達到正確的認識。“六〇六”這種藥品經過六百零六次試驗才製成，以前的六百零五次試驗都失敗了，每一次失敗都不僅是證明了所

用的方法是錯誤的，而且又對於應當採取什麼正確的方法給予了一種啟示。對錯誤應該加以具體的分析，即分析產生錯誤的不同情況，分析錯誤的具體內容，而不應該採取簡單粗暴的辦法，更不應該全盤否定別人的科學勞動。在今天，任何一個科學工作者只要勤勤懇懇地工作，努力掌握材料，認真鑽研問題，都會對科學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東西。這樣的人，即使在工作中犯了某些錯誤，也必須肯定和尊重他在科學研究工作中的一切有益的勞動，對他的錯誤則應該採取同志式的與人為善的態度進行批評，幫助他改正。

學術問題的論爭不同於政治鬥爭，學術問題不能和政治問題混為一談。當然，在階級社會里，各個階級都要使科學為自己服務，並力圖把它作為階級鬥爭的武器。但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還有另一面，科學雖然同階級鬥爭有密切關係，但是它究竟不是和政治完全相同的，就是哲學和社會科學這樣具有很強的黨性的科學，也不是和政治鬥爭直接等同的。政治鬥爭是階級鬥爭的直接表現形式，科學則往往比較曲折地表現階級鬥爭。以為學術上的一切爭論都是階級鬥爭的直接表現，都是“興無滅資”的鬥爭，是不對的。在批評學術問題上的錯誤觀點時，決不可不加分析地輕率地提到階級立場和政治原則上來。

在學術研究過程中，要對許多實際材料



进行分析、综合，进行判断、推理，形成理論性結論，这是和科学工作者的世界观、方法論密切联系着的。但是，并不是学术上的一切錯誤結論，都是由科学工作者在 worldview、方法論上的某些缺陷造成的。事实上有时由于材料掌握得不够，或者由于缺乏某些必要的知識，就有可能对某些問題作出錯誤的判断。不能以为人們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偏差，包括在个别問題上的偏差，都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所造成的。如果采取这种看法，就只会把复杂的問題簡單化，而不利於学术問題自由討論的开展。

把对自然科学成果的哲学概括除外，自然科学上的爭論問題一般都不是反映階級之間的斗争的，而是認識过程中的是非之爭，不同見解之爭。在我們学术界中目前存在着的关于遺傳学問題、邏輯問題、美学問題、文献考訂問題以至关于中国古代某一哲学思想究竟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等等問題的爭論，都是学术問題的爭論。固然，历史学、美学、哲学就其整体說，是階級性的科学，但是也不能把凡涉及这些科学領域的問題都认为是包含着階級斗争的、政治的内容。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这些科学时，必須保持严格的党性，同时必須善于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非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

学术問題的論爭，必須采取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要充分說理，以理服人。任何学

派或个人，如果要在科学上真正有所成就，就必须具有两方面的品德：一方面要有勇于坚持真理的严肃态度，另一方面要有肯于虚心听取意見的雅量，二者缺一，都会使人在思想上停滯下来。真理是客观的。科学工作者必須对真理負責而不輕率地放棄自己的意見。真理不怕考驗。馬克思說得好：“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輝就越燦爛。”<sup>①</sup>經不起批評和考驗的意見，决不是真理。不能虛心听取不同意見实际上是怯懦的表現。誰在批評面前表現怯懦，誰就表明自己既沒有掌握到真理，也沒有决心去探求真理。坚持正确意見而不害怕批評，并且勇于接受別人的正确意見，这是維護真理的科学态度。

我国俗語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我們科学工作者决不可认为自己的見解已經是最全面最正确的，万无一失的，不需要任何微小的补充和修正的，而別人的意見則毫无可取之处。在学术問題上的独断作風和宗派主义的“門戶之見”，是对科学发展不利的。討論和批評是智慧的动力。各个不同学派和持有不同学术見解的个人，只有互相尊重，互相探討，才能很好地开展学术問題的自由討論，很好地貫徹执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sup>①</sup> 《第六屆萊茵省議会的辯論（第一篇論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9頁。



# 論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

許 滌 新

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級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实行这个根本制度，在农村人民公社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必經的历史阶段。

农村人民公社，是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組成的。

我国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经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就实现了合作化。高级社比初級社，具有更多的优越性。这主要是由于高级社解决了初級社时期土地及其他生产資料要支付报酬，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則、增加社会主义积累、扩大再生产之間的矛盾。高级社的出現，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全国各地出現了以兴修农田水利为中心的大規模的生产建設运动，形成了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高级社就显现出了它的局限性。这就是，它的規模还比較小，它的經營范圍还不广。这时广大农民看到，要办水利，要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要綜合发展农村的各种經濟，都需要超出原来高级社的規模，在原来高级社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建立某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組織形式。为了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很多地方的农民群众，就在原来高级社的基础上联合組成一乡一社的大型的高级社，組織規模扩大了；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有些高级社就統一經營同农业有关的某些手工业、商业和信用事业，經營范圍更广了；为了便于领导，有些高级社管理委员会和乡人民委员会合并办公，实际上成为政社合一的过渡形式。这些事实說明，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人民公社的因素就在逐步地生长，而且有些高级社已經具有人民公社的雛型。

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及时地总结了各地农民群众在实践中所創造的經驗，一九五八年八月，党中央即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决議。在这个决議的指导下，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实际教育下，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更大的提高。因此，在较短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可见，农村人民公社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它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农民群众的要求而出现的，它是我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

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既然是实行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规模的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因此，它就应当继承高级社时期一切合理的管理制度。正是因为考虑到了这种情况，所以，一九五八年八月党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就指出，各地在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初期，可以采取“上动下不动”的方法。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又指出：“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公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可以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一九五九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中继续指出：“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根据去年十二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根据今年二月在郑州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和以后中央的一系列指示，进行了整社。在整社中，贯彻执行了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确定了在目前阶段公社的生产资料实行三级所有制，生产队（现在称为生产大

队——引者）一级的所有权是基本的，公社一级的所有权是部分的（除了现有的社办的公共经济以外，还可以逐年从各生产队提取适当的积累），而生产小队（现在称为生产队——引者）也应该有小部分的所有权。”现阶段的农村人民公社，要继承高级社时期一切合理的、当前仍然适用的管理制度，就不是对高级社的全盘否定。我们知道，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不是简单地把旧事物消灭。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它原来的基础，都不是对于旧事物的绝对的否定。绝对的否定，表面看来似乎很彻底，但它否定了应该继承的积极因素，否定了事物发展的基础，从而也就否定了事物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公社这一新事物，也不是对于高级社的绝对的否定。它所否定的，只是高级社的局限性；而对于高级社的积极的、合理的因素，则是肯定的。如果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不以相当于高级社规模的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作为三级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不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能够继承高级社时期的一切积极的、合理的因素，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和提高。那就会成为没有肯定的否定，就不利于人民公社的进一步巩固和健全。

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是在高级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但它又不完全同于高级社。高级社一般地只经营农业，而人民公社不仅经营农业，并且经营工业、手工业和商业等行业。高级社只是一种经济组织，而人民公





社則是政社合一的組織，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又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權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就是以經濟來說，雖然生產大隊的集體所有制是公社三級集體所有制的基礎，然而公社一級還有一部分所有制，這是過去的高級社所沒有的；它現在在整個公社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雖然還不大，但是，它代表着人民公社的偉大希望和偉大前途。因此，‘如果看不見現階段農村人民公社是在高級社的基礎上聯合組成的，是不對的；同樣，如果看不見農村人民公社比高級社有所發展，看不見農村人民公社的新內容，看不見人民公社比高級社有更多的優越性，也是不對的。

客觀事物的发展过程是有阶段性的。这些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我們不應該孤立地、靜止地去看事物的某一个阶段，把它絕對化、凝固化起来；同时，也不應該脫離实际，割斷历史，超越阶段去处理問題。在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現为既相衔接又相区别的阶段性。从总的發展过程來說，它要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大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又要分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两个阶段。在集体所有制阶段，还要分为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和公社基本所有制两个阶段。現阶段的人民公社，是剛从高級社发展而来的，它不能超越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阶段，去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更不

能很快地实行全民所有制。

生产資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决定环节。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的客觀規律。現阶段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級集体所有制，是适合我国当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这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看得出来。

第一，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当前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基本上还未脫離以人力操作为主、畜力耕作为主、使用自然肥为主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剛从高級社发展而来的人民公社，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間內就拥有在整个公社經濟中占极大比重的社营經濟，因此就不能实行基本社有制。基本社有制的物质基础是現代化的农业技术設備。人民公社要拥有現代化的农业技术設備，沒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間，是不可能的。人民公社的社营經濟的发展，决不能通过削弱生产大队經濟的方法去实现，而只能建立在各个生产大队經濟大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大队的經濟越发展，則整个公社經濟的发展就越有保证。由此可見，現阶段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級集体所有制，是适合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是符合于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第二，在人民公社內部的生产大队之



間、生产队之間，存在着穷队和富队的差别。面对着这种情况，应当推动穷队搞好生产，赶上富队，并且推动富队更加努力，把生产搞得更好。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缩小穷队和富队之間的差别。这就必須承认生产大队是公社这个联合經濟組織中的独立經營单位，独立核算，自負盈亏；在生产大队的範圍內，統一分配归大队所有的产品和收入，而又承认各生产队在产品留量和收入水平上的差别。公社在必要的时候組織生产大队之間的生产协作，必須遵守自願互利、等价交換的原則。这样，照顾到各生产大队之間和各生产队之間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别，就有利于調动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員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加快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經济的发展。如果現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不实行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級集体所有制，否认穷队和富队的差别，違背等价交換的原則，一方面，会助长穷队的依賴思想，另一方面，又会妨害富队的生产积极性。这对于发展生产是极其不利的。

第三，在目前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由生产大队統一管理本大队的生产事业，并承认各生产队在管理生产上的一定的自主权，就能使生产大队、生产队根据本大队、本队的自然条件和其他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組織生产。这样，就能充分發揮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

发展农业生产力。

第四，在現有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利于貫徹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則。生产經營較好的生产大队，比生产經營較差的生产大队，得到的产品就会較多，从而，它的社員的收入也就較多。这对于調动社員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有着显著的作用。

現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不仅适合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适合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現有的政治觉悟水平。我国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政治觉悟水平不断地提高。在土地改革之后，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由个体經濟組織成互助組，由互助組逐步地发展成为初級社、高級社，一九五八年又在高級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組成人民公社。全国一亿二千多万个农户实现公社化，是农民群众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的生动表现。但是，刚从高級社进到人民公社的广大农民，在政治觉悟水平上，还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他們在关心公社利益的时候，关心得更多、更直接的是本生产大队和本生产队的利益。因此，他們現在还不能接受基本社有制，更不能接受全民所有制。

从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从农民群众現有的觉悟水平出发，現阶段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級集体所有制，受到了广大社員的积极拥护，調动了社員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并



且能够使他们在实践中进一步地认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从而能够进一步增强他们对于办好人民公社的信心和决心，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水平。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规律，要求我们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及时地改变已经落后的旧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的生产关系。不这样，生产力就会受到束缚而不能迅速地发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一规律还要求我们，在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去充实和巩固这个新的生产关系，使它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现在正是处在需要充实和巩固的状态中，它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稳定时期。我们知道，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地运动着，不断地变化着，不断地发展着。但是，事物的不断运动、不断变化和不断发展，并不否认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相对稳定、相对静止、相对均衡的状态，因而不能忽视相对稳定、相对静止、相对均衡的状态在事物整个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实践证明：相对稳定有利于事物的巩固和发展，它是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它不是发展的冻结，而是上一阶段事物发展的不断成熟、深化，也是下一步新发展的准备。在现阶段，稳定和巩固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有利于生产力的

发展，有利于为将来逐步地实现基本社有制准备条件。如果不承认客观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看不见现阶段人民公社根本制度有巩固的必要，那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相违背的。

## 二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决定环节，而正确地处理公社内部三级之间的经营管理权，则是维护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充分发挥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公社管理委员会，除了在行政上行使乡政府的职权以外，在生产管理上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发展农业、畜牧业和林业生产。在领导生产中，应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执行群众路线，对生产大队进行适合情况的正确的领导，不可管得太多太死。公社只有尊重生产大队的经营管理权，才符合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原则，才能充分发挥生产大队的积极性。这样，公社对全社的领导工作也才能做得更加切合实际情况，做得更有成效。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根据国家计划和各生产大队的具体情况，兼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向各生产大队提出关于生产计划的建议，并且可以采取协商的办法，对



各生产大队的计划作合理的调整；应该对各生产大队的生产进行检查，及时地帮助生产大队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因地制宜地推行经过反复试验确实有效的增产措施、改良工具和先进经验；在必要时可以按照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生产大队之间的生产协作；应该适时地调剂种子，供应农具、肥料和农药，管好用好大型农业机械，从各方面帮助生产大队实现生产计划；等等。公社管理委员会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同社员群众和干部商量，充分注意各生产大队的具体情况，切实防止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避免采取简单的、一般化的领导方法。公社管理委员会，根据需求和可能，可以有步骤地举办社办企业。社办企业应该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并且同国家计划适当结合。举办社办企业应该量力而行，不应该过多地占用生产大队的劳动力，以免妨碍农业生产。

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这个联合经济组织当中的独立经营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因此，它就应该统一管理本大队范围内各生产队的生产事业。如果不是这样，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便成为一句空话；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由生产大队统一管理本大队的生产事业，就能够根据本大队的具体情况安排生产，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积极性，避免公社领导上的一般化。同时，生产大队还

必须承认各生产队在生产管理上的一定的自主权，才能维护生产队一级的所有制，把生产搞得更好。生产大队的生产计划，应该建立在各生产队生产计划的基础上。生产大队根据国家计划任务和各生产队的实际情况，对各生产队提出初步要求；然后，由各生产队发动社员充分讨论，拟定本队的生产计划；然后，由大队把各生产队的生产计划和大队企业的生产计划，加以综合，经过必要的协商调整，订出全大队的生产计划。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应该根据生产计划，经常督促检查各生产队的生产工作，帮助生产队及时总结生产经验，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和问题，对于生产困难较多的生产队，要更多地给以帮助；还应该同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充分商量，因地制宜地推行先进经验和增产措施，使他们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生产大队为了发展多种经营，适应各生产队发展生产的需要，增加社会产品和社员收入，还可以根据农事忙闲的情况，经营一定数量的大队企业。

生产队是人民公社最基层的组织单位，也是农业生产战线上最基层的战斗单位。它担负着最直接、最具体的组织社员生产和组织集体福利事业的任务。党关于农村的各项政策，都要通过生产队同群众见面，具体执行。生产队的组织健全不健全，战斗力强大不强大，工作做得好不好，是党的政策能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人民公社的生产事业能不能更快地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必须充



分发挥生产队的战斗作用。

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这个联合经济组织中的独立经营单位，而生产队则是人民公社的基层生产单位，对大队来说，它是包产单位。因此，正确地处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关系，搞好劳动力、土地、耕畜和农具的“四固定”，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劳动力、土地、耕畜和农具，都是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全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大队所有，但必须固定给生产队使用。全大队范围内的劳动力，除了公社和大队按规定调用的以外，都必须固定在生产队。集体所有的耕畜、农具，可以归大队所有，固定给生产队使用；也可以归生产队所有；也可以有些归生产大队所有，有些归生产队所有。搞好“四固定”，实质上就是明确生产队对于劳动力、土地、耕畜和农具的使用权。生产队有了这些使用权，就可以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地组织生产。这样，生产队就可以合理用工，使社员各施所长；就可以因地种植，使地尽其利；就可以对耕畜精心饲养，使役得当；就可以对农具保管得好，维修得好，使用得好。生产大队把劳动力、土地、耕畜和农具固定给生产队，可以使生产队在生产管理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充分发挥生产队的战斗作用，更好地完成或超额完成包产任务。例如，土地的使用权是和农作物的种植权相联系的，土地的使用权固

定给生产队，农作物的种植权也就必须交给生产队。否则，生产队便无法根据本队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组织生产，实现生产计划。也就是说，如果生产队没有这些使用权，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包产任务，生产大队的生产计划也就难以实现。

做好“四固定”，是充分发挥生产队的战斗作用的保证；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度，则是推动生产队发挥战斗作用的重要条件。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一样，都需要有健全的责任制度，才能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在生产中建立正常的秩序，有效地进行计划领导和实行经济核算，以达到发展生产、降低成本的目的。实行“三包”，就是在生产、用工和成本等方面，划出一条责任界限来。这条责任界限，反映了生产大队对生产队所提出的生产任务和要求，也反映了生产队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三包一奖”制度，实质上是公社的计划管理、生产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和收入分配等制度，在基层生产单位的集中反映。实行“三包一奖”制度，既能实现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又能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生产；它可以促进经济核算制在农业生产中的实行，以更好地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能够推动生产队和社员积极生产。一句话，实行“三包一奖”制度，有利于正确地调整公社的三级管理组织之间，特别是基本核算单位(出包单位)和基





层生产单位(承包单位)之间的关系,把小集体(生产队)的利益和大集体(生产大队和公社)以及国家的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

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并不否定生产队一级的集体所有制;生产大队要统一管理各生产队的生产事业,并不否定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生产上有一定的自主权;生产大队在全大队范围内统一分配归大队所有的产品和收入,并不否定各生产队在产品留量和收入水平上的差别。总之,维护和加强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同确定和保障生产队一级的集体所有制,并不是矛盾的。

生产队要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大队给它的包产任务,必须在生产管理上有一定的自主权。生产队在保证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有权因地制宜种植;有权安排农活;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选留和管理本队的种子;有权调整本队的劳动定额;在不妨碍水土保持,不破坏森林、草原和牧场的条件下,有权在本队范围内,开垦荒地、经营荒山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土地;有权利用农闲时间经营各项副业生产。只有在这些方面承认生产队的自主权,才能保障生产队一级的集体所有制,充分发挥社员和生产队干部的积极性。当然,生产队管理委员会在决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同社员商量,特别要听取有经验的农民的意见,重要的事情,还要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通过。

明确确定公社内部三级的经营管理权,正确处理三级之间的关系,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才能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发展生产。

### 三

流通过程不仅是生产过程的延长,而且是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反映。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农村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它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同时并存着。工业主要由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经营;农业主要由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人民公社经营。在国营企业和人民公社之间,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依存、互相支援的社会主义的分工协作的关系。为了供应工业生产和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国家必须从农村人民公社取得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为了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生活的需要,人民公社和农民群众必须从国营企业取得农具、化肥和日用工业品等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是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国营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农村人民公社中,生产资料和产品则是各个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国家对于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的财产,不能像对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的财产一样,实行直接调拨。否则,就否定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就会



損害无产階級专政的基石——工农联盟。因此，国营企业同农村人民公社之間的經濟联系，只能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在等价交换的原則之下，国营經濟和集体經濟，各以自己的产品换取对方的产品，双方都能从交换中得到应得的利益。这种形式，在現阶段是农民群众唯一能够接受的，是最能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的。

不但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經濟同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經濟之間，存在着商品关系，而且在集体經濟同集体經濟之間，也存在着商品关系。农村人民公社在經濟上，是各个生产大队的联合組織，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因此，公社除了按照規定向大队提取一定的公积金和調用一定的劳动力以外，不能再随便調用生产大队的劳动力、生产資料和其他物資。公社在必要时組織生产大队之間的生产协作，必須按照自願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則去进行。公社同公社之間、生产大队同生产大队之間的經濟联系，也只能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

不但在公社之間、生产大队之間的經濟联系必須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則，就是在生产大队內部的各生产队之間，也必須遵守这个原則，才能保障生产队一級的所有制。一般地說，归生产队所有的收入和资产，有：超产所得的奖励；在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經營农、林、牧、副、漁各种生产所得的收入；在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节约下来的資

金；划归生产队所有的果树、林木和水面等資源；归生产队所有的农具；用自有资金兴办的基本建設、购置的生产資料和其他設備；包产任务以外利用空隙地和荒山种植的果树、林木和其他多年生作物；归生产队所有的耕畜和它們繁殖的幼畜，固定給生产队使用的耕畜所繁殖的幼畜或者幼畜的分成部分；等等。所有这些，都归生产队全权支配。公社和生产大队在有必要进行适当調剂的时候，必須取得生产队的同意，实行等价交换。这就是說，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間的經濟联系，也是一种商品交换关系。

人民公社社員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帶有个体經濟的性质，但它是社会主义經濟的附屬，而不是独立的个体經濟。因为它的主体是参加公社的集体农民，而不是脱离公社、独立于集体之外的个体农民。集体經濟的收入，是社員收入的主要部分；家庭副业的收入，在社員收入中只占补助地位。随着集体經濟的发展，家庭副业收入在社員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小。在积极办好集体經濟，不妨碍集体經濟的发展，保证集体經濟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让社員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发展家庭副业，对于增加社会产品，补助社員收入，活跃农村市場，都有好处。社員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产品，是社員劳动的成果。当他們把这些产品轉让出来的时候，只有通过商品的关系，通过买卖，才是他們能够接受的。

为了活跃农村經濟，公社、生产大队、



生产队以至社员，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可以在农村集市上交换和调剂自己生产的商品。除了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农产品以外，其他农产品和副产品，在完成同国家订立的定购合同以后，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的补充。它反映了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集体所有制和社员有自留地、家庭副业的特点。集市贸易有利于提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的商品流通能够更顺利地得到解决。

国家在向农村人民公社收购产品的时候，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以至社员在交换和调剂自己生产的商品的时候，都要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就是遵守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生产 and 流通领域起主导作用。但是，由于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的同时并存，由于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是实行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由于社员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既然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就必然还存在着价值规律。

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仅仅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在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对于纳入国家计划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不起自发性的调节作用，但是，它

对生产总还发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在进行生产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生产这些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商品的成本核算，不能不考虑到市场上供应和需要的关系。至于社员的家庭副业生产，生产队在包产任务以外的生产，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一部分生产，则是按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这些生产，都受到价值规律的调节。

遵守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是正确处理工农业产品比价，正确处理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农产品价格是否合适，关系到农产品的劳动消耗能否得到合理的补偿，关系到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能否扩大再生产，关系到社员生活能否逐步地得到改善和提高。农产品价格如果低于价值，国家虽然可以增加收入，但公社和社员的收入就会减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到损害。反之，农产品的价格如果高于价值，公社和社员的收入固然可以增加，但是，国家和城市居民的负担就会加重，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会减少，从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就会受到影响。总而言之，在商品交换中，必须遵守价值规律，才有利于彼此间的互相协作，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才有利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

等价交换是商品交换的原则，而商品关系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反映。在商品流通



中实行等价交换，是肯定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同时并存，肯定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集体所有制和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的必然结论。为了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为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我们必须在国家、集体之间，在集体和集体之间，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遵守价值规律，贯彻等价交换的原则。

#### 四

产品的分配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产品的分配，是以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为原则的。这个原则并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一种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否定了人对人的剥削，使劳动成为决定人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获得收入的唯一依据。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生产力还未达到那么高的发展水平，因而还不能提供极其丰富的产品，以充分满足全体人民的生活需要，而只能让人们根据劳动所得，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在这个时期，生产还未完全实现机械化自动化，劳动还未成为人们生活上的第一需要；在这个时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还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这个时期，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还没有极大地提高，有些人在不同程度上还保留着旧社会的思想意识，还不能自觉地积极工作；

等等。由于这些原因，消费品的分配，只能根据每个社会成员在工作中所消耗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去进行。由此可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人民公社，对于社员进行产品分配，也是不能违背这个客观规律的。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于按劳分配的原则，作出了科学的论述：“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党的这个决议又写道：“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

根据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要在社员间实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公社必须保证生产大队在本大队范围内统一分配归大队所有的产品和收入，避免在大队和大队之间进行平均分配。否则，就会使劳动得好、生产的多的大队，不能以较多的产品分配给它的成员；就会使劳动得差、生产的少的大队，无偿地取得别的大队的劳动成果。生产大队既然是现



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独立经营单位，那末，产品的分配，也必须由大队去掌握。如果不使产品分配权同生产大队的基本所有制相适应，维护和加强生产大队的基本所有制就会落空，在社员之间要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就失去了前提。

生产大队在全大队范围内统一分配归大队所有的产品和收入的时候，必须承认各生产队在产品留量和收入水平上的差别，避免在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进行平均分配，并且在合理制订“三包”指标的基础上，做到奖赔兑现。只有这样，才能使生产队在对社员分配产品和收入时，有可能更好地实现按劳分配。

在生产大队之间、生产队之间，避免平均主义，是实现按劳分配的前提条件。生产队在进行分配的时候，还必须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对于家庭人口多而劳动力少的社员，和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困难的社员，不应当进行适当的照顾。这样的照顾，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应当有的，是在不妨碍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下进行的。

生产队对于社员的劳动，应该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付给合理的报酬。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根据各种工作的技术高低、辛苦程度和在生产中的重要性，确定合理的劳动工分标准，制订各种工作定额。农忙期间，农业劳动的报酬，应该高于平时。农业、畜

牧业中有技术的劳动的报酬，应该高于普通劳动。手工业、林业、渔业、盐业等专业劳动的报酬，应该按照和农业劳动不同的标准计算。凡是有定额的工作，都必须按件记分；无法制订定额的工作，可以按照实际情况，评工记分。这样做，就能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付给社员以合理的报酬。

在合理计算劳动报酬的基础上，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生产队从包产中所得的收入，包产以外经营其他各种生产的收入，包产以外增产的粮食，超产奖励所得的粮食，等等，在分配给社员的时候，都必须遵守按劳分配的原则。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工作是不能离开政治工作的。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注意物质利益，并不否定政治挂帅，而是更有利于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更有利于教育人民群众把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更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已经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只要我们认真坚持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这个根本制度，认真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和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其他各项政策，就能够把人民公社办得更好，进一步发挥它的优越性，加速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 因地制宜地实行“三包一奖”制度

舒代新 富文业

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实行的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度，是我国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中一项基本的管理制度。在不断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实行这项制度，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加强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对于进一步巩固健全农村人民公社和发展农业生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三包一奖”制度，是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所熟悉的一项管理制度。早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为了避免和克服每日生产临时分配活计，浪费劳动时间，劳动效率不高等缺点，就开始实行了“小包工”制度，把一种或几种农活一次包给生产队，规定出完成的时间和质量，以及应付给的工分。这样，就一项生产的一定生产阶段来说，生产队和社员明确了具体任务，有利于增强责任感，提高劳动效率。这就是“三包一奖”制度的萌芽。但是，实行“小包工”，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连续性和生产周期

长的特点。于是，许多地方把各种农作物，按季节或常年包给生产队，确定耕作要求和应付给的工分。这就出现了“季节包工”和“常年包工”。实行“季节包工”和“常年包工”，生产队只对耕作任务负责，对生产结果——产量高低，没有责任，不能促进生产队因地制宜地采取技术措施，达到更多增产的目的。为了在这方面加强生产队的责任心，又出现了包产、包工和超产奖励的“两包一奖”制度。到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由于组织规模扩大，实行了分级管理。为了使各级能够更合理地使用资金，又在“两包一奖”的基础上，增加了包成本的内容，形成了“三包一奖”制度。这样，在生产、劳动、财务和分配等方面，就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营管理制度。

全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要继续实行“三包一奖”制度，是有其客观根据的。农村人民公社是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它统一管理各生产队的生产事业，又承认生产队在生产管理上的



一定的自主权。因为每个生产大队一般都有上百农户，成千亩耕地，数百个劳动力，一个大队中的各个生产队的具体情况也有不同，如果由生产大队直接组织社员劳动，具体安排农活，在现有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显然是办不到的。而生产队的规模一般只有几十户，几十个劳动力，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更熟悉本队所经营的土地、农活、作物的特性，更易于掌握本队各种生产条件的变化情况，生产队干部也熟悉本队社员的情况和特点。因此，在加强生产大队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生产队在管理生产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十分必要的。“三包一奖”制度，正是适应这种客观需要而实行的一项基本的管理制度。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只要人民公社正确地、认真地实行“三包一奖”制度，就能够在经营管理和收入分配方面，集中体现人民公社现阶段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的根本制度，正确地处理公社的三级管理组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关系。“三包一奖”制度中包产、包工、包成本的内容，反映了生产大队向生产队提出的任务和要求。为了使生产队实现这些任务和要求，生产大队要把土地、劳动力、耕畜和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使用，有的把全部或部分耕畜、农具归生产队所有。生产大队固定给生产队的土地、劳动力、耕畜和农具，不能随意抽调和变动。如果在特殊情况下，必须调用或者在生产队之间组织协作的时候，一定要不妨碍生产队生产计划

的完成，经过协商同意，实行变工换工，严格遵守互利等价的原则。生产队则必须很好地运用这些生产条件，完成包产任务，把包产范围内的产品和收入交给生产大队统一分配。在生产队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生产大队则要保证分配计划的兑现。按照人民公社实行分级管理的规定，生产队在经济上有一部分所有权，在经营管理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它可以根据“三包”合同，得到超产奖励和包成本的节余。生产队在不影响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可以根据本队条件，挖掘增产潜力，发展生产，并支配其全部收入和产品。这样，通过实行“三包一奖”制度，既能保证生产大队真正成为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和统一分配的经济单位，又能使生产队一级的所有权和管理生产的一定的自主权受到尊重，从而在指挥生产时，便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明确各自的职权和责任，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

人民公社实行“三包一奖”制度，可以使国家计划任务，经过生产大队，扎根在直接组织生产的生产队。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必须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有计划按比例地向前发展。人民公社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制订生产计划时，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的需要。生产队对于本队的农业生产特点，对于本队的集体需要和社员的个人需要，了解得最为清楚。通过“三包一奖”制度，公社根据国家计划和各生产大队的实际情况，向生产大队提出关于生产计划的建议。生产大队根据公社的建议和



各生产队的实际情况，对各生产队提出初步要求。然后，由生产队充分发动社员讨论，订出本队的生产计划。再由大队把生产队的计划和大队企业的计划，加以综合，经过必要的协商和调整，订出全大队的生产计划。这样，就可以把国家计划任务和公社的生产计划落实到群众中去，使国家、大集体、小集体和社员个人等方面的需要，都能够得到合理的照顾。

人民公社正确地实行“三包一奖”制度，还有利于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正确实行“三包一奖”制度以后，在各个生产队生产条件基本相同的大队里，由于各生产队主观努力程度的不同，在增产幅度和收入水平上就有不同。那些勤俭经营、劳动积极的生产队，就会得到较多的超产奖励和成本节余，同时生产队经营的收入也会较多；而那些经营管理不善或者劳动不积极的生产队，就少得或得不到超产奖励和成本节余，甚至因为完不成包产任务而少得少分。在各生产队之间生产条件的差别比较大的生产大队里，生产大队可以通过“三包一奖”制度，从包产、包工、奖励或者发展副业生产等方面，对那些原来生产条件较好、收入较高的生产队，加以照顾，使他们在参加生产大队统一分配的情况下，收入也有增加。这样，生产队之间的分配就会更为合理，可以进一步调动那些生产好、收益多的生产队更加积极生产，争取更多的超产；激励那些生产较差、收入较少的生产队，发愤图强，努力争取超产。同

时，由于各生产队的收入水平有高有低，因而它们的劳动工分的分值也就有所差别。不同生产队的社员，所得的劳动报酬，也就有所不同。而且，劳动积极的社员，不管本队是否超产，都可以得到适当的奖励。工作积极、办事公道、有显著成绩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也能够从超产部分中得到一定的奖励。劳动不积极的社员，本队超产不能受奖，本队减产还要多赔。实行“三包一奖”制度，使得生产队之间、社员之间，在收入多少上存在的这种差别，既不同于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差别，也不同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由于农民内部阶级分化而产生的贫富差别，而是由于劳动数量和质量的不同和原来的生产基础不同，而产生的收入多一些和少一些的差别。只有承认这种差别，才能更加激发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如上所述，因地制宜地实行“三包一奖”制度，是适合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发展情况的。它能够正确体现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的根本制度，把国家、大集体、小集体和社员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因而就可以更好地调动农村中的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健全农村人民公社。

## 二

几年来，随着人民公社的日益巩固健全，集体生产的经验日益增多，“三包一奖”制度



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它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应用范围更广了。在包产方面，已由按农作物包单位面积产量，改为包总产量。对某些经济作物和蔬菜等，既包产量，又包产值。实践证明，包总产量更有利于发挥生产队的主动性，可以因地制宜，扩大播种面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既包产量又包产值，更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保证产量。特别是还有利于增加蔬菜的品种，保证均衡上市，适应市场需要。在包工方面，除了按亩、按作物包工以外，还有的按实际产量定工，或者以包产的产量定工，或者在耕作阶段按亩包工，在收获阶段按实际产量包工。这样，就使包工更加切合实际，把劳动和劳动的成果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统一起来。在包成本方面，有的由只包管理费和部分生产费，改为成本包干。这种办法有利于鼓励生产队节约成本，增加生产投资。在奖励方面，有些生产大队把年终一次奖励，改为分季预奖，年终结算，做到了奖励及时兑现。生产搞得比较好的生产大队，还实行了现金和实物两种奖励。对于超产粮食的生产队，有的把一部分、大部分或者全部超产的粮食，奖给他们；对于超产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的生产队，有的也适当地提高这些产品的留量。在奖励中，有些生产大队还采用了“奖中有罚，罚中有奖”的办法，即在超产队中，劳动好的社员可以多得奖，劳动较差的社员少得或不得奖；在减产队中，劳动好的社员可以不赔，劳动特别好的社员，可以由生产队给予适当的奖励。这样，执行奖

罚时，在社员之间就进一步贯彻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三包一奖”制度，现在不仅在农业生产中得到普遍推行，而且在林、牧、副、渔各业生产中，也在有利于发展生产，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试行和采用。在“三包一奖”的期限上，对多年生的桑、茶、果树等生产，实行了一次包死、多年不变的办法；对于粮食和其他作物，有些条件比较好的生产大队，也在试行一次包死、两年或三年不变的办法，以便于生产队作长期安排，更好地加强经营管理，争取连年增产。

“三包一奖”制度，不仅适应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内容更加丰富了，而且各地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三包一奖”的形式。

第一，按亩、按作物来定产、定工、定成本。一般的作法是：根据固定给各生产队使用的土地的土质、水利等条件，按亩、按作物确定包产指标；根据按亩、按作物所需的一般用工数和所需的成本来确定包工、包成本的指标。年终按这个包定的“三包”指标结算。生产队的实际产量超过包产指标时，按其超过的一定比例提奖；达不到包产指标时，便按减产部分的一定比例赔产。用工和成本，一次包死，生产大队按包工数付给各生产队劳动报酬，按包成本数付给生产投资，超过不补，节余全部归生产队。这是“三包一奖”制度比较早的一种形式。一般的在各生产队之间自然条件相差不太悬殊，土地、劳动力、耕畜、农具也比较平衡的生产大队里，采用



的比較多。这种形式，在农业生产的产量、用工和成本等几个主要方面規定的很明确，划清了責任界限，因而在促进生产，貫徹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則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現在，仍有很多生产大队采用这种形式。

第二，“以产計工”。具体作法是：先按第一种形式那样訂出包产、包工和包成本的数目，再根据各生产队的包产总数和包工总数，算出全大队每一个包工所应完成的包产产量。譬如一个包工应当生产三十斤粮食。年終結算的时候，就按照这个标准，根据各生产队的实际产量計算出应得的工分总数，参加生产大队的統一分配。这种作法把产量和用工完全結合在一起，使工分的多少，取决于实际产量的高低，产量观点很明确，結算办法也比較简单。这个办法可以解决第一种形式中，由于有时包产、包工訂的不准确，而产生的实际产量高、包工少的生产队收入少，而实际产量低、包工多的生产队收入反而多的問題。这种以产計工的办法，是在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出現的，現在，有一部分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仍然采用。

第三，按包产定工、定成本。一般的作法是：先按第一种形式那样訂出包产指标，然后根据这个指标确定包工数和包成本数。确定包工数有两种作法：一种是按全生产大队的平均数計算。例如每百斤粮食需要三个包工。另一种是按土质、水利等条件的好坏，訂出几个标准，分別計算到队。确定包成本数也有两种作法：一种是按全大队的

平均成本数計算。例如每百斤粮食八角錢。另一种是按包产产值的一定比例，确定包成本数。年終結賬时，实产量超过包产指标的，按規定实行奖励；实产量沒有达到包产指标的，按規定实行賠产。这种形式，能够更好地照顾生产条件不同的生产队，有利于加强团結，調动生产积极性。

第四，“三合一”的包工办法。这种方法，在包产、包成本方面，与第一种形式相同，只是在包工方面，采取“三合一”的办法。就是：首先，根据每个劳动力在正常情况下能够做到的工分数，算出全生产队的出工总数；其次，按第一种形式的包工办法，計算出全队各种农活的一般需要工数；第三，像第三种形式的包工办法那样，按包产計算出包工数；然后，把这三个数加在一起，用三去除，得出的平均数，就是生产队对生产大队的包工数。这种形式是在自然条件特別复杂的生产大队里产生的。它既保证了生产大队的統一分配，又照顾到生产队之間存在的差別，使不同的生产队，例如土地多、劳动力少或土地少、劳动力多的生产队，粮食作物多或經濟作物多的生产队，土质好、用工較少或土质差、用工較多的生产队，都比較滿意。还有的地方，也是考虑到自然条件比較复杂的情况，使土质好、用工較少、产量高和土质差、用工較多、产量低的生产队的利益都得到照顾，采用了既按面积又按产量的包工方法。其作法是：把按土地面积包工数和按产量包工数加在一起，然后用二去除，得出的数字，就是实际包工数。这样做的結





果，有利于调动各个生产队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上面介绍的，只是实行“三包一奖”制度的几种主要形式。这些形式的出现，说明各地是在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因地制宜地实行“三包一奖”制度，也说明“三包一奖”的具体形式还在不断地产生和发展，处在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因此，各个生产大队究竟采用哪种形式，必须从本大队的具体条件出发，做到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巩固以生产大队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三级集体所有制，有利于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单凭主观愿望强求一律，是有害无益的。

### 三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实行“三包一奖”制度是一项细致、复杂的经济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农村人民公社一般地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从总的方面看，它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从具体的方面来看，它们之间有时又存在某些矛盾。同时，农业生产本身项目繁多，农业生产的对象又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各有其生长规律。就农作物的栽培来说，由于作物和品种上的差异，对于土壤、气候、水利、农时和增产措施等方面的要求，是千差万别的。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更不能完全控制。因而，在实行“三包一奖”制度的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考虑到这些特点，采取相应的方法和措施，把“三包”指标订得

切实合理。

在实行“三包一奖”制度中，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就必须做到“三包”指标一定要落实，真正为生产队所接受。其中又必须特别抓住包产指标落实这个中心环节。因为包产是“三包一奖”制度的中心。包工、包成本都是为实现包产指标服务的，而超产奖励，也是为促进包产任务的完成所采取的措施。包产指标一定要留有余地，以平常年景的实际产量为基础，使生产队经过努力，真正有产可超。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及时修订“三包”指标，也是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认为“三包”指标订好以后，就算完事了。“三包”的期限，一般的是一年，有的是两年或三年。在制订“三包”指标时，对于这样长时间内的生产条件的变化，特别是自然条件方面的变化，是不可能完全预料到的。因此，只要影响实现“三包”指标的客观条件有了变化，就应对指标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实践证明，“三包”指标，首先是包产指标如果订得不合理，或者条件变了不作相应的修改，都是有害无益的。同时，生产队执行“三包”的结果，凡是实际产量超过包产指标的，就必须按照规定的比例提奖，如数兑现；凡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而减产的，必须按规定赔产。只有这样，才能加强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制度的责任心。在奖罚兑现时，应该坚持多奖少罚的原则，从积极方面鼓励生产队增加生产，降低成本。

实行“三包一奖”制度，必须踏踏实实地做好细致的经济工作，严格实行劳动定额管



理和評工記分，搞好經濟核算和記清“三包”賬目。生产大队在全大队內統一分配給社員的产品和收入，是由生产队按照社員的劳动工分进行分配的。因此，认真地做好劳动定額管理和評工記分，才能如实地記錄每个社員在集体生产中所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到分配时据以付給合理的劳动报酬。这是“三包一奖”在社員中兌現的客观依据。經濟核算則可以正确反映“三包一奖”制度的执行情况，能够从中及时发现問題，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三包”賬目，要定期結算公布，接受社員群众的监督。賬目不清楚，也会影响“三包一奖”制度的坚持实行。另外，在实行“三包一奖”的过程中，生产大队对于困难較多的生产队，应该更多地給以必要和可能的帮助，使它們能够完成或超額完成包产指标，迅速发展生产。

“三包一奖”制度是由社員群众实行的，又同他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因此，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三包一奖”制度才能实行得好。这就是說，在实行“三包一奖”的全部过程中，要走群众路綫，发揚民主。实行“三包一奖”制度中的重大事情，如制訂“三包”指标，情况变化以后修訂“三包”指标，制訂和調整劳动定額，以及評工記分，奖罰兌現，搞好“三包一奖”的經濟核算等等，都要同群众商量，听取和尊重他們的意見。社員群众經常在田間劳动，对每一块土地、每一种作物、每一件农活，都非常熟悉。他們又有丰富的生产經驗和生产技术。只有同他們商量，才能因地制宜地实行“三包一奖”

制度。

实行“三包一奖”制度，需要非常細致的經濟工作，又需要非常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綫，离开政治工作，任何經濟工作都是不可能做好的。实行“三包一奖”制度也不例外。因此，要教育全体干部和广大社員，使他們充分地認識到国家、大集体、小集体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結合起来；使他們了解到超額完成包产任务和多劳多得的关系，集体超产和个人增加收入的关系，正确地处理在实行“三包一奖”制度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問題。要使各个生产队既要努力完成包产任务，又要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既要合理使用劳动力，提高工效，又要提高农活的质量；既要坚持勤儉办社的方針，千方百計地節約各項开支，又不能不顾生产需要，不适当地减少开支，或者应该追加而不追加生产投資；在超产奖励兌現方面，既要完成包产指标为准则，又要注意粮食及其他产品的质量。同时，还要教育干部，充分地認識执行“三包一奖”制度的重要意义，細致地解决实行过程中的各种具体問題。总之，要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密切地結合起来，使“三包一奖”制度，在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健全人民公社制度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把矿山工作放在冶金工业的首位

高扬文

冶金工业是生产金属材料的工业，冶金工业部门是国家的原料工业部门。冶金工业内部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一种是冶炼和加工，例如，炼铁、炼钢、炼铜、炼铝等和轧钢、有色金属加工的生产；一种是原料的生产，这就是铁矿、铜矿、铝矿和其他金属矿、非金属矿的开采。冶炼各种金属，除了煤炭等需要由其他工业部门供应以外，大量的和主要的原料，要取之于冶金工业内部的矿山。整个冶金工业的发展速度，在冶金工业内部，首先取决于冶炼加工和原料生产发展的比例。只有原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同冶炼加工生产的增长速度相适应，而且矿石生产走在前面，冶金工业才能顺利发展。这就是说，矿山是冶金工业发展的基础。发展冶金工业，必须首先发展矿石生产；建设冶金工厂，必须首先建设矿山。这是冶金工业生产过程的一条客观规律。如果违背了这条客观规律，冶金工业就不可能进行生产。因此，把矿山工作放在冶金工业的首位，大力加强矿山工作，增加矿石产量，提高矿石质量，使冶金工业原料的生产适应冶炼加工生产的需要，是我国冶金工业今年和今后几年的中心任务之一，也是发展冶金工业的一项

重要方针。

在三年大跃进中，冶金工业部门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政治挂帅和大搞群众运动，使我国冶金工业取得了高速度的发展。不但冶炼、加工生产是高速度的发展，而且矿石生产也是高速度的发展。三年来，我国建设了许多大中小型的铁矿、有色金属矿和非金属矿，使矿山面貌有了极大的改变。矿山生产的许多技术经济指标，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我国矿山工人在大跃进中，在生产、基本建设和运输等方面，创造了许多符合多快好省方针和适合我国矿山特点的新技术、新方法。所有这些，就使矿石生产的发展同冶炼加工生产的发展基本上相适应。

矿山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进行地质勘探，需要单独修建运输线路，需要剥离大量的土方、石方，或者掘进很长的坑道、竖井和斜井等。进行这些工程所需要的时间，比建设高炉、平炉、转炉等所需要的时间要长一些。如果说，建设一个一百万吨冶炼加工生产能力的冶金工厂，需要两年至三年的时间，那末，建设供应一个一百万吨冶炼能力的工厂所需要的各种矿石基地，至



少要三年至四年的時間，遇到交通条件困难或者地质条件复杂的情况，時間要更长一些。因此，尽管我們在矿山工作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就冶金工业内部两个部分生产的关系来看，目前，矿山生产仍然是整个冶金工业的薄弱环节。为了更好地完成冶金工业生产的任务，为了今后我国冶金工业的迅速发展，我們必須把矿山工作放在冶金工业的首位，在冶金工业的干部中，进一步树立重視矿山工作的思想，加强矿山的干部队伍。在矿山工作中，一方面要做好現有矿山的工作，管好用好矿山的設備，充分发挥現有矿山的潜力，提高矿石的产量和质量；另一方面要加速新矿山的建設，加速小矿山的技术改造，爭取在今后几年內，克服矿山生产这个薄弱环节，为我国冶金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創造更好的条件。

在矿山生产中，必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按照矿山特点去领导矿山生产。在这里，首先要解决矿山生产能力的接續問題，也就是正确处理矿山的生产和基本建設的关系問題。矿山生产同冶炼、加工生产不同，高炉、平炉、軋鋼机建設起来以后，在相当长的時間內，不需要更換主体設備，可以保持生产能力。而一个新建成的矿山投入生产以后，在基本建設时期准备好的可采矿量，經過一个时期就会采完。只有不断地进行新的基本建設，准备新的可采矿量，創造新的生产条

件，矿山生产才能持續下去。許多矿山，就整个矿区來說，虽然蘊藏着数量很大的矿量，但是矿石却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开采。一定部位的矿石是有限的，可供开采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为了使生产不致中断，就需要在这一个采矿場还没有采完时，就开辟另一个采矿場；在这一个中段或台阶还没有采完时，就准备下一个中段或台阶；在这一个矿井內的矿石还没有采完时，就要动手开掘新的矿井或者延伸原来的矿井。为了运输新采区的矿石和岩石，就要开掘新的搬运坑道或者修筑新的道路。有的矿山，还需要进行新的地质勘探工程。所有这些，都需要进行基本建設。只有这种基本建設工程和采矿生产密切配合、互相銜接，才能长时期維持矿山的生产。在一般的金屬矿山中，基本建設必須經常准备出三年以上的开拓矿量，一年半至两年的采准矿量，这样，矿山的生产能力的接續就不会发生問題了。因此，每一个矿山都要一面进行生产，一面进行基本建設，年年生产，年年进行基本建設，生产和基本建設交錯进行，直到所有的矿量采完为止。

矿山要一面进行生产，一面进行基本建設，这就不仅要求补充生产所需的备品、备件和材料，而且要求不断补充基本建設所需的投資、設備和材料。通常基本建設的投資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比如对新建矿山的那部分投資。而上面所說的那种基本建設的投資，主要是为了維持原有的生产水平。根据矿山生产的这个特点，我們除了应当按时供应矿



山生产所需的备品、备件和材料以外，在年度基本建设的投资分配和设备、材料的安排上，必须首先满足维持矿山原有生产水平的需要，然后再安排新的矿山建设，决不可以只注意扩大再生产的那部分投资，而忽视维持原有生产水平的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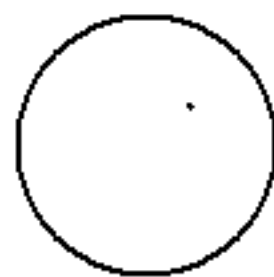
## 二

正确处理采矿和剥离（坑内采矿是坑道掘进）的关系，使剥离（掘进）和采矿保持适当的比例，在指导生产上，实行采矿和剥离（掘进）并举，剥离（掘进）先行的方针，也是做好矿山工作，发挥矿山生产潜力的一个重要问题。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关系，是决定矿山在整个存在时期内生产能力能否接续的问题，而采矿和剥离（掘进）的关系，则是决定矿山在当年是否能够正常生产的问题。矿山生产同其他工业生产一样，在生产之前，要做好准备工作。金属矿物许多都是埋藏在地下，就是露在地表之上，周围也复盖着表土或岩石。在采矿之前，虽然作了许多开拓工程，但是那只是做了主要的剥离、坑道、井巷和道路工程，并没有把采矿准备工作全部做完。因此，在采矿之前，还必须做许多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主要是剥离和掘进。如果是露天矿，在采矿之前，必须把复盖在矿物上面和周围的表土、岩石剥离掉，修好采矿场内部的道路。如果坑内开采，必须在地下掘出运输、提升的小型坑道、天井、溜井和安装机械，为采矿准备工

作场所。这些剥离和掘进，是开采矿石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不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就不可能进行矿山生产。

采矿和剥离（掘进）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而且这种比例关系，是随着地质条件的变化和开采年数的增长而变化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生产中，必须根据情况变化，随时调整比例关系，保证剥离和掘进走在采矿的前面。只有这样，矿山才能正常生产。在一般情况下，矿山经常保持三个月至半年的回采矿量，或经常保持百分之十以上的备用的采矿场，生产就能正常进行。如果剥离和掘进落后于采矿，回采矿量或备用的采矿场过少，生产就要受到影响，甚至会使生产中中断。

我们在领导矿山生产时，必须贯彻执行采矿和剥离（掘进）并举，剥离（掘进）先行的方针，坚持按比例进行生产，没有完成剥离（掘进）的任务，不能盲目地进行采矿。为了贯彻执行采矿和剥离（掘进）并举，剥离（掘进）先行的方针，必须要有具体措施，这就是要编制年度的和季度的采矿和剥离（掘进）计划，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年度和季度的采矿和剥离（掘进）总量和两者之间的比例，确定三级矿量应当保有的数量，作到心中有数，按计划进行生产。同时，要按剥离（掘进）的数量，配备必需的人员和设备，专人专职，专用设备专用，不能轻易调来调去，以确保剥离（掘进）任务的完成。这样长期坚持下去，矿山生产就会主动，生产的潜力也就能够发挥出来。





### 三

加速小矿山的技术改造，进一步发挥小矿山的作用，是冶金工业部门的一项战略任务，同大力加强现有的大、中型矿山工作有同等重要意义。

在三年大跃进中，冶金工业部门贯彻执行了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建设 and 加强大、中型矿山的同时，建设了大量的小型铁矿、有色金属矿和非金属矿。这些小矿山，生产了大量的矿石，不但供应了小高炉冶炼和小的有色金属冶炼企业的需要，而且部分地供应了钢铁、有色金属大冶炼厂的需要。以小型铁矿为例，一九六〇年的矿石产量，占全国铁矿产量的一半左右。小矿山已经成为冶金工业继续前进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现在的小矿山也有它的弱点，这就是机械化程度低，采矿一般都是手工劳动，运输主要依靠汽车和大车，生产不够稳定。因为机械化程度低，在生产上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很大，遇到大雨、大雪、大风，生产就要受到影响。小矿山这个弱点，不是小矿山本身特有的，而是因为来不及对小矿山进行全面的技术改造。只要实现了机械化，小矿山的这个弱点就会消除。从一九六〇年起，各地区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对小矿山进行技术改造工作。凡是实现了采矿机械化，修建了小铁路的矿山，生产面貌就大大改观，劳动生产率也有很大提高。为了使小矿山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矿石，充分发挥小矿山的作用，对

小矿山进行技术改造，是冶金工业部门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小矿山的技术改造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实现采矿和运输机械化、半机械化。在采矿方面，建设动力系统，创造采矿机械化条件，把手工采矿变成机械采矿，建设机械化通风和供水、排水系统。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而且可以抵抗自然灾害，保证正常生产。在运输方面，建设铁路，或者建设索道，实现运输机械化，改变小矿山厂外运输依靠汽车和大车的状况，就可以大大节约劳动力。小矿山技术改造的第二步，是实现精料方针，建立机械选矿系统。在现有的小矿山中，有一部分是富矿，可以直接送入高炉冶炼，不需要进行机械选矿。另一部分是贫矿，还有一部分矿石品位虽高，但含杂质较多，如果直接送入高炉冶炼，就要多消耗燃料或者影响铁的质量。属于这两种类型的矿山，都需要建设机械化选矿厂，进行选矿。

小矿山的技术改造，需要相当数量的设备和投资。小矿山所需要的设备，省、市机械工业部门都可以制造，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很困难。用于小矿山技术改造的投资，同建设大型矿山相比，是比较节约的，而且这些投资可以很快地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中收回来。因此，从建设速度上讲，从经济效果上讲，小矿山的技术改造都是必要的。

小矿山的技术改造，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应当有重点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全国小矿山的数目很多，不可能一下全部完成技术改





学方法，但是，金属质量的好坏，第一关不在冶炼方面，而在于原料的粗或精。如果能在矿山生产过程中采用选矿的办法，降低矿石所含杂质，不但可以减少冶炼过程中的困难，而且可以提高金属产品的质量。

使用精料可以大大节约燃料和运输力。冶炼金属需要大量燃料熔化石，在冶炼过程中，矿石中杂质越少，燃料就越省，反之，燃料就越费，因为很多燃料为熔化杂质而消耗掉。在炼铁中，铁矿石品位每提高百分之一，焦比可以降低百分之二。石灰石有效氧化钙每提高百分之一，焦比可以降低百分之一。而铁矿石含硫每高百分之一，焦比就要升高百分之二至三。冶金工业的运输量是很大的，每产一吨钢，运量是三十吨左右。主要运输的是煤、矿石和渣子，金属本身只占一小部分。矿石品位提高了，消耗定额降低了，焦比也降低了，厂外运输量相应地就可以大大减少。矿石的品位和质量提高了，渣量就减少了，厂内运输量也就随之而减少。

当然，矿石品位的提高是有限度的。品位的提高和选矿回收率有密切联系，在一定范围内，提高矿石品位，选矿回收率不会降低，而超过一定范围，选矿回收率就要降低，大量金属就要流失，如果流失的金属量超过由于品位提高在冶炼过程所获得的经济效果，就会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究竟多高的矿石品位是合理的、经济的，不致于降低选矿回收率，各个矿山应当根据不同性质的矿石，进行科学研究和科学计算，找出自己的

矿石品位和选矿回收率的合理界限。

在冶金工业系统贯彻执行精料方针，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深入地进行教育，使矿山全体职工，特别是领导干部，认识精料的重大经济意义，树立巩固的质量第一的思想，从采矿开始，在每一个生产过程，都按精料方针进行生产。另一方面，要逐步地建设选矿厂和加强选矿厂的领导。现在，许多矿山还没有机械选矿厂，需要在几年的时间内，把应该建设的选矿厂都逐步建设起来。机械选矿是贯彻执行精料方针的重要措施，应该选矿而不选，矿石的质量就得不到根本的改善，共生的金属，也不能回收利用。同时，有选矿厂的矿山要加强对选矿厂的领导，提高选矿厂的设备利用率和选矿回收率，既要多选矿，又要减少金属的损失。

## 五

目前，我国金属矿山的生产作业和基本建设作业，许多环节还是手工劳动，就是机械作业的矿山，也还有很大潜力有待于挖掘。因此，在矿山继续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变手工劳动为机械化、半机械化劳动，把现有设备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就有很大的意义。

我国金属矿山有许多特点，同时，矿山的采矿、选矿和运输以及打眼放炮的方法，又都在日新月异地变化，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就可以不断创造出适合我国矿山特点的采矿、选矿和运输等新方法。例如，



在我国铁矿中，赤铁矿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赤铁矿，一般的品位虽然比较低，但却是国家宝贵的资源，应当充分利用起来，因此，需要创造一套多快好省地选赤铁矿的新的选矿方法。我国铜矿中氧化铜的数量也是很多的，需要设法提高氧化铜的选矿回收率，充分利用这些氧化铜矿。其他如选矿方法怎样简化，选矿药剂怎样就地取材，也是急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在运输方面，我国矿山地势一般较高，垂直运输的距离大，创造一套适合这种特点的运输方法，对加速矿山建设，节约基本建设投资，增加产量，降低成本，都有很大的关系。我国木材比较缺乏，在矿山怎样少用坑木，或以其他构件代替坑木，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用的采矿和选矿机械重型设备很多，怎样改进这些设备，既提高效率，又减少重量，也需要逐步研究解决。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我国矿山中，继续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在三年大跃进中，我国矿山工人不仅发挥了冲天干劲，而且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有许多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对我国金属矿山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在一部分露天矿山中，用溜井或溜井同平巷相结合的运输方法，代替火车或汽车盘山运输的方法，既加快了建设速度，又节约了投资。又如，在采矿场内短距离的运输，利用地形坡度，采用自动滑行的办法，比人力推车或小电机牵引矿车，提高了运输效率，节约了运输

设备。在平地建设矿山的矿仓，结构复杂，容积又小，是很久以来影响矿石生产而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许多矿山利用山坡建设斜坡矿仓，工程简单，容积又大，就从根本上克服了过去矿仓的缺点。在选矿方法上、在机械设备上，也都有许多适应我国矿山特点的新创造。但是，同冶炼工业比较起来，矿山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开展还是不够的。三年来，在高炉、平炉、转炉和电炉冶炼方面，已经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技术操作方法，而在矿山方面，还没有成套，并且有些好的创造，也还没有普遍地推广。这就加重了矿山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任务。为了贯彻执行把矿山工作放在冶金工业首位的方针，加速矿山生产的发展，必须对已经创造的、行之有效的新技术进行巩固、推广和提高，并且不断创造采矿、选矿和运输的新技术，充分利用我国地下资源，迅速增加矿石产量，提高矿石质量。

\* \* \*

矿山工作的任务是艰巨的、复杂的，矿山的建设是需要较长时间的。但是，在三年大跃进中，我们已经建设了一个相当雄厚的基础，取得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矿山的经验，对矿山生产过程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只要认真贯彻执行把矿山工作放在冶金工业首位的方针，在今后几年之内，矿山工作一定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矿山的生产一定会大大地发展。



## 肯尼迪岂能扭转历史潮流

郭济洲

肯尼迪上台半年多了。在这半年多当中，他不只一次地谈到关于历史潮流的问题。他说：“历史并不是逆着我们走的，而在最终是顺着我们走的。”“我不相信历史的潮流一定在哪一边。只有我们自己决定要做什么，我们要把历史潮流转到哪个方向，我们才能成功。”

肯尼迪的这些话，看起来好像表示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信心，实际上却是反映着腐朽没落的美帝国主义的狂妄和无知。

历史潮流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历史的发展总是这样：较低级的社会经济形态一定发展到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生的力量一定胜过腐朽的力量。在客观规律面前，人们虽然不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归根到底，人们绝对不能改变或者废除客观规律。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的人物，他们自恃具有超越一切的才能，把自己阶级的腐朽的力量看作是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妄图扭转历史潮流。可是，没有一个不是碰得头破血流，而为历史潮流所淹没。

肯尼迪很喜欢谈历史，但是看来他对历

史了解得并不多。历史的发展表明：无论哪一种社会制度，当它还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灭亡的。但是，只要它不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反，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的时候，它的灭亡就是不可避免的。原始社会让位于奴隶社会，奴隶社会让位于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又让位于资本主义社会，这都是不可避免的。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一切矛盾急剧尖锐化了。按世界规模来说，资本主义已经从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变成阻挠社会发展的因素。半个多世纪的无数事实，证明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决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定要在新的合理的世界中生活。这就是当代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自恃拥有庞大的实力，就可以违抗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意志，实现它独霸和奴役全世界的计划。它纠合世界上一切反动力量，以便去同历史的潮流作战。结果，尽人皆知，美帝国主义遭到了历史的惩罚。杜鲁门、杜勒斯、艾森豪威尔等等，都接连败北。





六十年代新的緊張的斗争开始了，美国壟断资产阶级挑选了肯尼迪。而肯尼迪自己也以扭轉历史的潮流为己任。他以用新人、行新政相标榜，说什么他的上台“意味着改变，也意味着重新开始”。

可是，形势比人强。肯尼迪虽然装出了具有信心的样子，实际上却是異常恐惧的。他在上台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就对美国政府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描繪了一幅阴暗的图景。肯尼迪說：“我們將必須重新考驗一下，像我們这样組織起来和进行治理的国家是否能够存在下去。結果并不是肯定的。答案并不是清楚的。”当时法国《巴黎日报》說：“一个美国总統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无上优越性，甚至它的存在能力提出問題，这还是第一次。”

現在，半年多过去了，情况也更加清楚了。在偉大的历史潮流面前，肯尼迪的遭遇，甚至还不如他的前任。

肯尼迪坚决执行着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同时装出一副“和平”的样子。可是，当肯尼迪的“和平战略”还没有完全摆弄开来的时候，肯尼迪政府就用自己的行动，揭露了它的凶神恶煞的本来面目。特别是肯尼迪政府派遣雇佣軍入侵古巴遭到惨敗，不但丢掉了几年来美帝国主义苦心培植的古巴反革命力量的大部分，而且把肯尼迪竞选总統以来伪装和平所积下的政治資本差不多丢光了。

肯尼迪上台以后，就主張要更加疯狂地扩軍备战，叫囂軍备必須“不受任何規定的

預算限額的約束”。肯尼迪在半年中，三次大規模地增加軍事預算，把美国的备战計劃推进到最高峰。肯尼迪认为“應該給予導彈計劃以最大的优先权”。應該說，肯尼迪政府在发展導彈生产方面，已經开足了馬力。可是，連美国的反动报刊也承认，美国同苏联之間的“導彈差距”越来越难以“弥合”了。苏联成功地連續发射了两艘載人宇宙飞船，美国在尖端科学技术方面被苏联抛得更远了。

肯尼迪上台的时候，曾經說：“在欧洲，我們的联盟有空白，而且有点混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团結受到經濟上的竞争的削弱，部分地受到了国家利益的侵蝕。它还没有把它的力量充分动员起来，也还没有完全取得共同的想法。”他号召加强帝国主义陣营的团結，把改善美国同它的盟国的关系当做一項重要的任务。半年以来，美国同它的盟国进行了极为頻繁的接触，举行了多次的会談。肯尼迪还亲自到巴黎和倫敦移樽就教。但是，它們之間的矛盾，沒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更为低落了。六月一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写道：“美国在扮演西方联盟領袖的角色方面遇到了問題”，“不管肯尼迪总統对巴黎、維也納和倫敦所作的旋風式的旅行会有些怎么样的結果，单是他进行这次訪問的事实，就已經在欧洲中心地区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一个躊躇畏縮的美国正在拚命設法恢复冷战中的西方領導权。”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后期，美帝国主义



就把古巴、老挝、刚果这一些国家当做“麻烦地区”。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对这些国家实行了所谓新政策。可是，对于美帝国主义说来，不但没有能消除这些地区的“麻烦”，而且使自己更加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肯尼迪妄图阻止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但是，这个广大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仍然在不断向前发展。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的这个半年，是美帝国主义继续遭到不断失败的半年，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的半年。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当代最广泛、最伟大的斗争。参加这个斗争的，包括全世界各国的人民，他们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个斗争，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因而，它是不可抗拒的。

现在，巩固团结和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成为世界局势的决定因素。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革命运动剧烈地震撼着帝国主义的统治。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已经接近完全崩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总人口十六亿五千万人中，有五亿六千多万人，即占全球居民的百分之三十四的人口，是属于被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而现在的局面却迥然不同了。在全世界总人口二十九亿人中，殖民地人口只有一亿多，占全球

居民的百分之五左右。

肯尼迪提出六十年代的主要斗争，是要夺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的中间地带。在这个广大地区，许多国家已经取得独立，另一些国家正在争取独立。这些国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经济还很不发达，文化还很落后。这些国家的人民，正在为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而进行斗争。肯尼迪认为，这里存在着大好的机会，只要拿出一些美元作为钓饵，装作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提高文化的样子，就有可能阻止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达到它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目的。可是，斗争中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日益懂得，他们的国家之所以贫困和落后，主要是新老殖民主义者长期奴役和掠夺的结果。肯尼迪的任何甜言蜜语都掩盖不了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实质。肯尼迪在拉丁美洲推行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说是要拿出五亿美元来帮助拉丁美洲各国发展经济和文化；但是，美国垄断资本从拉丁美洲各国掠夺的利润，每年就高达数十亿美元。古巴总理卡斯特罗说得好：解决拉丁美洲的贫困和饥饿的问题，“并不需要五亿美元的施舍，而需要另一样东西：从外国人手里收回国家财富。”“我们的美洲决不是用任何方式所能收买的”。

肯尼迪害怕苏联、中国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人民的影响，说什么这些地区的人民“不了解他们自身生活中自由的意义”，因而“对苏联和



中国的榜样有深刻的印象”。

帝国主义者同人民是没有共同的语言的。肯尼迪所说的“自由”，就是要维护殖民统治，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处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奴役和掠夺之下，不给他们以任何自由。对于这种“自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早已领教过了。正因为这样，这个广大地区的人民才要起来，为摆脱新老殖民主义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对苏联和中国的榜样有深刻的印象。”这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人民说来，是清清楚楚的。肯尼迪在这里承认了一个他不承认的事实：社会主义国家，是已经独立和正在争取独立的各国人民的忠实朋友。社会主义国家一贯认为，给予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掠夺而斗争的人民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是自己的光荣的国际义务。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支援，是完全符合被支援国家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同时，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又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斗争中日益懂得，在帝国主义时代，必须取得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使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彻底的解放。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革命力量的团结和相互支持，是当代国际斗争中最重要的特点。肯尼迪害怕这两股力量的团结，妄图扭转历史的潮流，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肯尼迪政府所执行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但遭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独立国

家和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在帝国主义国家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也遭到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对。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正在继续发展，并且同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权利、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

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说：“这几年的主要总结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和它的国际影响的急剧增长；殖民主义体系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下迅速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阶级搏斗日益加剧；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更加衰落和腐朽。在世界舞台上，社会主义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和平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战争力量。”

这就是对于当代历史潮流的最科学、最简要的概括。

一切尊重事实的人，都不会不承认这个著名的论断。可是，对于腐朽的反动势力来说，他们在反动阶级立场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支配下，是不可能认识真理的。肯尼迪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尽管历史潮流的趋势是如此明显，肯尼迪还在那里大谈要把历史引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甚至以为他“决定”要做什么，就能得到成功。

七月十八日美国《纽约时报》总结肯尼迪上台六个月的文章写道：“在肯尼迪政府当政的头六个月中，美国对外政策基本上同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时期一样，但是变得更灵活和更富于冒险精神。”肯尼迪政府并不甘心



在古巴和老撾的失败，仍然坚持对古巴和老撾的侵略政策，并且准备在这两个国家重新挑起战火。肯尼迪政府在积极准备全面核战争的同时，特别着重搞局部的常规战争。最近，又借口所谓柏林危机，实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宣称“决心冒任何危险”。肯尼迪政府的这种冒险性，值得全世界人民引起高度的警惕。

但是，历史的潮流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经过多年国际斗争的结果，美帝国主义所处的地位越来越软弱了。肯尼迪政府上台半年多来的事实证明，每当世界各国人民起来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给它以有力

的回击的时候，它就不得不被迫退让。我们既要看到肯尼迪政府的冒险性，又要看到它的软弱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它要不断地进行冒险；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虚弱的，所以它又是软弱的。我们从来认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战略上必须藐视它，战术上必须重视它。在斗争中日益觉悟的各国人民，依靠自己团结的力量，采取正确的路线，进行长期的斗争，一定能够取得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大江流日夜，历史的洪流汹涌奔腾地前进着，肯尼迪只能徒呼奈何！



高粱（套色木刻）

杜鸿年

